傳播研究與實踐

科技部TSSCI期刊

第7卷 第1期 2017 年1月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溝通

導言：從末日預言到溫水煮蛙的警訊／徐美苓

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包裝與呈現對環境友善行爲意圖的影響／施琮仁

緩慢開展的危害再現：媒介報導中的旱災、風險及氣候變遷論述之語料分析／郭文平

風險溝通、媒體關注與框架分析：以新聞再現企業環境相關議題爲例／楊意菁

誰的風險？誰的管制與檢測標準？蘭嶼核廢料爭議之研究／范玫芳

研究論文

另一種「新聞攝影」？——以「洪仲丘事件」中Facebook粉絲頁爲例，初探社群平臺之影像傳播／區國強、陳百齡、潘金谷

紀錄作爲創傷的療癒：從《赤陽》、《漫漫哀傷》到《怒祭戰友魂》／蔡慶同

中國新聞傳媒的組織場域、領導風格與文化：以《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爲例／王毓莉

有線電視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研究／莊春發

口述歷史專題

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煮吃師傅」口述史與社會記憶／陳玉箴

典籍再現

從傳播的偏向到STS：再探Harold Adam Innis 傳播理論的關鍵元素／王淑美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世新大學 舍我 紀念館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1-4．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1

導言：從末日預言到溫水煮蛙的警訊

徐美苓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於 1956 年出版《風險社會》一書時，並未受到很大關注。該書於 1992 年譯成英文，同時隨著全球性風險議題一一浮現，「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概念逐漸被學界及公眾接受，也凸顯貝克半世紀前的先知灼見。到了 21 世紀，來自健康、金融、政治與環境等範疇的災難或危機案例，在在提醒世人對相關議題的風險溝通刻不容緩，也召喚了不少跨領域學者投入研究。簡言之，風險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知識的不確定性，也就是我們或許知道該危險（hazard）發生的機率，但無法知道危險何時會發生，這個特性在論及緩慢進行並具累積性危害的環境議題最為明顯，而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無疑是當今國際上最受矚目的此類環境風險問題。

論及氣候變遷及相關環境問題的風險溝通，我們腦海中自然浮現出好萊塢電影中的世界末日情景：基於人類過錯或上帝旨意，災難鋪天蓋地降臨地球，令人無所遁逃。然當今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問題早自工業革命以來便開始累積，緩慢發展迄今終一一不預期爆發，事實上更適合用「溫水煮蛙」的比喻形容之。雖說有科學家對溫水是否真能煮熟青蛙的效應不以為然，但多數人對此效應的寓意並不陌生：若我們沒有早點警覺問題（也就是水溫的不斷增加）已發生，仍沈醉於當前的安逸舒適，久而久之，我們便會失去自救的能力。也就是說，隨著全球極端氣候的愈形險峻，與其坐以待斃，任由末日災難宰割，我們不如趕緊從溫水中跳出，共同尋求解決之道。由此，世界各國紛紛簽署約束碳排放量的巴黎峰會協定，包括政府、民眾、企業、民間團體及媒體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如何因應也備受關注。本期專題即以「氣候變遷與環境風險溝通」為主軸，希望能從各種角度描繪出多元之風險溝通面貌。

氣候變遷研究最關注的利害關係人不外乎是普羅大眾，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

* Email: mlshiu@nccu.edu.tw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之一即為如何喚起民眾對氣候變遷嚴重性的認知，因而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一如其他風險議題的傳播，恐懼訴求（fear appeals）是氣候變遷問題常見的再現方式，北極熊在融冰上哀嚎、異國高山冰河線的退縮、非洲大片的乾旱田地等畫面持續出現在媒體中，然這些日積月累的恐懼訴求能否進一步激發民眾的因應行動呢？早在 1950 年，耶魯學派的賀夫蘭等人便提出所謂的「驅力模式」（fear-as-acquired model），認為受眾內心被激發的恐懼可視為改變行為的驅力，亦即透過接受訊息中的建議，可以降低恐懼以及導致改變態度或行為。回顧過往健康宣導成效研究，便可發現恐懼訴求是經常被使用也是引起最多爭議者。相關研究也提醒我們恐懼訴求訊息量和採取的行動間是否呈現直線關係，結果並不一致，且有不少研究說明恐懼訴求的效果有限，因此有關恐懼訴求的運用重點已不再是有效與否，而是在什麼情況下是有效的說服策略？若有效的話，我們又該如何設計訊息內容？

循此脈絡，本期專題的第一篇論文〈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包裝與呈現對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影響〉，便以影片訊息操弄的實驗設計方式，探究氣候變遷議題可能引發的負面恐懼情緒及其後續影響的機制及情境。作者施琮仁延伸 Stúrmer、Simon 等學者發展的「雙路徑模型」（dual pathway model），此模型途徑之一預設個人在接觸氣候變遷訊息時會先判斷該訊息呈現風險的相關性，據以觸發相關情緒；途徑之二則涉及個人對所屬群體應對相關風險能力之評估，此「集體效能」越強者越有可能採取因應的環境友善行動。施琮仁比較集體效能與著重個人層面的「自我效能」及對行動建議有效性評估的「回應效能」之影響，發現此三種效能雖皆能中介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但與恐懼訴求引發的負面情緒產生交互作用後卻各有不同的效應。此發現對後續研究的啟示為：除了對行動效能需有更精準的測量及分類外，我們也不能忽略行動效能與情緒產生的交互作用過程。由此，在推廣氣候變遷傳播的實務上，訊息的溝通也需更著重在設計有效促發民眾環境友善行為的行動效能類別上，而非無差異地增強各種效能感。若再進一步延伸，我們發現無論是傳播或其他著重在「感知」（perception）相關領域的研究，常聚焦在探究何以個人會認為某類負面訊息或事件較可能發生在其他人而非自己身上，因而削弱自身行動力，例如 Neil D. Weinstein 等人提出的「樂觀偏誤」（optimistic bias）論述。就氣候變遷風險溝通範疇言，剖析這種被認為是偏誤的感知與各類行動效能之間的關聯，或可更深化前述交互作用產生機制的解釋，我們也拭目以待後續的相關研究。

除此，媒體如何再現氣候變遷議題的各面向也素為環境傳播研究大宗。雖然

airiti

多數民眾仍仰賴人際管道與社會網絡作為個人風險的評鑑依據，然一旦牽涉影響社會、而非僅個人層級的風險判斷時，媒體報導扮演的角色則不可忽視，而氣候變遷的風險正屬於社會層級。就表現來看，強調時效性的媒體往往很難觀察到不易顯見的長期氣候風險問題，即使報導了，媒體的框架或再現是否反映出合理或合時宜的因應方式不得而知。本期專題的第二篇論文〈緩慢開展的危害再現：媒介報導中的旱災、風險及氣候變遷論述之語料分析〉，即針對 2014 ~ 2015 兩年主流平面媒體就臺灣旱災的報導進行質量並行的語料分析（corpus analysis）。作者郭文平指出旱災的影響層面深遠且具有日常性，其風險卻因其緩慢開展的性質常被低估或錯估。其研究也發現旱災的媒體再現仍舊框限在人類必須戰勝大自然前提的對抗論述中，強調水的供給面，忽略長期旱災趨勢與氣候變遷風險的連結，無怪乎在地民眾原以為只會影響遙遠開發中國家的旱災，實際上早已開始漸漸侵蝕著自己的國土。郭文平的研究除了點出氣候變遷議題再現的新關注面向，喚起我們對日常生活用水文化的反思，也開展了新的媒體文本分析方式。其所使用的語料分析方法，即依據大量電子化文本資料並輔以之軟體程式的分析，目的在於找出文本中語言運用規則及模式，過去常用於語言學領域中。面對當今各類新舊媒體報導的鉅量資料，既有的量化內容分析或質化文本分析方法恐已難捕捉到媒體資料的全貌及發展趨勢，語料分析的借用可謂開闢了新的研究取徑。除了旱災議題，我們也期待未來此方法能應用在更多的風險議題再現分析研究中。

本期專題第三篇論文〈風險溝通、媒體關注與框架分析：以新聞再現企業環境相關議題為例〉，將研究焦點轉向另一個利害關係人——企業。隨著氣候變遷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漸受矚目，越來越多企業領悟到增加成本、聲譽損害與環境問題的密不可分，因而也將諸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意識注入於企業活動中。此觀念的改變本立意良善，可使企業瞭解到與其社會之間的關係需更著重在環境永續的共生，而非侷限於商品消費的經濟意涵。作者楊意菁透過縱貫面（1997 年 ~ 2014 年）與橫斷面（2014 年）的分析，一探企業環境風險溝通議題的媒體再現。其分析卻發現透過媒體再現的企業與環境議題仍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量，而忽略企業對整體環境議題的責任。此研究不僅延伸過去公共關係研究在企業社會責任面向的分析，其從企業風險溝通角度切入，也突破及可豐富以往氣候變遷傳播的研究視野，並帶來反思新課題。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強調特定企業與環境面向於報導中，其背後是否牽涉媒體內部的業配慣習或也屬某種商業置入？這個脈絡的釐清除有助閱聽眾理解企業與

airiti

媒體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可呼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研究及實務工作長期投入的目標，並為之注入企業與媒體關係探討的新素材。

最後，環境議題的風險溝通牽涉到權力及正義的施展。包括核能在內的替代能源（alternative）使用，在近年來也被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問題的討論中。然核能的發展及相關論述不只弔詭，也具高度爭議性。美國於 1950 年代視核能發展為民生用途，臺灣則於 1970 年代將核能列為國家十大建設之一。隨著美國三浬島及前蘇聯車諾比等重大核災事故的發生，使得國內外反核運動成為環保運動大宗；21 世紀氣候變遷問題的顯見，核能又翻身成為可降低排碳量的乾淨能源；但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的發生，對核電存廢的激烈論辨再起，相關民意也隨著媒體報導有著起起伏伏的變化。然當多數論辯集中在核能電廠的興建，既存的核廢料處理問題卻相對乏人問津。核廢料處理是環境也是民眾健康問題。在本期專題的第四篇論文〈誰的風險？誰的管制與檢測標準？蘭嶼核廢料爭議之研究〉中，作者范玫芳結合環境正義和科技與社會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風險評估與管制爭議，試圖重構具賦權意涵的風險溝通。透過文件分析、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等多重方法交叉剖析，范玫芳的研究發現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爭議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的交錯，以及「應做卻未做的科學」。由此，相關議題的風險溝通也需奠基在環境正義的彰顯上；而核廢料問題所涉及錯綜複雜的科技風險，點出未來跨領域研究投入的重要性。

從風險社會概念所衍生出的風險溝通論述中，我們發現因應氣候變遷或其他環境風險問題時，重思各利害相關者如何概念化問題及因應方式仍需繼續發展。本期專題的四篇論文雖廣及四個不同氣候變遷或環境議題的利害關係人面向，畢竟也僅觸及冰山之一隅。我們期盼未來有更多傳播或跨領域研究的投入，一方面深化相關論述的內涵，另方面可共謀在行動或實務上的解決之道。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5-36．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2

從雙路徑模型探討風險訊息的包裝與呈現對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影響

施琮仁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摘要

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能否減緩，取決於環境友善行為的實踐。本研究以集體行動之雙路徑模型為基礎，聚焦於負面情緒與效能感，藉以討論風險訊息的呈現與包裝如何能有效增進民眾的行為意圖。透過實驗法（$N = 211$），本研究發現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有助於增強相關性認知，而相關性的提升會導致較高的行動意願；民眾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後也會產生負面情緒，進而強化行動意願，此為情緒導向之因應路徑。另一方面，在風險訊息中提供行動建議能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間接提升各種效能感及行為意圖，此為問題導向之因應路徑。結果也指出負面情緒的作用對於具有低回應效能感、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為顯著，顯示效能感的作用可能會因情境而不同。

關鍵詞：效能感、氣候變遷、集體行動、環境友善行為、雙路徑模型

* Email: tjshih@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9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7 月 19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氣候變遷可說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國際環境議題，因為其影響不僅跨越國界，更跨越世代。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 2013 年發布的第五份評估報告（AR5），地球氣候系統從 1950 年後逐漸暖化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而人類活動極有可能（extreme likely）[1] 是造成氣溫升高的主要原因 (Lorenzoni & Whitmarsh, 2014)。該報告也預估，若不採取任何措施，地表溫度在 2100 年時最高可能增加攝氏 4.8 度。因此，如何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便成為了氣候變遷風險溝通中的重要議題。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15 年 3 月針對 40 個國家進行調查，詢問該國最關注的國際威脅為何。結果指出，有 19 個國家的民眾（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高碳排放國家）將氣候變遷排在第一位，排名高於經濟不穩定、伊斯蘭國、伊朗核武計畫等議題 (Carle, 2015, July 14)。在臺灣，聽過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的人數逐年上升，從 2009 年的 78.6%，到 2011 年的 82.4%，再到 2013 年的 85.3%。此外，超過九成的民眾也都相信全球暖化會在未來幾年對臺灣環境產生重大衝擊 (M.-L. Hsu & Shih, 2014)。然而，現有研究也發現，雖然民眾對氣候變遷的知曉、關注程度很高，但實際減緩行為的落實似乎並沒有跟上腳步 (Kollmuss & Agyeman, 2002; Shaw et al., 2009; Sterman & Sweeney, 2007)。此狀況顯示現階段的公眾溝通應該要從過去注重風險認知的提升，轉而聚焦於實際行為或行為意圖的促發。

關於如何讓民眾採取環境友善行為，學術界長期以來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從認知的角度出發，舉凡民眾的環境信念 (O'Connor, Bard, & Fisher, 1999)，以及對氣候變遷的關切程度 (Semenza et al., 2008)、對發生原因及可能後果的瞭解多寡 (O'Connor et al., 1999)、整體風險感知 (O'Connor et al., 1999) 都是影響其行為的關鍵因素。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情感（affect）才是行為改變主要的驅力，尤其是恐懼、擔憂等負面情緒。雖然研究發現恐懼、罪惡感的確能讓民眾更願意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但拿捏不當也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 Feinberg & Willer (2011) 發現恐嚇語言會讓民眾更不相信氣候變遷；O'Neil & Nicholson-Cole (2009) 也發現恐懼訴求對於民眾行為並無正面效果。

---

1 人類活動和地球暖化的關係，在 IPCC 的各個評估報告中皆有估計，第五次評估報告使用了「極有可能」的字眼，在統計上代表 95% 的確定性，比過去更為肯定。相較之下，2001 年發布的第三次評估報告僅有 66% 的確定性，而 2007 年的第四次評估報告則認為人類活動「很有可能」導致地球暖化，代表了 90% 以上的確定性。

airiti

不論出發點為何，現有的研究大多將節能減碳行為當作個人內在因素所造成的結果，鮮少在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此一議題。如前所述，氣候變遷和全體人類活動有關，其影響也跨越國界、物種，且要解決此環境問題也無法靠單一個人之付出，而是需要群體合作之力量。因此，氣候變遷可視為一種集體危害（collective disadvantage），而節能減碳行為則可以被視為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因為這些行為需要群體共同執行，並且是以改善整體情況為目標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2)。

在集體行動的觀點下，Stürmer、Simon 等學者發展出一套能夠解釋民眾因應策略的模式，稱為雙路徑模型（dual pathway model）(Stürmer & Simon, 2004; 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根據此理論，民眾在面對集體危害時會先判斷該危害對於本身或所屬群體的相關性，一旦危害被判定相關，民眾就會啟動兩類因應機制，第一類是相關情緒的觸發，而第二類則是評估群體對於該危害是否有應對之能力。因此，根據此理論，民眾採取節能減碳行為與否，一方面和氣候變遷可能引發的負面情緒有關，通常是恐懼；另一方面則和得以解決問題的各種效能感有關，尤其是集體效能感。前者稱為情緒導向之因應路徑（emotion-focused coping），後者則為問題導向之因應路徑（problem-focused coping）。

本研究除了以雙路徑模型為基礎，更在兩個面向加以延伸。首先，在問題導向策略方面，此模型所著重的是對群體因應能力的評估，也就是集體效能感；然而，在氣候變遷情境下，其他類別的效能感（例如自我效能、回應效能）也是促成行為的關鍵要素 (Lubell, Zahran, & Vedlitz, 2007)，應該一併討論。第二，雖然雙路徑模型認為人們會先評估議題的相關性，再決定因應方式，但相關研究鮮少加以驗證；也就是說，議題相關性是否會導致後續兩類因應作為，還缺乏研究支持，本文將實際檢視此一預設，以彌補經驗證據之不足。

在氣候變遷風險溝通方面，本研究也能提供實務上的貢獻。過去政府或企業在傳播氣候變遷議題時經常使用恐懼訴求，亦即強調此環境問題的負面影響，以提高民眾的風險感知。此外，在宣導節能減碳行為方面，政府也常使用條列式的行為提示，期盼民眾遵循，環保署的「十大無悔宣言」活動即是一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 年 4 月 14 日）。這些溝通手法都僅考慮單一因應路徑，而沒有同時考慮情緒及效能感，也尚未有研究評估此類宣傳方式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採用實驗法，一方面透過框架手法操弄議題相關性，以觀察相關性能否促發後續兩種因應路徑——情緒導向及問題導向路徑——如何影響民眾行為。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操弄訊息提示（包括沒有提示、個人行為提示、集體

airiti

行為提示），以瞭解行為提示是否能為民眾所提取利用，進而影響不同類別之效能感及後續行為。

貳、文獻探討

一、氣候變遷議題的特性

在雙路徑模型中，要促發後續反應的第一步是相關性的判斷。故在詳細討論雙路徑模型的內涵之前，必須先檢視氣候變遷議題的本質，作為瞭解影響民眾行為意圖的基礎。以下段落將呈現民眾對於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性的看法，以及提出增加此議題相關性的手法—框架。

（一）氣候變遷和個人的相關性

不論國內外的研究都發現人們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的關聯性不高。一份美國耶魯大學的調查顯示，65% 的受訪者表示氣候變遷會影響到下個世代的人們、植物及動物，但僅有不到四成（38%）的民眾認為會影響到自己 (Leiserowitz et al., 2014)。國內學者則發現，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會對其他國家環境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卻只有 76.7% 的民眾認為臺灣會受到相同層次的影響（徐美苓、施琮仁，2013）。也就是說，氣候變遷對於人們來說具有心理距離感 (Spence, Poortinga, & Pidgeon, 2012)。

根據解釋層級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人們對外在事物的理解，有賴於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建立，而這些心理表徵又有不同的層次。低層次代表個人對事物的理解是具體的、無結構的，以及因情境而異的；而高層次代表人們以抽象、有系統、去情境化的方式來理解外在事物 (N. Liberman & Trope, 2008)。通常一件事會被用何種形式理解，和個人能有多少直接經驗或能獲得多少資訊有關。例如，當某事件發生在「此時此地」，人們能透過實際目擊經歷該事件並獲取具體訊息，因此相較於發生在遠處或是未來的事件，較容易用低層次的方式理解 (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

當一件事物被抽離其特殊情境、一些具體的細節遭到省略時，其抽象、理解層次即隨之提高，容易讓人們覺得離自身較為遙遠，也就是有較大的心理距離感。此領域的學者將心理距離感區分為四個面向，分別是實際距離（發生在本地或國外）、時間距離（發生在現在或未來）、社會距離（自身或是他人），以及不確定性（會不會發生）(N. Liberman & Trope, 2008; Trope et al., 2007)。而研究

airiti

顯示，人們認為氣候變遷在此四大面向都有距離感。首先是氣候變遷的發生與否仍具爭議，故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面向）；而即便氣候變遷真的存在，也會在許久以後才產生影響（時間距離面向）。此外，如前所述，民眾傾向認為該風險較可能影響到國外的他人（實際及社會距離面向）(Milfont, 2010)。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僅在實際距離的範圍內討論議題相關性，因為地理位置的遠近是人們最能具體想像的特徵。Scannell & Gifford (2010) 的研究發現若氣候變遷影響的地點是個人覺得重要、相關的，民眾便較有可能採取環境友善行為。而在臺灣的情境中，Shih & Lin (2016) 也發現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會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及引發負面情緒，進而提高民眾採取環境友善行為的意圖。

（二）框架作為提升相關性的手法

為了加強氣候變遷和民眾自身的關聯性，「框架」開始被廣泛地運用於訊息包裝。框架是媒體效果研究中重要的一個分支，Scheufele (1999) 將框架區分為媒體框架（media frame）及閱聽人框架（audience frame），前者指的是新聞記者在報導時將複雜的議題簡化成觀眾有興趣、容易理解的故事情節，而後者則指人們在理解外在事件時所使用的詮釋基模（interpretive schema）。當媒體框架和閱聽人框架符合時，訊息便能發揮較明顯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框架是一個意義建構的機制，不論記者所使用的情節或閱聽人所使用的基模，都和一個地區的文化價值或世界觀息息相關（同上引）。

在討論科學相關議題的溝通與傳播時，學者已開始倡導框架的重要性 (Nisbet, 2009a; Scheufele, 2006)。Nisbet (2009a) 甚至表示：「框架是傳播過程中一定會發生的現象，尤其在探討公共事務或政策時。世界上沒有不被框架的訊息，一個成功的傳播者必須精熟框架手法，不論是有意還是出於直覺」(Nisbet, 2009a: 15)。透過強調某些訊息內容，框架能夠暗示人們對於事件的意義、責任歸屬、原因及解決方式的想法 (Entman, 1993)。

從心理學的角度，框架的作用在於連結兩個概念，使得閱聽人在接觸到訊息後會相信這兩個概念是有關係的，也就是產生適用性的考量（applicability）(Price & Tewksbury, 1997)。過去研究顯示，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之下存在著幾個常見的框架，例如懷疑論者經常使用「不確定」框架，而環境擁護者則經常援引「向科學宣戰」、「潘朵拉的盒子」(Nisbet, 2009b)，這些不同的框架皆凸顯了氣候變遷議題中的不同元素，試圖讓閱聽人從這些角度去思考該議題。

airiti

因此，本研究利用框架的概念，凸顯訊息中的在地元素，以暗示在地城市和氣候變遷兩者之間的連結程度，並觀察此關聯性是否和人們後續的因應作為有關。長期研究氣候變遷的耶魯大學學者 Leiserowitz (2005) 在提出溝通策略建議時，就是將「強調氣候變遷的在地影響」放在首位，認為民眾對議題的知覺相關性會因此提高。而雖然已有研究發現在地框架的確會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 (e.g., Shih & Lin, 2016)，但數量不多，故本研究仍然提出研究假設，希望驗證此一關聯性。

研究假設一：在地框架比非在地框架更能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是和自身相關的議題。

二、集體行動理論與雙路徑因應模型

如前所述，雙路徑模型主要以集體行動為研究脈絡。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意指「群體成員為了改善整體情境所共同採取的行動」(van Zomeren et al., 2012: 181)，目的是在群體面對威脅或危害時，能夠提升集體利益。在環境及自然資源管理的領域中，集體行動是很重要的概念 (Adger, 2003)，不僅因為自然環境是人類和其他物種共有，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所帶來的後果也會由所有成員共同承受。氣候變遷是近年來全人類所面對最急迫的共同問題，而單一個人的付出無法解決此一問題，需要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一起採取行動 (Ostrom, 2010)，因此適合把此議題放在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

早期和集體行動相關的理論，主要從認知的觀點出發。例如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認為人之所以會採取集體行動，是經過理性計算及資源分配的結果。所謂理性，是指人們會考量自身的物質資源，並以滿足個人利益為行動目的 (Gamson, 1992; McCarthy & Zald, 1977)。基於這樣的理性論點，人們若要採取行動，行動所能帶來的利益就必須大於個人需要付出的成本。但相對地，也因為人們會選擇最符合個人效益的途徑，故可能產生自己不付出，卻依賴他人行動以獲得共同利益的「搭便車」效應。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情緒被視為不理性的反應，因此和集體行動無關 (van Zomeren et al., 2012)。

後來的學者認為，人們除了考量自身的客觀資源，也會考量集體行動的主觀效用（subjective utility）。例如 Klandermans (1984) 就倡議，資源動員理論應該在結構因素之外（亦即資源），也考量社會心理因素。援引期望價值模型（expectancy-value models），他認為人們在決定是否要採取集體行動時，會對

airiti

他人的參與與否產生期望，而這個期望會影響個人行動的動機。此概念和集體效能感的主張相互吻合，皆強調群體透過共同行動以解決威脅或不利狀況的能力 (Bandura, 1997)。

以 Lazarus (1991) 的評估理論為基礎，van Zomeren 及其他學者發表了多篇論文，試圖提出一個能夠解釋集體行動動機的整合模型，稱為「雙路徑模型」(van Zomeren et al., 2012)。此模型認為集體危害提供了一個情境，使人們必須因應，而採取集體行動則是人們對該危害的趨近因應（approach coping），相對於無所作為之規避因應（avoidance coping）。根據雙路徑模型，人們在評估因應作為時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初級評估，另一是次級評估。初級評估是針對相關性的判斷，屬於認知層級。一旦某個集體危害被判定和個人或其所屬群體相關，次級評估才會啟動。以下段落將針對此模型中的兩條可能路徑進行詳細討論。

三、路徑一：情緒導向因應

在次級評估階段，相關性的認知會使人們產生情緒反應。由於現有關於集體行動的研究多以抗議或社會運動為情境，經常涉及不公義的事件或相關咎責對象，憤怒因此成為主要的情緒反應 (van Zomeren et al., 2012;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然而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由於媒體或政府較常強調該氣候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且該風險之形成無法歸咎於任何單一個人或政府單位，因此較為相關的情緒是恐懼或擔憂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10; Verplanken & Roy, 2013)。這部分的因應措施被稱為「情緒導向因應」，因為情緒是促成因應行動的關鍵因素 (Lazarus, 1991)。

在進一步討論情緒導向因應的機制之前，有必要先對「情緒」一詞給予清楚定義。情緒（emotion）是屬於情感之下的一個概念，而情感（affect）指的是對事件或議題所引發之整體「好」與「壞」的評估，主要透過感受得來 (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4)。在風險研究中，情感被認為是影響態度或認知很重要的因素，例如 Leiserowitz (2006) 就發現，負面情感對於全球暖化的風險感知及相關政策支持度都有正面影響。

相對於情感僅有強度及方向的區別，情緒有較高的實質意義內涵，可以代表人們對不同主觀經驗、情境再現或是行為後果的特定具體反應，例如生氣、擔憂、恐懼等 (Böhm, 2003)。Kittipongvises & Mino 將情緒定義為「對物體、概念、影像所產生之特定、深刻的感受或自動評估」(Kittipongvises & Mino, 2013: 127)。在風險認知領域中，負面情緒已受到廣泛的關注。例如在心理計量典範

airiti

（psychometric paradigm）中，研究者發現人們的風險認知有時和可能形成的後果無關，而是和風險事件本身的特性有關，未知或容易引發恐懼的事件一般而言會讓民眾產生較高的風險感知 (Fischhoff, Slovic, Lichtenstein, Read, & Combs, 1978; Slovic, 1987)，由此可見情緒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全球暖化的情境之下，Böhm (2003) 將人們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分為四類，分別是（一）對影響的期望情緒（prospect emotions），例如恐懼及擔憂；（二）反身情緒（retrospective），即親身經歷全球暖化影響後所產生的情緒，例如傷心；（三）和自身相關的道德情感（self-related ethic-based emotions），例如罪惡感；以及（四）和他人相關的道德情感（other-related ethic-based emotions），例如生氣。基於以下原因，本研究著重於第一類的期望情緒。首先，如 van Zomeren et al. (2010) 所言，氣候變遷的形成難以歸咎於單一個人或組織，因此和道德類的情感較不相關。第二，雖然近年來臺灣發生了數起氣候災害，例如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但一方面專家與民眾對於這些氣候災害是否和氣候變遷相關仍未有定論[2]，另一方面受災民眾仍較集中於特定地區，因此大部分臺灣民眾可能不會產生反身情緒。第三，在行為預測方面，期望情緒具有較深厚的理論背景，例如諸多和恐懼訴求相關的理論，都考量了恐懼、擔憂對於人們行為促發的影響 (Ruiter, Abraham, & Kok, 2001; Witte & Allen, 2000)。

如前所述，雙路徑模型認為人們會先評估議題和自身或所屬群體的相關性，一旦議題被判定相關，才會衍生出後續的兩條因應路徑，包括情緒的引發 (van Zomeren et al., 2012)。換句話說，議題相關性會引起負面情緒，Shih & Lin (2016) 的研究支持了這樣的論點。然而，也有學者發現相關性反而會促發防衛機制。在 A. Liberman & Chaiken (1992) 的研究中，受試者閱讀了一篇講述咖啡因與乳房纖維囊腫關係的文章，結果顯示，為了避免心生恐懼，那些平常有飲用咖啡習慣的受試者比起不喝咖啡者，更不相信兩者的因果關係。因此，相關性和負面情緒的關聯性，在理論上及實證證據上皆存有歧異。

同樣地，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的關係也尚未定於一尊。一方面，研究指出負面情緒和氣候變遷減緩行為有正面關係，例如 Hersch & Viscusi (2006) 發現民眾對全球暖化的擔憂是預測他們是否願意付出較高昂油價的顯著因子。此

2 臺大大氣系教授柳中明與張智北皆不認同是全球暖化造成了莫拉克風災（柳中明，2010 年 5 月 14 日；張楊乾，2010 年 5 月 6 日），而由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在風災過後一年左右所進行的電話調查顯示，僅約半數的受訪者（51.6%）將莫拉克風災和全球暖化拉上關係（張楊乾，2010 年 7 月 26 日）。因此，近年來臺灣雖面臨一些氣候災難，是否能視為氣候變遷的影響，似乎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airiti

外，恐懼與減緩行為的關聯性，也已經在一些文獻中被確立。這些研究發現，民眾愈害怕全球暖化，採取行為的意圖就愈高 (Shih & Lin, 2016; van Zomeren et al., 2010)。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相反的結果，例如 O'Neill & Nicholson-Cole (2009) 發現，雖然強烈的視覺呈現能夠吸引民眾對全球暖化的注意力，但由這些圖片所引發的恐懼感若太過強烈，反而會造成民眾否定問題的存在，進而變得和全球暖化議題更為脫節。

徐美苓、楊意菁（2011）的研究某種程度也提供了支持此說法的證據，她們發現民眾對全球暖化影響的知識愈高，行動意願就愈低。作者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當今媒體在溝通全球暖化議題時大多強調其災難性後果，導致閱聽人不相信這些災難會發生，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此解釋提供了兩個重要的線索：第一，災難或戲劇性訊息之所以會導致風險否定，可能是因為負面情緒的中介；第二，當人們產生恐懼感，卻不知如何著手預防風險的負面效果時，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延伸平行模式為這樣的說法提供了理論基礎。

由於相關性是否會帶來負面情緒，或是負面情緒是否會帶來行為改變等問題皆尚無確切結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以檢視上述概念之間複雜的關係。

研究問題一：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二：框架是否能透過相關性、負面情緒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情緒導向因應）？

四、路徑二：問題導向因應

在判斷危害具有相關性之後，人們在次級評估階段也會對因應能力進行評量。因應能力是指在面對集體危害時，個人對自身能「募集」到多少資源的判斷。值得一提的是，此預設指的是人們會評估自身資源的多寡，而非表示相關性會導致因應能力感知的提升。

由於行動具有群體意涵，此處所指的資源也和群體有關，泛指個人能夠從他人獲得多少的社會支持。若有愈多群體成員願意共同採取行動以對抗集體危害，代表個人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愈多，也代表個人擁有較高的集體效能感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Bandura (1997) 將集體效能感定義為個人對於集體問題能否透過共同行動獲得解決的信心；通常集體效能感愈高，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也會提高 (Lee, 2010;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這部分的因應行為被稱為「問題導向因應」 (Lazarus, 1991)。

airiti

然而，現階段探討集體效能和環境友善行為關聯性的研究非常有限；在這些少數的研究中，Lubell et al. (2007) 運用了全國性電話調查資料，發現集體效能感和環境公民行為、環境友善行為皆有正面的顯著關係。而 van Zomeren et al. (2010) 使用實驗法，發現那些有接觸到集體效能資訊的受試者，比起沒有接觸相關資訊的受試者有著更高的意願採取環境友善行為，以對抗氣候變遷。Heath & Gifford (2006) 也發現，若民眾認為自己的配合能對團體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正面影響，就比較有可能採取氣候變遷的減緩行為，說明了集體效能的作用。此外，也有研究發現，期望互惠性（expected reciprocity）愈高，民眾採取行動的可能性也愈大 (Lubell et al., 2007; Lubell, Vedlitz, Zahran, & Alston, 2006)。期望互惠性指的是民眾是否相信團體中的其他人也會付出和自己同等的心力，來解決問題，和集體效能的概念雷同。

雖然雙路徑模型是以集體行動為背景，強調集體效能感的重要性，但其他類型的效能感也可能對個人行為產生關鍵影響。例如，根據延伸平行模式（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即便人們察覺氣候變遷的嚴重性，也不見得會採取因應行動，因為缺乏能夠解決問題的信心，也就是自我效能感 (Witte, 1992)。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對於自己能否執行某項行動以解決相關問題的判斷」 (Bandura, 1982: 122)，也是一種對自身的信念。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民眾的自我效能愈高，愈有可能採取環境友善行為 (Lubell et al., 2007; Meinhold & Malkus, 2005; Tabernero & Hernández, 2011)。在一項跨文化比較研究中，學者發現不論是在美國樣本或是韓國樣本中，自我效能感都能顯著預測行為意圖 (Kim, Jeong, & Hwang, 2013)。事實上，兩者的關係在臺灣的情境下也獲得了證實（周儒、潘淑蘭、吳忠宏，2013；M.-L. Hsu & Shih, 2014）。

除了自我效能感，有些學者也認為應該考慮回應效能感（response efficacy）的作用。在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及延伸平行模式中，回應效能感被視為是影響恐懼訊息能否產生效力的重要元素之一，此概念指的是當民眾面對一系列能夠規避或減緩威脅事件的建議時，針對這些建議的有效性所給予的評估 (Kim et al., 2013)。例如，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民眾若覺得資源回收是減緩碳排放的有效策略，則具有較高的回應效能。在實證研究上，Kim et al. (2013) 發現回應效能和環境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面關係。而以馬桶兩階段省水器為例，Lam (2006) 也發現，若民眾認為該裝置是有效的節水方式，其安裝的行為意圖就會提升 [3]。

3 在 Lam (2006) 的研究中，回應效能的測量方式是要受訪者評估其他省水策略的有效性，而非直

airiti

結合上述理論基礎，本研究因此同時將三類效能感（包括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納入考量，並提出以下假設，希冀對於環境行為的前置因素有更清楚的瞭解。

研究假設二：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及集體效能感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之間具有正面關係。

五、行動策略知識作為效能感的前置變項

效能感的產生取決於一個重要的前置因素，即行動策略知識。此類知識指的是民眾在面對問題時，是否知道哪些行動是他們能夠採取的，以及哪些是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行動 (Hines, Hungerford, & Tomera, 1987)。雖然不同學者測量行動策略知識的變項不同，但大多是詢問民眾對自身知識程度的「主觀認知」（例如：周儒等，2013；S.-J. Hsu & Roth, 1998）。

值得注意的是，雙路徑模型僅觸及效能感的評估，並未指出效能感從何而來。此外，雖然學者已注意到知識在氣候變遷議題中的重要性，但現有研究所關注的大多是和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知識，例如知識的來源 (Zhao, 2009) 或是知識的影響（徐美苓、楊意菁，2011；徐美苓、施琮仁，2015；Bord, O'Connor, & Fischer, 2000）。然而，Boerschig & De-Young (1993) 認為要促發或改變行為，除了對於氣候變遷的「議題知識」（knowledge about the issue）之外，和行為有關的「行動策略知識」（knowledge of the issue）也很重要。Hines et al. (1987) 也持相同看法，認為任何以促進環境友善行為為目標的溝通，都必須讓民眾知悉可得且有效的行動方式。

關於增進行動策略知識的方法，Nolan (2010) 指出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提供資訊，告訴人們要做哪些事情、怎麼做。Shih & Lin (2016) 的研究發現，在訊息中提供減緩行為的提示，的確能夠讓民眾更加瞭解如何對抗全球暖化，也就是累積了行動策略知識。

至於行動策略知識和效能感、行為意圖的關係，一篇統合研究檢視了十年間的研究成果，發現行動策略知識整體而言的確和環境友善行為有關 (Hines et al.,

---

接詢問二階段省水器對節水的效率。因此作者以另一名詞 subjective effectiveness of alternative solutions (SEAS) 來代表，而非使用回應效能感。也因為 SEAS 和回應效能感是相反的概念，故在此研究中，SEAS 和更換省水器行為意圖的迴歸係數為負數。

airiti

1987)。在臺灣，周儒等（2013）與 S.-J. Hsu & Roth (1998) 曾經分別針對大學生及花蓮地區的中學教師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是最能夠預測環境行動的重要前置變項。此外，周儒等（2013）的研究也發現，除了直接效果，行動策略知識也能夠透過提升自我效能，間接增加行動的可能性。

研究假設三：行為提示會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

研究問題三：行為提示如何透過行動策略知識、不同型態的效能感影響民眾的行為意圖（問題導向因應）？

根據延伸平行模式，當人們覺得某事件的風險不嚴重時，就會停止評估自身受影響的可能性，相關因應行動也不會發生；然而，當人們察覺風險升高且自身又會受到影響，下一步就會繼續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解除或降低威脅。若評估後認為採取行動就能降低風險，且自己也有能力採取該行動，那麼實際因應行為就較有可能發生，此現象稱為危害控制（danger control）。反之，若評估後發現行動無效或自身缺乏採取該行動之能力，因應行為就不會發生，此時民眾會轉而調適自己的認知，例如否認風險的存在以消除恐懼，此過程稱為風險控制（risk control）(Witte, 1992; Witte & Allen, 2000)。因此，由風險訊息所引發的負面情緒究竟會成為行動的驅力還是阻力，其中關鍵在於效能感。

在分析上，民眾會採取危害控制或是風險控制是一種交互作用關係（interaction）的表現；也就是說，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會因效能感的強弱而有不同。但由於恐懼訴求理論主要關注自我效能與回應效能，並未考慮集體效能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使用研究問題來探討這些變項間的關係。

研究問題四：負面情緒和不同型態的效能感對於環境友善行為意圖是否有交互作用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與施測

為驗證上述研究假設及問題，本研究透過實驗法蒐集所需之資料，實驗法可讓研究者對於內在效度有較高的掌握，故適合用於媒介效果的檢驗。本研究的受

airiti

試者來自於臺灣北部的某所大型公立大學，招募信件經由該校的電子郵件系統發送，受試者需至指定的電腦教室中受測，以免外在環境干擾。共有 211 名學生完整參與實驗，包含研究生與大學生，受試者獲得新臺幣 100 元現金作為酬勞，實驗的期間為 2015 年 3 月 19 日至 4 月 9 日，共約三週。在所有受試者中，女性占 70.1%（n = 148），男性占 29.9%（n = 63），平均年齡為 22.18 歲（SD = 2.85）。

本研究之實驗為二因子實驗設計，兩個因子分別為（一）框架，分為在地與非在地情境兩個層次，以及（二）行為提示，共有三個層次，包括沒有提示、個人提示、集體提示。框架的設計在於促發受試者的情緒導向因應，而過去研究顯示「在地框架」能夠讓民眾產生相關性的認知與負面情緒反應 (Shih & Lin, 2016)，故本研究將框架區分為「在地 vs. 非在地」兩個情境。行為提示則和問題導向因應相關，由於本研究同時考量了自我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故除了關注行為提示本身的作用，還將行為提示區分為個人行為的提示與集體行為的提示。因此，本研究共有六個實驗組別（2 × 3）。

實驗刺激操弄的部分，本研究製作了長約 1.5 分鐘的短片，開頭先敘述氣候變遷的現況，然後指出幾個可能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城市。在這些可能受到影響的城市中，本研究製作出兩個版本，一個版本強調在地臺灣城市，例如臺北、高雄，而另一個版本則強調世界上其他大都市，例如紐約、舊金山。前者即代表本研究之「在地」框架，而後者則代表「非在地」框架。為了方便受試者辨認不同城市，影片中不僅刻意強調這些城市的重要地標，例如臺北 101 大樓、紐約布魯克林橋、舊金山金門大橋等，更用字幕標示城市名稱，此操作和 Spence & Pidgeon (2010) 的設計方式相同。

在受影響的城市之後，其中一個版本就此結束，第二個版本則以字幕方式告知受試者面對氣候變遷時所能採取的行動，例如購買節能的電器用品。還有第三個版本則是在這些行動前加上百分比[4]，例如 94% 的民眾已經會隨手關燈、關電器或拔插頭，試圖讓受試者知道已有其他人開始採取行動，此三版本分別代表第二個因子（行為提示）的三個層次。

值得說明的是，本研究之實驗設計上參酌 Shih & Lin (2016) 之論文甚多，可謂該文之延伸。然而，兩者在理論架構及主要變項的使用上有所不同。詳細來說，Shih & Lin (2016) 援引雙訊息處理模型（dual process model），主要關注民眾在面對風險訊息時可能採取哪些解讀方式？而不同的訊息處理又可能產生何種行為

4 本實驗所列出的建議行為包括資源回收、搭大眾運輸工具、攜帶免洗餐具等，百分比資料來自徐美苓、施琮仁（2015）調查結果中的實際數據。

airiti

後果？而本研究以集體理論中的雙路徑模型為根基，雖然理論名稱看似雷同，也皆包含情緒要素，但集體理論特別著重效能感的角色，尤其是集體效能感，是本研究獨特之處。

本研究使用 Survey Monkey 作為資料蒐集平臺，該平臺中的隨機顯示功能可讓研究者平均分配每一個實驗組別暴露的機率，因此本研究中的受試者看到每一個情境的機率都是相等的。實驗過程中，每名受試者都獨立使用一部電腦，並配戴耳機，以免受到他人干擾。受試者簽署完同意書後，會先填寫一份問卷，測量其環境價值觀與氣候變遷知識，之後才收看影片。看完影片後，受試者再填寫另一份關於其認知、情感、行為之問卷。需要說明的是，基於研究目的，本文僅使用後測之變項。

在正式施測前，本研究於 2015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進行前測（$N = 44$），所有量表與指標都具有滿意之信度與效度。

二、變項測量

（一）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行為意圖，在問卷中，受訪者被問到未來從事以下九種氣候變遷相關之減緩行為，包括 1. 儘量以大眾運輸工具、腳踏車代步，少開汽機車。2. 隨手關電燈、關電器或拔插頭。3. 少用冷氣，或將冷氣機溫度設定得較高。4. 節約或重複用水。5. 對玻璃、鋁罐、塑膠或報紙做分類回收。6. 少用塑膠袋或使用環保袋。7. 在外用餐，會隨身攜帶環保餐具。8. 多吃素，少吃肉。9. 使用有節能標章或比較省電的產品。和過去大多數研究不同，本研究並非單獨詢問這些行為意圖的可能性，而是要受訪者和自身過去的經驗對照，指出未來「會比現在更不常做」、「和現在差不多」，或是「會比現在更常做」上述行為。本研究將九個題項相加，形成意圖指標[5]，此指標之範圍為 9 至 27，分數愈高代表未來愈有可能從事這些減緩行為（$M = 23.07$, $SD = 2.75$, Cronbach's $\alpha = .77$）。

5 本變項要求受試者以過去行為為基礎，評估未來採取該行為的可能性，因此屬於次序變項（ordinal variable）。在李克特量表中，選項的數目和指標信度的關係一直是廣受討論的議題，過去研究指出，2 點量表、3 點量表、4 點量表、5 點量表、7 點量表甚至更多類別的量表都可合併作為某概念的指標。其中，3 點量表在信度上優於 2 點量表，卻和 5 點量表沒有顯著區別 (Bendig, 1954b)。另一篇研究也發現指標的信度在 5 ~ 9 點量表之間都非常類似，但在 2 點量表時較低、3 點量表時較高 (Bendig, 1954a)。因此本研究之「行為意圖」指標由 9 個 3 點量表題項組成，在合理性及信度考量上應無問題。

airiti

（二）中介變項

1. 相關性

相關性量表由兩個變項組成，在調查中，民眾被問到是否同意以下兩項敘述：(1) 全球暖化和我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2) 我一生中會被全球暖化影響的機會相當高。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將兩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認為全球暖化和自身愈相關（M = 4.18, SD = 0.63, r = .56, p < .01）。

2. 負面情感

本概念之量表由兩個變項組成，分別是 (1) 您是否對於影片中地球暖化對該地區造成的結果感到擔心？以及 (2) 您是否對於影片中地球暖化對該地區造成的結果感到害怕？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完全不擔心／害怕）至 5（代表非常不擔心／害怕），本研究將兩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的負面情感愈強烈（M = 4.14, SD = 0.71, r = .50, p < .01）。

3. 行動策略知識

根據 Hines et al. (1987)，行動策略知識指的是民眾是否知道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有哪些行為是可以運用並且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換句話說，此概念是民眾對於自身知識的主觀評估。Shih & Lin (2016) 在其研究中以「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來對抗全球暖化」來測量此概念，故本研究也採用相同問法。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分數愈高代表主觀認定之知識程度愈高（M = 4.09, SD = 0.78）。

4.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量表由五個變項組成，在問卷中，受訪者被問到是否同意：(1) 為了對抗氣候變遷，我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2)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些簡單的事來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3) 在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方面，我覺得我能做出一些貢獻；(4) 我個人的行動能夠對氣候危機的解決有所幫助；(5) 改變我的生活習慣，將有助於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將五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之自我效能感愈高（M = 4.16, SD = 0.51, Cronbach’s α = .85）。

airiti

5. 回應效能

回應效能所測量的是民眾對於行為是否能夠有效減緩暖化影響的認知，因此需要和行為的指標一致。本研究使用「行為意圖」中的九個變項，要求受訪者逐一評估採取這些行為之有效性，選項從 1（代表非常沒有效果）至 5（代表非常有效果）。這九個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後，就得到了回應效能量表，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之回應效能感愈高（M = 4.16, SD = 0.49, Cronbach's α = .86）。

6. 集體效能

集體效能量表係參考 van Zomeren et al. (2010) 的研究，由下列三個敘述組成：(1) 透過合作，人們可以避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 透過集體的努力，我們可以防止氣候變遷的發生；(3) 如果我們一起行動，就可以降低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回答的選項從 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將此三變項相加並取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之集體效能感愈高（M = 3.88, SD = 0.63, Cronbach's α =.68）。

雖然在恐懼訴求理論中（例如防衛動機理論及延伸平行模式），自我效能及回應效能經常被合併使用，但有研究顯示兩者其實是相關但不同的概念，是更高層次效能感中的兩個面向 (Witte, 1996)。而集體效能感則鮮少和其他兩類相提並論，因此本研究將此三類效能感視為不同的變項，分別進行分析。

肆、結果

在檢驗假設及回答研究問題之前，本研究先進行操縱檢測。在問卷中，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方才觀看的影片中，「是否有告知您如何對抗全球暖化的字幕」，在沒有行為提示的組別中（n = 73），有 2 名表示有看到字幕、有 4 名表示沒注意；在個人提示組別中（n = 79），有 6 名表示沒看到字幕、有 1 名表示沒注意；而在集體提示組別中（n = 59），各有 1 名表示沒看到字幕及沒注意。關於框架，本研究也詢問受試者在影片中因地球暖化而受到影響的地點是何處？觀看非在地框架的受試者（n = 107）全部都回答美國，但觀看在地框架者（n = 104）則有 6 名回答美國。雖然部分受試者所注意到的內容和研究操弄不盡符合，但本研究仍予以保留，原因是人們在接觸媒體訊息時原本就可能對細節有所遺漏或記憶錯誤。此外，本研究操弄的是訊息的有無或種類，並非訊息特性（例如高恐懼訊息 vs. 低恐懼訊息），因此受試者不需對訊息產生主觀認知，其他類似的研究皆

airiti

未進行操縱檢測 (Kuhn, 2000; Retzbach, Otto, & Maier, 2016; Wiedemann & Schütz, 2005)。

研究假設一認為在地框架比非在地框架更能讓民眾覺得氣候變遷是和自身相關的議題，為了測量框架的主效果，本研究使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進行假設檢定。結果顯示，觀看在地情境的受試者（M = 4.26, SD = 0.61）比觀看非在地情境者（M = 4.08, SD = 0.61）的確有較高的知覺相關性，且此差異具有統計上之顯著性（$F(1,205) = 4.48$, $p < .05$），因此研究假設一受到研究結果的支持。

研究問題一探討負面情緒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 ANCOVA，將行為意圖做為依變項、兩個實驗因素做為自變項，而負面情緒則做為共變項（covariate）。結果顯示負面情緒和行為意圖間具有正面的顯著關係（β = 1.54, SE = .25, $p < .01$），也就是負面情緒愈強，民眾愈有意願採取環境友善行為。

研究問題二檢視了框架如何透過相關性、負面情感而對行為意圖所產生的間接效果，也就是情緒導向因應路徑。為了測驗此中介效果，本研究採用 Hayes (2013) 所發展的「PROCESS」巨集，來檢驗變項間的中介關係。Hayes 等人提倡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來分析中介關係，認為該方法比起傳統的 Sobel Test 有更多好處 (Hayes, 2009; Preacher & Hayes, 2004)。例如中介效果經常不是常態分布，但 Sobel Test 卻有常態分布的預設，拔靴法則無。此外，Sobel Test 需要計算間接關係的標準誤，作為評估迴歸係數顯著與否的參考，但標準誤如何計算仍有爭議；而拔靴法則能夠透過多次建立重複樣本（resample）計算出信賴區間，作為顯著性判斷的依據，省去計算標準誤的步驟。同時，傳統中介分析規定自變項與依變項必須先有顯著關係，也就是總效果要顯著，但使用拔靴法估計間接效果時，並不需要此一前提。更重要的是，此方法容許研究者同時考慮兩個以上的中介變項，使得間接關係的檢驗更加細緻。

根據表 1 的模型 1 ~ 3，框架對於行為意圖的間接影響主要透過兩條路徑，在地框架一方面藉由提升議題相關性而增加民眾的行為意圖（β = .1423），另一方面，相關性的提升也增強了民眾的負面情感，進而使其更有意願採取行動（β = .0964）。

研究假設二認為自我效能感、回應效能感及集體效能感皆和環境友善行為意圖有正面關係，為了檢驗此一假設，本研究使用 ANCOVA 建構了三個模型，此三模型皆以行為意圖做為依變項、兩個實驗因素做為自變項，而三類效能感則分

airiti

別做為共變項。結果顯示，自我效能感（β = 1.68, SE = 0.35, $p < .01$）、回應效能（β = 2.57, SE = 0.35, $p < .01$）、集體效能感（β = 0.94, SE = 0.30, $p < .01$）三者皆和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面關係，因此研究假設二受到支持。

研究假設三檢視行為提示是否可以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ANOVA 結果指出觀看不同行為提示的受試者的確在行動策略知識上有所差異（$F(2,205) = 19.96$, $p < .01$）。透過 Scheffé 事後檢定法，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個人提示（M = 4.22, SD = 0.82）、集體提示（M = 4.42, SD = 0.94）的行動策略知識都比無提示（M = 3.66, SD = 0.85）的組別高，但個人提示、集體提示兩組之間則無顯著不同。

研究問題三則探討了行為提示如何透過行動策略知識、三類效能感間接影響行為意圖，也就是問題導向因應路徑。同樣利用 Hayes (2013) 中介分析法，但因為行為提示屬於三個組別的類別變項，在迴歸分析中需拆解成兩個虛擬變項，本研究因此以「無提示」為參照組，分別創立了「個人提示」與「集體提示」兩個雙元變項，並在分析中分開處理。結果顯示（表 1 之模型 4 ~ 6），個人行為提示可以先後增加行動策略知識與自我效能感，進而提升行為意圖（β = .1982）。同樣地，此間接效果路徑在回應效能感（模型 10，β = .2657）及集體效能感（模型 14，β = .0875）的情境之下也達到統計顯著性。

上述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無法直接影響行為意圖，必須經由各種效能感中介；而個人行為提示也無法直接提升不同的效能感，必須經由行動策略知識中介。在集體行為提示部分，此類提示能夠增加受試者的行動策略知識，進而提升自我效能感以及最終的行為意圖（模型 8，β = .2742），此間接效果路徑在回應效能感（模型 12，β = .3675）及集體效能感（模型 16，β = .1211）的情境之下也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集體行為提示會透過自我效能（模型 9，β = - .2609）及集體效能（模型 17，β = - .1547）分別對行為意圖產生影響，且此間接效果為負向。

研究問題四探討負面情緒和三種不同的效能感是否有交互作用關係，為了檢視此關聯性，本研究使用階層迴歸分析，將模型分為四層。第一層為實驗組別，包括框架與行為提示；第二層為訊息反應，包括相關性、行動策略知識與負面情緒；第三層為三種效能感；最後第四層為交互作用變項，交互作用變項中的個別組成概念在相乘前都先經過標準化，以避免共線性問題。根據表 2，負面情緒對於行為意圖的效果，會因為回應效能（β = - .19, $p < .01$）及集體效能（β = - .13, $p < .05$）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詳細來說，負面情緒對行為意圖的效果，僅存在於低回應效能的民眾之間（請

airiti

	間接效果係數	拔靴後標準誤	信賴區間
1. 框架→相關性→行為意圖	.1423	.0960	.0120 ~ .4142*
2. 框架→相關性→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0964	.0581	.0150 ~ .2593*
3. 框架→負面情感→行為意圖	- .1637	.1329	- .4837 ~ .0573
4.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行為意圖	.1353	.2454	- .3097 ~ .6625
5.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1982	.0822	.0787 ~ .4281*
6. 個人提示→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 .2176	.1376	- .5537 ~ .0037
7.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行為意圖	.2141	.2253	- .2039 ~ .6914
8.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2742	.1062	.1143 ~ .5517*
9. 集體提示→自我效能→行為意圖	- .2609	.1474	- .6072 ~ -.0163*
10.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2657	.1070	.1096 ~ .5413*
11. 個人提示→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 .4161	.2118	- .8914 ~ - .0488
12.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3675	.1278	.1683 ~ .6817*
13. 集體提示→回應效能→行為意圖	- .3182	.2245	- .8375 ~ .0622
14. 個人提示→行動策略知識→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0875	.0420	.0284 ~ .2084*
15. 個人提示→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 .1126	.0924	- .3589 ~ .0273
16. 集體提示→行動策略知識→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1211	.0561	.0407 ~ .2796*
17. 集體提示→集體效能→行為意圖	- .1547	.1031	- .4355 ~ - .0051*

表 1：中介分析結果——框架及訊息提示對於行為意圖影響之雙重因應路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1. 表格中的迴歸係數為非標準化迴歸係數。

2. 框架共有兩組，為二分變項，在此分析中，非在地框架為參照組。

3. 行為提示共有三組，為類別變項，故在迴歸分析中需區分為兩個虛擬變項，以無提示的組別作為參照組。

*$p < .05$

airiti

	Zero-order	Before-entry	Final β
階層一：實驗組別			
框架（1 = 在地）	.03	.03	- .03
個人提示（1 = 有）	- .01	- .01	.08
集體提示（1 = 有）	.09	.09	.12
Incr. R^2			1.0
階層二：反應			
相關性	.29**	.31**	.07
負面情緒	.40**	.40**	.21**
行動策略知識	.19**	.18*	- .00
Incr. R^2			-19.4**
階層三：效能感			
自我效能	.32**	.17*	.14
回應效能	.46**	.35**	.32**
集體效能	.21**	.08	- .05
Incr. R^2			10.1**
階層四：交互作用			
負面情緒 * 自我效能		- .03	
負面情緒 * 回應效能		- .19**	
負面情緒 * 集體效能		- .13*	
Incr. R^2		4.9**	
Total R^2（%）			35.5

表 2：實驗組別與雙路徑模型因子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5$, **$p < .01$

見圖 1）；經過統計檢驗，對於高回應效能的民眾來說，負面情緒和行為意圖並無關聯，雖然高回應效能感的民眾整體而言比較可能採取行動。同樣地，負面情緒對於行為意圖的正面影響，也僅發生於低集體效能的民眾之間（請見圖 2）。值得注意的是，在負面情緒較不明顯時，擁有較高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可能採取行動，而隨著情緒反應增強，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反而有較高的行為意圖。

伍、討論

環境友善行為是普遍認為能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關鍵因素，近年來許多研究也都致力於找出能夠促進此類行為的原因，但這些研究大多考慮個人背景或對自身的認知，較少把氣候變遷放在集體危害或集體行動的脈絡下討論，也就是考量個人對「他人」的認知如何影響行為。本研究採用以解決集體問題為目的的雙路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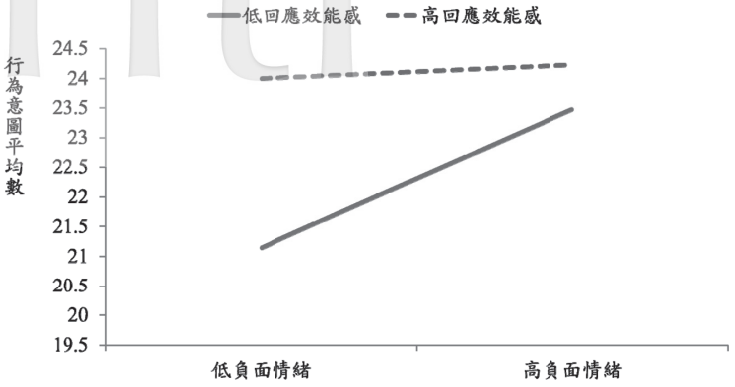


圖 1：負面情緒和回應效能感對行為意圖的交互作用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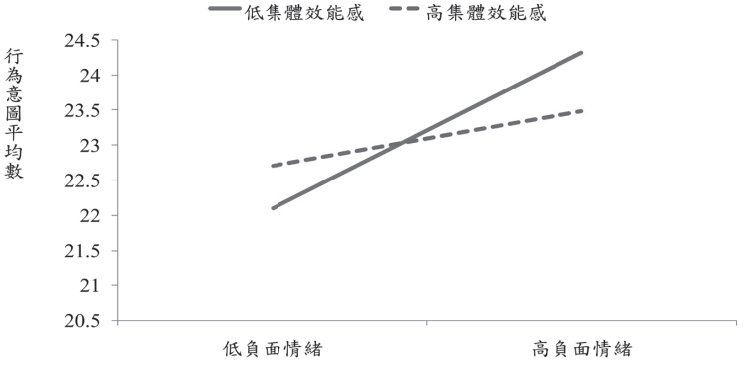


圖 2：負面情緒和集體效能感對行為意圖的交互作用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徑模型，並結合框架理論與恐懼訴求理論，希望瞭解何種訊息能增進環境友善行為，以及背後的心理機制。

首先，本研究發現將氣候變遷包裝成在地議題有助於相關性的認知，而相關性的提升會導致較高的行動意願，此發現和 Shih & Lin (2016) 的研究結果一致。另一方面，民眾認為氣候變遷和自身相關後也會產生負面情緒，並提升行動的意願。過去許多學者認為情緒是行動的泉源 (Loewenstein, Weber, Hsee, & Welch, 2001; Slovic et al., 2004)，本研究的發現支持這樣的說法。

其次，本研究也發現在風險訊息中提供因應策略的提示能夠增進民眾的行動策略知識，而民眾在瞭解如何面對氣候變遷後，又會形成不同的效能感，進而增

airiti

進行為意圖。值得討論的是，Shih & Lin (2016) 在其研究中發現訊息提示會影響行動策略知識，但行動策略知識卻和行為意圖無關。本研究補充了一個失落的環節，也就是效能感。本研究之結果顯示，行動策略知識和三種效能感都有正面關係，而在分別考量的情況下，三種效能感也都各自會增進行為意圖，如表 1 所示，這些中介路徑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上述有關中介效果的發現具有重要意涵，首先是現有研究雖然已開始注意到效能感的作用，卻鮮少討論可以影響效能感的前置因素，本研究發現若民眾知道該做些什麼（行動策略知識），則各種效能感都可以獲得提升。第二，上述發現也指出不論是框架或行為提示本身對於民眾的行為意圖都沒有直接效果，而是必須透過某些中介的認知或情感因素才能發揮作用。

本研究另一有趣的發現，是集體提示會透過自我效能及集體效能的中介，而對行為意圖產生負面影響（如表 1 模型 9 與模型 17），這和理論上的假設有所差異。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集體提示「提醒」了民眾氣候變遷是個牽涉廣泛的嚴重問題，因此反而降低了對自己和他人能夠解決此一危害的信心。為了加以驗證，本研究在中介分析中加入「嚴重性感知」[6] 變項作為控制，結果顯示模型 9 與 17 兩條間接路徑皆變為不顯著，對上述假設提供了部分證據。

此外，本研究發現負面情緒與效能感具有交互作用關係，此結果也值得討論。如前所述，負面情緒的作用對於具有低回應效能感、低集體效能感的民眾較為顯著，負面情緒甚至讓集體效能感較低的民眾比較高的民眾更願意採取行動，這和延伸平行模式的假設不同。這樣的差異可能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第一，回應效能感較低的民眾反而較有意願行動的原因可能在於天花板效應，如圖 1 所示，那些回應效能感很高的民眾原本採取環境友善行為的意圖就較高，因此即便負面情感提升，其行為意圖也無法更加提高。第二，本研究也發現，在負面情緒較高的情況下，集體效能感較低的民眾比集體效能感高的民眾更有意願採取行動，這可能反映了「搭便車」的現象。Lam (2006) 在其研究中也觀察到類似現象，他認為更多民眾的參與無疑能加強集體行動成功的機會，但卻同時也降低了個別民眾行動的必要性。

第三，從理論的層次來看，延伸平行模式是承續恐懼訴求的脈絡而來，而恐懼訴求大部分是為瞭解決或避免與個人健康相關之風險 (Witte & Allen, 2000)。相較之下，氣候變遷的成因、影響與解決方式都牽涉到集體行為 (Lubell et al., 2007)，因此造成延伸平行模式較不適用。第四，從測量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對

6 「嚴重性感知」的測量是透過詢問受試者「請問您覺得全球暖化的問題嚴不嚴重？」回答選項為五點量表，從「非常不嚴重」至「非常嚴重」。

airiti

行為意圖的操作化方式，是請受試者以現有的行動為基礎，衡量未來採取行動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差不多，或更不可能），也就是說，本變項某種程度控制了過去的行為，並非單純的可能性預估。因此，效能感較高的民眾可能因為原本就已經很頻繁地採取減緩行為，故更高情緒刺激所能提升的行動意圖較為有限。雖然如此，但本研究對行為意圖的操作化方式除了更準確測量此概念，更把民眾放在不同的基準點，因此對於效能感的影響有更深入的發現。

在敘述研究貢獻之前，有必要先說明一些在解讀本文結果時所需注意的事項。首先，本研究雖然發現閱聽人在解讀風險訊息時能透過兩種不同途徑，但無法得知閱聽人究竟只能單獨採取一條訊息處理路徑，還是能夠同時運用雙系統，甚至此二系統的啟動是否有會有先後次序。雖然過去研究傾向認為人們在面對威脅或恐懼訊息時，情感系統的啟動會早於分析系統 (Slovic et al., 2004)，但並不清楚當訊息所包含的恐懼元素較低時，閱聽人會如何反應，未來的研究可針對不同的風險訊息特性，檢視可能的影響。

其次，本研究將訊息區分為在地框架與非在地框架，但此區別雖然能夠造成民眾對議題關連性有不同的認知，卻無法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可能的原因是在地框架係以臺北、高雄為遭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情境，而受試者可能不見得來自此二城市，使得心理距離感無法拉近。未來研究可考慮納入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Scannell & Gifford (2013) 已經發現人們對某地區的依附感愈強，行為意圖也愈強。

第三，對於集體效能感的促發，本研究的操弄方式是提供已採取各項減緩行為人數的百分比。然而，此數據提示可能讓受試者產生「搭便車」的心態，而非形成集體效能感。未來研究在進行實驗操弄時，除了強調他人已在努力之外，可更加著眼於通力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個人在集體行動中的貢獻 (van Zomeren et al., 2010)。

此外，本研究對於行動策略知識的測量僅使用單一變項，可能在信度與效度上不如使用多變項組成的構念為佳。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表 2，行動策略知識和自我效能、回應效能、集體效能皆有統計上顯著的正向關聯性，和理論及過去的研究發現吻合，此一致性也說明了此變項具有一定之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然而，未來研究仍可參考周儒等（2013）的測量方式，將行動策略知識分為說服、生態管理、消費主義、法律及政治五個面向，以便更完善地測量此一概念。

airiti

陸、結論

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能否減緩，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們能否實踐環境友善行為。本研究在如何設計風險訊息以增進民眾行為意圖方面，具有豐富的參考價值，在此將針對本研究之理論貢獻及相關實務意涵進行詳細闡述。

第一，現階段許多媒體文宣都著重於告知民眾應該採取何種行為，但幾乎沒有研究檢視這樣的傳播方式是否能夠有效增進行為意圖；若有效，又是經由何種機制？本研究指出此類文宣無法直接提升民眾解決問題的信心，但能夠透過增加行動策略知識來發揮效果。也就是說，民眾的效能感之所以提升，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知道怎麼減緩氣候變遷的威脅。未來的文宣在設計時除了告知行動策略，還應該強調民眾也能執行訊息中所建議的行動，以讓訊息能直接影響效能感。有鑑於楊意菁、徐美苓（2012）發現多數臺灣民眾一方面肯定全球暖化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又覺得在處理該風險的過程中有許多限制，在溝通訊息中強調民眾解決問題的能力實為必要之手段。

第二，雖然學者已體認到效能感對促進行動有所幫助，但相關實證研究的數量仍然稀少，且主要著重於自我效能感。本研究是少數同時考慮不同種類效能感作用的論文，結果也指出，除了自我效能感外，其他種類的效能感（例如回應效能感及集體效能感）也和民眾的行為意圖息息相關。因此，未來政府或科學家在進行氣候變遷相關風險溝通時，除了強化個人信心之外，還應說服民眾訊息中所建議的行動真的能有效減緩負面影響，以及氣候變遷是需要全體共同付出才能解決的集體環境風險。

第三，本研究發現民眾在面對氣候變遷風險訊息時，可能透過情感或效能感兩條不同途徑，支持雙路徑模型的說法。本研究也發現兩種因應模式雖然各自對行為意圖有不同的影響，卻也同時具有互動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考慮負面情緒之後，效能感的作用會變得非常不同，當民眾的負面情緒被促發、感受到處理風險威脅的必要時，那些擁有低回應及集體效能的民眾反而更有行動的意願。因此，未來傳播訊息的設計應考慮效能感的侷限，以及適用的群體範圍，而非無差別地增強效能感。

第四，現階段媒體在呈現氣候變遷相關影響時多強調其戲劇性及災難性，導致民眾雖然負面情緒被引發，卻不知如何因應，故有學者認為風險訊息中同時也應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徐美苓、楊意菁，2011；楊意菁、徐美苓，2012）。然而，本研究發現負面情緒和自我效能並無交互作用關係，亦即縱使民眾具有解決

airiti

威脅的需求，也相信自己可以處理該威脅，行動意圖仍然不會有顯著的增加。雖然此發現看似和延伸平行模式的預測相左，但該模式所著重的大多是個人層次的威脅，而非如氣候變遷這種牽涉到集體行為的共同風險，故本研究實則對延伸平行模式的適用性提供了良好的參照點。

參考書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 年 4 月 14 日）。〈節能減碳十大無悔宣言〉。取自 http://www.epa.gov.tw/lp.asp?ctNode=32003&CtUnit=1722&BaseDSD=7&mp=epa

周儒、潘淑蘭、吳忠宏（2013）。〈大學生面對全球暖化議題採取行動之影響因子研究〉，《環境教育研究》，10（1）：1-34。

徐美苓、施琮仁（2015）。〈氣候變遷相關政策民意支持的多元面貌〉，《中華傳播學刊》，28：239-278。

———（2013）。〈臺灣氣候變遷全國民眾電話調查計畫〉。（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委託計畫研究報告）。臺北：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徐美苓、楊意菁（2011）。〈臺灣全球暖化風險溝通的常民認知〉，《傳播與社會》，15：71-104。

柳中明（2010 年 5 月 14 日）。〈柳中明回應：「莫拉克降雨多　與暖化無關」〉。取自 http://lowestc.blogspot.tw/2010/05/blog-post_14.html

張楊乾（2010 年 7 月 26 日）。〈「八八風災與暖化意識」語音辨識電話民調發布〉。取自 http://lowestc.blogspot.tw/2010/07/blog-post_26.html

———（2010 年 5 月 6 日）。〈臺大教授：莫拉克降雨多　與暖化關係不大〉。取自 http://lowestc.blogspot.tw/2010/05/blog-post_06.html

楊意菁、徐美苓（2012）。〈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溝通：以全球暖化議題的情境公眾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2：169-209。

Adger, W. N. (2003). Social capit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Geography*, *79*, 387-404.

Böhm, G. (2003). Emotional reactions to environmental risks: Consequentialist versus ethic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 199-212.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NY: Worth.

--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122-147.

Bendig, A. W. (1954a). Reliability and the number of rating-scale categories. *Journal of*

airiti

Applied Psychology, *38*, 38-40.

-- (1954b). Reliability of short rating scale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rated stimuli.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8*, 167-170.

Boerschig, S., & De Young, R. (1993). Evaluation of selected recycling curricula: Educating the green citize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4*(3), 17-22.

Bord, R. J., O'Connor, R. E., & Fischer, A. (2000). In what sense does the public need to underst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9*, 205-218.

Carle, J. (2015, July 14). *Climate change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 Americans, Europeans, middle easterners focus on ISIS as greatest dang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7/14/climate-change-seen-as-top-global-threat/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Feinberg, M., & Willer, R. (2011). Apocalypse soon? Dire messages reduce belief in global warming by contradicting just-world belief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34-38.

Fischhoff, B., Slovic, P., Lichtenstein, S., Read, S., & Combs, B. (1978).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 *Policy Sciences*, *9*, 127-152.

Gamson, W. A. (199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A. D. Morris & C. M.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pp. 53-76).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2009).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6*, 408-420.

Heath, Y., & Gifford, R. (2006). Free-market id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case of belief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8*, 48-71.

Hersch, J., & Viscusi, W. K. (2006). The generational divide in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uropean evidence. *Climatic Change*, *77*, 121-136.

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7).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8*(2), 1-8.

airiti

Hsu, M.-L., & Shih, T.-J. (2014, August). *Pattern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mong Taiwanese adults: A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vidence, RI.

Hsu, S.-J., & Roth, R. E. (1998). An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held by secondary teachers in the Hualien area of 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 229-249.

Kim, S., Jeong, S.-H., & Hwang, Y. (2013). Predictor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American and Korean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Science Communication*, *35*, 168-188.

Kittipongvises, S., & Mino, T. (2013).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s held by the rural citizens of Thailand. *Ecopsychology*, *5*, 126-135.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s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Kollmuss, A., & Agyeman, J. (2002).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8*, 239-260.

Kuhn, K. M. (2000). Message format and audience values: Interactiv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n perceived ris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 41-51.

Lam, S. P. (2006). Predicting intention to save water: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response efficacy, vulnerability, and perceived efficiency of alternative solu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 2803-2824.

Lazarus, R. 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F. L. F. (2010). The perceptual base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protest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2*, 392-411.

Leiserowitz, A. (2007). Communicating the risks of global warming: American risk perceptions, affective images, an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In S. C. Moser & L.

airiti

Dilling (Eds.), *Creating a climate for change: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change* (pp. 44-63).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 Climate change risk percep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The role of affect, imagery, and values. *Climatic Change*, *77*, 45-72.

Leiserowitz, A., Maibach, E., Roser-Renouf, C., Feinberg, G., Rosenthal, S., & Marlon, J. (2014). *Climate change in the American mind: Americans' global warming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 Novembe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environment.yale.edu/climate-communication-OFF/files/Climate-Beliefs-November-2013.pdf

Liberman, A., & Chaiken, S. (1992). Defensive processing of personally relevant health messag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669-679.

Liberman, N., & Trope, Y. (2008). The psychology of transcending the here and now. *Science*, *322*, 1201-1205.

Loewenstein, G. F., Weber, E. U., Hsee, C. K., & Welch, N. (2001).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 267-286.

Lorenzoni, I., & Whitmarsh, L. (2014). Climate change and perceptions, behaviors,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fter the IPCC 5th assessment report -- a WIREs editorial.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5*, 703-708.

Lubell, M., Vedlitz, A., Zahran, S., & Alston, L. T. (2006). Collective action,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air quality poli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9*, 149-160.

Lubell, M., Zahran, S., & Vedlitz, A. (2007). Collective action and citizen responses to global warming. *Political Behavior*, *29*, 391-413.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Meinhold, J. L., & Malkus, A. J. (2005). Adolescent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Can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self-efficacy make a differenc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7*, 511-532.

Milfont, T. L. (2010).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psychology. In V. Corral-Verdugo, C. H. Garcia-Cadana, & M. Frías-Armenta (Eds.),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sustainability: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19-42). New York, NY: Nova Science.

Nisbet, M. C. (2009a).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Why frames matter for public

airiti

engagement.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51*(2), 12-23.

-- (2009b). Framing science: A new paradigm in public engagement. In L. Kahlor & P. Stout (Eds.), *Understanding science: New agenda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p. 40-67). New York, NY: Routledge.

Nolan, J. M. (2010). "An Inconvenient Truth" increases knowledge, concern, and willingnes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2*, 643-658.

O'Connor, R. E., Bard, R. J., & Fisher, A. (1999). Risk perceptions, general environmental beliefs, and willingnes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Risk Analysis*, *19*, 461-471.

O'Neill, S., & Nicholson-Cole, S. (2009). "Fear won't do it": Promoting positive engagement with climate change through visual and iconic representation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0*, 355-379.

Ostrom, E. (2010). Polycentric systems for coping with collective ac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 550-557.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4).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6*, 717-731.

Price, V., & Tewksbury, D. (1997). News values and public opinion: A theoretical account of media priming and framing. In G. A. Barnett & F. J. Boster (Ed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13, pp. 173-212). Greenwich, CT: Ablex.

Retzbach, J., Otto, L., & Maier, M. (2016). Measuring the perceived uncertaint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5*, 638-655.

Ruiter, R. A., Abraham, C., & Kok, G. (2001). Scary warnings and rational precautions: A review of the psychology of fear appeals. *Psychology and Health*, *16*, 613-630.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3). Personally relevant climate change: Th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local versus global message framing in engagement.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5*, 60-85.

-- (2010).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 and civic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89-297.

Scheufele, D. A. (2006). Messages and heuristics: How audiences form attitudes about

airiti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J. Turney (Ed.), *Engaging science: Thoughts, deeds, analysis and action* (pp. 20-25). London, UK: Wellcome Trust.

--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1), 103-122.

Semenza, J. C., Hall, D. E., Wilson, D. J., Bontempo, B. D., Sailor, D. J., & George, L. A. (2008).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Voluntary mitigation and barriers to behavior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35*, 479-487.

Shaw, A., Sheppard, S., Burch, S., Flanders, D., Wiek, A., Carmichael, J., et al. (2009). Making local futures tangible -- Synthesizing, downscaling, and visualizing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for participatory capacity build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 447-463.

Shih, T.-J., & Lin, C.-Y. (2016).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or mitigating actions against global warming: Linking framing and a dual processing mode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19. doi: 10.1080/17524032.2016.1154886

Slovic, P. (1987).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236*(4799), 280-285.

Slovic, P., Finucane, M. L., Peters, E., & MacGregor, D. G. (2004). Risk as analysis and risk as feelings: Some thoughts about affect, reason, risk, and rationality. *Risk Analysis*, *24*, 311-322.

Spence, A., & Pidgeon, N. (2010). Framing and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effects of distance and outcome frame manipul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 656-667.

Spence, A., Poortinga, W., & Pidgeon, N. (2012).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f climate change. *Risk Analysis*, *32*, 957-972.

Sterman, J. D., & Sweeney, L. B. (2007). Understanding public complacency about climate change: Adults' mental models of climate change violate conservation of matter. *Climatic Change*, *80*, 213-238.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 Collective action: Towards a dual-pathway model.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5), 59-99.

Stürmer, S., Simon, B., Loewy, M., & Jörger, H. (2003).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fat acceptance move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6*, 71-82.

Tabernero, C., & Hernández, B. (2011). Self-efficac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guid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3*, 658-675.

airiti

Trope, Y., Liberman, N., & Wakslak, C. (2007). Construal levels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Effects on representation, predic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7*, 83-95.

van Stekelenburg, J., & Klandermans, B. (201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Current Sociology*, *61*, 886-905.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2). Protesters as "passionate economists" a 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of approach coping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 180-199.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664.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10).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dual pathway model analysis of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39-346.

Verplanken, B., & Roy, D. (2013). "My worries are rational, climate change is not": Habitual ecological worrying is an adaptive response. *Plos One*, *8*(9), 1-6.

Wiedemann, P. M., & Schütz, H. (2005).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risk perception: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the EMF area.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3*, 402-405.

Witte, K. (1996). Predicting risk behavior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diagnostic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 317-342.

-- (1992).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9*, 329-349.

Witte, K., & Allen, M. (2000). A meta-analysis of fear appeals: Implications for effective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 *27*, 591-615.

Zhao, X. (2009). Media use and global warming perceptions: A snapshot of the reinforcing spiral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 698-723.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5-36, January 2017

How Message Framing and Presentation Affect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A Dual-Pathway Model Perspective

Shih, Tsung-Jen*

Associate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heth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can be effectively mitigated depends heavily on degree of individual engagement in environmental-friendly behaviors.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dual pathway model, which emphasizes the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efficacy, to investigate how to facilitate mitigation actions. Through an experiment involving 211 people recruited at a large public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this study found both emotion-focused coping and problem-focused coping to be possible pathways leading to mitigation action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Regarding emotion-focused cop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raming climate change as a local issue increased its perceived relevance, which, in turn, stimulated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ing action cues in messages increased knowledge of action strategies, and so triggered different forms of efficac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 case of problem-focused coping.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negative emotions interacted with various forms of efficacy to shape intentions. 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s was stronger for people low in response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suggesting the role of efficacy may not be monotonous.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erceived efficacy, climate change, collective acti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dual-pathway model

---

* Email: tjshih@gmail.com
Received: 2015.11.9
Accepted: 2016.7.19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ei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37-70．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3

緩慢開展的危害再現：媒介報導中的旱災、風險及氣候變遷論述之語料分析

郭文平 *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旱災被視為是一種緩慢開展風險，其影響層面深遠且具有日常性，本研究在 2014 ~ 2015 年臺灣「十年大旱」背景下，以質量並行的語料分析方法探討臺灣平面媒體如何再現旱災。研究發現平面媒體再現的旱災多半強調「水的供給面」論述，這類供給面論述也偏好連結到對自然降雨的期待、及對水庫短期蓄水量變化的關切。旱災被再現成一種「必須對抗的戰爭」、而不是視為長期風險而與之共存，氣候變遷及旱災風險的長期論述幾乎在相關的報導中消失不見。本研究顯示臺灣媒體旱災再現需調整角度關注較多需求面節水問題，同時在論述上應多朝向視旱災可能是未來臺灣常態的氣候現象之一，而非短時間的異常現象。

關鍵詞：旱災、氣候變遷、媒體再現、語料分析、緩慢開展風險

* Email: kuowinpi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1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8 月 9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2014 年末到 2015 年中旬，臺灣面臨嚴重乾旱，這場旱災被以「十年大旱」形容，引發了臺灣對降雨、氣候變遷、水資源分配及日常用水討論，並持續半年多時間，2015 年中旬因梅雨及續颱風帶來雨水，嚴峻缺水情況暫告段落。

本文以「十年大旱」作背景，蒐集《聯合報》、《蘋果日報》及《自由時報》[1] 三份臺灣主要報紙旱災期間報導，以語料分析（corpus analysis）技術探察旱災報導字彙使用及論述，本研究試圖回答核心問題是：媒體如何再現旱災及其帶來的風險？

旱災常被視為是一種「緩慢開展的危害」（slow-onset or slow-moving hazard），因缺水不似洪水、地震等帶來即刻的災難，但隨時間推移乾旱會逐漸影響日常生活，釀成災難 (Sonnett, Morehouse, Finger, Garfin, & Rattray, 2006; Ward, 2005)。旱災所牽涉課題包括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運用管理、災難回應與解決等，都是媒體關注的公共議題，媒體也是民眾獲得旱災資訊、政府各項因應措施主要來源 (Hurlimann & Dolnicar, 2012)，但國內外媒體如何「再現旱災」或「論述旱災」的相關研究屈指可數，使得此一主題成為有待開發的研究面向。

旱災作為一種災難具有多重特徵，首先，旱災是緩慢進展風險型態，長期並直接影響到大眾日常生活經驗（用水），因此旱災經驗具有「日常性」（everydayness）特徵 (Shove, 2003)；其次，旱災也是「水文氣候風險」（hydro-climatic hazard），乾旱多因降雨或水源缺乏，常被納入氣候環境因素一併討論 (Ruiz Sinoga & León Gross, 2013)；再來，旱災是包含多重現實（reality）的情況，除氣候、水文、環境外，旱災問題融合社會經濟、文化實踐、及政治政策等層面，是一種社會環境現象（social-environmental phenomena）的綜合問題 (Anderson, 2014; Wahlquist, 2003)。

2014 ~ 2015 年旱災在 2014 年末引起關注，經濟部水利署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提出預警，該年 10 月到 11 月降雨創下氣象局自 1947 年設置平地雨量站以來歷史最低紀錄，各主要水庫供水量遠低於預期，是 1978 年以來最嚴重「旱災」（經濟部水利署，2014b 年 12 月 21 日）。在此之前，水利署因「水情趨緊」（經濟部水利署，2014c 年 11 月 20 日），採取連串限水、農田停灌休耕、及民生工業限水措施（經濟部水利署，2014a 年 12 月 25 日）。但是 2015 年 5 月間進入

1 此三份報紙已經占臺灣讀者閱報率的 90% 以上，因此本研究未將四大主流紙媒中的《中國時報》納入語料分析的選取樣本中。

airiti

梅雨季節旱象獲紓緩，同年 5 月 25 日經濟部發布乾旱解除訊息（經濟部水利署，2015a 年 5 月 25 日）。

2014 ~ 2015 年旱災普遍被認為是受到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官方指未來極端氣候將成常態，同時將臺灣乾旱和氣候變遷連結（經濟部水利署，2015b 年 3 月 5 日）。其實，近年許多研究早已經將旱災列為氣候變遷導致結果之一 (Risbey, Karoly, Reynolds, & Braganza, 2003)，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指出，在暖化趨勢下，全球乾旱將會頻繁發生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5)，某些不常發生旱災的地區也會出現乾旱，且 21 世紀旱災發生次數將超越 20 世紀 (Wade, Jones, & Osborn, 2006)。上述討論顯示，當代論述旱災問題無法忽略氣候變遷因素，這也是本研究將氣候變遷納入媒體再現旱災討論原因。

本文的「再現」指的是以語言、影像或不同媒材建構事件意義過程，並涉及「指意」及符號系統運用與實踐 (Hall, 1997)。而語料分析焦點則是「新聞報導中的語言文字運用如何被用來再現旱災」，這個主題也被歸屬於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 (Baker & Ellece, 2011)。此外，語料分析方法在意義上也兼具對文本詞彙使用的數量探索、及文本論述的意義詮釋與解析，兼具量化與質化的分析型態 (Baker, Gabrielatos, Khosravinik, Krzyżanowski, McEnery, & Wodak, 2008; McEnery & Hardie, 2011; Tognini-Bonelli, 2001)。

整體來說，本文目的在探尋旱災報導中主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為何？氣候變遷及風險等概念在旱災報導中又如何被論述？根據 van Dijk (1996) 關於社會主控意識形態及團體的討論，本文將「主控論述」定義為：對某些議題及行動的普遍性或支配性說法與詮釋，這樣的詮釋可能是基於社會上某些被認為是合理的或是道德的觀點。新聞報導中經常存在對某些議題的主控論述，透過文本論述分析可有效探詢這些主控論述如何被植入新聞報導，進而瞭解事件或議題如何被媒體理解及再現。

貳、文獻回顧

過去研究顯示，有關乾旱或缺水問題發生之際，民眾難以憑下雨及用水經驗感知情況，媒體仍是民眾獲得乾旱資訊主要來源，且影響公眾如何理解及因應旱災 (Dessai & Sims, 2010; Hurlimann & Dolnicar, 2012)。許多關於水的議題都會關注乾旱討論、並擴及乾旱相關議題。Hurlimann & Dolnicar (2012) 分析 2008 年

airiti

澳洲報紙、廣播及電視 1,253 篇關於水資源報導，發現乾旱是最常見的議題（占 56%）、其次是海水淡化（27%）及限水（17%）。乾旱資訊和媒體報導關係密切，媒體呈現甚麼樣的乾旱現實及論述，因此成為本文研究焦點。

一、旱災、氣候及其論述

媒體的旱災再現首先觸及的問題是「旱災如何被定義」，此一問題涉及多層面考量，澳洲是乾旱經驗最豐富國家之一，其經驗被許多國家引為借鏡。Anderson (2014) 在《持續忍耐：澳洲乾旱故事》（*Endurance: Australian Stories of Drought*）一書中強調，乾旱除了是人類實際體驗外，也涉及文化論述概念。異常（aberrance）是當代西方文化在處理乾旱問題時慣常的思維邏輯模式，從長遠歷史角度來看，乾旱被視為一種「謎」（enigma），而氣候異常成為理解乾旱的框架之一。West & Smith (1996) 指出，多數旱災都被媒體報導描述為不正常、超自然、威脅社會的現象，不是「正常氣候情況」，旱災因此習慣性地被建構成一種大自然給人們的「無預警」且「空前絕後」的挑戰。異常論述使得早期旱災都被認為是「神的旨意」、且「施行於毫無受到保護的人類身上」 (Anderson, 2014)。

抗旱也常和「英雄主義」及「國族精神」的象徵連結，Sofoulis (2011, 2005) 指出，20 世紀澳洲為抗旱廣泛建立水庫等大型公共建設系統，確保公眾用水無虞，這些建設受到澳洲人「英雄式」歌頌，也強化了澳洲人國族主義。水壩代表一種解決乾旱的「鉅水」（big water）論述，這種論述結合澳洲「巨型水壩」建構史，串連起澳洲人抗旱、英雄主義及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Anderson (2014) 則認為抗旱建構了「白色澳洲人神話」，其論述及意象是「受苦難的大地及掙扎」，激起了澳洲人抗爭的特質。

不過，旱災異常論述及鉅水論述後來逐漸轉化，1990 年代澳洲政府鼓勵農民節水對抗旱災，政府將旱災從一種自然災難論述，轉化成為「正常的商業風險」，澳洲農業生產者必須在其商業計畫中將旱災列為事先預期且考量變數 (Anderson, 2014; Ward, 2005)，不過澳洲媒體似乎並未跟隨著政府政策論述移轉，仍偏好旱災是異常災難的論述模式 (Ward, 2005)。

本文將旱災視為一種「緩慢進展危害」，相關定義在此需先釐清。危害（hazard）、風險（risk）及危機（crisis）意義實際上有差異。「Hazard」本文譯作「危害」，指一切可能引發災害風險因素。Singer & Endreny (1993: 6) 將危害定義為「對人類及其珍惜之物的威脅」，如有毒廢棄物、貧窮、風災、瘧疾、汽

airiti

車等。本文中「缺水」或「旱災」就是一種可能引發災難風險的危害；「Risk」通常譯作「風險」，其定義為「任何和危害相連而對財產可能的損害、導致的疾病、受傷或死亡」 (Singer & Endreny, 1993: 6)，從這點來看，危害是具體可能損害人們財產或生命的事與物，其可能引發的變化程度稱為風險，這種變化通常是具負面結果 (Singer & Endreny, 1993)。「Crisis」譯為「危機」，指正在發生且可能導致或已產生傷害及損失的事件。Coombs (2010a: 19) 定義危機是「對於一個未預期發生事件的知覺，該事件威脅利益者的預期、同時可能產生負面結果」。風險和危機之間具有不可分關係，風險是潛在尚未發生的災害，而危機則是風險發生後形成的事件 (Coombs, 2010b: 56)。Coombs (2010b) 指出，風險可能會發展成為危機，許多風險管理者都尋求在其轉變成為危機前，先標示或指出潛在風險，而危機處理也將事前風險評估作為重要指引 (Williams & Olaniran, 1998)。

二、媒體及旱災再現

旱災牽涉到文化建構的概念，媒體則成為建構旱災論述及意象的一環。過去研究指「媒體的真實是建構的真實」 (Adoni & Mane, 1984; Tuchman, 1972)，媒體報導的旱災真實則涉及媒體如何看待旱災、及如何論述旱災。考察過去媒體及旱災相關研究，有以下特徵：

第一，旱災媒體報導多數集中在呈現問題及供給面解決方式。Paneque Salgado & Vargas Molina (2015) 分析西班牙安達露西亞（Andalusia）地區 2004 ~ 2005 年及 2011 ~ 2012 年兩個時期乾旱報導發現，媒體呈現問題包括水的價格、對社會經濟影響、及水資源政策等。Russell-Verma, Smith, & Jeffery (2015) 分析英國媒體網站中關於旱災調適（drought mitigation）報導發現，旱災調適報導集中在「管制用水」及「使用再生水及節水的獎勵措施」兩個面向，供給面報導（如海水淡化、興建水庫等）引發網民較為激烈討論，反觀需求面調適（如節水獎勵）討論不多。Sonnett et al. (2006) 分析美國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兩地區的旱災報導則發現，旱災報導問題面角度強調旱災的發生、危害、及危機；解決面角度則強調減少用水、調適及責任歸屬。而地區性政治、文化及基礎建設程度差異致使旱災報導角度也不同，供水基礎建設較好地區，旱災報導強調缺水警訊，並且傾向以長期問題態度定義旱災；反觀基礎建設尚在發展地區，旱災被視為是一種緊急問題，且急迫的要求政府提出短期解決方案。

第二，旱災報導通常會強調「戲劇性」、同時存在偏見。澳洲乾旱報導常出現乾枯大地、枯死植物或牲畜乾枯屍體等強烈畫面意象 (Hurlimann & Dolnicar,

airiti

2012)，但 Wahlquist (2003) 指出，早期旱災在澳洲是一種普遍經驗，1990 年代以後多數澳洲人生長於都市及基礎設施完善的環境，逐漸失去旱災警覺，媒體報導旱災多認為只會影響農民，媒體偏好受旱災折磨且絕望的新聞素材，而不強調旱災理性科學的討論，因強烈意象畫面比較符合「新聞價值」，其實乾枯大地這種旱災意象，實際上已經不是現代多數澳洲人的生活經驗。相反的，農業地區的媒體傾向鼓勵農民對抗旱災，例如 Campbell, Smith, & Siesmaa (2011) 分析澳洲維多利亞省報紙報導 2009 年旱災發現，當地旱災新聞傾向正面、且具有教育性的故事，以激勵當地農民及農業組織士氣。

第三，旱災論述從供給面轉為強調需求面。早期針對《紐約時報》1949 年到 1995 年旱災報導時序分析發現，媒體對旱災解決論述從早期供給面的擴張水庫水源方案，1980 年代後逐漸轉為討論家戶節水或解決輸送漏水問題等需求面方案 (De Gaetano, 1999)。許多媒體旱災論述也開始轉為和氣候變遷連結 (Risbey et al., 2003; Sofoulis, 2011)，氣候變遷引發的旱災主要是水的供給減少，加上興建水庫、尋找新的水源等這類解決水荒的供給論述在環境保護意識抬頭情況下面臨挑戰，旱災問題解決論述逐漸從「供給面」轉換到「需求面」。如 Sofoulis (2011) 指出，19 到 20 世紀中興建水庫解決乾旱模式是「供給面論述」典型，屬於歌頌「偉大政府」（興建水庫被視為是偉大基礎建設工程）及「英雄主義」的菁英觀點，市民用水行為被「一視同仁」看待，成為統計上「均質」使用者（average users），忽略了用水需求面差異。在全球氣候變遷及不正常降雨情況頻傳，加上無法興建新的水庫後，對旱災解決論述轉至討論水資源管理，並兼顧環境保護及生物多樣性的目標，旱災解決被認為需要新框架，如環境的規範、土地使用計畫、生態保護等 (B. W. Head, 2010)。

從上述文獻檢閱顯示，媒體再現旱災基本上充滿了不同程度爭議及關於旱災各種面向的論述爭議，據此，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幾個相互關連的研究問題：

（一）旱災期間報紙相關報導如何再現旱災？其主控論述又是甚麼？

（二）旱災報導中旱災的風險和危機概念如何被再現與論述？

（三）旱災報導中氣候變遷因素如何被再現與論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語料分析方法，該方法以大量電子化文本資料為基礎並輔以軟體程式分析，目的在找出文本中語言運用規則及模式，分析文本中字彙使用、

airiti

及所構成論述。語料分析方法和內容分析及質性文本分析方法不同，語料分析直接探討文本字彙構成意義，不採取內容分析類目建構及人工編碼方式；除此，語料分析兼具量化字詞統計及質化論述分析，比起傳統文本論述分析則具有更多的資料作為論證。

一、語料分析方法簡介

語料分析方法在本文意義在於，過去臺灣媒體再現旱災研究不多，語料分析有助研究者發掘研究者未能憑簡單觀察獲知的語言現象 (Baker, 2005)，在臺灣旱災媒體再現的相關研究缺乏下，語料分析極有助益。本研究主要語料分析方法包括：

（一）詞頻統計分析（frequency list）：統計語料文本中各字彙出現頻率，詞頻可代表語言生產者語言使用偏好及某些新聞文本的特徵 (Baker, 2005)。

（二）併置詞分析（collocation）：以 T 值檢定（T-score）方式探哪些字彙經常伴隨出現 (Sinclair, 1991)，T-score 檢測某一樣本分布平均數和整體分布平均數間差異否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本文預設將 T 值顯著水準設為 99.99%（$p < .001$），達到此一顯著程度字彙才會被列出討論。

（三）共詞句分析（concordance）：共詞句分析將觀察字彙置於文本的脈絡中心，探詢其意義，又稱為「脈絡中的關鍵字彙」（key word in context，簡稱 KWIC），是語料分析中作為論述分析方法的基礎。「論述」在本文中指涉的是「一種使用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在某些情況下所進行的賦予意義的社會行為」 (Lemke, 1995: 6)，論述範圍可指某一種文類如「新聞論述」，也可以指特定主題如「氣候變遷論述」、「旱災論述」等 (Bevitori, 2010)，本文所分析的論述既是新聞論述的一環，同時也涵蓋特定旱災相關主題論述。

本研究以 Wordsmith 6.0 軟體 (Scott, 2010, 2012) 輔助分析，程序是先進行斷詞，再以詞頻統計探詢旱災文本字彙出現頻率，稱為「以語料為基礎」分析（corpus-based analysis）。本研究斷詞軟體採用中研院發展的斷詞系統，斷詞準確率 96%。中研院中文斷詞系統詳細介紹見可參考相關網頁（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本研究接著從詞頻基礎進一步分析併置詞及共詞句，稱為語料驅動分析（corpus-driven analysis）(Tognini-Bonelli, 2001)。

詞頻統計結果通常會獲得龐大數量的字彙結果，本文參考過去作法，選擇出現次數在前 100 字彙討論 (Bevitori, 2010; McEnery & Hardie, 2011)。而前 100 大

airiti

詞頻字彙選擇作為後續分析標準是：（一）出現頻率排名較前且跟旱災相關的主題字彙；（二）跟本研究主要問題相關字彙，例如氣候變遷、風險等；及（三）依據過去研究文獻討論，而擷取出相關字彙作為分析，例如過去文獻關切旱災的需求面及供給面問題，研究者再從字彙中擷取出代表這些面向字彙進行分析。

二、語料資料的建構及分析過程

語料分析必須先建立分析的目標語料群集，再經過相關整理，方能以軟體程式輔助分析。本研究以關鍵字搜尋國內主要報紙資料庫方式建構分析的語料，建構語料使用的搜尋字彙，係根據以下原則選取：（一）旱災文獻中的搜尋字彙；（二）旱災發生期間每週隨機抽取一天，檢視報導標題用字做為文本搜尋字彙參考；及（三）本文的某些核心問題如「氣候變遷」或「風險」等字彙並未納入搜尋字彙，主要考量研究目的在瞭解旱災和上述議題的關係，以這兩個字彙搜尋將出現單純討論風險或氣候變遷、但與旱災無關文章。據此，本文以下列字串作為語料搜尋關鍵字包括：旱災、供水、抗旱、省水、限水、降雨、下雨。搜尋搭配「or」指令，具有上述任何字彙報導均會被納入搜尋結果。搜尋日期範圍設定為水利署發布第一階段限水、到經濟部結束抗旱應變工作為止的月分，搜尋三家國內主要報紙，其中《聯合報》資料庫為聯合知識庫；《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則透過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蒐集，實際搜尋時間為2014年11月1日到2015年5月31日。

總計本研究搜尋文章總計為 3,192 篇，剔除不符本研究宗旨報導後共計納入 941 篇報導（納入比率 29.47%），各月分搜尋及納入文本篇數統計見表 1，從該表可發現各報旱災報導都隨著旱災嚴重程度逐漸增加，在 2015 年的 3 月和 4 月分旱災最嚴重時期報達到最高峰，但 2015 年 5 月分梅雨季節帶來雨水後，旱災報導的篇數急速下降。

本文以關鍵字搜尋到旱災相關文本僅有約三成納入分析語料之中（表 1），主要是逐一檢視搜尋文本後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題的報導，剔除原則包括了：（一）重複文本；（二）主題並非旱災的文本（如廣告或只是將旱災當成附屬內容的文本）；及（三）氣象或缺水簡訊，內容僅有一兩句資訊，未涉旱災論述內容。不同媒體間報導篇數有不小落差，主要是部分報紙偏好整合報導（如《蘋果日報》），致報導量偏少，但語料分析因注重整體語料文本的情況，因此單一報紙篇數較少不影響分析。

airiti

日期	自由時報／篇		蘋果日報／篇		聯合報／篇	
	篩選前	篩選後	篩選前	篩選後	篩選前	篩選前
2014 年 11 月	108	20	31	3	94	18
2014 年 12 月	155	61	55	10	168	37
2015 年 1 月	106	40	24	4	124	31
2015 年 2 月	137	67	33	10	115	42
2015 年 3 月	335	129	64	22	292	93
2015 年 4 月	327	119	88	31	312	87
2015 年 5 月	286	67	84	21	243	26
各報分析篇數		503		101		337
總計分析篇數						941

表 1：語料資料搜尋結果及篩選結果篇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以 941 篇關於旱災報導進行語料分析，總計語料蒐集文本總字數為 26 萬 1,815 字，詞頻統計總計列出 2 萬 8,204 個字彙。

一、旱災：媒體語料的字彙運用

字彙頻率統計呈現了「甚麼字彙在旱災報導中「經常出現」或「常被運用」，詞頻也代表特定新聞議題分布趨向，頻繁出現字彙反映媒體關切議題焦點，研究者根據高頻率出現字彙可進行「字義歸類」（semantic category），查探整體旱災新聞報導特徵。

表 2 為詞頻統計結果後的前一百大字彙，除了屬於句子聯繫字彙外，主要旱災相關字彙（稱為內容用字）可區分為以下幾類：（一）描述旱災整體情況及反應的字彙最多，如「水情」、「缺水」、「旱象」、及「影響」等，符合旱災期間對「缺水」問題關切；（二）「水庫」一詞是出現頻率最高字彙，相關字彙包括表示水庫位置（例如「石門」、「桃園」等因位於水庫集水區而頻繁出現）、「萬噸」、「蓄水量」等也經常出現；（三）水的運用字彙如「用水」、「省水」等也因為乾旱限水成為高度被關注字彙；（四）政策限制用水的字彙如「限水」、「供水」、「停水」等，因和民眾日常用水息息相關而頻繁出現；（五）區隔水資源運用的用字如「工業」、「民生」等，這些字彙代表了誰用水？甚麼類型用水？（六）表示社會行為者及引述意見的用字，包括「水利署」、「經濟部」、

airiti

編號	字彙	次數	%	編號	字彙	次數	%	編號	字彙	次數	%
1	#	8,485	3.29	34	就	661	0.26	67	休耕	419	0.16
2	的	5,074	1.97	35	來	648	0.25	68	進入	412	0.16
3	水庫	2,720	1.05	36	水利署	644	0.25	69	至	411	0.16
4	用水	2,212	0.86	37	昨天	615	0.24	70	用水量	406	0.16
5	限水	1,781	0.69	38	節水	614	0.24	71	讓	405	0.16
6	也	1,475	0.57	39	已	607	0.24	72	仍	402	0.16
7	在	1,442	0.56	40	影響	581	0.23	73	可能	399	0.15
8	有	1,258	0.49	41	實施	572	0.22	74	毫米	395	0.15
9	供水	1,212	0.47	42	蓄水量	569	0.22	75	下	391	0.15
10	表示	1,172	0.45	43	臺南	555	0.21	76	每天	375	0.15
11	是	1,151	0.45	44	措施	548	0.21	77	第三	374	0.14
12	為	1,126	0.44	45	了	547	0.21	78	和	373	0.14
13	說	1,099	0.43	46	水位	545	0.21	79	以	372	0.14
14	但	1,094	0.42	47	停水	539	0.21	80	經濟部	371	0.14
15	都	972	0.38	48	再	539	0.21	81	持續	368	0.14
16	水情	923	0.36	49	缺水	539	0.21	82	使用	364	0.14
17	會	909	0.35	50	高雄	530	0.21	83	多	363	0.14
18	地區	894	0.35	51	工業	518	0.20	84	若	354	0.14
19	等	885	0.34	52	水	510	0.20	85	公尺	348	0.13
20	石門	853	0.33	53	對	503	0.19	86	雨量	348	0.13
21	到	849	0.33	54	要	499	0.19	87	有效	345	0.13
22	階段	847	0.33	55	水量	497	0.19	88	新竹	343	0.13
23	降雨	816	0.32	56	抗旱	496	0.19	89	年	340	0.13
24	於	813	0.31	57	臺灣	474	0.18	90	自來水公司	339	0.13
25	與	806	0.31	58	今年	473	0.18	91	第二	338	0.13
26	不	784	0.30	59	可	472	0.18	92	由	335	0.13
27	約	769	0.30	60	旱象	472	0.18	93	僅	332	0.13
28	及	765	0.30	61	省水	468	0.18	94	時	331	0.13
29	後	744	0.29	62	民生	455	0.18	95	水資源	331	0.13
30	萬噸	728	0.28	63	從	449	0.17	96	或	326	0.13
31	桃園	725	0.28	64	指出	441	0.17	97	立方公尺	318	0.12
32	目前	708	0.27	65	民眾	430	0.17	98	減少	316	0.12
33	月	667	0.26	66	大	427	0.17	99	較	312	0.12
								100	因應	298	0.12

表 2：旱災報導語料前 100 大詞頻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 代表語料中的阿拉伯數字，軟體程式自動設為同義的字彙。

airiti

「自來水公司」或「民眾」等。官方單位成為旱災報導最常出現的行為者，另外引述用字如「表示」、「說」和「指出」，則因為新聞報導屬於經常引用消息來源的文類（news genre）而經常出現；（七）旱災行動的整體用字，「抗旱」一詞是出現最多的字彙；（八）指涉與量的用字如「降雨」、「雨量」等，顯示旱災期間對該問題的關切；及以（九）新聞的時間用字，如「目前」、「月」及「昨天」等。

詞頻字義歸類過程中，部分文法字彙如「的」這類用字出現次數很多，但和旱災內容無直接關聯，故不討論；此外，部分字彙跨越不同語意使用領域字彙，則以併置詞分析來判斷其最常出現情況作為歸類依據。

詞頻統計初步呈現幾個旱災報導特徵：首先，旱災報導主要關切仍以「供給面」論述居多，「水庫」一詞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內容字彙便可看出。如本文的文獻部分討論，水庫代表一種「鉅水論述形式」 (Sofoulis, 2005, 2011)，同時包涵對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的景仰與孺慕，除此，水庫的興建也象徵人類奮鬥對抗自然的偉大表現 (Sofoulis, 2005)。做為某一時期旱災解決模式的主控論述，水庫功能論述特別強調水的量化層面，加上歌頌水庫興建偉大的意識形態根植人心，使得在旱災期間水庫蓄水量成為整體社會關注焦點。相對表意供給面的字彙，需求面字彙在詞頻統計中整體出現情況較不頻繁，雖然許多需求面字彙出現頻率仍在前 100 名內。需求面字彙通常連結對旱災問題的因應和解決方法，包括「省水」、或「休耕」等，都代表站在需求面觀點討論旱災情況。不過，某些字彙出現代表著從供給面著手的政策性限制用水需求，如「限水」、「階段」（限水）、或「停水」等。

其次，「抗旱」一詞頻繁出現，可視為是媒體（或媒體所反映）對於旱災的整體論述觀點之一，這種對抗意識形態暗示「旱災如同作戰」必須要對抗。Wahlquist (2003) 指出，媒體報導旱災時候偏好用戰鬥隱喻，旱災報導往往不著眼於「如何與旱災共存或適應」，而是一種持續的對抗。和「旱」這個字相連的動詞還有「解旱」、「耐旱」、「防旱」、「救旱」，這些字彙出現低於 20 次，整體來說引用情況不如「抗旱」一詞普遍。

第三，社會行為者字彙在詞頻統計中出現「水利署」、「民眾」、「經濟部」及「自來水公司」等，這些字彙涵蓋了官方機構、用水供應機構、及指涉一般大眾的語言表意。從整體併置詞來看，社會行為者字彙都經常和「話語權」（discourse authority）相關字彙（包括「表示」、「說」及「指出」）併置使用，如「水利署」一詞和前述話語權的三個字彙總計連用 139 次、「民眾」為 52 次、

airiti

「經濟部」44 次、自來水公司 55 次，這些社會行動者都是在旱災報導中跟話語權字彙連用最多的主詞字彙。

本文將話語權的三個字彙出現次數合併後分析這類字彙和甚麼樣的社會行為者連用。分析結果顯示，和話語權字彙連用達到顯著水準字彙中，最頻繁的是「水利署」（$n = 139$, $t = 11.216$, $p < .001$），其次依序是旱災期間的經濟部次長兼任水利署長的「楊偉甫」（$n = 10.695$, $t = 9.792$, $p < .001$）、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連上堯」（$n = 79$, $t = 8.794$, $p < .001$）、石門水庫管理中心主任「王瑋」（$n = 77$, $t = 8.67$, $p < .001$）、氣象局（$n = 72$, $t = 8.18$, $p < .001$）、自來水公司各管理處（$n = 72$, $t = 8.31$, $p < .001$）、及民眾（$n = 53$, $t = 6.66$, $p < .001$）等。

上述結果意義是，旱災期間具有高度話語權社會行為者，是官方機構人員及其相關單位，整體顯現出媒體在旱災期間一定程度上依賴官方訊息或呈現更多官方詮釋觀點。水的供給單位（如水庫、自來水公司）及氣象單位則因為缺水、限水及降雨問題而成為旱災期間中經常被引述的來源，單一民眾說法也會被引用，但整體而言比不上官方及水的供給單位。

詞頻統計顯示出哪些「經常出現」於旱災文本中的字彙，相對而言，「有哪些字彙是不常出現」或「消失」在媒體論述中同樣值得探討，這些「消失字彙」有時更具有分析意義 (van Dijk, 1998)。本文關切的「氣候變遷」一詞僅出現 25 次（類似的「氣候異常」一詞出現 5 次）、「風險」出現 29 次、「危機」則出現較多 146 次。必須說明是，這些字彙並未列入語料建構的搜尋字彙，主要是研究者希望瞭解「旱災報導中這些字彙呈現情況」而非「該時間整體新聞對於這些字彙」的狀況，在這裡的結果顯示，旱災文本中這些字彙出現情況不多，而非旱災期間整體的其他新聞這些字彙出現情況，這些字彙或許在其他新聞類型中出現頻繁，但此非本文討論重點。

整體而言，氣候變遷、風險或危機這類字彙幾乎是消失在旱災報導當中，也顯示旱災報導中並未特別重視及強調這類議題。另一個情況是話語權的併置詞彙分析發現，學者專家被引述的次數基本上不多，「教授」一詞和話語權字彙連用次數只有 19 次，顯示旱災報導中極少引用學者專家說法。

二、旱災報導的主軸論述

前述詞頻統計呈現字彙出現頻率，接續將分析這些字彙被擺在論述脈絡中如何形成意義，並反映旱災報導論述主軸。從詞頻統計出發，本文進行前述提出的「語料驅動分析」，方法包含前述的併置分析及共詞（論述）句分析。

airiti

（一）水庫成為旱災期間媒體主軸論述

旱災期間除「水庫」一詞成為詞頻統計最高頻率出現字彙外，其相關字彙如「水位」、「蓄水量」等，也成為旱災報導中頻繁出現字彙網絡，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媒體對旱災報導主軸論述之一。針對水庫一詞頻繁出現，研究者好奇的問題是：究竟「水庫」在旱災時期如何被論述？又是透過甚麼樣的字彙組成被論述？

本文查探「水庫」和哪些字彙一起連用，以分析水庫及併置字彙如何形成具有意義的字彙群組（lexical unit）。統計分析發現，「水庫」一詞常和特定水庫名稱連結，包括「石門」、「曾文」、「南化」、「明德」、「翡翠」等字彙，反映了媒體再現的缺水區域地理分布情況，大致上符合缺水區域情況。

水庫另一類經常連用字彙類型則是強調「供給面」字彙類型，包括了水庫的「水位」（$n = 268, t = 16.02, p < .001$）、「蓄水量」（$n = 308, t = 17.20, p < .001$）、「供水」（$n = 141, t = 10.79, p < .001$）、「進帳」（$n = 153, t = 12.19, p < .001$）、「水情」（$n = 142, t = 11.10, p < .001$）等，這些字彙和水庫連用符合前述指出媒體在旱災時期，對於水庫「供給面」的關切。

從字彙連用來看，水庫供給面問題常被以「進帳」來形容，進帳顯示一種計算用語，通常用於計算金錢，用於水庫描述時形成一種對水庫量化的「競賽式」及「比較計算」論述方式，以下共詞句子（concordance line）呈現了「水庫」和「進帳」兩個字彙之間的論述模式（粗體字部分為中心字彙，為本研究者標示強調，非原文格式，以下共詞句做法相同）：

> 南化水庫在農曆春節期間的一波雨水，曾**進帳**約50萬立方公尺（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7 日，第 B2 版）
>
> 鋒面雖帶來降雨，但對各水庫**進帳**有限，其中水情最糟的石門水庫降雨量僅十三點八毫米、預估入流量約二百萬噸（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12 日，第 A3 版）
>
> 這波雨勢讓水庫**進帳**三百萬噸水量，目前水位是二百七十二．九四公尺，有效蓄水率廿八．五％，蓄水量則是三千二百八十九噸，離滿水位約八公尺。以每天出水量約五十二萬噸計算，若不下雨，大概還能撐六十三天（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13 日，第 A14N 版）
>
> 水庫集水區平均降雨量一百二十三毫米，水位上升約五公分，水庫

airiti

管理中心預估昨天約可**進帳**八百七十萬噸，目前每天出水量約五十五萬噸（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21 日，第 A14N 版）

上述摘出的新聞文本中，「水庫」和「進帳」的共詞句可看出，水位數字在這些句子中都是論述核心、句子都包含「進帳」一詞。這些句子論述都和不同程度的數字化水量計算單位結合，如「進帳多少萬噸」等，有時候甚至強調水位上升「幾公分」，顯示在旱災期間討論水庫問題時都以一種量化計算的方式被論述。這種對於水的「量化關切」原本就是旱災期間常見的模式 (Jeffries, 2003)，也成為臺灣旱災報導中的常態。

前述的共詞句摘要中也可看出，臺灣媒體在旱災期間，偏好以短期計算方式報導水庫的庫存水位、水位的增加與減少等變化，這些論述時間上都是「短期的」、「以日計算」的水位變化，如論述中出現「每天出水量」、或是「大概還能撐六十三天」等的說法，都顯現了媒體旱災期間關切這種短期水位變化的態度。

（二）旱災報導中的對抗論述

詞頻計算發現「抗旱」一詞成旱災報導中頻繁出現字彙，語料中其他「旱」的相關字彙包括：「旱災」、「大旱」、「旱象」、「乾旱」等，所有的「旱」的詞彙合計總出現頻率達到 1,439 次，顯示媒體在這段期間普遍認知缺水現象已是一種屬於「旱」的現象。

「抗旱」一詞是旱災期間較為具體的「行動字彙」之一，該字彙的併置詞分析顯示，「抗旱」最常和「會議」這個字連用（$n = 100, t = 9.96, p < .001$）；其次是「節水」（$n = 45, t = 6.53, p < .001$），第三是「市府」（$n = 38, t = 6.07, p < .001$），其所顯示的意義是，媒體中抗旱常出現在會議層次、或被置於地方政府行動之中；其次，「節水抗旱」或「抗旱節水」這樣的用法也經常出現。以下摘要的抗旱共詞句，顯示抗旱一詞論述的型態：

為降低乾旱造成的損失與衝擊，水利署除展開**抗旱**，已完成地面人工增雨相關整備工作（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 B1 版）

氣候變遷，水資源更形珍貴，就算平日都不能浪費，何況是**抗旱**非常時期（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2 月 10 日，第 A14N 版）

airiti

用水減供幅度，各工業「用水大戶」**抗旱**如抗戰，桃園、新竹科學園區日前與北水處達成協議（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a 年 3 月 11 日，第 AA1 版）

對於旱象短期仍難解決，經濟部明天將召開**抗旱**會議，盤點各區水情（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4 月 9 日，第 A9 版）

上述「抗旱」一詞的共詞句摘述，可看出旱災不但以「對抗」的邏輯來被理解、同時也以戰爭的隱喻來框架，這樣的論述策略（discursive strategy）使媒體報導旱災時會出現「抗旱如抗戰」、或「抗旱是非常時期」這類戰爭描述的用語。當旱災被視為是「非常時期」，其意義是和「日常」形成對比，旱災仍被視為是一種異常的情況。其次，抗旱在許多論述中一如前述併置分析結果顯示，都和「官方的事務」或「相關會議」連結，如上述抗旱共詞句中提到了「抗旱如抗戰，園區和北水處達成協議」、「經濟部召開抗旱會議」、「水利署展開抗旱」等。

「抗旱」也常跟「節水」或「省水」兩個字彙連用，這種節水抗旱的論述也經常訴諸於「民眾」或「全民」，如以下共詞句摘要：

馬英九總統昨日視察時呼籲全民節水**抗旱**，經濟部並規畫，除部分地區工業大戶減少供水外，節水大計已指向民生，將拉長民生用水夜間減壓時間（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8 日，第 A2 版）

水情仍相當艱困，目前蓄水量僅廿五．八％，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抗旱**節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14 日，第 A14N 版）

上述包含抗旱及省水的共詞句中，大多指涉民生的或全民的，如「呼籲全民節水抗旱……節水大計已指向民生」或「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抗旱節水」。

這種全民的抗旱論述在某些時候也將民眾的抗旱和商業活動連結，部分抗旱及省水的共詞句，基本上被置於商業的脈絡討論，例如以下的共詞句：

抗旱帶動節水商機，居家生活賣場特力屋表示，因省水議題發燒，省水相關商品業績成長 3 成以上（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4 月 4 日，第 E2 版）

airiti

全民「**抗旱**」；居家賣場近兩周的省水、儲水設備，明顯成長 2 ~ 3 成，尤其儲水桶（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8 日，第 C7 版）

購物中心推出省水大作戰特販區，相關節水商品如水桶、省水閥、礦泉水、乾洗手等，一律祭出全民**抗旱**價；飯店則關閉游泳池（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14K 版）

這些抗旱共詞論述可以看出，媒體將全民抗旱置於商業的脈絡中，同時也將「省水行為」商品化，抗旱或省水被帶入一種關於商機的討論之中。

（三）旱災、風險、危機及媒體論述

本文關切主題之一是旱災報導中的「風險」及「危機」面向如何被再現？「風險」一詞在旱災語料中僅出現 29 次[2]，「危機」一詞出現較多，有 146 次。「危機」或「風險」兩個字在媒體運用程度上都不及強調供給面的水庫及其相關字彙、或強調面對旱災態度的抗旱等字彙。就語言運用來看，旱災作為一種風險或危機的意義在旱災報導中一定程度上被「語言化排除」（linguistically exclusion）。

本研究就「風險」及「危機」二字彙如何被論述進行併置詞分析，結果發現「缺水」和「風險」兩字彙最常一起連用，達到顯著水準（$n = 12, t = 3.44, p < .001$）；其次是「天氣」和「風險」連用（$n = 7, t = 2.64, p < .001$），這並不易意味著天氣變化被視為一種風險，實際對內文檢視，天氣和風險事實上是指「天氣風險管理公司」，兩者顯著被連用主要因旱災期間媒體報導天氣情況多引用該公司分析所致。

「危機」一詞同樣和「缺水」最常連用（$n = 76, t = 20.478, p < .001$）；其次是「限水」和「危機」連用（$n = 20, t = 4.24, p < .001$）；第三個和「危機」經常連用是「水庫」（$n = 13, t = 3.179, p < .001$）。無論「風險」或「危機」兩個字彙都未顯著和「氣候」或「氣候變遷」連用，一定程度顯示了氣候或氣候變遷問題在旱災報導語言運用觀點下很少被視為是一種危機或風險。

再以本文語料中的風險一詞的共詞句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旱災期間提到乾旱風險問題的預警對象大多不是考量一般民眾的日常用水風險問題，反而絕大多數是針對企業或是相關產業。如以下風險共詞句（《蘋果日報》的「風險」一詞在旱災期間全數都指「天氣風險管理公司」，故未列出該報）：

2 部分字彙因為出現次數太低，因此 Wordsmith 軟體主動剔除百分比計算，只列出次數。

airiti

明年農曆年前後的水情，看來真的不太樂觀，建議竹科、中科和南科需水性較高等產業，需要把缺水的**風險**考慮進去，一般民眾真的要開始節約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 AA2 版）

連續多天大雨後，股價被打回原形，儘管長線水資源仍是不可忽略的課題，但臺灣的水資源概念股投資**風險**相對偏高（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30 日，第 C02 版）

缺水問題迫在眉睫，CDP 的水專案，是讓企業提供水資源數據，透過行動減少水資源**危機**，CDP 則運用企業用水數據來建議企業缺水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 日，第 AA2 版）

台積電中科十五廠為例，四條生產線就投資近六億元，回收水每度成本約廿元，納入**風險**考量，比沒水可用還划算，目前限水措施對台積電影響微乎其微（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0 日，第 A1 版）

上述共詞句可看出媒體預警風險的對象，如第一個共詞句中提到「臺灣水資源概念股投資風險相對偏高」針對的是投資人；二到四句中提到「回收水每度成本約廿元，納入風險考量」、「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中文譯為「碳揭露專案」，屬於一個非營利組織）則運用企業用水數據來建議企業缺水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句中括號內文為本文作者加入非原始文句）、及「竹科、中科和南科需水性較高等產業，需要把缺水的風險考慮進去」等幾句論述的對象都是科技產業或企業。

部分風險論述表面上提到了民生用水問題，但其論述內在意義也非對於一般民眾的示警，例如以下兩段風險共詞句：

毛揆既然要求閣員換腦袋，就應該要求他們以新的思維與做法，來因應臺灣經常面臨缺水的**風險**，光靠宣導、道德勸說、限水，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缺水難題（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8 版）

新加坡同是缺水國家，卅年前就開始推動再生水，更將再生水回注水庫稀釋，供民生使用。但考量水質**風險**等因素，未來我將僅限非

airiti

食品、藥品的工業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A8 版）

上述兩個共詞的論述句中都提到了再生水運用及其水質問題，但在論述實際指涉上，第一段是討論再生水用於「非民生的用水產業」；第二段則引用當時行政院長毛治國談話，點出未來臺灣可能面臨缺水風險，但其論述指示對象則是內閣官員面對缺水風險的態度。

「危機」一詞的共詞句雖然也常和「缺水」及「限水」等字彙連用，但時間上都短期的措施或是活動，如以下危機的共詞句：

冷空氣來襲，挾帶水氣，各界本來期待可解除缺水**危機**，但可惜水氣不夠充沛，水庫進帳有限（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25 日，第 A09 版）

因應限水，再加裝兩個各一噸的水塔，估計可以渡過限水**危機**，孩子們如廁也改用水盆裝水，再以酒精消毒，維持清潔（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9 日，第 B1 版）

缺水**危機**讓洗車業者盡量用濕布擦車，加油站、汽車保養廠的自動洗車機停止營業（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26 日，第 B2 版）

面對缺水**危機**，高雄地區相關產品也持續熱銷……（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2 版）

替臺南帶來 1,000 萬噸水量，可多撐 12 天民生用水，但 2 水庫有效蓄水率仍各只有 13% 左右，限水**危機**仍未解除（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A10 版）

上述危機共詞句可看出，該詞彙的用法在意義上被置於較短期、或更多以「日常」觀點的缺水問題解決論述，這顯示危機被認為是「已發生」或「正在發生」且必須要盡速解決的情況，彰顯了媒體認為該段期間旱災已造成某種程度損害。例如上述句子中出現「冷空氣來襲夾帶水氣……水庫進帳有限」、或是「降雨替臺南地區帶來水源供給，可支撐 12 天民生用水」，兩個論述都將缺水危機置於短期氣象變化脈絡中討論；另外的論述句中則出現「缺水危機讓洗車業者盡量用濕布擦車……」、「度過限水危機，如廁用盆裝水」或「缺水危機……相關

airiti

產品熱銷」等，這類論述則是將缺水危機因應方式置於那些屬於「過渡時期的」、或「日常小撇步」的論述型態之中。

反觀前述風險共詞句子的論述中，多數時間指涉都是較長期問題解決脈絡，這可能和風險被視為一種潛在會發生情況有關，例如在前述的風險共詞句中，會出現包括「長線水資源仍是不可忽略的問題」（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30 日，第 C02 版）、「考量水質風險……未來我將僅限非食品」（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A8 版）、「道德勸說、限水，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缺水難題」（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8 版）、「明年農曆年前後水情」（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29 日，第 AA2 版），這些論述在風險的論述脈絡中，強調了「未來」、「日益」、「明年」等，都顯示媒體報導對風險問題有較長時間感知，提及的解決方案也著眼於中、長期方式。

（四）旱災報導中的神旨論述

無論旱災或其他相關災難研究中，自然現象經常都被連結到「神的旨意」、「天意如此」或「上天的懲罰」這樣的字眼，這是媒體歸因旱災常見的論述 (Singer & Endreny, 1993)。本研究旱災語料中神旨相關字彙群集合計共出現 111 次（包括了「老天」、「老天爺」、「天公」、「上天」及「天威」等），其中「老天」和「老天爺」兩個字彙被使用最多，顯示臺灣旱災報導中這一部分論述占有一定的位置。

併置詞分析發現「老天」和「下雨」（$n = 15, t = 3.861, p < .001$）及「希望」（$n = 8, t = 3.298, p < .001$）連用情況最多；而「老天爺」一詞也和「下雨」（$n = 9, t = 2.99, p < .001$）、「幫忙」（$n = 6, t = 2.44, p < .001$）及「希望」（$n = 6, t = 2.43, p < .001$）等經常連用。

從包含「老天」或「老天爺」的共詞句論述可以看出，媒體運用「老天」或「老天爺」兩字彙進行論述時，多半採用祈求語氣。如旱災論述中會出現以下的論述共詞句子，這些論述一方面將「水」視為是神的賜予之外，同時也將降雨問題「神聖化」，使得論述中出現「幫忙」、「祈求」、「寄望」等被動且顯示敬畏的用字：

> 要供給用戶 100 多萬噸原水，還是要寄望**老天爺**下雨才能解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B2 版）

airiti

水庫的水位直直落，如果**老天爺**再不幫忙，恐怕很快就會面臨缺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12 日，第 A14M 版）

馬達抽水，也增加電費成本，往後只能乞求**老天**下雨賞飯，早日解除旱象（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15 日，第 B1 版）

降雨為南化水庫帶來不少水量，希望**老天爺**「帶雨不帶災」，保持一定強度的雨（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A11 版）

部分祈求老天下雨的論述中還包含「（無奈的）責難」或是「天意如此」的意味，例如報導出現：

集水區累積雨量僅約二毫米，「**老天爺**下雨又下錯地方了！」（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3 月 7 日，第 A09 版）

楊姓住戶說，旱象持續、用水相當節制除濕機所產生的水都用水桶承接留用，「**老天爺**遲不下雨，不省一點水怎麼可以」（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3 日，第 A14D 版）

上述論述顯示媒體的旱災論述中帶有「天命難違」的色彩，這類論述顯示媒體旱災論述在語意上都期待「自然變化解決問題」優先於人為的措施。再如旱災論述句中強調「每週二、三停水，期間**老天爺**若下雨，停水仍有討論空間」（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29 日，第 A14K 版）；或前述的「寄望**老天爺**要下雨才能解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B2 版）等，意義上都顯示媒體旱災論述多數時候都是期待旱災解決方式要靠被動的「老天爺降雨」為前提。

媒體將降雨的問題神聖化的論述模式，可能出於媒體報導中一種對「自然力量」隱喻用法，並不見得是媒體果真認定降雨問題是「神的旨意」，但在其語言運用上，這樣隱喻式論述透過媒體報導輸出，其隱含的意識形態無形間可能強化或暗示旱災解決問題方式，最終情況仍要靠自然力量扭轉。

（五）旱災報導中的氣候變遷論述

氣候變遷被認為是導致 2014 ~ 2015 年臺灣旱災主要因素，不過語料統計「氣候變遷」一詞僅出現 25 次，顯示旱災報導脈絡中並未無太多氣候變遷問題討論。

airiti

從旱災報導中出現的「氣候變遷」一詞的共詞句字可以看出，整體而言旱災期間氣候變遷成為不少旱災論述的前提（presupposition），語意上暗示氣候變遷是缺水問題的另一項歸因（attribution）。因此氣候變遷「之下」、或「影響下」這樣類型句子會出現在相關論述中，例如「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降雨天數逐年降低，暴雨集中且強度越強、乾旱更長」（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 A15 版）；「花蓮多颱風、多地震，再加上**氣候變遷**帶來的強降雨，讓各種災害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加劇」（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 A14R 版）；或「**氣候變遷**下，不見得年年都是翡翠（水庫）豐沛，水的使用必須區域調度」（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13 日，第 A07 版）等。這種「氣候變遷影響（之下）」作為論述旱災歸因前提方式，符合相關科學研究及各界認定旱災發生成因的說法，惟整體旱災報導中氣候變遷和降雨變化的討論整體說來數量並不多。

旱災報導中部分論述提及對「氣候變遷導致降雨分布不均」情況的可能解決方案，例如論述中會提到「制定用水零成長政策」（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13 日，A07）、「水的使用必須區域調度」（自由時報，2015 年 4 月 13 日，第 A07 版）、及「CDP 多年來致力改變全球企業經營方式」（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 日，第 AA2 版）等。

不過，多數提到氣候變遷的論述基本上都是「呈現問題」，例如論述句中會有如：「原本預估**氣候變遷**趨勢導致豐水期降雨會爆量，枯水期更乾旱，現在卻是豐水期可能都不夠多，未來缺水可能是常態」（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16 日，第 A6 版）；或「臺灣降雨日數持續下降，百年來已減少四十天左右；此趨勢可能持續，**氣候變遷**帶來的乾旱威脅嚴峻」（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A16 版），如果將整體涉及氣候變遷的論述的 25 個論述句子進行分析，僅有七個關於氣候變遷的論述句提到相關缺水的解決方案。

（六）旱災的需求面論述

雖然本文在先前分析指出，旱災報導偏好強調「水庫情況」這類供給面報導，但需求面字彙在旱災文本中仍一定程度上被討論與報導。究竟這些需求面報導如何被再現與論述？是本文最後要討論問題。

從前述詞頻統計顯示，旱災報導中關於水的需求面論述基本上將用水分為三大區塊：「民生」、「農業」及「工業」都屬於頻繁出現字彙，將三個字彙各

airiti

自和「用水」進行併置統計，工業和用水共同出現 376 次、民生和用水一起出現 364 次、農業和用水一起出現 155 次。這樣的次數統計概略的顯示了媒體在報導用水區塊的情況，其中關於農業用水出現較少。

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兩字彙是討論較多的需求面向，而併置詞分析發現「工業用水」常和「民生」一詞併置成為「民生及工業用水」（$n = 63, t = 7.88, p < .001$），這種兩字彙經常伴隨出現形成一種字彙綑綁（lexical bundle）的情況，暗示文本生產者在處理問題時的歸類，工業和民生用水會一起被討論，農業用水則是不同範疇；工業用水一詞也經常和「大戶」（$n = 58, t = 7.58, p < .001$）及「減供」（$n = 61, t = 7.77, p < .001$）兩字彙連用，這顯示工業用水被認為是最需要減少用水的需求區塊。民生用水經常一起併置使用的字彙則是「水庫」（$n = 45, t = 6.243, p < .001$）、「供應」（$n = 44, t = 6.60, p < .001$）、以及「限水」（$n = 36, t = 5.804, p < .001$）等，這點並無意外；在農業用水方面，則是和前述的「工業」及「民生」兩字彙最常連用。

上述各區塊用水字彙的運用來看，無論是民生及工業用水，媒體關注的是以「減少供給」來抑制需求的手段，不過工業用水經常討論的是「大戶」的用水減供，反觀民生的用水則是關切水庫的儲水量及限水的措施，在語言使用意義上工業用水區隔出了「大戶／非大戶」，民生用水的討論則經常以整體集合名詞形態出現。比較值得注意是，從字彙使用情況來看，農業用水不是經常被排除在工業及民生用水討論之外，就是在討論時被和民生及工業用水並列討論。

為進一步瞭解三區塊用水在旱災報導中被論述的方式，本文將三個用水的詞彙進行共詞分析。結果顯示，工業用水論述都伴隨著「解決方案」，例如以下的工業用水共詞句論述，就包含了「水車購水」、「滯洪池抽水」或「中科廠水塔儲水」等具體方案：

> 由於廠商都建置回收處理設備，今起二階段限水，**工業用水**只減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一旦旱象進一步惡化，水車購水可能再度重演（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2 月 26 日，第 B3 版）
>
> 未來若持續惡化，還有滯洪池水源可供使用，抽取滯洪池水源澆灌廠……或作為嚴重缺水時部分**工業用水**的緊急補充水源（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9 日，第 B2 版）
>
> 中科廠商的水塔可儲水二、三天，中科管理局則是三個水塔，一

airiti

日用水量約七萬五千噸，三個水塔可使用三、四天……。（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31 日，第 A14J 版）

反觀民生用水論述，則多數寄望「水庫儲水增加」、「增加降雨解決問題」或「祈求老天能降下大雨」等，在語意上也不是論述主體，而是做為描述降雨、水庫情況的附屬，例如以下關於民生用水的共詞論述：

讓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累計約四．七毫米，換算約三十六萬噸的水量，僅是每日**民生用水**約四分之一的量……將視情況實施人工增雨，祈求老天能降下大雨（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5b 年 3 月 11 日，第 A14 版）

曾文集水區昨累積雨量約 61 毫米，南化約 45 毫米，替臺南帶來 1,000 萬噸水量，可多撐 12 天**民生用水**（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第 A10 版）

工業用水在許多論述中含有對工業用水的辯護或對缺水後果的憂慮、同時也暗示工業用水減供具有「極限」，如以下論述中：

若進入第二階段**工業用水**減供五 %，廠商們可能將會有影響（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31 日，第 A14J 版）

由於廠商都建置回收處理設備，今起二階段限水，**工業用水**只減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5 年 2 月 26 日，第 B3 版）

經濟部次長楊偉甫說，祭出節水措施以來，**工業用水**可壓縮空間已經不大，但**民生用水**還有空間。以石門水庫為例，每天**民生用水**的出水量達一百四十到五十萬噸，但全臺三大科學園區每天的用水量已壓縮至四十萬噸（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3 月 8 日，第 A2 版）

上述論述中，包括引述官員的談話指「工業用水可壓縮空間已經不大，但民生用水還有空間」，或強調「工業用水只減供 5%，不至於影響廠商營運」、「工業用水減供 5%，廠商們可能將會有影響」等，都隱含對於工業用水的關切及辯護。

airiti

反觀農業用水論述在旱災報導中被報導次數不如民生及工業用水，但媒體在選擇論述農業用水的再現時，都隱含著「農業用水」是被「犧牲」的一環，例如以下關於「農業用水」的共詞論述：

> 臺灣生態學會雲林工作站主任陳清圳表示，水利法第十八條明確規範用水順序為家用及公共用水、**農業用水**優先，**工業用水**在後…不應每次都先犧牲農業與農民（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自由時報，2014 年 12 月 27 日，第 A10 版）
>
> ……需水孔急，此時台塑六輕的用水幾乎全數得移撥**農業用水**，失去灌溉水的農民，如果想要耕作，只得抽取地下水，造成惡性循環（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蘋果日報，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 A15 版）
>
> 昨天以水資源為題開講，多人發言，認為政府逢乾旱，就以工業優先，以**工業用水**犧牲**農業用水**的思考，應該檢討（粗體字為作者所加）。（聯合報，2015 年 1 月 4 日，第 B2 版）

上述的論述顯示，農業用水在旱災報導中都強調是被犧牲的區塊，同時也暗示政府的政策失當，以及工業對於農業用水的侵害，雖然農業用水被提起的次數上雖處於弱勢，實質論述型態反而比起工業或民生用水更具有主動發聲及反動的意義。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語料分析方法探詢 2014 ~ 2015 年臺灣旱災期間報紙媒體報導對旱災、風險及氣候變遷等面向的再現與論述，本節討論本研究主要發現、價值及對未來研究建議。

一、旱災報導多著眼短期風險

整體而言，本研究貢獻了以語言論述觀點，且結合了質、量分析方法的媒體旱災再現研究。研究發現臺灣媒體再現的旱災偏好「強調水的供給面論述」，然而這些供給面論述多數情況下被連結到對自然降雨的期待、及對水庫短期蓄水量變化的關切。旱災被認為是一種「必須對抗的戰爭」，而不是視為「長期風險而與之共存」，即使部分媒體報導指出了臺灣未來可能的旱災隱憂，但氣候變遷及旱災風險論述幾乎在旱災報導中消失。

airiti

本研究提出了多個研究問題，首先是關於媒體再現旱災的主控論述，從字彙分析顯示，臺灣旱災報導集中在對水庫水情及存量變化面向上；除此，媒體的旱災報導也常以「老天爺」、「老天」這類「神格化」或隱喻的用法來對於旱災問題進行歸因，也連結對旱災問題的解決方法，包括了在報導中經常以「老天下雨才能解決旱象」這樣觀點進行論述。

就旱災本身而言，媒體的另一個主控論述是對旱災的「對抗」。「抗旱」一詞成為媒體報導中另一個慣常使用字彙。對抗的論述型態顯示一種將旱災視為「戰爭」的狀態，這種旱災等於作戰的論述，對照的是沒有旱災的日常生活，媒體的旱災報導的論述呈現出一種「旱災 vs. 沒旱災」、「戰爭 vs. 日常」、「正常 vs. 異常」的觀點暗示。

究竟該如何「定義」旱災的正常或異常，是本研究發現之下值得深思議題。Anderson (2014) 指出，「異常」是當代西方文化中思考乾旱的主流思維邏輯，旱災往往被再現成為一種「短暫的驚嚇」（temporal shock）或是一種「恐怖的異象」（horror alienation），不過當澳洲媒體經常把旱災視為是異常現象時，其實根據統計，澳洲沒有乾旱的時間其實並不長，整體說來「旱是日常」、反而「不旱是異常」。

就上述觀點來看，思考臺灣乾旱問題的本質是因應旱災的第一步，本文先前指出，整體社會對災害的風險與特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建構特質」。長年以來臺灣秋冬季節缺水似乎是一種常態，2014 ~ 2015 年旱災期間也有分析指出氣候變遷導致的枯水期拉長情況可能會變成一種「常態」，因此定義何種情況是正常、何種是異常，將直接影響到對旱災的因應與對策。

本研究第二研究問題是：旱災風險和危機概念如何被媒體論述？就字彙觀點來看，旱災報導中的「風險」一詞雖然在整體報導中出現次數不多，但當風險一詞被擺在報導論述中，提及對象卻極少是社會中的全體民眾，反而多半是農業、企業或是「非人」的水庫。本研究中旱災報導中使用「危機」一詞頻率超過「風險」，或許是分析文本選擇旱災發生期間，媒體多半認定旱災是即將迫近的危機，而非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論述分析發現「風險」一詞經常被用於旱災長期論述，而危機則是著眼於短期的問題解決論述，當媒體在使用危機一詞頻率上超越了使用風險一詞，所隱含意義是媒體對旱災問題偏向呈現「短期問題」，而非討論「長期變化的調適」。

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問題是：氣候變遷的因素在旱災報導中如何被再現與論述。研究發現相較於對水庫水位的關切，旱災報導中討論氣候變遷數量幾乎是付之闕如。考察出現次數不高的氣候變遷一詞論述發現，旱災期間報導固然視氣候

airiti

變遷是旱災發生的主要原因，不過媒體討論很少進一步的解釋、或呈現更多的氣候變遷問題，這使得氣候變遷在旱災報導中經常成為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背景資訊，缺乏更多解釋。

二、乾旱報導觀點：異常或日常？

總結來說，媒體再現旱災多數仍隱含一種短期的、下雨就可解決、及非正常情況危機的觀點。當代氣候變遷研究已強調，旱災未來可能是許多地區經常會出現的情況，乾旱應納入日常生活風險的一環，並且進行風險預防與規劃，不過臺灣媒體報導似乎缺乏此一論述觀點。事實上，強調供給面的水庫思維，在旱災期間也被部分媒體或學者指為不適合臺灣旱災問題解決的模式，因為臺灣的水庫目前大多有嚴重淤積問題，國外旱災頻傳地區也一改水庫論述而積極從需求面節水及省水等著手 (Sofoulis, 2005, 2011)，但本研究分析發現，關注「水庫」這種鉅水思維仍然是臺灣媒體在旱災期間最常出現及關切題材。

此外，本研究凸顯了旱災的一些本質上問題，缺水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可能成為「常態」，那麼異常、緊急措施的論述就不應該是解決臺灣缺水問題的主要思考方式；而期待老天下雨解決問題的思維邏輯也必須重新思考，這點也是基於臺灣在水的供給面上，是否仍然要視為是一個水源供給充足的國家已經可能出現疑慮，那麼在水的需求面上就應該要有不同的思維與實踐。

如何在旱災的報導中融入日常生活，本研究的幾項結論可以做為借鏡。首先，旱災屬於一種緩慢進展風險，加上未來氣候變遷導致旱災幾乎成為常態，媒體應將焦點擺在深入報導並討論長期的旱災因應方式，而非將焦點放在水庫短期水位、或短期省水商品銷售。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旱災風險，媒體報導也應該要有更多具有科學性的關注，以喚起民眾在旱災預警外的其他時間，也能夠具有節水意識。

其次，整體而言媒體在 2014 ~ 2015 年旱災期間仍然大篇幅關注供給面問題，從水庫問題被大量關注可見一般，在需求面的節水問題上，媒體關注焦點多半是政策性的減少供給（如停水、減供），其餘如日常生活中的用水文化等問題，媒體多半很少關注，澳洲在討論旱災因應時關注的面向相當多元，包括了以家戶為基礎的節水的科技是否真的可達到節水目的、家戶中用水設施（如水塔）如何影響用水、家庭裡的各種和用水相關的實踐活動如何回應節水與省水、回收水的蒐集和使用、乃至農業或工業用水型態如何因應整體氣候變遷、及更大的政府水資源管理政策等問題，都是可以更深入探討及著墨之處。L. Head (2012) 就認為我

airiti

們必須要扭轉的是都市中人們的「水文化」，而非單純的在每一次旱災發生時才思考節水問題，但從本文資料蒐集趨勢可見，媒體旱災報導在降雨解決了用水供給面（水庫）的問題後，旱災相關報導數量大幅減少，顯然在媒體在新聞價值的考量下，僅關注旱災最嚴重時期的情況，而不是穩定且長期的旱災因應及措施。

三、研究建議和研究限制

媒體旱災再現分析的角度相當廣，本研究中仍有許多層面基於篇幅關係無法觸及討論，包括需求面的水價、節水、省水；以及媒體對水資源、水的直接論述等，未來相關研究或可從這些面向著手。

此外，本研究在語料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旱災報導的論述分析，其中作為分析起點的詞頻統計，在部分字彙的選擇分析上，憑藉是研究者根據研究意旨的主觀考量，詞頻統計已可看出字彙運用趨勢，後續研究者可嘗試以其他統計方式，如「詞頻－逆向文件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方法分析選擇字彙的合適性；或是以關鍵性（keyness）統計方法，獲得「文本比較關鍵字」，進一步檢視分析字彙的內涵與合適性，惟本研究分析焦點並非語料分析相關技術，在此一部分無法更多著墨，是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

最後，過去臺灣基本上極為缺乏媒體如何再現及建構旱災的相關研究，若未來氣候變遷導致的降雨不均成為常態，那麼建立長期的、時間序列的（diachronic）的旱災再現分析，瞭解旱災論述變化，包括了對氣候變遷及旱災的關係、旱災的風險論述、或旱災的問題解決論述等，都是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深化之處。

參考書目

自由時報（2015 年 5 月 24 日）。〈鋒面很公平　臺南、高雄暫解渴〉，《自由時報》，第 A11 版。

———（2015 年 5 月 21 日）。〈水庫解渴　驟雨路塌積水無人傷〉，《自由時報》，第 A14N 版。

———（2015 年 5 月 3 日）。〈水比尿尿小　臺南減壓供水民怨不知〉，《自由時報》，第 A14D 版。

———（2015 年 4 月 29 日）。〈賣場省水專區！水桶大缺貨〉，《自由時報》，第 A14K 版。

airiti

———（2015 年 4 月 13 日）。〈宣示水權　鄭文燦：石門水桃園專用〉，《自由時報》，第 A07 版。

———（2015 年 3 月 30 日）。〈環保、水資源股　長線強強滾〉，《自由時報》，第 C02 版。

———（2015 年 3 月 25 日）。〈再沒進帳…石門水庫只能撐 39 天〉，《自由時報》，第 A09 版。

———（2015 年 3 月 14 日）。〈下雨水庫小進帳　只夠用幾天〉，《自由時報》，第 A14N 版。

———（2015 年 3 月 12 日）。〈春雨冷煞人　新竹水庫未解渴〉，《自由時報》，第 A14M 版。

———（2015a 年 3 月 11 日）。〈水情吃緊　臺北水車已預訂一空〉，《自由時報》，第 AA1 版。

———（2015b 年 3 月 11 日）。〈南投春茶恐減 3 成〉，《自由時報》，第 A14 版。

———（2015 年 3 月 7 日）。〈雨又下錯地方　桃園水庫集水區僅 2 毫米〉，《自由時報》，第 A09 版。

———（2015 年 2 月 10 日）。〈珍惜水資源　水公司應以身作則〉，《自由時報》，第 A14N 版。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科第一階段限水　廠商未雨綢繆〉，《自由時報》，第 A14J 版。

———（2014 年 12 月 27 日）。〈缺水就休耕、老犧牲農業　環團：把水還給農民〉，《自由時報》，第 A10 版。

———（2014 年 11 月 29 日）。〈這個冬天又暖又渴　偶有寒流〉，《自由時報》，第 AA2 版。

———（2014 年 11 月 19 日）。〈花蓮市獲經費　更新抽水站〉，《自由時報》，第 A14R 版。

經濟部水利署（2015a 年 5 月 25 日）。〈抗旱稍歇，經濟部豪雨應變小組一級開設〉。取自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42373

———（2015b 年 3 月 5 日）。〈104 年 3 月 5 日毛院長視察石門水庫水情及清淤作業〉。取自 http://www.wra.gov.tw/ct.asp?xItem=61866&ctNode=2476

———（2014a 年 12 月 25 日）。〈經濟部抗旱會議決定桃竹及嘉南（嘉義、白水溪）灌區第一期稻作停灌休耕〉。取自 http://vsip.tycg.gov.tw/

airiti

information_90_662.html

———（2014b 年 12 月 1 日）。〈會議記錄：104 年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二次工作會議〉。取自 http://www.ctsp.gov.tw/files/e3a8b797-dc8f-47f9-bb36-95ee56a580a5.pdf

———（2014c 年 11 月 20 日）。〈降雨不樂觀　水情趨緊　水利署提前部署抗旱〉。取自 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2D4A071D21C1A8F8

聯合報（2015 年 4 月 26 日）。〈強旱來襲　鳳梨縮水、春茶減產〉，《聯合報》，第 B2 版。

———（2015 年 4 月 24 日）。〈五月梅可望解旱〉，《聯合報》，第 A16 版。

———（2015 年 4 月 16 日）。〈水資源論壇搶救旱情　成大：水價不能不調　水利署：先徵耗水費〉，《聯合報》，第 A6 版。

———（2015 年 4 月 10 日）。〈抗旱備水　台積電進入最高警戒〉，《聯合報》，第 A1 版。

———（2015 年 4 月 9 日）。〈湖口新豐 17 村限水　記得關馬達、6 臨時站供水〉，《聯合報》，第 B1 版。

———（2015 年 4 月 8 日）。〈庫存飆 10 倍　賣場儲水桶搶破頭〉，《聯合報》，第 C7 版。

———（2015 年 4 月 1 日）。〈缺水衝擊　企業加入 CDP 控管水資源〉，《聯合報》，第 AA2 版。

———（2015 年 3 月 15 日）。〈旱象再繼續…苗栗大閘蟹養殖怎解渴〉，《聯合報》，第 B1 版。

———（2015 年 3 月 8 日）。〈石門蓄水率只剩 25%　節水大計指向民生〉，《聯合報》，第 A2 版。

———（2015 年 3 月 7 日）。〈雨幾時下？臺南 3 水庫蓄水量僅 4 成〉，《聯合報》，第 B2 版。

———（2015 年 2 月 28 日）。〈水情吃緊　或靠天公解決　第 3 階段限水恐提前〉，《聯合報》，第 B2 版。

———（2015 年 2 月 28 日）。〈汙水回收　大旱期活命水〉，《聯合報》，第 A8 版。

———（2015 年 1 月 4 日）。〈休耕抗旱　經典米得主：欲哭無淚田守喜「草地講堂」開講　批休耕補償未考慮佃農「我一毛錢也拿不到」〉，《聯合報》，第 B2 版。

———（2014 年 12 月 27 日）。〈毛閣員換腦袋　新思維解水荒〉，《聯合報》，

airiti

第 A18 版。

———（2014 年 12 月 9 日）。〈節水！曾文、烏山頭可撐到 5 月　春耕用水盡量提供　夜間大量使用先儲水　工業區滯洪池水源可最後應急〉，《聯合報》，第 B2 版。

———（2014 年 11 月 19 日）。〈水情吃緊　南投農民盼人造雨〉，《聯合報》，第 B1 版。

蘋果日報（2015 年 5 月 24 日）。〈危機未解　水庫進帳　曾文　南化多撐 12 天〉，《蘋果日報》，第 A10 版。

———（2015 年 4 月 29 日）。〈下月起　高雄每周二三停水〉，《蘋果日報》，第 A2 版。

———（2015 年 4 月 4 日）。〈全民抗旱　節水衛浴用品超夯〉，《蘋果日報》，第 E2 版。

———（2015 年 3 月 12 日）。〈臺灣遇罕見大旱　恐分區停 2 供 2〉，《蘋果日報》，第 A3 版。

———（2015 年 3 月 11 日）。〈限水破功　用水反增 50 萬噸〉，《蘋果日報》，第 A9 版。

———（2015 年 2 月 26 日）。〈科技廠憂水車　購水再現〉，《蘋果日報》，第 B3 版。

———（2014 年 12 月 30 日）。〈水之爭、河之殤、農之痛〉，《蘋果日報》，第 A15 版。

Adoni, H., & Mane, S.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323-340.

Anderson, D. (2014). *Endurance: Australian stories of drought*. Collingwood, Australia: CSIRO.

Baker, P. (2005). *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 New York, NY: Routledge.

Baker, P., & Ellece, S. (2011). *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U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Baker, P., Gabrielatos, C., Khosravinik, M., Krzyżanowski, M., McEnery, T., & Wodak, R. (2008). A useful methodological synergy? Combin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o examine discourses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 *Discourse & Society*, *19*, 273-306.

Bevitori, C. (2010). *Represen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News and opinion discourse*

airiti

in UK and US quality pres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Bologna, Italy: Bononia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C., Smith, E., & Siesmaa, E. (2011). The educative role of a regional newspaper: Learning to be dri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51*, 269-301.

Coombs, W. T. (2010a). Parameters for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W. T. Coombs & S. J. Holladay (Eds.), *The handbook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pp. 17-53).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 (2010b).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its allied fields. In W. T. Coombs & S. J. Holladay (Eds.), *The handbook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pp. 54-64).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De Gaetano, A. T. (1999). A temporal comparison of drought impacts and responses in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itan area. *Climatic Change*, *42*, 539-560.

Dessai, S., & Sims, C. (2010). Public perception of drought and climate change in southeast Engl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 *9*, 340-357.

Head, B. W. (2010). Water policy -- Evidence, learning and the governance of uncertainty. *Policy and Society*, *29*, 171-180.

Head, L. (2012). Have we changed our cultures of urban water? *Dialogue (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Australia*, *31*, 33-38.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UK: Sage.

Hurlimann, A., & Dolnicar, S. (2012). Newspaper coverage of water issues in Australia. *Water Research*, *46*, 6497-6507.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ffries, L. (2003). Not a drop to drink: Emerging meanings in local newspaper reporting of the 1995 water crisis in Yorkshire. *Text & Talk*, *23*, 513-538.

Lemke, J. L. (1995). *Textual politics: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London, UK: Taylor & Francis.

McEnery, T., & Hardie, A. (2011).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neque Salgado, P., & Vargas Molina, J. (2015). Drought, social ag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in Andalusia. *Environmental Hazards*, *14*, 224-235.

airiti

Risbey, J., Karoly, D., Reynolds, A., & Braganza, K. (2003). Global warming signature in Australia's worst drought. *Bulletin of the Australian Meteorological and Oceanographic Society*, *16*, 6-11.

Ruiz Sinoga, J. D., & León Gross, T. (2013). Droughts and their social perception in the mass media (southern Sp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33*, 709-724.

Russell-Verma, S., Smith, H. M., & Jeffrey, P. (2015). Public views on drought mitig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mments sections of on-line news sources. *Urban Water Journal*, *13*, 454-462.

Scott, M. (2012). WordSmith tools version 6. [Computer software]. Liverpool, UK: Lexical Analysis Software.

-- (2010). What can corpus software do? In A. O'Keeffe & M. McCarthy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rpus linguistics* (pp. 136-151). London, UK: Routledge.

Shove, E. (2003). *Comfort, cleanliness and convenienc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rmality*. Oxford, UK: Berg.

Sinclair, J. (1991).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er, E., & Endreny, P. M. (1993). *Reporting on risk: How the mass media portray accidents, diseases, other hazards*.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Sofoulis, Z. (2011). Skirting complexity: The retarding quest for the average water user.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5*, 795-810.

-- (2005). Big water, everyday water: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9*, 445-463.

Sonnett, J., Morehouse, B. J., Finger, T. D., Garfin, G., & Rattray, N. (2006). Drought and declining reservoirs: Comparing media discourse in Arizona and New Mexico, 2002 ~ 2004.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 95-113.

Tognini-Bonelli, E. (2001). *Corpus linguistics at work*.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 John Benjamins.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660-679.

van Dijk, T. A. (1998).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In A. Bell &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21-63). Oxford, UK: Blackwell.

-- (1996). Discourse, power, and access.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airiti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84-104). London, UK: Routledge.

Wade, S. D., Jones, P. D., & Osborn, T. (2006).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severe droughts:Implications for decision mak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90830/scho1206blso-e-e.pdf

Wahlquist, A. (2003). Media representation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drought. In L. C. Botterill & M. Fisher (Eds.), *Beyond drought: People, policy and perspectives* (pp. 67-86). Collingwood, Australia: CSIRO.

Ward, I. (2005). Drought, news media and policy debate. In L. C. Botterill & D. A. Wilhite (Eds.), *Disaster response to risk management: Australia's national drought policy* (pp. 85-98).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West, B., & Smith, P. (1996). Drought, discourse, and Durkheim: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Sociology*, *32*(1), 93-102.

Williams, D. E., & Olaniran, B. A. (1998). Expanding the crisis planning function: Introducing elements of risk communication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 387-400.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37-70, January 2017

Representing Slow-Onset Hazard: A Corpus Analysis of Discourse on Drought, Risk, and Climate Change in News Media

Kuo, Win-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Drought is seen as a slow-onset or slow-moving hazard. The impacts of drought are obtrusive and link to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rpus method to investigate how three major Taiwanese newspapers represented drought during Taiwan's most serious drought of the past decade, occurring from late 2014 to mid-2015. Nine-hundred and forty-one drought reports are collected to create a small corpus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newspapers tend to focus their drought coverage on the supply side, specifically on short term changes in the water levels of major reservoirs and on rainfall. Metaphors of battle and war are frequently used in drought reports, particularly the term "drought-proofing," which implies that societies must fight drought, instead of presenting drought as a long term risk to which societies should respond by seeking methods of co-existence or adaptation. Ter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perception usually appear only in the background of drought reports, making them nearly invisible. The study suggests Taiwanese media should pay more regular attention to the demand side aspect of water management, including water saving practices. Moreover, media reports should treat drought as a normal climate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n aberration.

Keywords: drought, climate change, media representation, corpus analysis, slow-onset hazard

* Email: kuowinping@gmail.com
Received: 2015.11.1
Accepted: 2016.8.9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71-106．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4

風險溝通、媒體關注與框架分析：以新聞再現企業環境相關議題為例 *

楊意菁 **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分別以縱貫面（1997 年 ~ 2014 年）與橫斷面（2014 年），探討風險溝通與媒體再現企業與環境相關新聞之間的問題。縱貫面的報導量分析（67,098 則新聞）顯示，與企業相關能源議題在 2008 年達到報導量高峰，《經濟日報》為報導數量最多之媒體。橫斷面內容分析總共分析了 279 則百大企業之新聞樣本，企業溝通主題以「生產低碳以及節能產品」為最多，與「氣候變遷」相關新聞最少。新聞報導的能源以「傳統能源」為最多，主要消息來源以「企業人士」為主。整體框架則以描述能源新產品及科技創新的「商業綠色」框架為最多，較少報導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由此可知，企業溝通能源議題，仍以商業利益為主要考量，卻忽略溝通企業對整體環境與能源之責任。

關鍵詞：企業風險溝通、框架分析、媒體關注、新聞再現、環境與能源相關議題

* 本論文係《氣候變遷、節能減碳與企業風險溝通：從議題溝通、議題倡議到公眾認知》科技部研究計畫（計畫編號：103-2511-S-128-004-MY2）之部分研究結果。
** Email: yjyang@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28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7 月 19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氣候變遷為環境風險的重要議題之一，近年來也受到全世界各國的注目，儼然成為全球化之環境風險議題。而其之所以受到嚴重關切，即在於同時影響人類生活與環境存續，不少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IPCC）、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 UNEP）等國際組織設立專責機構，評估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進而致力於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以及調節影響（蔡振興，2012）。從現實觀點來看，唯有透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新科技的發展，才能解決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因此進一步研議氣候變遷的調適及減緩策略也就顯得相對重要（楊純明、張致盛、陳駿季，2011）。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討論，已從議題的實質衝擊（impact）[1]，階段性地過渡到議題的適應（adaptation）與緩解（mitigation）[2]，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能源使用、能源效率、甚至能源科技產生了不可脫勾的關聯性。

越來越多企業領悟到地球氣候變遷，如暴雨、乾旱等風險都會增加企業面臨危機，進而增加成本與聲譽的損害，於是不少企業開始回應於環境改變，如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改善能源運作以及供應鏈之效率 (Smith, 2013)。而世界上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一部分可以歸因於直接或間接的企業活動，越來越多的公司已定下目標，並採取措施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Sullivan & Gouldson, 2013)。特別是國際組織（如 IPCC）與政府壓力，以及大眾媒體的關注提升，皆讓企業瞭解到面對環境風險的所作所為，如何讓社會大眾瞭解，已是當今企業溝通不可忽略的問題。而近年來企業公民以及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興起，也讓企業瞭解到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已不再侷限於商品消費的經濟意涵，更多是企業與環境永續的共生之道。《遠見雜誌》報導推廣節能不遺餘力的工研院服科中心經理王茂榮透露，相較以往，工研院最近接獲的節能技術服務案子倍數成長。各大機構爭相投入，只因全球暖化嚴重，「透過節能減碳不僅善盡企業公民責任，為環保盡一份力，也同時減少能源成本支出，利人又利己」（范榮靖，2008：94）。企業開始自動投入於環境議題以符合社會需求，並強調企業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因

1 實質衝擊意指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包括自然生態的破壞、天氣異常變化、傳染病的增加等。

2 「適應」意指任何調整，在自然或人為系統中，以減緩傷害或尋找有利的機會，因應實際或預期的氣候變化與影響。「緩解」意指人為干預，以減少人為干擾氣候系統（柳中明，2008 年 10 月 22 日）。

airiti

此，在風險社會的環境下，企業回應於氣候變遷以提倡節能減碳，已成為企業溝通的重要內涵。而企業如何經由媒體中介，進而與社會大眾溝通環境風險議題，更是學術研究值得探討的主題 (Hori, Shinozaki, Nogata, & Fujita, 2014)。

新聞報導向來都是公眾接觸企業訊息的主要管道，近期對於企業與媒體之間的研究則多從議題設定的角度，探討企業議題設定與媒體報導之間的關聯（何榮軒，2012；Carroll, 2010; Carroll & McCombs, 2003）。這些論文雖未聚焦媒體對於企業的態度，也未特別指出企業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卻點出了媒體在企業傳遞訊息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再加上公眾對企業的態度、信仰、能力及機會的認知，都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 (Sabeh, Flora, & Khairan, 2000)，因此企業開始瞭解到如何透過新聞媒體與他們相關公眾進行溝通，特別是對外溝通企業對環境的責任。

過去對於媒體如何呈現氣候變遷的相關論文已不勝枚舉，但媒體如何呈現企業環境新聞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見 (Meijer & Kleinnijenhuis, 2006)。換言之，新聞媒體如何報導企業因應氣候變遷或是如何推動節能減碳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見。另外，Smith (2013) 的研究指出，企業的永續努力主要聚焦於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直接衝擊，意指企業如何改善本身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並透過新聞報導其努力改善環境作為（如能源購買、改善建築物與減低交通工具的排放）的好新聞（good news），建立企業良好聲譽，卻不會溝通那些發生於供應鏈造成的間接衝擊之環境風險問題，亦即企業並未向社會溝通如何改善供應鏈所造成的環境風險（如咖啡連鎖大企業即應思考咖啡豆來源以及外帶紙杯供應商與環境風險的問題）。於是，企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進而溝通環境與能源相關議題，以及媒體又是如何框架企業推動節能減碳等相關環境議題，的確值得風險溝通與傳播學術研究進一步探討。

因此，本研究目的即從企業環境風險溝通的角度，剖析報紙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企業與環境及能源相關內容。而現代社會中，冷門的環境議題若能受到媒體關注，自然能影響一般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心。但環境議題長期以來並非經常受到媒體的關注，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從縱貫面與橫斷面探討媒體再現企業溝通環境議題的問題，亦即前者以新聞資料庫搜尋關鍵字的方式，剖析媒體對於企業與環境相關議題報導的數量變化，進而瞭解企業溝通環境議題受到媒體關注的變化；後者則以內容分析方法，並將焦點聚焦於能源等環境相關議題，探討最近一年（2014 年）臺灣的報紙新聞如何再現與百大企業相關之能源等環境議題，藉此釐清企業溝通環境風險的深度意涵。

airiti

貳、文獻探討

一、氣候變遷與企業節能減碳

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簡稱 WMO）與 UNEP 於 1988 年建立了 IPCC，除定期對氣候變化的現狀進行評估，也致力於全球的減排協定，以期減低氣候變遷風險帶來的威脅（吳榮華，2010 年 2 月 3 日；Gore, 2006 ／張瓊懿、欒欣譯，2007）。該組織提供了全方位科學評估結果的因應方案，並針對氣候變遷的潛在影響，制定可行的調適策略或緩解策略。各國或各地區規劃人員可參照 IPCC 的建議方案，再依據全球暖化的可能發展、衝擊大小等，自行研擬合適的調解與緩解策略。故部分已開發國家倡導節能減碳以求緩解氣候變遷的時程，重視食物哩程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更推廣所謂「碳足跡」制度，以控制生產過程中的碳釋出與排放，或是「水足跡」標示，以管制食物哩程中所消耗的水資源（楊純明等，2011）。

身為生態環境下重要角色之企業，開始思考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對策。大型企業每年能源消耗量大，目前已雇用能源管理者來控制他們的能源消耗 (Hilliard & Jamieson, 2011)。英國提出自願性碳標章（carbon labeling）方案，由碳信託以及碳地區（Carbon Trust & Carbon Zone）共同研擬草案標準。連鎖賣場巨頭特易購（Tesco）、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博姿連鎖藥妝（Boots）、和沃克斯洋芋片（Walkers Crisps）率先響應，前述特易購也在 20 項產品貼上碳標籤，表示要讓七萬多項產品貼上標籤。全球零售業巨人沃爾瑪（WalMart）宣示要做到「碳揭露」，戴爾（Dell）電腦則信誓旦旦要在 2008 年年底邁向「碳中和」。IBM 從 1990 年到 2002 年期間減碳措施所改善的商業流程，更為 IBM 省下了超過近八億美金的成本支出。當全球知名企業紛紛揭櫫其節能減碳的措施時，更著眼於其帶來的品牌利益、競爭力與龐大商機，節能減碳不僅可以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更讓企業備具競爭力（呂春慧，2008 年 12 月 8 日）。

Hori et al. (2014) 針對泰國與越南兩個亞洲國家的企業，進行能源節約行動調查，其節能行動指標不外乎包括不用電時關掉電壓器與電器產品、調整與設定空調溫度、控制空氣加熱氣、降低壓縮機溫度與壓力、改變適當的電子稅率（tariff）、設備週期性保養、用燃燒乳化燃料（burning emulsion fuel）取代燃燒石油（burning oil）、改變燈光系統、降低鍋爐容器（boiler vessel）的熱氣消失以及投資鍋爐（boiler）自動化系統、新科技取代舊設備等等。幾位學者的研究

airiti

結果指出，泰國企業因為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較高，高達 70% 的泰國企業進行社會及環境的節能行動，但胡志明市則只有半數公司推動節能行動。

而臺灣本身也因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及全球暖化等議題發酵，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 103 年度提升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能力輔導計畫。其中即有不少成功案例於改善廠內用電與高耗能設備利用離峰時段生產節省成本、產品碳足跡宣告、溫室氣體排放查證、加強蒸氣輸送管線保溫及改善蒸氣乾度、染色機裝設冷凝水回收系統（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2014）。面對氣候變遷議題，連向來是「排碳大戶」的臺灣水泥公司也投資碳補捉技術，利用二氧化碳養藻並從中提煉化妝品原料，不但減碳也打造了新商機（呂國禎、劉光遠，2015 年 12 月 22 日）。同樣，香港商界為了因應氣候變遷風險，投入「商界減碳建未來」計劃，旨在鼓勵和支持企業透過進行碳審計及減少碳排放工作，為香港塑造一個低碳的未來及促進相關環保產業的發展（盈臻環創科技有限公司，2016）。由此可知，企業面對氣候變遷風險，節能減碳與能源使用已成為企業必須積極處理的問題。

二、企業溝通與環境責任

Ihator (2004) 反思 20 世紀企業溝通的變化與問題時提出，企業聲譽溝通已成為組織存在的重要因素。但回推 20 世紀初期，企業並不瞭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有效溝通，因此企業與公眾溝通的概念在早期並不盛行。自從企業受到新聞扒糞者（muckrakers）不斷挑起企業不公平以及不負責任之事蹟，造成企業形象受損。於是二次大戰企業公關盛行後，企業才開始視傳播媒體為公眾溝通的重要工具，只不過經常傳遞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觀點。但近年來教育普及，也出現了第三部門，不同團體展現出各種觀點，當愈來愈多公民開始要求社會改革與正義時，企業正視到對外溝通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Sabeh et al., 2000)。企業因應利益關係人需求，主動展現回應於環境，亦可強化他們的生態效益、利益及聲譽 (Insch, 2008)。企業透過對內／外的溝通，建構符號語藝的社會角色，進而影響社會大眾對組織的認同 (Ashforth & Mael, 1989)。因此，環境風險成為企業對外溝通的重要概念，並透過媒體報導建立社會大眾對企業的形象認知。

由於企業社會責認強調企業積極投入於社會以及環境，Regester & Larkin (2005) 對於尋求企業社會責任轉型的企業提出一些指導原則，譬如尋求新的實踐、產品、服務和技術，在最小的物質和能源的使用上滿足人們的需求，並且提

airiti

高生活品質（牽涉到提高產品的功效和耐用性、循環再用）、把管理、研發的焦點從勞力的節省轉到資源的節省（避免產生廢物、資源回收與再使用）、對所有利益關係人在環境與社會影響上作全面而透明的報告、甚至確保供應商、轉包商採取同樣高水準的環境和社會標準。此概念也回應了企業公民與生態創新，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息息相關，因此企業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其對環境之責任與風險，也就顯得相對重要。

以美國的情況為例，風險溝通始於私部門組織未能適當地表現出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未能針對企業相關活動進行風險控制（如 1984 年在印度發生的化學事故）。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法規，旨在減少災難性化學和其他生產事故的可能性和後果 (Belke, 2000; Palenchar & Heath, 2007)。超級修正案再授權法案（Superfund Amendments and Reauthorization Act，簡稱 SARA, Title III, Section 313）於 1986 年要求企業與公眾共享有關化學物質的排放信息 (Palenchar & Heath, 2007)。臺灣社會也因近年來環境公安以及食安問題頻頻發生，政府部門開始訂定嚴格的法規以防範企業對社會與環境造成風險，例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終於在 2015 年 6 月三讀通過，除明定我國 2050 年總排放量至少比 2005 年總排放量減半的長期減碳目標，並授權環保署參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等相關國際公約，實施總量管制及碳交易制度，而該法案對於企業造成不少壓力，特別是石化業者（蘋果日報，2015 年 6 月 16 日）。換言之，企業在面臨企業社會責任、強大政府法規要求、以及社會公民風險意識興起的壓力下，進行風險溝通已無可避免。而此也道出了面對氣候變遷重大環境議題，企業如何有效傳遞因應環境風險之道，乃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三、環境議題的媒體再現與框架建構

（一）媒體關注與環境議題——媒體報導量理論

最能充分說明新聞媒體對公眾意見產生效果的就是議題設定理論，新聞媒體或許無法成功於告訴人們該怎麼思考，但他們卻成功於告訴人們可以聯想什麼 (McCombs & Shaw, 1972)。因此，任何議題若能受到媒體的關注（media attention）以及透過媒體的大量報導，才能成為人們心目中（包含了政策制定者）最重要議題。報導量理論（quantity of coverage theory）即根基於議題設定理論與媒體關注理論，藉由探究媒體長期報導，進而瞭解議題變化與公眾認知，該理論

airiti

已應驗在不少環境與社會議題研究 (Andrews & Caren, 2010; Brulle, Carmichael, & Jenkins, 2012; Corfee-Morlot, Maslin, & Burgess, 2007; Mazur, 2016)。

媒體報導量多寡及媒體關注會影響議題倡議組織對於策略選擇以及人員的招幕，也會影響政治議題與政策。更重要的是，媒體關注可以影響民意及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問題瞭解的廣泛論述 (Andrews & Caren, 2010)。Mazur (2016: 208) 認為媒體報導量理論適用於探討能源或環境危害之議題，其理論主張為：

1. 人們通常不會注意新聞版面的詳細內容。
2. 相較於細節內容，人們比較會受到版面報導量的影響，特別是重複的單一影像勝過詳細內容。
3. 公眾對風險、對抗性活動以及政府所採取的防範措施之考量，會隨著新聞版面的報導量以及顯著性而有所升降。
4. 新聞報導環境風險議題的版面報導量，是由「外部因素」來決定的，例如新聞議題本身的顯著性及新聞記者與他們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5. 大部分國內或國際領域的環境風險議題主要是藉由較大的新聞組織（像是主要報紙、通訊社以及電視網絡）向外（中小型、地方的新聞組織）延伸，並且藉由政府與環境發言人等重要消息來源，來獲得媒體的廣泛注意。
6. 因此，普遍公眾對議題關心的程度以及政府的動作，皆受到主要媒體版面報導量的起伏影響。
7. 美國主要新聞媒體給予高報導量的風險議題，經常會讓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採用，反之則不然。

雖然媒體報導量理論也受到一些批評，比如 Gutteling (2005) 認為媒體報導量理論隱約具有媒體直接效果的思維，忽略公眾面對爭議性科技議題，也會用多元及平衡的認知來理解事件。但若從媒體關注角度來看該理論，的確可以瞭解到爭議性議題或環境科技與媒體關注之間的關聯。再者，Mazur (1998, 2016) 認為媒體報導環境議題的數量（報導量理論），亦即其報導的顯著性，比內容還要重要，因為大多數的閱聽人比較容易被媒體訊息量影響，而不是被內容所影響。這樣的概念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冷門的環境議題若能受到媒體關注，自然能影響一般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心。此外，媒體報導量的分析，亦即從長期時間的觀點探討媒體報導量的變化，更能有效探究議題的趨勢與變化，對於近年來才稍為受到媒體關注的環境風險議題，則能更有效地瞭解環境風險議題如何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因此仍不失為瞭解環境議題是否受到關注的好方式。

airiti

不少媒體報導量理論常被應用在環境議題上，Andrews & Caren (2010) 的研究發現，比較有資源的環境組織長期受到媒體注意，但對抗性以及倡議新議題的環境組織則較少受到媒體關注。Mazur (2016) 探討水力壓裂法（fracking）爭議在 2010 ~ 2012 年之間報導量的變化，研究發現該議題的報導量在幾個重大事件中，如 2010 年的災難事件，特別是反對水力壓裂法紀錄片在 2011 年獲得奧斯卡提名，推升了該議題在媒體的關注度，獲得了媒體較大量的報導。Brulle et al. (2012) 以 2002 年到 2010 年，從氣候事件、運動倡議以及媒體報導量等角度探討氣候變遷議題的民意變化，其結果發現媒體報導扮演影響民意認知最重要因素。同樣，Corfee-Morlot 等學者（Corfee-Morlot et al., 2007）從報導量理論探討氣候變遷議題在媒體公共領域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氣候變遷的新聞逐年增加，特別是 1997 年《京都議定書》、2001 年美國退出議定書以及 2005 年美國卡翠納颶風，皆讓報導量顯著升高。由此可知，媒體報導量的分析實可用來瞭解媒體再現環境相關議題的長期趨勢與變化。

（二）新聞再現環境與能源相關議題

Teräväinen (2014) 的研究指出，1997 年至 2001 年期間，氣候變遷與科技發展在媒體上是分別處理的問題，但自從 2000 年以後，兩者之間的連結已強化在國家政策上，能源政策更是國家報紙報導的重要焦點。由於碳收集及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 CCS）為氣候變遷緩解策略的重要內涵，亦有一些學者將探討聚焦在媒體報導與 CCS 科技之間的關係，例如 Feldpausch-Parker et al. (2011) 的研究指出，新聞報導 CCS 科技經常與工作機會、政策發展、該科技發展的限制以及新科技測試的爭議有關。因此，科技發展與能源政策成為媒體經常報導的重點。也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探討已從衝擊影響漸漸轉向強調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與減緩，相關傳播研究也將焦點轉向替代能源以及節能減碳方面。於是，企業本身的減碳作為、低碳產品經常也是媒體報導的主題。

Batta, Ashong, & Udousoro (2015) 於文獻中指出，能源可被分類為兩種：一種是從地底下化石燃料與核礦石導出的棕色能源，另一種則是取自於自然環境的綠色能源。三位作者即以乾淨能源／再生能源以及非乾淨能源／非再生能源分析奈及利亞三家報紙，研究結果指出報紙普遍忽略報導再生能源。不過，Haigh (2010) 研究美國九家報紙如何報導替代能源議題指出，2004 年時總共只有 25 則替代能源相關新聞，到了 2008 年增加到 163 則。Haigh 進一步指出，95% 有關替代能源的報導，都出現在新聞的商業版面，替代能源與商業的關係，反而大於

airiti

與環境以及科學的關係。國內學者則從媒體建構的角度探討臺灣替代能源在媒體呈現的樣貌，研究發現媒體報導最多的是核能與太陽能，風能及生質能等再生能源被報導的比例不到一成（徐美苓，2015）。於此，本研究除了將核能、風能獨立出來，亦將能源種類分為傳統能源（非替代能源）以及其他替代能源。

此外，與企業相關的能源議題，除了企業本身減碳作為、低碳產品、能源新科技的發展、以及政策問題外，由於氣候變遷的風險對於企業供應鏈影響層面大，根據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簡稱 CDP）研究指出，30% 的企業表示其供應鏈受到氣候因素影響而遭到破壞，1,864 家的供應鏈也表示未來五年受到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成本提高 (Smith, 2013)，因此企業溝通氣候變遷與能源相關議題，也必須溝通如何改善供應鏈之效率。

至於不同產業在媒體再現其環境議題溝通方面是否有所差異，過去並無相關文獻探討，但過去探討不同產業與企業公民溝通的研究中，卻發現企業屬性的不同，對於媒體再現其企業公民內涵即有所不同。例如最常被商業雜誌報導的產業以電子科技業為最多，比例約三成七，其次被報導的服務業，比例則下降至約一成六（楊意菁，2015）。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不同產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是否在媒體報導上有所差異。

（三）企業溝通能源與環境議題的消息來源與框架建構

新聞媒體是組織最重要的溝通對象，其重要性遠超過其他的利益關係人，亦即組織是否能夠成為新聞消息來源，也影響著新聞框架的走向，因此媒體與消息來源之間的互動更是許多學者研究探討新聞報導的重要範疇。一般來說，廣義的環境新聞研究，經常指出新聞報導環境風險時，較常依賴政府官員、業界發言人、或環保團體代表為主要消息來源（Trumbo, 1996，轉引自徐美苓，2015：26）。Culley, Ogley-Oliver, Carton, & Street (2010) 分析媒體報導核能議題，研究發現新聞報導透過消息來源的選擇，傾向支持核能利益，並強調核能發展有益於經濟利益。臺灣學者研究傳統媒體與另類媒體對於替代能源的媒體建構，研究指出，新聞報導傾向採用中央政府單位、學術研究或專業代表及民間利害代表的發言（徐美苓，2015）。而 Curtin & Rhodenbaugh (2001) 從公共關係與新聞來源的角度探討媒體如何設定環境議題，結果指出，政府依然是主要消息來源，其次是貿易代表成員，第三則是環境組織團體，教育組織以及企業本身的比例並不高。雖然企業消息來源比例不高，但作者進一步說明，貿易組織成員作為主要消息來源，也點出了商業集結勢力在環境議題設定所展現的力量。

airiti

企業從什麼角度與社會大眾溝通環境風險，或是社會大眾從什麼角度瞭解企業如何因應環境議題，媒體框架扮演著重要角色。框架的功能在於提供對於某項問題、事件角色的詮釋，而其經常伴隨著道德判斷，甚至提供情緒效果 (Entman, Matthes, & Pellicano, 2009)。因此框架意味著事件、議題的真實選擇與強化，並且提供詮釋、評估以及解決的觀點，更具有新聞敘事的意味 (Entman, 1991, 2003)。但 Entman (2003) 表示，框架也有著其文化與社會意涵，越具備文化迴響（resonance）以及強度（magnitude），其框架越能觸動廣大閱聽眾的想法與情感，因此，框架一直都是傳播研究關心的課題。回顧過去相關環境與能源議題框架的研究，Haigh (2010) 研究指出，報紙喜歡強調與汽車產業相關的替代能源解決方案，並傾向以「國際貿易」、「美國經濟」以及「政治策略」的角度來說明替代能源，卻較少從「倫理」、「科學的不確定性」以及「公眾參與」的角度來框架替代能源。Wright & Reid (2011) 探討媒體再現生化燃料能源（biofuels）的問題，報導內容反映了經濟發展（生化能源是有利潤的）、環保（可以降低溫室企體排放）以及國家安全（降低美國對外國能源的依賴）三個主題。

Boyd & Paveglio (2014) 分析了加拿大四家主流與地方媒體報導碳封存議題，報導量很明顯地在 2009 年以後增多，整體的新聞以正面新聞居多，較常出現的正面新聞框架包括「CCS 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CCS 可以降低環境破壞」、「CCS 可以降低氣候變遷的破害」等等，較常出現的負面框架則是「CCS 花費太高」等。而 Hart & Feldman (2014) 探討美國電視新聞對氣候變遷報導的研究則指出，能源有效性的報導，正反面意見呈現相當，而新聞報導傾向傳遞氣候變遷的威脅，且主要被框架為環境結果。但其中針對能源有效性（efficiency）的報導，則大多強調政府對於能源因應的有效性行動，如政策制定等，卻較少報導有關個人能源有效性（個人行為改變）或是商業以及科技能源有效性。

Nijkrake, Gosselt, & Gutteling (2015) 探討企業溝通與媒體報導框架時，分別從「人情趣味框架」（該框架從情感、個人的角度對事件陳述）、「責任框架」（強調事件的責任）、「衝突框架」（該框架強調個人，團體或組織之間的衝突）、「經濟後果框架」（強調對個人，團體，組織或地區的經濟後果與問題）、以及「道德框架」（將新聞故事置於道德規範的脈絡下）來探討媒體對於企業危機的框架報導。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報導比起企業本身的訊息溝通，採用較多元的框架來報導企業新聞，而不論是媒體或是企業溝通皆喜歡採用「人情趣味框架」，但是媒體報導比起企業溝通本身，更喜歡採用「衝突框架」來報導新聞事件，但媒體卻很少從「道德框架」報導企業事件。

airiti

徐美苓（2015）探討替代能源的媒體框架指出，報導批評政府作為或不作為的「政府作為」框架比例最高，「經濟發展」框架其次，最少從「減碳」以及「環保生態」框架報導替代能源議題。Batta et al. (2015) 從科技科學、商業經濟、政治、健康安全、環境、以及法律犯罪框架探討能源議題，高達 64.08% 的新聞從商業角度報導能源議題。謝君蔚、徐美苓（2011）的文章探討基因食品的新聞框架，研究指出，基因食品報導框架經常強調「經濟掛帥」與「天然最好」框架的新聞論述，其實是透過經濟數字、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包裹著明顯的商業利益，因此經濟利益框架在探討企業商業新聞當中，實為不可或缺之重要框架。另外，Foerstner, Humphreys, & Shearer（2013，轉引自 Batta et al., 2015: 46）也從科技的科學框架、強調對人類影響的人類利益框架、以及強調衝突的政治框架，探討媒體報導能源議題的框架主軸。由此可知，科技框架為能源報導不可或缺之主題，不過本文考量科技／科學包含科學創新以及科技風險兩個層次問題，能源風險大多因科技所引發，因此，另外將「科技創新」訂定為能源風險框架之一。

有關媒體報導企業能源框架的論述相當缺乏，經由上述企業溝通框架、企業環境溝通訊息、商業訊息、以及環境與能源框架的文獻探討，訂定本文的框架分析角度，包括「企業經濟利益」、「科技創新」、「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利益衝突」、以及「能源風險」，再加上近年來風險溝通強調公眾參與的重要，因此本文另加入「公眾參與」框架。Feller (2004) 強調，1980 年代以來，綠色消費成為一些企業走向綠色經濟的驅動力，這種趨勢導致了兩種新的敘事。第一種敘事是政治綠色敘事（political green discourse），包含「生態敘事」（ecospeak）或「綠色敘事」（greenspeak）的意涵，著重於對各類議題的討論，並持續針對環境和污染辯論。第二種敘事是商業綠色敘事（commercial green discourse），包括各企業所產生推銷其新的綠色產品的文本，以創造環境保護的企業形象。而 Frandsen & Jonansen (2011) 剖析氣候變遷論述與企業認同管理時指出，企業建立了兩種氣候變遷論述，一是政治的綠色論述，包含所有對於生態、環境以及污染爭辯的論述；二是商業綠色論述，企業透過行銷綠色產品以便建立環境友善之企業形象。由此可知，「政治綠色」與「商業綠色」的敘事已成為近來企業經常採用的溝通框架。另因能源相關議題原本即與環境保護有關，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將各細項框架歸納為「政治綠色」、「商業綠色」以及「環境綠色」三大框架。

airiti

參、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可彙整如下：

一、媒體再現與企業相關之環境議題在數量上的趨勢變化為何？

（一）企業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在不同時間下所呈現的報導數量變化為何？

（二）企業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在不同報紙下所呈現的報導數量變化為何？

二、新聞媒體再現百大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涵為何？

（一）新聞報導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為何？

（二）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的新聞再現是否有所不同？

（三）不同產業情況下，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等內容是否有所不同？

（四）新聞報導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為何？

（五）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的新聞再現是否有所不同？

（六）不同產業情況下，新聞媒體對於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等內容是否有所不同？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重點主要是從縱貫面以及橫斷面角度，剖析媒體報導與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關係，因此縱貫面部分根據媒體報導量理論，本文從資料庫搜尋長期數量資料，進行新聞報導量的趨勢分析；橫斷面的分析，則採量化內容分析方法，藉此瞭解媒體再現的相關問題。而兩者都以平面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報導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研究對象與樣本

本研究採用媒體報導量分析以及內容分析方法剖析報紙新聞，平面媒體將以閱報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由於本研究焦點在於企業溝通環境風險，而企業新聞與經濟屬性較有關聯，因此除了選定四家一般報紙外，另增加選擇一家財經報紙。根據世新大學 2013 年臺灣民眾媒體大調查，《經濟日報》為全臺灣民眾最常閱讀之第 6 名報紙，也是唯一一份進入前 6 名之財經報紙（世新大學，2013），因此本研究立意選取《經濟日報》為研究對象。五家報紙媒體分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新聞樣本的搜尋方式，依據研究目的分為縱貫面與橫斷面兩方面。

airiti

縱貫性的資料搜尋，由於 1997 年《京都議定書》奠定了限制排碳減緩全球暖化的論述基礎，以及氣候變遷議題在經歷卡翠納颶風、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的發行、國際氣候會議的宣示之下，氣候變遷議題開始受到媒體以及社會的關注 (Boykoff, 2007)。因此本文以 1997 至 2014 年 18 年的時間，從報紙資料庫輸入關鍵字，如「企業」與「氣候變遷」、「企業」與「能源」、「企業」與「節能減碳」或是「企業」與「環保」等幾個與環境相關的關鍵字，尋找這些關鍵字每年新聞報導的數量，新聞總數量為 67,098 則新聞。此部分將單純進行報導量分析，不進行深度的內容分析，其目的是為了系統性地瞭解與企業有關的環境相關議題，在媒體報導的長期趨勢與數量變化。

橫斷面的新聞搜尋，為了進行深度的內容分析，本文以研究進行前的最近一年（2014 年）[3] 時間為主，進行樣本搜尋。由於大企業經常是媒體喜歡報導的對象，再加上百大企業對於環境責任更是責無旁貸，因此本研究將以百大企業名單做為依據。本研究以《天下雜誌》2014 年大調查臺灣百大企業為對象，並以其「服務業」、「金融業」以及「製造業」三大產業各取前 50 大企業（共 150 家企業）做為關鍵字取樣對象，分別輸入「XX 企業」與「氣候變遷」、「XX 企業」與「能源」、「XX 企業」與「節能減碳」或是「XX 企業」與「環保」，搜尋後，有的企業可能一則新聞皆無，但有的企業則可能一年出現數個樣本。如此搜尋方式，可以避免單純輸入「企業」與「能源」等關鍵字，卻搜尋到大量不相關之新聞，例如政府表示企業應該重視能源議題，這類的新聞同時提到了企業與能源，但實際上卻只是政府的政策或呼籲，並非是企業本身作為及溝通。最後，搜尋出來的新聞再經人工比對是否與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有關，進一步排除不適用之新聞，最後樣本數為 279 則新聞。

三、分析單位與類目建構

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每「則」新聞，主要分析新聞的文字部分，圖片則不納入分析類別。本研究亦根據前測結果，作為類目建構與修訂之參考依據。此部分內容分析只分析以橫斷面（2014 年）搜尋到 279 則新聞樣本，內容分析之類目包括以下：

3 橫斷面的時間選擇，本文考量以最近期的時間點為主，而非以重大事件發生為考量，一方面可呈現較新的媒體再現資料，二方面也避免因重大事件而誤現了一般時期媒體再現企業風險溝通的內容。

airiti

（一）基本資料與報導方式：包括媒體別、企業產業別（製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等。

（二）新聞報導的內容主題：提及企業氣候變遷能源議題的面向，包括節能減碳作為（企業本身作為，如溫室氣體排放／能源使用與效率）、能源新研究與新科技（非企業相關產品的科技發明，如智慧電網或碳封存技術等）、低碳產品／環保產品（與企業相關產品，推出節能汽車／智慧電網／投資太陽能廠，或是相關活動有利於企業本身）、能源政策（能源政策討論與配合政府能源政策／核能政策討論／核能爭議）、舉辦能源減碳活動、改善供應鏈之效率（提及上下游廠商運輸過程減碳或相關問題）、未明確說明與減碳、節能或能源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

（三）能源類別：新聞報導何種能源問題。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其他替代能源（生質能／潮夕發電／廢材發電）、傳統能源（石油／火力發電）、其他、未談到能源問題。

（四）消息來源：新聞引用的來源。引述消息來源則包含企業人士（CEO、企業主管、員工）、政府機構人士（經濟部／環保局／能源局等）、能源專家（其專長為能源、氣候變遷）、非能源專家（一般專家及名人）、環保團體與非營利組織、其他企業人士、一般民眾、其他（或無消息來源）。

（五）新聞報導的內容框架：參考 Haigh (2010)、Feller (2004)、Wright & Reid (2011)、Frandsen & Jonansen (2011)、Nijkrake et al. (2015) 以及徐美苓（2015）的研究內容，本研究將新聞提及企業溝通相關能源議題的框架角度為：1. 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新節能產品）、2. 科技創新與進步（碳封存／減碳技術）、3. 企業社會責任（道德倫理、企業對環境的責任、社會教育環保活動）、4. 環境保護（對環境有利，此一做法真的對環境有利，企業作為直接回饋到環境）、5. 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能源本身的爭議）、6. 政治爭議與衝突（政策面的爭議）、7. 公眾參與、8. 其他。以上 1.、2. 牽涉到商業利益，即便是科技創新亦包含了可能的商業利益，合併為商業綠色框架、3.、4. 屬於企業整體對環境應有的道德與責任層次問題，合併為環境綠色框架、5.、6.、7. 屬爭議、衝突與公眾參與層面，由於能源本身的風險爭議經常是政治爭議與衝突的源頭，故合併為政治綠色框架。

（六）報導立場：針對氣候變遷能源議題之報導立場，包括鼓吹（認同企業溝通的能源問題，並以正面角度報導）、質疑（批評企業溝通的能源問題，並以負面角度報導）、中立（或無立場）等。

airiti

上述所有內容分析編碼的資料，將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 進行頻率百分比與卡方檢定。

四、前測信度分析

建構完內容分析編碼表後，本研究先進行前測，二位編碼員[4]的相互同意度達到標準後再進行正式內容分析。本研究從分析樣本中抽樣檢驗類目建構的信度，依照 Wimmer & Dominick (2006) 所說，信度檢驗必須抽取總樣本的 10.0% 至 25.0% 之間來進行抽樣分析。由於本研究以 279 個樣本中隨機抽樣選取 40 則，符合信度抽樣比例原則。依據 Holsti (1969) 的信度公式計算，本研究的總相互同意度為 84.51%，信度為 91%（0.91），以 Wimmer & Dominick (2006) 所建議的 .9 才合乎標準。本研究信度 91%，符合一般信度認定標準。

伍、研究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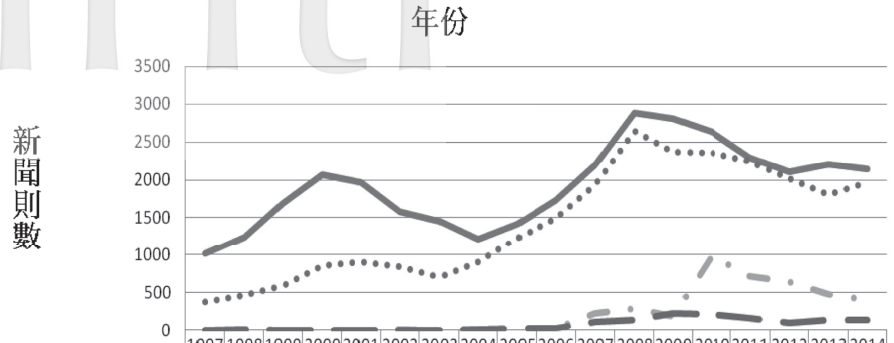
一、媒體再現與企業有關環境議題的長期性分析

長時間的樣本選取，除了較能系統性地描繪企業環境議題與風險溝通的內容，更能釐清社會（甚至是國際）重大環境議題對媒體報導的影響，進而影響公眾對議題的關注。本研究問題一從媒體報導量以及媒體關注的角度，探討 1997 年至 2014 年，媒體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報導量變化。從圖 1 顯示，在這 18 年當中，「企業」與「環保」是媒體報導最多的新聞，其次則是「企業」與「能源」，這兩條線所呈現的趨勢變化差不多。「企業」與「環保」以及「能源」之間的新聞報導，從 1998 年開始的反核運動，以及全國能源會議的召開等事件（同上引），皆讓新聞在 2000 年與 2001 年出現了第一次的小高峰。其後報導量下降，直到 2005 年（「企業」與「能源」新聞則在 2004 年）後又開始往上爬升，同時在 2008 年達到了高點，其後再緩慢下降。而 2008 年國光石化爭議、1206 抗暖化遊行、總統大選與環境政策、全國 NGOs 環境會議以及蘇花高等環境議題（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網站，2015），皆讓「企業」與「環保」以及「企業」與「能源」，同樣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企業」與「氣候變遷」則出現最少的新聞量，只有在 2006 年開始到 2010 年期間稍為增多，但在 2010 年後，整個媒體報導量並未明顯增加或減少。

4 二位編碼員為傳播科系碩士班學生，並修習過研究方法等相關課程。

airiti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企業＋環保	1017	1243	1693	2064	1965	1582	1450	1217	1416	1731	2192	2885	2808	2636	2289	2104	2202	2145
企業＋能源	381	469	595	859	905	845	703	899	1233	1495	1935	2642	2368	2363	2243	2024	1809	1973
企業＋減碳	5	7	2	8	5	11	6	12	21	23	223	289	188	994	714	644	479	399
企業＋氣候變遷	1	13	4	4	5	6	0	21	29	32	116	138	232	222	165	109	139	138

圖 1：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的媒體報導量分析（1997 ~ 201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這期間包括 2005 年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紀錄片的推出、2007 年英國第四頻道推出的《全球暖化大騙局》紀錄片、2009 年的哥本哈根會議以及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都讓氣候變遷受到媒體較多的關注。Mazur (2016) 研究指出，水力壓裂法在紀錄片《天然氣之國》（*Gasland*）推出後，加上這部影片受到名人的支持，也讓媒體報導聲量增加。因此，環境議題若要受到媒體關注，除了重大會議外，紀錄片的出現也成為重要推手。

「企業」與「減碳」在這幾年當中的新聞量也不多，但很明顯的，自從 2006 年開始緩步上升，到了 2010 年到達了高峰，整體報導量明顯多於氣候變遷。換言之，企業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討論，也從議題的實質衝擊，階段性地過渡到議題的適應與緩解，企業與「節能減碳」相關的新聞反而多於企業與「氣候變遷」。

至於不同媒體報導量方面，由於《經濟日報》屬財經媒體，故不論是哪一組關鍵字，整體新聞量都是明顯多於其他四家。反之，《蘋果日報》則是明顯報導量最少，但是《自由時報》的新聞報導量也不多。非財經報紙方面，以《聯合報》報導的新聞數量最多，《中國時報》其次。幾組關鍵字來看，五家報紙中，除了《蘋果日報》，都是以「企業」加「環保」此一組關鍵字獲得最多的報導量，其次則是「企業」與「能源」（只有《蘋果日報》最多的是「企業」與「能源」，第二高的是「企業」與「環保」），再其次則為「企業」與「減碳」，最後才是

airiti

「企業」與「氣候變遷」。由此可知，不同報紙媒體長期以來對於企業與能源相關議題的報導關注的確有所不同，《經濟日報》在報導環境與能源方面議題，的確比較會從企業的角度加以報導，因此報導量最多。而向來對於環保議題較為關注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於企業環境溝通方面的新聞報導量，明顯也多於《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如圖 2）。

二、媒體再現百大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容分析

橫斷面的內容分析方面，本研究分析了五家報紙共 279 則新聞。由於《經濟日報》的財經屬性，故其報導企業與能源溝通相關新聞顯得較多（占 34.8%），其次則是《聯合報》（26.2%），第三名的《中國時報》報導比例降至 16.1%，而《蘋果日報》則報導最少（10.0%），《自由時報》報導也不多（12.9%）。

新聞報導企業的產業別方面，雖然當初抽樣是根據三大產業各取前 50 大做為抽樣來源字，但抽樣結果，以服務業最常在新聞報導上呈現與能源相關的議題報導（51.3%），其次則為製造產業（45.5%），財務金融業相對較少（3.2%）。

（一）新聞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

新聞報導如何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主題與能源類別，以及不同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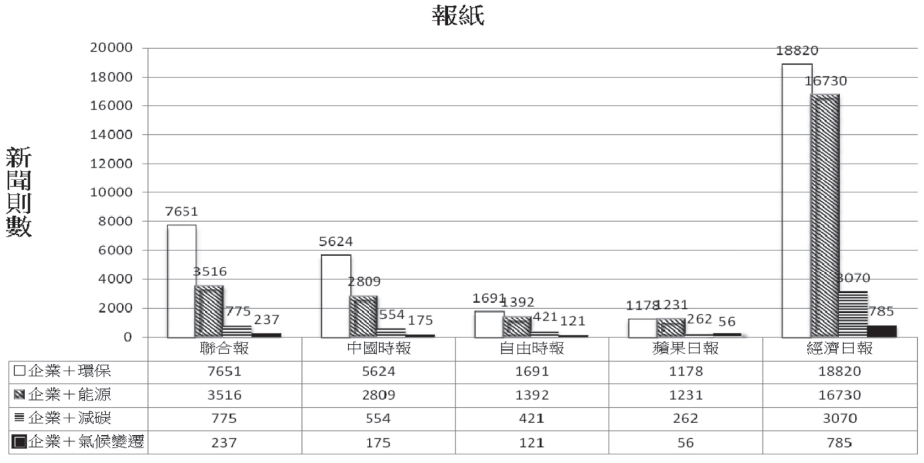


圖 2：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在不同媒體的報導量分析（1997 ~ 2014, N = 67,09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iriti

體與不同時間下，新聞再現是否有所差異，為本研究問題二之（一）探討的重點。一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發現報紙新聞最常以「低碳產品／環保產品」（占 25.4%）做為新聞報導的主題，其次也有不少新聞與能源或節能減碳無直接關係，這類新聞並未進一步說明企業在能源或減碳方面的問題，占比 19.7%[5]。接下來企業溝通能源相關主題，也會觸及到能源政策（19.4%）以及企業本身節能減碳作為（17.2%），較少新聞說明企業舉辦的能源或減碳相關活動（3.9%），以及說明企業如何改善供應鏈效率的問題（4.7%）。

至於新聞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能源種類，主要仍以火力、石油等傳統能源居多（48%），太陽能源占比降至 14.3%，核能以及其他他替代能源則分別占比 11.5% 與 11.1%，未明確談到哪一種能源種類的新聞，則有 34 則（12.2%）。

研究問題二之（二）另外探討不同新聞媒體對於報導主題與能源類別的新聞再現是否有所不同。為避免卡方分析細格樣本數少於 5 比例過高，本研究合併相關主題，新的主題內容參見表 2。本研究發現，不同報紙強調的新聞主題不盡相同，卡方分析達顯著差異（$\chi^2(12, 279) = 34.282, p < .01$）。《聯合報》較常報導與企業相關之「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新聞；《中國時報》經常強調與企業相關的「能源政策」以及「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新聞主題；《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則喜歡報導企業與「新科技與低碳

報導主題	次數	百分比	能源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節能減碳作為	48	17.2	核能	32	11.5
能源新研究與新科技	25	9.0	太陽能	40	14.3
低碳產品／環保產品	71	25.4	風能	1	0.4
能源政策	54	19.4	其他替代能源	31	11.1
舉辦能源減碳活動等	11	3.9	傳統能源	134	48.0
改善供應鏈之效率	13	4.7	其他	7	2.5
與能源／節能減碳無關	55	19.7	未談到能源問題	34	12.2
其他	2	0.7			
總和	279	100.0	總和	279	100.0

表 1：報導的主題內容與能源類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 例如新聞報導交通部特別選定世界讀書日為「交通部漂書日」，交通部長葉匡時有感於爭議不斷的核四議題，特別捐出《大災變》與《臺灣軟實力》，盼大家透過科學知識，理性看待能源與環境變遷。而此新聞當中，該活動並非中華電信所舉辦，中華電信為活動配合單位，且文中未提及任何有關能源或減碳的作法（中國時報，2014 年 8 月 22 日，第 AA1 版）。

airiti

主題內容＼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	38.4	31.1	22.2	16.5	25.8	25.8
新科技與低碳商品	21.9	27.7	38.9	40.2	34.4	34.4
與能源／節能減碳無關或其他主題	13.7	11.1	30.6	27.8	20.4	20.4
能源政策	26.0	31.1	8.3	15.5	19.4	19.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12, 279) = 34.282, $p < .01$

能源類別＼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核能	21.9	15.6	8.3	7.1	4.1	11.5
新興與替代能源	26.0	20.0	22.2	28.6	28.9	25.8
傳統能源	46.6	55.6	61.1	35.7	44.3	48.0
未談到能源及其他	5.5	8.9	8.3	28.6	22.7	14.7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χ^2 (12,279) = 31.262, $p < .01$

表 2：不同報紙與主題內容及能源類別之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商品」的主題新聞。《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於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報導較為聚焦，最少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而《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以及《經濟日報》三家報紙，相對較少討論「能源政策」主題，特別是《自由時報》的比例最少（8.3%），而其探討與能源無關新聞主題也不少，比例高達 30.6%。

不同報紙報導企業溝通的能源類別，一如表 2 所示，經卡方分析也達到了顯著差異（χ^2(12, 279) = 31.262, $p < .01$），幾家報紙最常強調的能源種類雖然都是傳統能源，但在比例上仍有差異，《自由時報》的比例最高（61.1%）、《蘋果日報》比例最低（35.7%）。而《聯合報》相對於其他報紙，比較喜歡報導與企業有關的「核能」議題。另外《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在新聞中未明確指出為何種能源類型的新聞也較多（28.6% 以及 22.7%）。

此外，不同的企業屬性，對於溝通能源相關議題也有不同的溝通重點，因此研究問題二（三）進一步探討不同產業情況下，報紙新聞與報導主題以及能源類別之間的異同。根據表 3，此部分的卡方檢定皆達到顯著差異（χ^2(6,279) = 12.668, $p < .05$; χ^2(6,279) = 34.589, $p < .001$）。研究結果指出，新聞報導較常呈現製造產業以及服務業在「新科技與低碳商品」（分別占 34.6%，35.0%）的主題

airiti

新聞，財務金融業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則經常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而報導的能源類別，製造業最常溝通「傳統能源」（48.0%），「新興與替代能源」的比例也不少（35.4%）。服務業明顯溝通「傳統能源」（49.7%），其他能源種類的新聞比例則差不多。而新聞報導財務金融產業方面的新聞，出現了較多「未談到特定的能源」（55.6%）的新聞，且沒有任何新聞論及「核能」問題（詳見表 3）。

（二）新聞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

媒體再現新聞的內容與消息來源有著密切關係，也影響媒體報導的立場與框架角度，因此本研究問題二之（四）探討新聞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框架、消息來源與立場結果。由於本文探討以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為主，因此研究結果指出，新聞報導最常引用「企業人士」作為主要消息來源，比例高達 55.9%，其次依序為政府人士（20.1%）、非能源專家（10.0%），環保團體等組織（5.4%）、能源專家（3.6%）、其他企業人士（1.8%）、一般民眾（1.8%）以及其他（1.4%）。新聞立場以中立居多（77.4%），鼓吹立場則為 15.1%，較少是批評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或以負面角度報導質疑立場（7.5%）。

主題內容 ＼ 企業業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節能減碳作為、活動及改善方法	29.9	22.4	22.2	25.8
新科技與低碳商品	34.6	35.0	22.2	34.4
與節能減碳無關或其他主題	20.5	18.2	55.6	20.4
能源政策	15.0	24.5	0.0	19.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6,279) = 12.668, p < .05$				
能源類別 ＼ 企業業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核能	3.9	18.9	0.0	11.5
新興與替代能源	35.4	17.5	22.2	25.8
傳統能源	48.0	49.7	22.2	48.0
未談到能源及其他	12.6	14.0	55.6	14.7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12,279) = 31.262, p < .01$				

表 3：不同企業別與主題內容及能源類別之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iriti

整體框架方面，報紙最常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新聞，亦即新聞較常呈現與企業商業利益有關的產品開發與科學創新，這類新聞框架的比例超過了一半（50.9%），至於報導能源風險不確定性、政治衝突以及公眾參與的「政治綠色」框架，以及強調企業責任與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比例上分別為 25.5% 及 23.6%。另從細項框架來看，強調「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框架角度的新聞報導最多（41.6%），其次依續為「政治爭議與衝突」（14.3%）、「企業社會責任」（12.5%）、「環境保護」（11.1%）等，但比例都不高，報紙新聞最少從「公眾參與」（6.5%）、「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4.7%）的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詳見表 4）。

接下來本文繼續回答研究問題二（五）：不同報紙媒體對於新聞消息來源、框架以及立場呈現的異同。卡方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報紙對於消息來源的引用並無明顯差異（$\chi^2(8,279) = 23.686$, $p = .097$），換言之，「企業相關人士」都是這幾家報紙主要的引用來源，其中以《蘋果日報》比例最高，《中國時報》最低。「政府人士」與「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都是第二與第三引用來源，但《中國時報》引用的比例稍高。新聞框架角度經由統計檢定則顯現差異（$\chi^2(8,279) = 21.082$, $p < .01$），雖然不同報紙都以呈現「商業框架」為最多，但《蘋果日報》比例最高。除了《聯合報》與《經濟日報》，其他幾份報紙其次皆以「政治綠色」框架為報導角度，唯獨《聯合報》傾向從「環境綠色」，也就是強調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立場方面，不同報紙的立場也不盡相同（$\chi^2(8,279) = 16.272$, $p < .05$），《經濟日報》完全沒有質疑的立場，《聯合報》從質疑立場報導的比例最多（15.1%），《蘋果日報》次之（10.7%）（詳見表 5）。

研究問題二之（六）探討報紙報導不同企業別對於企業溝通框架、消息來

整體框架	細項框架	次數	細項百分比	整體框架百分比
商業綠色	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	116	41.6	
	科學創新與進步	26	9.3	50.9
環境綠色	企業社會責任	35	12.5	
	環境保護	31	11.1	23.6
政治綠色	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	13	4.7	
	政治爭議與衝突	40	14.3	
	公眾參與	18	6.5	25.5
總和		279	100.0	100.0

表 4：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框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iriti

立場＼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鼓吹	16.4	11.1	19.4	10.7	15.5	15.1
質疑	15.1	8.9	8.3	10.7	0.0	7.5
中立	68.5	80.0	72.2	78.6	84.5	77.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8,279) = 16.272, p < .05$						

消息來源＼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企業相關人士	56.2	40.0	58.3	71.4	62.9	57.7
政府機構人士	17.8	31.1	16.7	21.4	17.5	20.1
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	12.3	20.0	11.1	3.6	15.5	13.6
環保與非營利組織	6.8	2.2	11.1	3.6	4.1	5.4
一般民眾與其他	6.8	6.7	2.8	0.0	0.0	3.2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16,279) = 23.686, p = .097$						

新框架＼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經濟日報	總和
商業綠色	37.0%	40.0%	55.6%	71.4%	58.8%	50.9%
環境綠色	34.2%	20.0%	16.7%	10.7%	23.7%	23.7%
政治綠色	28.8%	40.0%	27.8%	17.9%	17.5%	25.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8,279) = 21.082, p < .01$						

表 5：不同報紙與媒體報導立場、消息來源以及框架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源以及立場是否有所不同？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再現不同企業別的立場有所不同（$\chi^2(4,279) = 22.264, p < .001$），三種企業別當中，雖然皆以中立角度呈現的新聞最多，但媒體對於「服務業」比較常從質疑的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製造業」則獲得較多的鼓吹正面肯定的新聞，「財務金融業」則只有呈現中立的新聞。消息來源方面，報紙報導不同企業別也有不同的溝通樣貌（$\chi^2(4,279) = 19.317, p < .05$），「企業相關人士」雖然是所有企業溝通最常出現的消息來源，但服務業的比例較低，其次引用的消息來源則較為不同。製造業其次喜歡引用「政府機構人士」，服務業則喜歡引用「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政府人士」以及「一般民眾」同為財務金融業其次引用的消息來源，但完全未引用「專家名人」以及「環保組織」的觀點。而不同產業別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其框架角度則沒有顯著差別（$\chi^2(4,279) = 7.949, p = .093$），若以百分比差異來看，媒體傾

airiti

向從「環境綠色」框架報導製造業，從「政治綠色」框架報導服務業，只是以上的說明並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詳見表 6）。

陸、討論與結論

一、重要發現與討論

（一）企業溝通環境相關議題之媒體報導量整體趨勢增加

對於以碳為基礎材料、能源來源之依賴性、以及對溫室的氣體排放，已經被認為是 21 世紀企業面對的主要問題 (Hoffmann & Busch, 2008)。Kolk, Levy, & Pinkse (2008) 探討 FT500 大企業與碳揭露計畫之間的關係，從 2003 年開始，企業回應於 CDP 的比例增加了很多。從 2003 年 227 家企業（46%），到 2007 年

立場＼企業業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鼓吹	20.5	11.2	0.0	15.1
質疑	0.8	14.0	0.0	7.5
中立	78.7	74.8	100.0	77.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4,279) = 22.264, p < .001$				
消息來源＼企業業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企業相關人士	63.8	51.0	77.8	57.7
政府機構人士	23.6	17.5	11.1	20.1
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	7.9	19.6	0.0	13.6
環保與非營利組織	2.4	8.4	0.0	5.4
一般民眾與其他	2.4	3.5	11.1	3.2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8,279) = 19.317, p < .05$				
框架＼企業業別	**製造產業**	**服務業**	**財務金融業**	**總和**
商業綠色	52.8	47.6	77.8	50.9
環境綠色	27.6	21.0	11.1	23.7
政治綠色	19.7	31.5	11.1	25.4
總和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4,279) = 7.949, p = .093$				

表 6：不同企業別與媒體報導立場、消息來源以及框架交叉分析（%，$N = 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iriti

已達 383 家公司（77%）回應於 CDP。換句話說，越來越多企業努力回應於溝通氣候變遷的相關問題。也因如此，媒體報導呈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新聞量也日益增多。

從媒體長期報導量的變化可以得知，社會環境事件以及氣候變遷重要會議，都會影響新聞報導量的消減或增長，如同 Mazur (2016) 的研究指出，美國主要的新聞組織早期對於水力壓裂法議題只付諸少量的關心，但發生在 2010 年 4 月的離岸深水地平線災難，促使《紐約時報》大量報導，並指出用來提取頁岩層天然氣的水力壓裂法所存在之潛在風險。而隨著反水力壓裂法的紀錄片《天然氣之國》宣傳成功，伴隨名人效應，使其在 2010 上半年的日舞（Sundance）電影節贏得了影展獎項，接著於 2011 年獲得奧斯卡提名。這些事件成功建構了水力壓裂法危害環境的有效形象，也讓該爭議在 2012 年獲得了所有美國新聞組織之廣泛注意，更激起公眾高度關注水力壓裂法的潛在風險與利益。同樣的，國外學者探討瑞士地熱能源與媒體長期報導量分析指出，該風險議題受到地震事件以及政治選舉投票而提升了報導量，反對地熱能源的聲量也因此提高，因此媒體對於地熱能源議題報導量的多寡以及正反意見的消長，影響了民眾對於議題重要性以及贊成與否的認知 (Stauffacher, Muggli, Scolobig, & Moser, 2015)。換言之，媒體關注以及報導量分析並非是要探討競爭論述的有效性，而是藉由聚焦於不同面向的議題，如何在主要新聞媒體獲得大量報導，進而解釋公眾對於風險訊息關心程度的起伏 (Mazur, 2016)。

本研究發現，從 1997 年至 2014 年 18 年期間當中，「企業」與「環保」是媒體報導最多的新聞，其次則是「企業」與「能源」，這兩條線所呈現的趨勢變化差不多。但「企業」與「氣候變遷」則出現最少的新聞量，只有在 2006 年開始到 2010 年期間稍為增多。但在 2010 年後整個媒體報導量並未明顯增加或減少。「企業」與「減碳」在這幾年當中的新聞量也不多，但很明顯的，自從 2006 年開始上升，到了 2010 年到達了高峰，整體報導量明顯多於「企業」與「氣候變遷」。

藉由長期分析企業溝通能源與環境相關議題的報導量，本研究指出了「能源」、「環保」與企業之間的議題，長久以來，一直是企業著力對外溝通的焦點，但最根本的企業與「氣候變遷」議題，也是企業與目前整體大環境之間的共生共存問題，卻是企業較少著墨溝通的內容。其原因有可能新聞經常從自然環境的變化與衝擊，報導氣候變遷議題（如乾旱、暴風雨以及極端氣候等） (Mazur, 2009)，較少從責任角度探討氣候變遷，特別是從企業課責的角度報導氣候變遷，

airiti

以致於企業也較少回應於氣候變遷的風險溝通。但隨著氣候變遷論述從強調成因、衝擊，轉變到調適與緩解，企業近年來也開始致力於「節能減碳」的議題溝通。由此可知，企業對外溝通主要還是呼應於整體氣候變遷論述的變化，以致於強調緩解作法的「節能減碳」論述隨之增加，但對於企業與氣候變遷巨觀層面的整體環境論述仍顯得較為貧乏。

（二）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議題以低碳環保產品主題以及傳統能源類別為主

一般而言，企業進行能源減碳的方式相當多，如生產設備節能效率、溫室氣體排放、綠色產品、生產低碳化等問題進行診斷、諮詢輔導，提供生產效率、減碳量、耗能量改善建議及資訊（經濟部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2014）。而本研究發現，報紙新聞最常報導企業溝通「低碳產品／環保產品」（25.4%）主題，這也應驗了能夠創造企業商業利益的「低碳產品／環保產品」，仍然是企業面對氣候變遷環境問題時，最喜歡對外溝通的主題。相對的，企業對外溝通的新聞當中，較少說明企業舉辦的「能源或減碳相關活動」（3.9%），以及說明企業如何「改善供應鏈效率的問題」（4.7%）。Hoffmann & Busch (2008) 於研究中說明，對許多公司來說，從自身業務當中而導致的排放量，比起在整個價值鏈中，亦即從上游或下游而來的排放量，是小巫見大巫的，但無論是上游或下游產業的排放，對於一般企業的碳排放量，都不會被列入考慮。因此，如何改善供應鏈效率的問題，對於企業對外溝通能源相關問題來說，自然也就顯得較不重要。也難怪 Smith (2013) 會認為，企業對於改善環境表現通常是孤立的，比較是從單一層面活動（project）著手，而非從企業整合著手。雖然供應鏈的問題並非個別企業所能獨立改善之事，但供應鏈畢竟是永續經營裡的一個重要環節，風險大多就是忽略供應鏈的問題，大企業即須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扮演帶領供應鏈一起因應環境風險的責任，因此企業實應強化這方面的對外風險溝通。

至於新聞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的能源種類，主要仍以火力、石油等傳統能源居多（48%），太陽能源占比降至 14.3%，核能以及其他替代能源則分別占比 11.5% 與 11.1%。換言之，即便因應氣候變遷，替代能源成為國家相關政策大力推行之解決方法，但在企業方面，經常與其相提並論的仍舊是傳統能源居多，其中原因或許是因為選樣當中的百大企業，有關石化燃油的企業新聞不少（如中油），較少企業與替代能源的投資、使用或是開發有關，因此造成企業溝通替代能源的新聞顯得較少。

airiti

（三）企業人士為主要消息來源、商業綠色為主要媒體再現框架

由於本研究以企業為主要探討對象，因此，「企業人士」是新聞報導最常引用之消息來源，其次為政府人士，較少引用非能源專家以及環保團體等組織的觀點。新聞立場以中立居多（77.4%），鼓吹立場則為一成五左右（15.1%），較少是批評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或以負面立場報導（7.5%）。因此，整體而言，媒體對於企業溝通能源相關問題，仍是以正面肯定與鼓勵立場居多。

整體框架方面，報紙最常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報導企業溝通新聞，亦即新聞較常呈現企業商業利益有關的產品開發與科學創新，這類新聞框架的比例超過了一半（50.9%），其與 Stauffacher et al. (2015) 研究結果類似，幾位學者發現工業團體傾向使用「科技技術與能源改革」來框架地熱能源風險議題。至於報導能源風險不確定性、政治衝突以及公眾參與的「政治綠色」框架，以及強調企業責任與環境保護的「環境綠色」框架，比例上分別為 25.4% 及 23.7%。幾家報紙當中，又以《聯合報》報導「環境綠色」框架的新聞最多，此結果或許與過去多項研究指出傳統媒體，如《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對於環境議題報導較為重視有關（林佳弘，2013；林義晃，2003；徐美苓、楊意菁，2011）。而徐美苓、楊意菁（2011）分析平面媒體全球暖化報導品質時，訪問了幾位環境記者，不少記者反映《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早期培養了不少資深環境記者，雖然有些記者後來離開報社成為獨立記者（如《聯合報》朱淑娟），但兩家報紙對於環境議題仍然顯得較為關心，而此或許能說明《聯合報》在環境議題上為何較能跳脫商業框架的思維。

另從細項框架來看，強調「企業經濟利益與發展」框架角度的新聞報導最多，其次依續為「政治爭議與衝突」、「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但比例都不高；報紙新聞最少從「公眾參與」、「能源風險的不確定性」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的問題。Pompper (2004) 探討美國報紙報導環境風險公共政策的議題框架，其指出，能源議題為美國經濟條件帶來沉重的問題，因此，能源發電議題在近十年來受到顯著的媒體關注，而電力與能源發電主題及框架，幾乎是完全由政府菁英人士和工商界消息來源來推動的，傾向以經濟問題探討能源議題。Gauthier (2010) 探討食品風險議題報導時也發現，強調經濟方面損失的損害框架，被用來描繪說明企業在此議題中成為受害者（以及所遭受到的經濟損害），而戰爭框架則用來說明企業能夠根除／解決食品中細菌的能力，兩者框架皆以企業利益為主。上述這些研究道出了，風險議題與商業及經濟利益，仍是媒體報導的重要角度。

airiti

企業對外溝通低碳產品，不但反映企業力行環保，又能回饋至企業利益中，而這也就是為何「商業綠色」成為報紙媒體最常再現的訊息框架。新聞訊息框架影響人們如何定義問題的方式、引起問題、責任歸屬、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Cooper, 2002，轉引自 Nijkrake et al., 2015: 81），最終更會影響公眾的看法。不過可惜的是，企業對於環境責任相關的「環境綠色」框架論述，卻鮮少著墨。如此一來，或許也會間接影響民眾認為綠色產品才是解決企業與環境之間的最有效方法，卻忽略了綠色產品之外，企業對於整體環境與能源應負擔之責任。

（四）不同報紙以及企業屬性，呈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的內容有所不同

不同報紙報導企業溝通的能源種類，經交叉分析，達到了明顯差異，《自由時報》報導傳統能源的比例最高、《蘋果日報》比例最低。而《聯合報》相對於其他報紙，比較喜歡報導與企業有關的「核能」議題，此一結果或許與《聯合報》曾經製作一系列核能議題專題報導有關。另外《蘋果日報》與《經濟日報》在新聞中，報導「新興替代能源」以及未明確指出為何種能源類型的新聞也較多，由此可知，除了核能類別，《蘋果日報》對於能源種類報導的比例差距不大，《聯合報》則相對給予企業與核能較多篇幅的報導。

不同報紙媒體對於新聞消息來源的引用並無明顯差異，也就是說，「企業相關人士」都是這幾家報紙主要的引用來源。不同報紙對於新聞框架的呈現亦有所不同，雖然不同報紙都以呈現「商業框架」為最多，但《蘋果日報》比例最高。除了《聯合報》與《經濟日報》，其他幾份報紙其次皆以「政治綠色」框架為報導角度，唯獨《聯合報》傾向從「環境綠色」，也就是強調企業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角度來報導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另外，本研究發現，「商業框架」的差異並非存在於傳統一般報紙（《中時》、《聯合》等）與財經報紙（《經濟日報》）之間，反而出現在《蘋果日報》與其他報紙之間，也就是說《蘋果日報》更傾向以商業角度報導環境議題，而此研究發現也確認了，《蘋果日報》的媒體屬性在報導新聞或是環境議題方面，的確與傳統一般紙媒有所不同。

此外，不同的企業屬性，對於溝通能源相關議題也有不同的溝通重點，新聞報導較常呈現製造產業以及服務業在「新科技與低碳商品」的主題新聞；財務金融業在溝通能源相關議題時，則經常出現「與能源無關」的主題。而報導的能源種類，製造業與服務業最常溝通「傳統能源」，財務金融產業則呈現較多「未談到特定的能源」的新聞，且未有任何一則新聞論及「核能」問題。由以上結果可知，財務金融企業對於能源環境議題的溝通較無明確的主題或能源類別，不知是

airiti

否因為其他產業對環境衝擊較大，還是因為財務金融業忽略本身與環境能源之間的可能關聯，或許須要未來更進一步瞭解。

消息來源方面，「企業相關人士」雖然是相關新聞最常出現的消息來源，但財務金融業引用的比例較高，相對較少引用其他消息來源。製造業其次喜歡引用「政府機構人士」，服務業則喜歡引用「能源與非能源專家名人」，「政府人士」以及「一般民眾」。Pompper (2004) 指出，引用企業消息來源經常是為了確認或是反駁企業的所作所為，而本研究結果在新聞立場方面也以鼓吹及正面居多，再加上企業經常成為主要消息來源，因此就企業環境風險溝通言，企業組織成功地掌握了訊息溝通的主要內容，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新聞媒體似乎缺乏以不同消息來源或觀點報導新聞。而媒體再現不同產業別的能源與環境相關議題時，其框架角度則沒有顯著差別。

至於報紙報導不同業別對於企業立場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媒體再現不同企業別的立場有所不同，三種企業別當中，雖然皆以中立角度呈現的新聞最多，但媒體對於「服務業」比較常從質疑的角度報導企業溝通能源議題，「製造業」則獲得較多的鼓吹正面肯定的新聞，「財務金融業」則只有呈現中立的新聞。Kolk et al. (2008) 指出，CDP 試圖幫助制度化碳信息披露可以成為一種常規做法，而曾參與 CDP 的投資者幾乎都是金融機構。以上的說明或許可以解釋金融產業迅速回應於相關議題，使得財務金融產業並未獲得媒體的負面報導，不過本次研究，金融產業的樣本數相對較少，故這樣的推論仍有待進一步的驗證。另一方面，向來被認為與能源使用或排放大有關係的製造業，與其他產業相比，卻獲得最多正面新聞報導，由此可知，製造業對外溝通環境議題，算是比較積極與成功的。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對於企業來說，氣候變遷不只是環境領域的議題，更與經濟、政策以及科技創新有關，能源科技被認為不只是氣候與能源政策工具，也是主動於詮釋政策討論的社會建構過程 (Barry, 2001; Teräväinen, 2014)。因此企業組織不能忽視媒體的存在，與其可能發揮的效益或影響。但回顧過往文獻卻幾乎沒有研究聚焦於企業環境溝通與媒體報導，因此，本研究從企業風險溝通角度探討媒體再現企業溝通能源相關議題，突破以往氣候變遷風險溝通的研究視野，除了提供學術界觀看風險溝通的完整面貌，也能釐清企業在風險溝通中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結果應能豐富氣候變遷以及風險溝通學術內涵。

本研究企圖從縱貫面，亦即從長期的報導變化來瞭解企業與環境及能源相關

airiti

議題受媒體關注之程度與變化，的確提供傳播研究瞭解環境議題與媒體關注之間的變化關係，但因長期報導量的樣本搜尋僅就關鍵字本身進行樣本搜尋，故僅能解釋相關報導的數量增減，無法指出新聞內容是否明確對應企業溝通能源問題，以致於無法顯現深度內容意涵，為研究上之限制。另外因媒體報導量理論並未提及究竟要多大的報導量才是分析最佳依據，因此不同期間的選擇，其結果（或說媒體關注）或許有所不同，因此未來研究或許可以從不同時間點，或是幾個不同時間點，甚至是不同國家媒體在同一段時間點，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報導量分析，應能更全面瞭解社會趨勢變化、文化背景差異與媒體關注環境議題之間的相關問題。

而本研究結果指出了企業習慣從「商業綠色」框架角度對外溝通能源相關議題，點出了企業與商業利益之間無法脫勾的問題，也是企業進行風險溝通值得探索的問題。但這次研究只能就媒體報導層面來說明該現象，無法深度瞭解企業如何建構綠色論述。Feller (2004) 即指出，氣候傳播和環境傳播都是象徵性的行動，其中語言和其他形式的象徵行動創造了意義，並促成人們對大自然結構的認知。而 Feller 甚至認為企業敘事從涉及市場行銷功能的綠色行銷敘事，已漸漸轉移到以企業規劃和管理過程（包含企業品牌、企業社會責任和人力資源的施行策略）的藍色企業敘事。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論述建構的角度，探討企業溝通環境風險，在媒體上所呈現的論述意義。

由於企業風險溝通道出了企業責任與環境之間的重要關係，《遠見雜誌》曾經專欄報導企業進行節能減碳的企業公民行為，像是味全企業成立節約能源服務團、中華汽車執行責任與專案控管以因應能源問題、中國人壽則舉辦環保競賽進校園，進行節能減碳提案競賽（范榮靖，2008）。而這類企業推動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相關議題，藉由媒體報導，除了具有傳遞環境風險教育知識意涵，亦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意義。因此未來研究，實可探討企業環境溝通與企業公民的相關問題。

最後，由於網路不同於傳統媒體，可以提供人們立即最新的資訊，並且方便搜尋，亦能提供與公眾互動對話的機會。時至今日網路已成氣候變遷議題傳散的重要場域，不論是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或人士、以及反氣候變遷團體者，皆可以在網路找到發聲的管道與機會，也成為社會公眾接受氣候變遷訊息的主要來源之一（楊意菁、徐美苓，2010）。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探討企業網站如何傳遞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以及如何揭露風險等訊息，以完善企業溝通與風險溝通研究領域。

airiti

參考書目

中國時報（2014 年 8 月 22 日）。〈交通部漂書　郵局、車站設點　葉匡時捐《大災變》貼近時事〉，《中國時報》，第 AA1 版。

世新大學（2013）。〈臺灣民眾媒體評鑑大調查與十年回顧〉，《世新大學傳播資料庫》。取自 http://cc.shu.edu.tw/~cjc/downloads/activity/2013/7-12/102091801.pdf

何榮軒（2012）。《HTC 企業新聞稿與媒體報導的議題設定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吳榮華（2010 年 2 月 3 日）。〈哥本哈根會議及臺灣之因應〉，《國政分析》。取自 http://www.npf.org.tw/post/3/7031

呂春慧（2008 年 12 月 8 日）。〈節能減碳新商機及企業碳管理系統〉。取自 http://college.itri.org.tw/Topiclearn.aspx?id = 273

呂國禎、劉光遠（2015 年 12 月 22 日）。〈烏賊大翻身　把 CO2 變化妝品〉，《天下雜誌》。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 = 5073405

林佳弘（2013）。《臺灣石化產業環境影響評估報導之分析——以國光石化及六輕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義晃（2003）。《報紙環境新聞分析及其對中部地區民眾環境認知、態度及行為之影響研究》。國立臺中師範學院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柳中明（2008 年 10 月 22 日）。〈眼光放遠　才能真正面對暖化〉，《低碳生活部落格》。取自 http://lowestc.blogspot.tw/2008/10/blog-post_22.html

盈臻環創科技有限公司（2016）。〈顧問及培訓服務：商界減碳建未來〉。取自 http://www.planetcare.com.hk/our-services.php?serviceID=33

范榮靖（2008）。〈企業節能妙招　貴公司如何減碳？〉，《遠見雜誌》，265：94-96。

徐美苓（2015）。〈新興環境議題的媒體建構：以臺灣替代能源新聞報導為例〉，《傳播與社會》，32：19-57。

徐美苓、楊意菁（2011 年 7 月）。〈科技風險與全球暖化報導品質分析〉，「2011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新竹。

張瓊懿、欒欣譯（2007）。《不願面對的真相》。臺北，臺灣：商周。（原書 Gore, A., & Media, M. [2006]. *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planetary emergency of global warm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NY: Rodale.）

airiti

楊純明、張致盛、陳駿季（2011）。〈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與緩解策略〉，《作物、環境與生物資訊》，8：254-264。

楊意菁（2015 年 7 月）。〈商業雜誌與企業公民訊息：一個縱貫性的媒體再現與框架分析〉，「2015 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暨科技部社會學門成果發表會」論文。臺灣，高雄。

楊意菁、徐美苓（2010）。〈風險社會概念下的風險溝通與網路傳播：以全球暖化議題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8：151-191。

經濟部中小企業節能減碳資訊網（2014）。〈輔導申請服務〉。取自 http://ghginfo.moeasmea.gov.tw/moeasmea/wSite/ct?xItem=4849&ctNode=1397&mp=00602

蔡振興（2012）。〈氣候變遷、自然與生態溝通〉，《中山人文學報》，32：71-89。

謝君蔚、徐美苓（2011）。〈媒體再現科技發展與風險的框架與演變：以基因改造食品新聞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0：143-179。

蘋果日報（2015 年 6 月 16 日）。〈立院三讀　企業超額排碳罰 3 倍　2050 年溫室氣體減量須達標〉，《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616/36610772/

Andrews, K. T., & Caren, N. (2010). Making the news: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 841-866.

Ashforth, B. E., & Mael, F. (1989).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20-39.

Barry, A.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UK: Athlone Press.

Batta, H. E., Ashong, C. A., Udousoro, N. W. (2015). Examining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on energy utilisation in select Nigerian newspapers. *Developing Country Studies*, *5*(16), 40-51.

Belke, J. C. (2000). *Chemical accident risks in U.S. industr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ccident risk data from U.S. hazardous chemical faciliti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hemical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Prevention Office.

Boyd, A. D., & Paveglio, T. B. (2014). Front page or “buried” beneath the fold? Media coverage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airiti

411-427.

Boykoff, M. T. (2007). Flogging a dead norm? Newspaper coverage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from 2003 to 2006. *Area*, *39*, 470-481.

Brulle, R. J., Carmichael, J., & Jenkins, J. C. (2012). Shifting publ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oncern over climate change in the US, 2002 ~ 2010. *Climate Change*, *114*, 169-188.

Carroll, C. E. (Ed.). (2010).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the news media: Agenda-setting within business news coverage in developed, emerging, and frontier marke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arroll, C. E., & McCombs, M. (2003). 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business news on the public's images and opinions about major corporations. *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 *6*, 36-46.

Cooper, A. H. (2002). Media fram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German peace protest against INF missiles, the Gulf War, and NATO peace enforcement in Bosn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 37-80.

Corfee-Morlot, J., Maslin, M., & Burgess, J. (2007). Global warm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365*, 2741-2776.

Culley, M. R., Ogley-Oliver, E., Carton, A. D., & Street, J. C. (2010). Media framing of proposed nuclear reactors: An analysis of print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 497-512.

Curtin, P. A., & Rhodenbaugh, E. (2001). Building the news media agenda on the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journalistic source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7*, 179-195.

Entman, R. M. (2003). Cascading activation: Contesting the White House's frame after 9/1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415-432.

-- (1991). Symposium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ntrasts in narratives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4), 6-27.

Entman, R. M., Matthes, J., & Pellicano, L. (2009). Nature, sources, and effects of news framing.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175-190). New York, NY: Routledge.

airiti

Feldpausch-Parker, A. M., Chaudhry, R., Stephens, J. C., Fischlein, M., Hall, D. M., Melnick, L. L., et al. (2011). A comparative state-level analysis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discourse among US energy stakeholders and the public. *Energy Procedia*, *4*, 6368-6375.

Feller, W. V. (2004). Blue skies, green industry: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s as utopian narratives. In S. L. Senecah (Ed.),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 pp. 57- 7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Foerstner, A., Humphreys, A., & Shearer, E. (2013). *Energising media coverage of energy issues: Impact of different reporting frames on audience segments and understanding*. Evanston, IL: Med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randsen, F., & Johansen, W. (2011). Rhetoric, climate change, and corporate identi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5*, 511-530.

Gauthier, E. (2010). Foodborne microbial risks in the press: The framing of listeriosis in Canadian newspaper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 270-286.

Gutteling, J. M. (2005). Mazur's hypothesis on technology controversy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7*(1), 23-41.

Haigh, M. M. (2010). Newspapers use three frames to cover alternative energy.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1*(2), 47-62.

Hart, P. S., & Feldman, L. (2014). Threat without efficacy? Climate change on US network new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6*, 325-351.

Hilliard, A., & Jamieson, G. A. (2011). Energy management in large enterprises a field study. In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55th annual meeting* (pp. 399-403). Santa Monica, CA: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Hoffmann, V. H., & Busch, T. (2008). Corporate carb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12*, 505-520.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Hori, S., Shinozaki, M., Nogata, D., & Fujita, T. (2014). The role of CSR in promoting companies' energy-saving actions in two Asian cities. *Energy Policy*, *69*, 116-121.

Ihator, A. S. (2004).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 century change.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9*, 243-253.

airiti

Insch, A. (2008). Online communicati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A study of New Zealand's electricity and gas retailers.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14*, 139-153.

Kolk, A., Levy, D., & Pinkse, J. (2008). Corporate responses in an emerging climate regim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commensuration of carbon disclosure.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7*, 719-745.

Mazur, A. (2016). How did the fracking controversy emerge in the period 2010-2012?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5*, 207-222.

-- (2009). American gen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warnings: Avian influenza and global warming. *Human Ecology Review*, *16*, 17-26.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176-187.

Meijer, M. M., & Kleinnijenhuis, J. (2006). News and corporate reputation: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 341-348.

Nijkrake, J., Gosselt, J. F., & Gutteling, J. M. (2015). Competing frames and tone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versus media coverage during a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1*, 80-88.

Palenchar, M. J., & Heath, R. L. (2007). Strategic risk communication: Adding value to society.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3*, 120-129.

Pompper, D. (2004). At the 20th century's close: Framing the public policy issue of environmental risk. In S. L. Senecah (Ed.),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 pp. 99-13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Regester, M., & Larkin, J. (2005). *Risk issu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public relations: A casebook of best practice* (3rd ed.). London, UK: Kogan Page.

Sabeh, Z., Flora, M., & Khairan, F. (2000). Corporate citizenship as a facto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5*, 210-214.

Smith, T. M. (2013). Climate chang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 the supply chai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9*(3), 43-52.

Stauffacher, M., Muggli, N., Scolobig, A., & Moser, C. (2015). Framing deep geothermal energy in mass media: The case of Switzerland.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98*, 60-70.

airiti

Sullivan, R., & Gouldson, A. (2013). Ten years of corporate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What do we have to show for it? *Energy Policy*, *60*, 733-740.

Teräväinen, T. (2014). Representations of energy policy and technology in British and Finnish newspaper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299-315.

Trumbo, C. (1996). Constructing climate change: Claims and frames in US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5*, 269-283.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06).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8th ed.). Belmont, CA : Wadsworth.

Wright, W., & Reid, T. (2011). Green dreams or pipe dreams? Media framing of the US biofuels movement. *Biomass and Bioenergy*, *35*, 1390-1399.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71-106, January 2017

Risk Communication, Media Attention and Framing Analysis: News Representation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f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Yang, Yie-J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risk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orporations communicate messages on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dopted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1997 ~ 2014) and the cross-sectional approach (during 2014)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n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and news representation. From 1997 to 2014, media coverage of longitudinal trends showed that energy issues related to corporations peaked in 2008, with the "Economic Daily" having the most coverage. Regarding the cross-sectional aspect, content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 total of 279 news stories sampled from Taiwanese print media and dealing with the hundred largest enterprises in Taiwan. This study found the theme of "low carbon and energy saving products" to be the major news topic. The news stories were more focused on traditional energy than other energy types, and corporate people were the predominant sources. The most common news frame was "commercial green," namely the description of new energy products and new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f energy-related issues tended to favor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corporations. This study ends wit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Keywords: corporate risk communication, framing analysis, media attention, news repres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energy-related issues

---

* Email: yjyang@mail.shu.edu.tw
Received: 2015.10.28
Accepted: 2016.7.19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107-139．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5

誰的風險？誰的管制與檢測標準？蘭嶼核廢料爭議之研究 *

范玫芳 **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2011 年 11 月媒體報導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附近檢測出鈷 60 和銫 137。本文結合環境正義和科技與社會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風險評估與管制爭議中，公民行動如何挑戰官方科學論述和環境不正義問題。蘭嶼個案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的交錯、及「應做卻未做的科學」。蘭嶼部落不同世代的反核行動者與反核團體以多元行動表達其訴求，並挑戰官方的輻射管制標準與監測方式。核能管制與研究機構間複雜的共生網絡弱化了科學知識生產的可信度和釋出的風險資訊。本文建議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強化資訊透明、地方參與和課責性、納入預警原則，並賦權地方族人在風險評估科學知識產製和核廢料治理上扮演關鍵角色，重構部落族人的環境健康風險與福祉。

關鍵詞：科技爭議、風險感知、核廢料、管制、環境正義

* 作者感謝期刊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之建設性意見、受訪者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分享，以及研究助理林育如、林俊仁和張簡妙琳在訪談資料蒐集整理和校訂上的協助。本研究為科技部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MOST 103-2410-H-010-013-MY3）。
** Email: mffan@ym.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16 年 8 月 13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前言

蘭嶼貯存場遷移問題[1]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多年來懸宕未決，正當經濟部重申妥善進行核廢料後端處理，台電委託中研院進行的檢測報告意外在 2011 年底曝光。學者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連續三年於蘭嶼貯存場外潮間帶與潮池中的泥沙中檢測出銫 137 與鈷 60 人工核種。原能會表示：鈷 60 可能是蘭嶼貯存場進行廢料桶檢整作業[2]產生的飛灰飄到場外；台電則回應：「低於標準值」，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劉力仁、林毅璋、張存薇，2011 年 11 月 29 日）。台電強調偵測到鈷 60 的量遠低於標準值，「不能稱之為『外洩』，只能說是『微量外釋』」。「因為把壕溝的上蓋打開，送進處理中心處理，打開門的時候，有少量的粉塵被吹出去」到潮間帶。但有日本學者攜帶儀器測量蘭嶼輻射，發現有十個點有異常的輻射值，超過背景環境值 10 倍，有外洩疑雲（孫窮理，2012 年 2 月 24 日）。

前立委鄭麗君拿出台電處理破碎核廢料桶的照片，發現處理過程中，有些工人使用鏟子、有些竟徒手將廢棄物放入桶內，完全不是台電所說的負壓封閉空間。但台電回應表示現已改善。立委質疑核廢管理鬆散安全問題，迫使台電道歉（壹電視，2012 年 10 月 25 日）。外洩事件引起蘭嶼達悟族人高度不滿，在 2012 年 2 月 20 日發起「220 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運動。達悟人聚集在貯存場表達他們的憤怒，他們往貯存場丟棄發霉的芋頭，象徵要台電把帶來的垃圾（核廢料）帶回去。他們高喊：「核廢滾蛋、永不續租」，最後將象徵核廢料的桶拋向大海，代表他們永不要核廢（林詩嵐、簡毓群，2012）。2012 年 8 在立委協助下，部落文化基金會邀請日本學者中生勝美、加藤洋調查環境輻射汙染，發現島上有多處異常輻射熱點，迫使原能會推動第三方監測（黃淑鈴，2015：27）。

原能會與台電的回應與處理呈現當前核廢料處置中資訊與知識的不對等、風險溝通的鴻溝以及管制科學等問題。官方與傳統主流的量化風險評估未能涵蓋在地文化與生活方式差異，以及核廢料輻射對於敏感和易受傷害群體（例如：孕婦

1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自 1982 年起暫時貯存低放射性廢料。根據原能會和台電的說法，原本規劃將核廢料拋入蘭嶼外海海溝，但在 1980 年代初國際海洋公約規定禁止傾倒有毒廢棄物到海中，故將低放核廢料暫存蘭嶼。儘管原能會與台電強調整個過程沒有欺騙或隱瞞地方居民。然而，當地達悟人口表示，當初核廢料貯存場興建時，台電說是要蓋罐頭工廠，增加族人就業機會，並未充分告知核廢料輻射風險。蘭嶼反核廢料運動自 1987 年解嚴後持續進行，迫使政府在 1997 年停止運送核廢料並承諾遷廠 (Fan, 2006, 2009)。

2 針對蘭嶼貯存場核廢料桶鏽蝕破損問題，台電於 2007 年 12 月展開檢整重裝作業，歷經四年完工。

airiti

與嬰幼兒）的影響。核廢料貯存場的爭議對傳統社會文化與地方發展造成極大的衝擊，引發居民在健康風險與生態環境的疑慮，更牽涉環境正義與永續性的問題。

環境正義研究關注在環境風險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以及如何／為何會造成少數人不公平地承受環境污染。現代工業體系高度仰賴科學和專家，科學家對地方環境條件缺乏全面性的認識，將可能做出錯誤的假定。專家權威與社會政治結構彼此交互作用，衍生更複雜的爭議。科學知識常被視為是靜態且穩定的，然而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簡稱 STS）學者認為科學與技術具動態性，官方和主流的環境風險評估往往忽略文化生活形式差異和地方條件的特殊性，以致於低估當地少數具有文化差異群體的環境風險暴露。美國的環境正義運動帶動政治的轉變，以往被視為弱勢的少數群體，透過環境正義行動者與科學家間持相互結盟創造形塑環境管制體制以及改變科學實作的機會，成為爭議中的積極的參與者 (Cohen & Ottinger, 2011)。

環境正義文獻較少以變動的科學的角度切入檢視科學爭議，且較缺乏關注科學家的實作與行動。另一方面，倡議科學或科技民主文獻對於公平或差異的議題較缺乏關注 (Cohen & Ottinger, 2011)。既有蘭嶼核廢料研究多數是在蘭嶼貯存場輻射外洩事件發生之前，研究分析的焦點包括：達悟族所承受的環境不正義問題（紀駿傑，2006；黃之棟、黃瑞琪，2009）、核廢料議題牽涉多元的環境正義價值觀點和衝突 (Fan, 2006) 以及核廢料貯存場鄰避困境的紓解（余鎮宏，2007）；蘭嶼特殊系絡下跨文化風險感知的差異，以及達悟族人對核廢料風險的感知如何有別於社會主流的看法 (Fan, 2009)；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資源動員（劉嘉偉、張玉佩，2012）；新聞媒體如何「再現」達悟族人反核廢料的抗爭運動（王嵩音、1998）；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郭良文，2010）；蘭嶼社區健康和安全評估之前導性研究。以上研究呈現對於原住民的弱勢處境和環境不正義問題的關懷，但對於蘭嶼環境監測與風險管制問題較欠缺細緻的科學爭議分析（江宏哲，2015）。

晚近一些研究指出居民反對污染設施的設置和運轉並非出於狹隘的自私心態，地方論述往往呈現較廣的環境和社會考量或基於多重價值立論。將地方抗爭描繪成鄰避現象很可能會加劇衝突並讓風險承擔者感到怨憤。在促進各方對話和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協調者必須讓各方參與者感到其觀點有受到尊重，並避免使用鄰避的用語（范玫芳，2014；Burningham, 2000; McClymont, 2008）。框架（framing）和論述（discourse）乃是風險管制不可忽略的重點。管制的過程以及規則制定牽涉國家和多元政策行動者之間相異的需求和知識宣稱的相互競爭。到

airiti

底什麼知識以及誰的知識在管制風險上被視為是相關的，乃是一種轉譯、協商與權力鬥爭的社會過程（范玫芳，2014；Lidskog, Soneryd, & Uggla, 2010）。

日本福島核災後引起國內多元的社會行動者對核能議題之關注，被視為反核運動的復興 (Ho, 2014)。原本從事核能研究的專業者轉而參與民間反核行動，出現新的專家—行動者（experts-activists）。蘭嶼部落不同世代的反核行動者透過與反核團體、跨領域科學家及福島核災後投身於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合作，形成新的異質性反核聯盟。黃淑鈴（2015）指出自 2011 年起部落文化基金會結合各種反核勢力，將反核廢從「族群正義」導向「環境權」議題，從殖民和滅族等文化論述轉向透過「建立事實經驗的可信度來支持其主張」。然而該文主要聚焦在反核廢運動「框架」（frame）移轉的過程，分析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框架設定如何受到世代間的競爭、原運與反核運動的消長以及蘭嶼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這三大因素的影響。針對輻射外洩事件衍生的環境監測和健康風險爭議，有必要更深入的檢視專家的科學知識宣稱（knowledge claims）及部落風險論述的知識基礎和社會脈絡間的關係，以及以往研究較忽視的核能設施臨時工的勞動健康風險問題。

本文嘗試結合環境正義與 STS 的理論觀點，探討蘭嶼核廢料的風險與管制爭議，以及公民行動如何挑戰官方的科學論述和環境不正義。研究問題包括：蘭嶼居民如何感知和回應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以及官方「沒有超標就是安全」的宣稱？蘭嶼居民、地方團體、反核專家和官方在風險論述及知識宣稱有何差異？針對和環境輻射監測爭議，民間反核團體如何發展對抗性論述並採取行動挑戰官方科學實作？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座談。文獻資料分析方面，主要檢閱相關的期刊文章，輔以核廢爭議的新聞報導、會議資料及環保團體的文宣等。在深度訪談部分，本研究在 2015 年 7 月至蘭嶼進行訪談，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當地居民（包含達悟族第一代反核廢行動者、達悟族反核中生代和青年、移居蘭嶼的臺灣本島人、在貯存場工作的族人）、當地關注核廢料議題的非營利組織成員和積極參與反核廢料的行動者。本研究也針對投身於民間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輻射防護與健康領域專家、北海岸反核團體成員進行訪談，共計有 15 位受訪者（詳見附錄一訪談名單）。訪談大綱分以下四個面向：一、風險感知；二、核廢料輻射管制；三、反核廢料行動；四、貯存場遷場及最終處置選址爭議。此外，本研究在 2014 年 7 月舉行「核廢料管制與監督機制專家焦點座談」，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以及曾任職在原能會的官員參與對話，藉以瞭解立場相異的專家論述和立論依據，共有六位學者專家與會（見附錄二與會者名單）。四個討論議題如下：

airiti

一、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外潮間帶檢測出人工核種的意外事件之看法；二、現行核廢料處置的相關法規、管制標準以及實務運作之研討；三、核廢料管制問題的公民參與機制；四、歐美國家在核廢料管制與監督的經驗和借鏡。

在介紹理論觀點後，本文根據研究問題意識，首先探討居民、反核專家和官方在風險論述及知識宣稱的衝突，並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和「應做卻未做的科學」（undone science），以及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交錯的問題。接著，本文討論環境輻射監測與管制爭議、蘭嶼反核廢行動者和民間反核團體如何挑戰官方輻射管制標準和監測方法，並進一步反思當前由上而下的參與困境和可能出路。

貳、科學的變動和環境正義

科技與社會研究將科學視為鑲嵌於文化的社會動態系統，且往往是因應特定的政治及社會爭論而生產出來，而非單一線性發展的展示；換言之，由於科學及技術的本質是動態的（dynamic），科學與技術其實是被主動製造（actively produced）出來的，並會在文化轉移（cultural shifts）中不斷進行重製（re-made）而展現其動態過程；另一方面，其本質也是可轉變的（transformable），轉變往往發生在社會結構出現斷裂（disruption）時，這樣的斷裂為社會行動製造出更多空間，讓新的組織規範及知識的共識在當中逐漸浮現，例如新興領域的基因毒理學及保育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都是被社會價值引導其發展方向；永續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則是另一個例子。環境正義運動關注科技製造出的不平等，倡議常民的在地經驗知識具有轉變科技知識的豐富潛能，有助於催生出更公平的科學技術及政策 (Ottinger & Cohen, 2012)。

早期環境正義研究主要關注的問題為環境風險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亦即是否因種族與階級因素造成環境污染或危害暴露的不平均分配？近期環境正義的研究逐漸將不公平的問題放置在較廣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來討論，並延伸關注原住民受壓迫、社會差異（例如貧窮、年齡與性別差異）與不公平分配問題間的相互關聯（范玫芳，2012；Ishiyama, 2003）。值得關注的是，專家也被視為一種新的階級。現代工業體系高度仰賴科學和專家，使得專家知識權威整合到既有造成環境不正義問題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彼此交互作用，衍生更複雜的爭議。不公正的分配結果往往牽涉缺乏對文化多樣性和地方知識的肯認，同時和被排除在決策程序之外的問題彼此相互糾結。環境正義問題包含分配面、差異肯認與程序面 (Schlosberg, 2004, 2007; Walker, 2010)。Sen (2009) 提出了能力取

airiti

向途徑（capacity approach）的正義觀，認為公平享有能力去達成個人具價值性的運作功能（the capability to achieve valued functionings）乃是分配正義的核心。具價值性的運作功能包含了個人生活重要層面，例如足夠的營養、免於疾病、能參與在社群生活事務以及具有尊嚴。

當前官方體制的風險評估程序傾向於將複雜的環境社會問題簡化成數量，並將政治與價值上的爭議轉化為科學爭議，進而造成許多公民（特別是文化少數族群）對這些議題變得難以接近（inaccessible）。科學和政府體制往往扮演重要角色去建構人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環境風險分配的差異，這些「已知」（knowns）和「未知」（unknowns）進而形塑科學、政治以及公眾對環境不正義的關注。官方體制的風險評估與溝通途徑常看不清（blindness）種族、階級和文化脈絡和分配上差異，使得外界面對無形的（invisible）環境健康風險時也看不見這些風險承擔者 (Powell et al., 2011: 149)。

環境正義運動挑戰官方風險評估對於族群文化差異的漠視，質疑量化的風險評估將所有樣本的基準設立在 70 公斤住郊區的白人男性，忽略都市中的少數移民與原住民可能以捕魚為生或因與水有關的文化儀式而更易於暴露在污染中。官方對於魚類消費（fish consumption）標準的錯估，將嚴重低估污染暴露在文化族群間的差異，尤其一些低收入社區的少數族裔慣於在受污染的水中捕魚與大量攝食而產生毒性物質超高暴露量問題。環境正義運動促使科學家注意到少數族群的特殊生活型態，而修正了評估風險的方法，尋求更具代表性及參與性的替代方案 (Ottinger & Cohen, 2012: 160)。政治與組織壓力往往會造成結構性的知識間隙（knowledge gap），尤其是在敏感的環境健康問題爭議中，稱為「系統性不製造資訊」（systematic nonproduction of knowledge），是屬於「應做卻未做科學」（undone science）(Frickel et al., 2010; Ottinger, 2013)。相關知識並非僅僅是被掩蓋的問題，有時相關資訊與知識根本不存在。STS 觀點認為當居民面臨潛在環境危害的程序正義問題時，需要執行更嚴格的告知同意標準，必須設法認定與弭平與決策相關的知識缺口，而填補知識缺口的相關研究必須在人民行使同意之前進行 (Ottinger, 2013; Ottinger & Cohen, 2012)。

環境正義行動者並非以製造科學知識為第一要務，科學在行動者眼中並非堅實的證據角色，而被視為更進一步政治行動的工具。這是一種行動取向（action-oriented）的新作法，創造了新空間及帶來新的、更符合正義的科學出現之可能性。一個好是例子是基於社區基礎參與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的生物偵測（bio-monitoring），使得不只是社群，個人也可得知個人

airiti

污染的暴露量。環境正義也生產出了更公平的科學，例如：可攜式空氣偵測器（portable air monitor）的發明，配置（bucket）此利器能即刻掌握空汙數值，而非只是長時段的平均值，這可促成及時的政策行動（timely policy action），使管制單位更注意監測，可更進一步對企業課責（accountability）。環境正義行動者也挑戰官方證據的標準，這也製造了另一個斷裂。如可攜式空氣偵測器可提供每 5 分鐘的空汙數據，對比於 8 小時或 24 小時的標準數值，可作為政策行動的驅動器（trigger）。相較作出致病率提高的統計數據，科學家改採「公眾健康顯著值」（public health significance）作評估，可決定何時介入受汙染社群 (Ottinger & Cohen, 2012)。

美國原住民族在 1990 年代開始表達對於環保署政策與科學實作上的擔憂，而環保署則在 1999 年 5 月組成了原住民科學委員會（Tribal Science Council，簡稱 TSC），以讓部落能夠結構性地參與在環保署的科學評估。TSC 是一個讓原住民族能夠直接提出其疑慮的平臺；其由部落代表與環保署代表共同組成，主要工作為促進部落與政府間彼此利益上的互動，以及支持印地安族群物質、文化以及儀式生活的保存，以及永續健康環境的安全使用。TSC 還是有一些貢獻，如讓環保署和讓全國各地的原住民研究人員開始思考原住民社群適用的潛在暴露途徑的風險評估模型 (Johnson & Ranco, 2011: 184-187)。TSC 於 2002 年提出健康與福利典範（health and well-being paradigm），旨在讓各個族群能夠依據自己的傳統文化定義健康，並依其定義發展其健康管理計畫；這個機制從頭促進了全面的族群參與。進一步來說，強調不同文化的差異，讓原住民族能夠依據其自身傳統文化定義「健康」，並讓其自行發展維護該健康環境的標準與行動計畫；包含瞭解健康風險的不同知識形態，並提倡不同的科學生產程序來保護原住民族文化（同上引：187-192）。然而這個機制並非全然沒有缺點，衍生的問題包括：一、此機制翻轉了科學事實建立的通常程序，這可能會讓環保署失去管制的基礎；二、環保署成為各種政治與科學利益的協調者，而逐漸喪失專家機關的色彩；三、環保署有權力決定能被納入此政治過程的人跟議程。此外，對於包含美洲原住民在內的環境正義運動者來說，儘管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變多了，由於其他具有強大力量與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團體加入這個角力場，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可能會同時下滑（同上引：193）。

環境正義運動的核心價值進入科技中挑戰了傳統狹窄定義的「好科學」（good science）。管制單位在評估風險時開始認為社區參與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環境正義運動也與其他運動結合，價值永續、健康、在地性，也逐步

airiti

滲透影響了科學實作 (Ottinger & Cohen, 2012)。環境正義運動展現轉變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特性，深切影響了個人、社群及環境政策，它運用以下四種運作方式帶來轉變：一、重視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與差異，促成科學社群採用新科學方法進行研究；二、環境正義運動者主張有效地在實作中生產出可供使用的環境知識；三、為顧及環境議題的急迫性，必須重新思考科學證據的官方標準是否適用；及四、提倡正義、永續及健康，使這些價值被納入科學技術生產活動之中，進而催生出更公平的科學技術。環境正義運動有效地擴展了科學與技術得以轉變的可能空間。利用在科技實作中製造斷裂（rupture），斷裂提供了空間，藉著與富同情心（sympathetic）的科學家合作，將保護性（protective）、預警性（precautionary）、干預等原則，帶入研究相關的策略中（同上引：159）。

參、風險知識的鴻溝

官僚體系與專家往往依賴統計模型和量化指標進行風險的界定和詮釋，並強調「已知」的和可控制的部分，而輕估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確定性和「未知」的影響。技術的風險管理模式具有侷限性，包括：化約論的問題、經濟學的限制、文化理解的限制和缺乏道德可責性 (Jasanoff, 2010)。Wynne (1996) 指出科技專家在核電爭議中經常言過其實的保證安全且不正面承認錯誤或承擔責任，過於樂觀和傲慢的態度動搖了公眾對專家系統的信任。技術官僚傾向於將民眾建構為知識欠缺且需要更多宣導和教育。但實際上民眾並非要求「零風險」或確定性的保證，而是對技術專家一再保證安全或缺乏證據的宣稱抱持懷疑，認為技術專家不應否認自身缺乏掌控問題複雜性的能力。輻射研究和流行病學界逐漸面臨到科學本身侷限性的挑戰，無法用科學來消弭不確定性與無知（ignorance）。常民在地知識和專家知識並非截然二分或對立，而是在爭議中相互依存。風險脈絡化有助於吾人理解風險建構過程中諸多的不確定性。

一、不確定性與未知：官方和民間論述的衝突

官方和台電強調蘭嶼核廢料的輻射監測符合管制標準，儘管被檢測出放射性核種仍低於標準值。前原能會官員認為長期低劑量的輻射暴露是否絕對有害還有待更明確的科學論證：

airiti

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害還是無害？難以用科學做一個結論，因為高劑量的輻射對人體絕對有害，但低劑量是否絕對有害，這不見得。比如像喝酒，喝過量的酒也會有影響，但每天喝一杯葡萄酒，大家都說對身體有益，所以大量跟小量對人體的影響是不一樣，輻射也是一樣的情形，大量的絕對不好，那少量到底好還不好？這種情況之下有兩種反應，第一個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害，我就盡量避免；另一個是既然不知道有沒有害，那可能還可以勉強接受，所以我們對輻射的爭議就是在這兩種心態裡面。蘭嶼的部分是說我們不知道是否有害，所以我就盡量避免，但是就政府的標準，你無法證明它有害。（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G1）

然而，民間反核團體和擔任民間組織顧問的核工專家指出核廢料的影響是長遠的、全面性，且具有科學不確定和未知：

放射性不分高低，對人體都會產生傷害，只要高出自然背景值的放射性，尤其是人工核種都應避免。所以在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理過程中，要非常的謹慎，尤其是這些輻射傷害多在五年至二、三十年後發生。（受訪者 E2）

我想那個東西、輻射，你知道它不是馬上發生的。不像傳染感冒，我們馬上就發現了。它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百年，我想這種東西你不要說沒有，沒有都騙人的。對蘭嶼造成什麼影響，那個影響我可以說無限啦、什麼時候發生不知道。因為什麼時候、或是它現在已經在地底或生態鏈產生問題了，我們不知道。（受訪者 NGO1）

長久居住在蘭嶼的達悟族耆老基於身體感官經驗觀察表達核廢料貯存場設置後對土地及農作物生長的影響：

因為輻射是無色、無味又沒有形狀，那怎麼去影響你都不知道。有很多老人家說，我們的土地變了。因為這些老人家親自用手去耕作，他直接去觸摸土壤，他不知道什麼是輻射但是他知道我們的土地已經產生變化，我們的感覺就是，這些變化一定跟輻射有關係，比如說農作物很容易就爛掉啦，這一些現象在研究裡面都是看不到的。（受訪者 L5）

airiti

居民的風險感知除了建立在所獲得的外界資訊和在科學知識上，對於科學的理解同時受到過去的生活經驗以及價值世界觀所影響。居民指出核廢料貯存場設置後對居民健康造成影響，甚至危及後代子孫，表達對政府作為和台電管理措施的不滿，以往負面經驗和對官方的不信任直接影響他們對官方說法和數據的理解：

> 因為不是會痛會臭的東西，它放在這邊我們不知道它會怎麼樣，但廢料放在這裡之後很顯然地有很多奇怪的病，像癌症的東西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就認為專家所說的這個危害地區是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是聽到的是有良心的外面的人知道這個東西是非常不好的東西，不是幾年就消除的輻射東西，它永遠會在這土地上，會殘害你們的孩子或後代，我們知這是有毒的東西，我們不會相信他說那些都安全，我們不會認同他的安全標準，我們相信是有輻射傷害我們的身體，但是我們又能跑到哪裡？（受訪者 L2-2）

儘管居民和民間團體的核工專家顧問聲稱曾在貯存場工作過的達悟人有不少人罹癌，但卻無法證明兩者間的因果關係：

> 因為其實很多蘭嶼人去裡面工作，得癌症的很多都過世啦，可是這個東西你沒辦法去證明，這無色無味的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但曾經在那裡工作過的人得到癌症又不便去透露他自己的一些說法，也很難得到幫助，所以他在醫療上產生很大的困擾。（受訪者 L6）
>
> 那以他們說健康上的確有影響，那可是政府通通把它推到他們吃檳榔、抽菸。沒有錯、檳榔跟抽菸、喝酒這是一個 factor，但是這些因素掩飾了輻射的危害。而且沒有辦法證實。我個人認為天底下沒有那麼巧的事。（受訪者 E2）

二、「應做卻未做的科學」

核廢料的管制呈現了「應做卻未做的科學」問題。環保團體以核電廠為例，指出冷卻水滲漏對海洋的影響缺乏相關調查研究：

airiti

這個問題就我講的：那個很多你看不到的，怎麼洩漏的你也不知道。譬如說核一廠之前那個冷卻水滲漏，那個影響有多大？底下你看得到嗎？但是在臺灣誰去做了這個調查？包括海洋的沉積物誰去做了調查。因為國家不補助這樣的調查，包括地方的北觀處做了什麼？它頂多做了潮間帶的調查，海洋沉積物才是問題。不論落塵或沉積、或在河流內、一定可以測得到，但是誰做？誰會去做？沒有人。（受訪者 NGO1）

蘭嶼居民指出居民疾病和核廢料貯存場的設置和輻射異常意外之間的關連，但卻缺乏長期的調查研究：

因為我們觀察到我們自己族人的一些健康的問題，有一些疾病的罹患率會慢慢變高，比如說罹患甲狀腺癌的人越來越多，原因卻沒有人去探究。因當我們看到自己的族人生這些病的時候，我們就會聯想到跟核能廢料有關係。但是政府並沒有做相關的研究。（受訪者 L5）

有蘭嶼居民認為蘭嶼核種外洩是檢整作業的疏失，懷疑貯存槽的廢水可能外漏來，若外漏很容易會汙染到地下水，但卻未能有進一步相關的調查研究（專家諮詢會議，與會者 NGO2）。擔任民間輻射安全促進會理事的公共衛生領域學者指出，目前無法掌握蘭嶼輻射污染和暴露的全貌，礙於經費和人力，仍還有很多科學工作應該做：

我們要算曝露評估，風險評估第一個要曝露評估，曝露評估本身不完整，你只看 1997 年，1999、2000 年我們做了一部分，沒有很完整的，因為沒有錢，無法做得很完整沒有辦法瞭解整個蘭嶼島輻射污染的情形到底怎樣？，後來台電重新委託中研院的扈治安教授去做研究，在 2008 到 2012 年間發現許多異常的輻射、環境的污染，整個蘭嶼島，因為牽涉到人的居住、飲水範圍、生活環境等評估，現在沒有辦法做風險評估。另外一種風險評估就是以個案方式進行，觀察有多少癌症、有多少先天畸形與臺東做比較，但這有個困難，是傳統的流行病學研究沒有做得很好。（受訪者 E1）

airiti

傳統的風險評估途徑及官方「符合標準」的宣稱並無法涵蓋到核廢料對居民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孕婦或父母親關注輻射對嬰幼兒健康的影響：

> 我在懷孕第一胎深怕這個孩子到蘭嶼會受輻射影響，我哭了一個晚上很緊張都睡不好，很討厭政府把核廢料放在這個小島。（受訪者 L2-2）
>
> 我會對台電的說法不信任。你講一些專業的東西，一般的老百姓本來就不是懂很多，只是心理層面會覺得這種東西你應該更嚴格的把關，被報導出來後……它是低於數值，但我們怎麼會覺得放心呢？（受訪者 L8）
>
> 族人都知道核廢料這三個字是一種會傷害人體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看不到也聞不到，它是無形的，它所產生的危害，是一種很恐怖的事情。核廢料的影響是相當深、相當全面的。（受訪者 L5）

對當地居民來說，核廢料造成的影響是全面性的：身體的疾病和心理、精神與社會文化上的衝擊乃是交互影響的，官方風險評估並無法回應當地居民的風險認知和情境特殊性。媒體對於放射性物質外洩的報導，造成族人社會心理上的衝擊：

> 蘭嶼他是一個少數民族，我們講健康是指生理、心理、社會這三個，生理就是我們會不會得病？他很焦慮，然後晚上睡不著，可是他心跳跟血壓都正常。另外問題是，小孩子不敢嫁人或人家娶到就說你們那邊有廢料，這三個層面都不健康嘛。……這牽涉到低劑量輻射，尤其是核廢料貯存場，中、低階核廢料貯存場產生的低劑量的輻射的影響，這整個鏈就蠻難釐清的，以過去事件我們多次有證據說明異常的外洩，但核廢料貯存場沒有任何要搬遷的打算，那我想這三個心理、生理、社會三個層面，大概很難得到平安、健康的概念。即使輻射量可能只有一點點。（受訪者 E1）

核廢料貯存回饋金政策以貯存桶數量為計算基礎，部落間對於回饋金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如何分配使用有不同的看法。少數在貯存場工作的部落族人，不反對核廢料貯存場，認為貯存場遷移會影響原本在貯存場工作族人的工作機會。族人間彼此立場上的對立，也衝擊傳統部落人際關係和文化：

airiti

尤其是核廢料這個東西背後的誘因出來的時候，會使……民族性的思維變質……像以前傳統的、人與人互助的精神會被慢慢侵蝕。（受訪者 L8）

以上顯示目前管制科學（regulatory science）的侷限性。國外環境正義運動和原住民參與社區環境監測的案例顯示鑲嵌於原住民信仰文化的豐富知識型態，能夠在環境污染爭議中提供建設性意見，進而弭平知識的缺口、促成科學的改善或減害。換言之，原住民知識在面對外來專家時，具有點出「應做卻未做的科學」在哪個領域或層面「未做」的能力。在 2012 年蘭嶼野溪整治工程的爭議中，反對政府水泥化整治工程的達悟族人實際勘查整治工程如何破壞溪邊護岸的原生植被以及固床工如何威脅魚蝦的生存、引用既有研究報告強調蘭嶼物種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並在說明會上向工程單位說明族人的風險觀和蘭嶼的傳統工法，迫使主管單位暫緩東清村的整治工程（范玫芳、張簡妙琳，2016）。達悟族人的社會文化生活跟所居住的蘭嶼島上自然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性和連結性，尤其河流與水具有傳統文化意涵和重要功能。主流的風險評估未能納入族人特殊的生活型態以及潛在的危害暴露管道，例如捕魚、潮間帶撿拾貝類、農耕和使用地下水的方式和食物來源。當危害物質污染了水、土壤、空氣和植物等，污染物會經由飲食、接觸、吸入等多重途徑最後累積在人體。當前管制監測標準和科學運用未能涵括達悟族人對於風險的不同詮釋，有必要進一步瞭解當地族人的環境觀、健康觀和身體觀等，並結合當地原住民知識改善既有風險評估的不足，進而找尋健康促進的行動計畫。

肆、多重環境不正義的交互作用

蘭嶼核廢料爭議除了凸顯達悟族人所承擔環境風險的分配不公平，同時也牽涉文化差異缺乏肯認以及程序和參與面向的環境不正義。缺乏對文化尊重與肯認與被排除在政策制定過程密切關聯，往往帶來不正義的分配結果 (Schlosberg, 2007)。研究指出在核電工作的員工承受高於一般人接觸的輻射風險，這些核電廠的勞工通常處於社會經濟的弱勢地位，成為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勞工不僅賠上健康的代價，甚至可能誘發輻射相關的基因不穩定性（genomic instability）而影響到後代子孫的健康。儘管此些勞工可能被告知輻射暴露的風險，但他們可能因生計考量被迫去接受高風險的工作 (Shrader-Frechette, 2012: 135)。對於檢整作

airiti

業引發的爭議，有蘭嶼居民認為台電將風險資訊隱匿，間接影響工人防護作業的警覺性，台電管理上的疏失造成工人暴露在輻射危險中：

> 是台電的教育訓練不夠確實，不然可能是不想透露立即性危害的事情給工作的作業人員，若是知道有立即性危害的話，怕會有更反抗的聲音。（受訪者 L1）
>
> 台電的委託廠商管理上一個非常大的疏失。工人要去濠溝工作的時候，基本要穿戴好防護衣及配戴輻射偵測器。若到了濠溝下面後輻射偵測器叫，就表示這輻射劑量達標，工人原應該要上去休息、換其他的人。問題是根據在那邊工作過的工人，有的人未把輻射偵測器帶至濠溝內。根本就不知道接收的輻射劑量到底是多少？所以很多人就是身體有產生一些狀況，甚至發生沒有穿防護衣下去工作，這個部分就是廠商為了節省人力及經費支出，在應該要輪替的時候不換人，還是用同一批人去那邊工作，所以造成工作的工人曝露在過高的一個輻射值下面，對身體就有傷害。（受訪者 L5）。

有學者專家和居民指出台電輕忽低估檢整作業的風險，質疑防護資源分配不足，認為官方和台電在蘭嶼貯存場的監督和管理比不上本島核電廠管制的嚴謹：

> 我覺得台電是草率，他可能低估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工程發包說不定也砍價……聽說包的是臺灣的公司，就找了一些人，但這些人也沒有 codify（系統化的分類管理），那邊很熱，整個衛生條件不是很好，做的時候就很容易出問題。（受訪者 E1）
>
> 在整檢過程裡頭的一些汙泥，或是混雜的一些東西，連工作人員也都沒有戴整個防護，在蘭嶼的整個核廢料的安檢並沒有像核一、核二廠用的那麼嚴謹，因為它這是一個臨時的處置廠，所以基本上那種整個編列預算的配置上的器材，沒有那麼多安全考量的處理。（受訪者 L6）

從事檢整作業的工人，多半處於經濟上弱勢，當有人不幸罹患疾病後，家庭更陷入經濟上的困境。部落地方組織正持續關注整檢作業工人所承擔不公平的健康風險和傷害：

airiti

我的一個學生家長，年紀比我還要小，他曾經就是參加過這個檢整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檢整工作時間是多少，應該是超過一年以上。他今年年初就被發現罹患血癌。血癌是長期曝露在有輻射下會得到的一個病。所以到現在，他雖然換了骨髓，但是到後面到 6 月時，他已經住到安寧病房。這是一個案例，曾經做過這一些檢整工作的這些人，他後面的身體狀況到底有沒有人去關心他？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去關心這將近一百多個人到兩百個人的身體健康，沒有人去照顧，所以在這個部分，媒體報導的是確實的，那是真實的。其實我們一直在觀察這群人，他到後來、他們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我們會持續去追蹤。（受訪者 L5）

目前蘭嶼回饋金的利用主要由蘭嶼鄉公所提出經費計畫，並送回饋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張存薇，2009 年 6 月 27 日）。回饋金傾向用以補貼族人生活所需與公共建設，卻未有充裕的經費使用在居民健康風險的長期評估與調查研究，以及環境輻射檢測以及環境問題的改善。整檢作業造成放射性物質釋出，專家學者質疑缺乏課責性，而達悟族人和地方組織也表示台電應該要負起責任，並在事後採取改善環境污染的補救措施：

民眾會有疑慮這樣的事情都沒有人負責，那下一件更大的事情我要相信誰？人力是無法監督到台電檢整的，處分也只有開罰單，民眾就無法相信這個體制能為他們爭求權益。他們找永樂公司來做維修，後來因時程的延宕要趕工，原能會是說因為永樂公司的經驗不夠，這麼重大的事情，在發標的時候你找一個經驗不夠的人來做，但我們大眾都不知道也沒有說話的權利的時候，那要民眾接受是微量釋出的結果，那心態上是否能夠接受？（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P2）

台電沒有盡到監督的一個責任，他要做這個工程的時候，他沒有去監督他委託的廠商，其實他們在作業的時候，東北季風很大，會把一些粉塵就往外吹。所以會在朗島這比較高的那個一些輻射塵，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在檢整過程當中因為作業的疏忽，讓這些核種外洩，其實台電應該要負責去做除污的工作。（受訪者 L5）

達悟族核廢料整檢作業臨時工的健康權益受限於政治動員權力和資源而被

airiti

整個結構系統性地忽略。體制若不能尊重部落價值並真實地承認部落特殊處境，則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的概念是無法整合到法律、政策與方案中。部落的處境特殊性（situational particularity）係指部落文化的差異、殖民經驗、治理能力以及政治地位，亦即部落的主權和早先於殖民政權的生活模式（lifeways）。肯認面向的正義需要管制政策和措施將受影響群體的文化、價值和處境納入 (Whyte, 2011: 200)。既有研究印地安部落環境正義問題的文獻發現，標準化的環境正義指標無法一體適用在印地安部落。部落健康概念難以概念化操作，不同部落族人之間文化的差異、生活以及自我認同方式的不同，也使得研究途徑難以直接適用。印地安部落的環境正義研究不斷地挑戰傳統西方概念對於科學和健康的定義，並主張將其差異反映在政策制定與管制標準上。部落主權和自治地位的確立使得美國原住民部落能在其領土上建立其環境管制規定。以 Pueblo of Isleta 部落為例，基於主權運作和考量部落族人在日常飲用乾淨的水質以及文化儀式的用水需求，而訂定比新墨西哥州政府更嚴格的水質標準（water quality standards，簡稱 WQS）。儘管州政府考量到該部落位於水源下游而提出州對下游的水質管制標準，但部落仍認為這不足以回應部落的關切問題和需要，美國環保署必須履行部落所訂定管制標準的執法 (Vickery & Hunter, 2016: 40)。美國印地安部落長期遭受到諸多環境不正義問題，經過部落間長久抗爭迫使聯邦政府將印地安部落的環境正義定位為聯邦的信任責任（federal trust duty），讓印地安政府和部落居民有對等的權力和美國環保署就污染問題和健康風險進行談判和協商，而非一味地由環保署主導。環保署與印地安部落以政府對政府的基礎上談判，達成污染整治的協議共同合作進行環境不正義的矯治 (Zaferatos, 2006)。印地安部落在環境正義的奮戰經驗以及聯邦政府肯認部落自決，以及在環境管理和標準制定的主體化過程，值得國內進一步的深究。

伍、環境監測的科學爭議

STS 研究領域認為科學與技術是社會性的活動，換言之，社會、意識形態與各種價值並非在科學與技術之外，而是蘊含在其本身。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 SSK）研究取徑認為科學知識並非單純地反映自然或是客觀存在，社會文化因素諸如利益、權力和意識型態不僅會影響科學家的活動，且是科學知識生產過程的決定性因素。科學乃是社會與制度性建構的過程，「事實」是在特定脈絡與情境所建構（Sismondo, 2004 ／林宗德譯，2007）。以

airiti

下將探討環境檢測的爭議、民間團體如何挑戰官方科學實作以及彼此相互抗辯的過程。

一、檢測數據與科學知識可信度

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並非「顯而易見」地被感知，反核廢運動轉向主動尋求科學證據支撐。正如 Yearley (1992) 所言：環境運動具有一種特殊的矛盾情結，環運人士須仰賴科學證據支撐其論述的正當性，但另一方面，環運人士也必須對科學權威甚至是科學推論提高警覺。即便科學事實確立，其所代表的意涵不見得能獲得一致共識；既然科學事實只是暫時性的事實，連帶地「觀察」也並非是毫無疑問的。科學知識的證成更會受到各自判斷和詮釋所影響。

反核廢團體主動進行環境輻射檢測，並質疑官方測出的數值遠低於民間測出的數值。監測數值爭議實際上牽涉到測量點的選定、如何檢測、如何取樣等（受訪者 E2）。擔任民間團體顧問的核工專家質疑官方公布的檢測數據為何在有核能設施的地方檢測出的輻射值都偏低，其中背景輻射值最低的依序是蘭嶼、石門和金山，認為官方將檢測儀器設在距離貯存場過遠的距離而影響檢測結果：

> 把偵測儀擺在 11.5 公里外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管國家訂的有多嚴格那就是政策，政府說蘭嶼的背景輻射值是全國最低的，但在座的各位有人相信嗎？（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A1）
>
> 量測方法的問題，就像空汙跟水汙一樣，要從那裡去做檢測？如果在廢水前端做量測，那一定超毒，所以這本身就有很多爭議性，民間跟政府的絕對都對不起來，因為是量測點的問題。（專家焦點座談，與會者 P1）

除了測量點的選定，不同的檢測和取樣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測量結果。蘭嶼反核廢組織和反核團體曾尋求國外環保團體援助進行檢測，在 1990 年代末期在貯存場廢水排放口附近測出人工核種，引起民眾質疑蘭嶼低放貯存場是否混雜了中高階放射性廢料：

> 所謂的用一個政府的標準來講，對民眾是不是會產生健康風險，我覺得太簡單了啦！在 1996 ~ 97 的時候吧，蘭嶼的郭建平去找國際綠

airiti

色和平組織來測量，測量真的有就有，一直到郭建平找出來，這樣才會進入一個討論，就是說：核廢料貯存場，外面的排放口的汙染，會不會造成蘭嶼居民的健康影響。（受訪者 E1）

鈷 60 這些不可以出來的，這是高階的廢料才有，所以他說對人體沒有影響那是一派胡言，他測到鈷、銫 139、銫 137，這些都是高階的輻射線耶，所以它放在這邊的很顯然不是低的……銫 137，好像就是超過這個數字。（受訪者 L2-1）

檢測數據和結果的不一致又牽涉到如何解釋科學數據和潛在的影響，環保團體以核電廠之前發現壁雕魚為例，指出官方和民間團體間對於核電廠排水口和淨水口設施造成的環境影響存在歧見，如何解讀污染又須顧慮到對當地漁業的衝擊：

在 1997、1993 年老前輩發現的秘雕魚，地方還送去廣島的研究室做檢測，確實有啊！銫 137，確實有那個東西鈷 60。但官方版說不是、他說是因為熱水，所以魚缺少維他命 C，我們沒有餵水果，所以秘雕魚，很多問題、那一種、其實都還在辯論中。當然擁核的一直在說沒有證據，我們就一直在找有證據啊！我其實不太願意談污染，因為就居民立場談污染是不是地方漁民不用生存，誰要來這邊吃？後來我們著重淨水口吸魚事件，把魚卵吸進去、甚至在 2001 年 7 月分我們發覺 5 分鐘吸進去 40 公斤的魚，他們（台電）再去山上挖壕溝掩埋、都有證據啊，我們偷偷去跟拍。進水口對生態的破壞比排水還要嚴重。但是排水不是溫度高就沒事了，我們也有一個朋友他潛水下去看，出水口的那個都是蛤蠣的墳場。珊瑚都死光。（受訪者 NGO1）

面對民間檢測和官方數據的落差，台電則質疑民間儀器是否符合。民間團體認為政府打壓民間說法，日本學者同樣也檢測出人工核種（受訪者 L6）。同樣的儀器，但測出來的結果就是偏高，應該要社會大眾一個合理的理由（專家諮詢會議，與會者 NGO2）。民間團體進一步質疑管制單位與台電和研究單位間形成複雜的共生網絡（專家諮詢會議，與會者 NGO2），而組織利益混雜的文化弱化了科學知識生產的可信度：

講該說的話，那他們退休了通通到這些地方，尤其是民營電廠當

airiti

董事長、總經理，那待遇當然是台電兩、三倍。那官員像原能會、原能所，他們退休都到台電支持的核能資訊學會啊，你上網一查，董事長是誰？他原來是原能會當過主委。也很多這個台電投資的、或者台電捐助的所以你聽話，就一路一直幹，而且那個沒有年齡限制，你可以幹到七十歲、八十歲都沒人理你，這就形成整個核電文化……像核研所有拿台電的研究經費，在做核能的評估都是核研所在跑，還有清華大學，怎麼會公正？（受訪者 E2）

在官方與民間團體的檢測論戰中，又衍生出公正第三方如何產生以及其監測結果如何能獲得認可的政治問題：

A1：我們都有去做監測，蘭嶼每一小時有 3.92 毫西弗，1 毫西弗是 1,000 個微西弗，他（官方）公告的是 0.043 微西弗。

G1：你自己測的也不能算數，我們現在最好的做法是同一個地方取樣取 3 份，政府分析一份、民間團體一份，如果中間兩者有不一樣，就把第 3 份送國外分析。

A1：我們把樣本送到日本做檢測，結果外交部去函抗議日本干涉內政。（摘錄自專家焦點座談）

以上顯示科學不純粹是事實性知識，同時具有政治性。Yearley (1992) 認為科學專業和科學實作從來就不是無私利性的（disinterested）。在環境運動過程中，科學事實、科學證據和論證被當成一種大眾組織動員的「資源」，科學證據的提出和援引形成一種攻防對抗，如何導向正面的協商以及信任關係的重建則是重要的課題。

二、科學管制標準的變動性和灰色地帶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途徑將科學知識視為是有限性與暫時性的。科學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ness）可以指「缺乏知識」、「不知道事實」、「（證據）不能提供或證明合理性」、「經驗現象的易誤性」、「有限的可觀察性」等 (Yearley, 1992: 518)。儘管官方強調符合標準，但民間團體認為核廢料對環境與健康影響是無法用一次性的標準來判斷。核輻射標準值的訂定有特定時空背景，管制標準乃是片斷且變動的：

airiti

標準是人訂的，標準在制定的時候，有它的時空背景發展，原能會定的標準，要看過去歷史，以前臺灣有核能作業 30 幾年，最主要的就是核能電廠，後來有廢棄物、環境的輻射暴露的汙染情形，所以這個標準也會隨著時間而演進，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但他不會是同步的，有些人會快、有些人會晚一點。（受訪者 E1）

學者專家指出臺灣的管制標準遠落後國際的參考標準值，需要檢討標準值如何訂定以及所依據的標準為何的問題：

原能會的標準都落後 10 幾年……。國際專業團體訂下來的當然比較可靠，國際訂的標準牽涉到我們的敏感度跟需求度，因為我們是核能密集的國家，在國際標準上應該及早要有一些應對。國內所謂環境輻射防護的法規至目前來講都還遠遠落後國際的參考標準值。因此，某些政府單位他所講的標準，應要懷疑他確認是國際標準，還是自己訂的標準。（受訪者 E1）

國際上有國家將核廢料區分為高階、中階和低階放射性廢棄物三類，我國僅區分為高階和低階放射性廢棄物。核廢料科學定義上存在灰色地帶，產生核廢料經過不同科學實作的處置後如何歸類以及如何管制的模糊空間：

所謂低放射線的定義是什麼有沒有混那個輻射流出來的水、那個抹布？那個抹布你去擦了、拖把擦了，那個水是低放嗎？不見得。像那個三個核電廠的燃料池漏得蠻嚴重的，甚至監察院還提出糾正喔，水漏出了，他那個水漏出的輻射線很高。還有發生空輻，那地面有集塵灰，有一次核一廠一公分的灰在地面，那件事情都有披露出來。那麼厚的一層灰一定是抹布去擦、拖把去擦的嘛。擦完以後那拖把，裡面到底低放還是中階。國外是分成高中低。就是這個界線很難分，高就直接指核燃料，中就是指那個銅管，是指那些設備器具。那低是指衣服帽子口罩。但那個水怎麼算？那個水其實很嚴重、滲水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漏，雖然有用杯子、桶子去收集，可是並沒有說收集以後怎麼弄？像現在不是燒核廢料嗎？一燒那裡面那個渣，像聚寶盆一樣是濃縮的，那到底是叫中還是叫低？（受訪者 E2）

airiti

即使環境運動者是科學家或與科學家結盟，也會面臨許多「務實上的不確定性」（pragmatic uncertainty），當團體與團體間進行科學事實與論證的競爭，涉及對特定事實的證明與需要時，表面健全的科學知識也會成為不確定的來源 (Yearley, 1992)。民間反核廢核工專家對於核廢料分類與管制標準的疑問，挑戰了所謂科學權威，既有的國際標準是否適用於蘭嶼的特殊處境有待商榷，需要行動者持續揭開核廢料科學與技術的黑盒子。

陸、由上而下的參與困境

科技風險溝通為風險分析的重要環節，同時涵蓋以下三個論辯層次：第一、實際證據與科學發現；第二、個人與體制的判斷以及過去相關經驗；第三、個人的價值與生活方式。第一個層次的辯論焦點並不限於科學技術的考量，往往轉移到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以及該計畫或解決方案的社會與經濟面之妥適性。涉及價值信念與世界觀的爭論，必須藉由開放性的對話並邀請民眾參與決策過程，以尋求或建立在風險管理上的共享意義或共同立足點 (Renn & Levine, 1991)。針對科技爭議涉及價值的衝突，溝通與協商是達成環境議題的共識與制定永續發展決策的要素 (Drevenšek, 2005: 71-72)。族人在核廢料管制政策上的參與仍受限於由上而下的協商平臺和被動地受邀在環境監測。在福島核災後新一波的反核運動中，蘭嶼反核廢料組織與北海岸和其他反核團體結盟，形成「四地核廢災民」共同向政府抗爭。2013 年 4 月核廢災民於行政院與院長江宜樺會談，促成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置協商平臺，在 2013 年的 7 月 29 日由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召開的第一次協商會議。民間行動促使政府首次將核廢料議題提升到行政院跨部會協商層級，每三個月召開會議。然而，反核廢團體對政府回應不滿，退出協商平臺，促使政府檢討現有核廢處置政策的缺失，採納反核廢組織的意見，規劃以行政法人成立專責機構，推動核廢處置相關業務（受訪者 L5）[3]。在「四地核廢災民」協商平臺的參與管道中，不易呈現出蘭嶼達悟族人的處境特殊性，而弱化了族人傳統文化和原住民知識在制度和知識生產上的建設性角色。

輻射外洩事件後原能會物管局在蘭嶼推動環境平行監測作業，強調「落實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及第三者驗證取樣偵測分析」，邀請蘭嶼當地民眾、民間團體及地方政府相關代表，會同進行蘭嶼各村落環境取樣及輻射偵測作業。原能會指

3 目前行政院提出的「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已送入立院審議，但版本內容仍引起不少民間團體質疑。詳見全國廢核行動平臺（2015 年 5 月 1 日）。

airiti

出：在「每個部落進行偵測及取樣作業前，除先向參與者說明輻射偵測儀器之使用及採樣方式外，均由各村落村長或參與民眾指定其輻射偵測及取樣地點」。同時強調「以校驗合格之輻射偵測儀器進行量測」、各項採樣分析工作委由經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並核發證書之實驗室—國立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執行，對外公布各部落的環境偵測並未發現有輻射異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3 年 10 月 2 日）。

但官方推動的環境平行監測作業，仍未能取信於蘭嶼地方反核廢組織，受訪的族人質疑第三者驗證機構的獨立與公正性：

> 其實環境偵測是定點，其實到後面也會有一種作法就是平行監測。就是他們請我們當地的居民或者是民意代表跟著他們去採取一些物件，就是採取蘭嶼的農作物，或者是土壤，然後去運送到臺灣的實驗室。至於他們送到什麼實驗室，我們不知道。我們希望的是能夠由第三方那個實驗室跟台電、跟經濟部沒有關係的。但是臺灣核能這一塊的圈子太小，都有一些師生的關係。一直以來他們說的數據都是說安全、安全。我們就會不太信任。其實你看日本人一來，有一些比較跟政府比較沒有關係的人來測，用他們的儀器去測，就會測到一些不一樣的數據，我們當地人起一些疑心，為什麼這些人測得到數據永遠都是安全的。（受訪者 L5）

政府所強調的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的概念顯然跟族人對於民主參與的想像，以及安全家園的需求有很大的落差。原民在制度和機制的參與上自主性不高乃是重要的問題。當前居民在一種由上而下執行的機制過程中一直還是處於被通知、告知、被動參與的角色，政府宣稱資訊公開且邀請居民參與，但真正的參與式環境監測是從在地出發。根據 2015 年修正通過後的原住民基本法第二法規定，為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發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族部落會議具備公法人的地位，賦予部落集體在法律上的權利。條文中所謂原住民族的同意或參與概念，在風險評估和管制標準設定上如何實踐，正是部落關注的議題。不少主張回到部落會議去決定部落公共事務，但以最近的屏東三地門反濫挖祖靈墓遷葬事件[4]為例，儘管行政程序上部落會議同意，但被族人質議資訊不透明公開、缺乏尊重和

4 該事件詳細報導請見林倩如（2016 年 1 月 14 日）。

airiti

充分溝通、部落文化遭剝奪和違反程序正義。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權利下放至部落會議，開發單位甚至是公部門可能持漢民族文化霸權或科學主義至上主義而否認傳統文化觀，或還是採取一些方式引導居民因應問題，這引發到底什麼樣的參與機制才適切的問題。

參與主動性則來自於人及地方能動性的脈絡，而能動性的產生脈絡，不同族群及部落皆有差異，一種是從部落內部，另一種則是從部落外部去組織並建立參與機制。以宜蘭縣寒溪部落的水源頭被侵占的問題為例，長久以來部落原有的水源頭被公部門強行使用，過程卻沒告知部落。部落青年注意到此議題，聯合耆老組織行動，這樣的組織行動一直延續至今，延伸關注到鄉公所農地灌溉水設計不良，導致部落村民用水分配不均，由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崗給協會）主動一戶一戶調查部落用水需求，召開用水戶大會並選出委員參與，每次會議皆邀請鄉公所出席或呈會議紀錄至公所。在 2016 年 1 月 8 日第四次寒溪巷灌溉水保育管理委員會指出：第五次會議務必請鄉長來參與，並要求灌溉水管線的施工設計人員同來與用水戶一同討論如何設計更適切的灌溉水管線。而宜蘭寒溪部落在另一個長期照護議題上參與的主動性更為強烈。2015 年三讀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涉及到原鄉老人照顧的問題，崗給協會在 2014 年開始辦理論壇活動邀請地方長照工作者及專家學者參與，並在 2014 年 10 月與專家學者、原住民青年、長照工作者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修法聯盟」，希望在長期照顧政策裡面被能夠有原住民參與的聲音。崗給協會除了主動籌組及參與外部修法聯盟的行動之外，更與大同鄉其他部落在從事照顧工作的在地組織，共同發起大同鄉長期照顧委員會，試圖讓由部落組成的委員會在未來地方的長照資源分配及服務上能發揮重要的諮詢及參與的功能。

以上寒溪部落的經驗顯示參與機制的設計上，不是制式的由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納入村民或徒具形式的部落會議參與，而是賦權（empower）地方讓長期運作且具能量的在地組織居於更重要的參與位置，才能慢慢捲動整個部落的參與，而這過程牽涉到如何引發在地的能動性，並非每個原住民部落或組織都具備這樣的主動性，需要創造條件及脈絡，但值得注意的是具能量且主動性的組織，通常是有部落青年參與並策劃行動。黃淑鈴（2015：39）指出蘭嶼反核廢料運動從「反殖民」的論述轉向「愛蘭嶼」的論述，從負面的抵抗轉為積極的行動，以往傳統上各自為政的六個部落逐漸形成一個社區的概念，並取得主體性，其中的原因也包括蘭恩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社區營造、蘭嶼居家關懷協會投入在居家醫療照顧。未來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風險治理可以朝向社區參與式的環境監測。但要

airiti

達到部落全體主動參與則是理想的狀況，需要奠基於長期的草根組織工作。擴大參與主動性乃是透過地方團體跟青年團體共同組織，外部組織則是扮演協力的單位，例如輻射知識和監測出來的結果分析，對族人來說是難以親近的，環保團體可以扮演語言轉譯的角色或致力於地方環境監測人才的培育[5]。

柒、結論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爭議凸顯風險資訊與知識的鴻溝以及居民承受多重不公平的交錯，既有輻射監測與官方論述呈現窄化的風險評估，未能涵蓋全觀的健康和福祉概念。當地族人的風險認知、論述與觀點根植於達悟民族特有的社會生活差異，呈現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y）。在福島核災以及檢整作業引發輻射外洩爭議後，蘭嶼居民更加積極採取多樣形式的反抗核廢料行動，向外界表達其訴求和價值主張。年輕一代的蘭嶼達悟族人透過網路與媒體傳遞核廢資訊與反核活動，表達其心聲與訴求。蘭嶼部落不同世代的反核行動者與北海岸反核居民、主要反核團體、跨領域的反核科學家以及福島核災後投身於反核行動的核工專家合作，形成新的異質性反核聯盟，透過共同的行動，強化反核陣營的凝聚力。反核聯盟質疑官方的輻射管制標準與監測方法並挑戰官方科學的可信度，也反映了民間對核能管制文化的不信任。

針對不同的文化群體各自擁有非常不同象徵系統，存在著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ility）時，如何處理溝通問題？ Collins, Evans, & Gorman (2007) 指出人類學家發現即便在巨大的差異存在時，兩個群體看似缺乏明顯的互動而可能無法穿越彼此，但兩個群體可以互相同意交換的規則，即使他們對所交換的物體歸諸於完全不同的意義，他們也可能不同意交易的過程的意義。交易的雙方可以設計出一種「局部協調」（local coordination）。當社群間存在很深的溝通上問題時，彼此之間持續的互動，透過某些混雜的語言，例如洋逕濱語（pidgin）來橋接不同領域的專門術語（jargons），而發生了信念與行動的在地協調，此一象徵性和空間性的動態互動地點（locations），被稱為「交易圈」（trading zone）。交易圈的概念提供了跨學科的合作和信念與行動的協調之理論基礎。「交易圈」的形成或新的跨領域工作乃奠基於「互動型的專業知識」（interactional expertise）。以愛滋感染者團體行動為例，行動者習得醫療的語言，提出論述挑

5 感謝崗給協會總幹事宋聖君提供寒溪部落地方參與經驗和寶貴意見。

airiti

戰既有實驗設計與規則的不適切，引起科學家與研究者的關注，進而與統計學者結盟，開展跨領域的合作關係，對愛滋病的科學研究提供具「貢獻性的專業知識」（contributory expertise）。不同文化價值群體的交易圈形成，除了群體中有成員獲得其他群體世界的「互動型的專業知識」，或可透過第三方來協調，而第三方需同時具備接近於兩個群體各自語言的能力和兩群體進行對話。

反核廢料運動展現跨領域與跨文化的持續互動和學習過程。反核立場的核工專家擔任環保團體的顧問，在反核行動中過程中有關科學爭議釐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具有「貢獻性的專業知識」。而長期從事輻射健康風險評估的專家，在投身於研究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與核工領域的專家對話與互動，經常被質疑：「你不是做我們這一行的，然後你怎麼懂我們做的呢？」，為了「瞭解他們在講甚麼話」，因此開始學習累積核工專業知識：「我們也要從他們那邊學，為什麼他們的看法會不一樣？也就是說工具不太一樣，像我就是學生物醫學，他們是學物理的，但是我也要知道他們在想甚麼？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在想甚麼，為什麼我們的價值體系不一樣？是來自於我們依據的東西是不同」（受訪者 E1）。輻射健康風險評估的民間專家，不僅具備醫療專業並習得核工領域的專業知識，嘗試透過蘭嶼部落組織與族人對話並學習「互動型的專業知識」。輻射健康風險評估的民間專家基於過去在蘭嶼執行研究經驗，試圖理解族人所說的負面影響，進一步將居民陳述的直接的感官經驗，轉化成醫療健康專業領域的術語。目前正嘗試在科學研究進行過程建立與蘭嶼居民的合作與和信任關係，試圖「解決族人所面對的不確定因素」（受訪者 E1）。陳政亮（2011）提出「公民／科學的運動聯盟」的策略，鼓吹科學研究者與受害者合作，在研究中帶入受害者的身體經驗和其身上所銘刻的社會經濟歷史，從而「重新調整其理論、假說、統計方法、收集資料與推論的方式」，將有助於形塑出新的政治／知識形式並處理「應做卻未做的科學」。在不同價值體系下，並沒有所謂最佳的組成跨領域和跨文化合作之方式，需要長時間和心力投入，並在過程中保有彈性，尋求彼此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面對蘭嶼核廢料處置的高度複雜性，顯示出科學知識的侷限，仍有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科學和社會不再是可以清楚切割，而是相互滲透和共同演化的 (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處於當代社會科學和研究的動態性，知識生產乃基於應用的脈絡，具跨科技性、高度異質性並擴大利害關係人參與評估知識的品質 (Gibbon, Limoges, Nowotny, Schwartzman, Scott, & Trow, 1994)。長期以來原住民部落的真正需求跟聲音缺乏一個機制被納入公共決策中。當前民間參與仍面臨核能權力結構和封閉的專家體系之限制。儘管官方在環境監測採平行監測，

airiti

但主導性的作法與可信度仍受到族人質疑；政府成立的核廢料處置協商平臺，仍屬於諮詢性質，呈現「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和參與困境。國際上社區環境監測科學的推動和參與式的社區研究之實作經驗值得學習，將有助於賦權在地居民和能力（capacity）的建立，透過不斷地互動與協商的過程，產生具「社會厚實性的知識」（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Nowotny et al., 2001)。而 Moore (2006) 認為值得思考的是參與式科學（participatory science）畢竟仍須仰賴專業者的執行，儘管科學可能真的能幫助地方居民，但參與者大多數還是處在知識的下游和被幫助者的角色，或對特定環境議題運動者來說，「是否該進入科學研究」本身便構成行動策略上的問題。

本研究呈現既有管制科學與監測標準與達悟族人風險詮釋之間的落差，並指出目前管制科學知侷限，以及「未做」的科學研究應做的必要性。環境正義的實踐奠基在資訊公開透明、地方參與和課責性。在面對科學證據不充分和諸多不確定性，核廢料風險治理體系有必要納入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建立完善的風險分析機制，並研析如何具體應用在輻射安全管制。制度變革的推動必須賦權地方族人在風險評估的科學知識產製和核廢料風險治理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透過由下而上途徑和局部協調，整合原住民知識和在地科學論述，並重構蘭嶼族人的環境健康風險與福祉。本研究關注蘭嶼達悟族不同世代反核廢行動者的風險詮釋和反核廢論述聯盟，未能剖析蘭嶼島上族人間對核廢料風險感知和論述的異質性和動態性，以及當時雇用在核廢料貯存場從事檢整作業的達悟族臨時工的風險觀和身體感，未來需要更多跨領域合作投入在原住民面臨的環境和科技爭議之風險溝通、治理與參與式研究，以及原住民環境正義的政策和法制面研究，並發展兼顧文化理性和公平性的解決途徑。

參考書目

王嵩音（1998）。〈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為例〉，《臺大新聞論壇》，5：111-136。

全國廢核行動平臺（2015 年 5 月 1 日）。〈除役未決　核廢何解　找不到病灶的核廢立法〉，《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2302

江宏哲（2015）。〈蘭嶼低階核廢料對居民長期健康與安全評估及健康流行病學之先驅研究〉。（衛生福利部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計畫）。臺北：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airiti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3 年 10 月 2 日）。〈102 年度蘭嶼民眾參與環境平行監測作業〉。取自 http://www.aec.gov.tw/newsdetail/headline/2999.html

余鎮宏（2007）。《從環境正義觀點探究「台電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鄰避困境與疏解》。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宗德譯（2007）。《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臺北，臺灣：群學。（原書 Sismondo, S.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xford, UK: Blackwell.）

林倩如（2016 年 1 月 14 日）。〈屏東三地門公所濫挖祖靈墳　原民疾呼立即停工！〉，《環境資訊中心電子報》。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112740

林詩嵐、簡毓群（導演），蘭嶼青年行動聯盟（製作）（2012）。〈吶喊——蘭嶼 220 反核廢記事〉【影片】。取自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149&Itemid=57

紀駿傑（2006）。〈環境正義〉，生物多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推動辦公室（編），《生物多樣性：社會經濟篇》，頁 25-40。臺北，臺灣：教育部顧問室。

范玫芳（2014）〈風險管制與程序正義：風力發電機設置爭議〉，《民主與治理》，1（2）：59-81。

———（2012）。〈從環境正義觀點探討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計畫〉，《臺灣政治學刊》，16（2）：117-173。

范玫芳、張簡妙琳（2016）。〈環境治理與原住民知識：蘭嶼野溪整治爭議〉，周桂田（編），《永續與綠色治理新論》，頁 87-122。臺北，臺灣：韋伯。

孫窮理（2012 年 2 月 24 日）。〈【國境邊陲】趕工的實驗：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與檢整〉，《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6745

張存薇（2009 年 6 月 27 日）。〈蘭嶼核廢回饋金　每人 4 萬 8 千元〉，《自由時報》。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27/today-south3.htm

郭良文（2010）。〈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43-74。

陳政亮（2011）。〈流行病學的政治：RCA 流行病學研究的後設分析〉，《科技醫療與社會》，12：113-157。

壹電視（2012 年 10 月 25 日）。〈踢爆！蘭嶼核廢料儲存桶破裂！工人徒手挖〉。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T63HFeEo

黃之棟、黃瑞琪（2009）。〈正義的繼受：我們與美國人講的到底是不是同樣的

airiti

「環境正義」？〉，《國家發展研究》，9（1）：85-143。

黃淑鈴（2015）。〈從族群正義到環境論述：達悟反核廢運動者的框架移轉〉，《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53（2）：7-48。

劉力仁、林毅璋、張存薇（2011 年 11 月 29 日）。〈中研院研究員偵測報告證實／蘭嶼核廢貯存場　鈷 60 銫 137 外洩〉，《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42654

劉嘉偉、張玉佩（2012）。〈原住民與傳播科技：網路對於蘭嶼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動員與凝聚〉，《傳播管理學刊》，13（2）：1-25。

Burningham, K. (2000). Using the language of NIMBY: A topic for research, not an activity for researchers. *Local Environment*, *5*, 55-67.

Cohen, B., & Ottinger, G. (2011).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G. Ottinger & B. R. Cohen (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pp. 1-1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llins, H., Evans, R., & Gorman, M. (2007).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38*, 657-666.

Drevenšek, M. (2005). Negoti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In A. Dobson & A. V. Sáiz (Eds.), *Citizenship, environment, economy* (pp. 226-238). London, UK: Routledge.

Fan, M. F. (2009). Public perceptions and the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on Orchid Island, Taiwa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 167-176.

-- (2006).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nuclear waste conflicts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5*, 417-434.

Frickel, S., Gibbon, S., Howard, J., Kempner, J., Ottinger, G., & Hess, D. J. (2010). Undone science: Charting social movement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to research agenda setting.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5*, 444-473.

Gibbon,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UK: Sage.

Ho, M.-S. (2014). The fukushima effect: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3*(6), 965-983.

Ishiyama, N. (2003).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American Indian tribal sovereignty:

airiti

Case study of a land-use conflict in Skull Valley, Utah. *Antipode*, *35*, 119-139.

Jasanoff, S. (2010). Beyond calculation: A democratic response to risk. In A. Lakoff (Ed.), *Disaster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pp. 14-40).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J. R., & Ranco, D. J. (2011). Risk assessment and native Americans at the cultural crossroads: Making better science or redefining health? In G. Ottinger & B. R. Cohen (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pp. 179-19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idskog, R., Soneryd, L., & Uggla, Y. (Eds.). (2010). *Transboundary risk governance*. London, UK: Earthscan.

McClymont, K. (2008). "We're not NIMBYs!": Contrasting local protest groups with idealised conceptions of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Local Environment, 13*, 321-335.

Moore, K. (2006). Powered by the people: Scientific authority in participatory science. In S. Frickel & K. Moore (Eds.), *The 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 Institutions, networks, and power* (pp. 299-323).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Nowotny, H., Scott, P., & Gibbons, M. (2001). *Re-thinking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public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MA: Polity.

Ottinger, G. (2013). Changing knowledge, local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gaps: STS insights into procedural justice.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8*, 250-270.

Ottinger, G., & Cohen, B. (2012). Environmentally just transformations of expert cultures: Towar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renew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5*, 158-163.

Powell, M., Powell, J., Xiong, L. V., Moua, K., Schmitz, J., Olivas, B. J., et al. (2011). Invisible people, invisible risks: How scientific assessment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overlook minorities -- And how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an make them visible. In G. Ottinger & B. R. Cohen (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pp. 149-17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enn, O., & Levine, D. (1991). Credibility and trust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airiti

Kasperson & P. J. Stallen (Eds.), *Communicating risk to the public* (pp. 175-217).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Schlosberg, D. (2007). *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ies, movements and natu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 Reconcei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Glob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theorie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3*, 517-540.

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rader-Frechette, K. (2012). Nuclear catastrophe, disaster-relate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Fukushima, Japan: Prima-Facie Evidence for a Japanese "Katrina." *Environmental Justice*, *5*, 133-139.

Vickery, J., & Hunter, L. M. (2016). Native Americans: Where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search?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9*, 36-52.

Walker, G. (2010). Beyond distribution and proximity: Exploring the multiple spatialiti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R. B. Holifield, M. Porter, & G. P. Walker (Eds.), *Spac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pp. 24-46). Oxford, UK: Wiley.

Whyte, K. P. (2011). The Recognition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Indian country. *Environmental Justice*, *4*, 199-205.

Wynne, B. (1996).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In A. Irwin & B. Wynne (Eds.),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earley, S. (1992). Green ambivalence about science: Legal-r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scientific legitimation of a social move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511-532.

Zaferatos, N. C. (2006).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Indian country: Dumpsite remediation on the Swinomish Indian reserv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8*, 896-909.

airiti

附錄一：訪談名單

訪談對象	代碼	訪談日期	受訪者背景
北海岸反核組織代表	NGO1	2015 年 5 月 15 日	長期投入反核運動。
輻射防護與醫學專家	E1	2015 年 7 月 8 日	長期投入反核運動。
民間組織核工專家	E2	2015 年 5 月 14 日	曾任核能研究所，福島核災後投入反核行動。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1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當地人民宿長期打工換宿的臺灣人，多次參與過反核廢運動。
蘭嶼達悟族第一代反核廢人士／宗教組織領袖	L2-1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年長者、牧師，為早期第一代的反核廢料英雄人物之一。在當地有相當聲望，並曾多次擔任部落會議的主席。
蘭嶼達悟族第一代反核廢人士／宗教組織領袖	L2-2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年長者，為上述牧師的妻子（師母）。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3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蘭嶼生活 5 年的臺灣人，從商，立場上較不反對蘭嶼核廢貯存。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4	2015 年 7 月 14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並積極公開表達其與組織的立場。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中年人／在地反核廢 NGO 代表	L5	2015.07.16	達悟族中年人，目前於蘭嶼公家機關服務，並為在地主要反核廢 NGO 組織的代表。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 / 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6	2015 年 7 月 15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特色餐飲業，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並提供空間作為反核廢料以及其他社會議題之交流討論平臺。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7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蘭嶼生活 11 年的臺灣人，藝品店老闆，平時積極關注核廢料以及環保議題。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8	2015 年 7 月 13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並且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並積極公開表達其與其組織的立場。
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青年／在地反核廢 NGO 人士	L9	2015 年 7 月 13 日	達悟族青年，目前經營民宿以及休閒餐飲業；為在地青年反核 NGO 的核心人物之一，並且積極吸收思考關於核廢料的相關知識。同時與當地重要政治領袖有密切關係。
服務於核廢料場的蘭嶼達悟族中年人	L10	2015 年 7 月 14 日	達悟族中年人，在核廢料場上班，立場上較不反對核廢料的貯存。
在蘭嶼生活的臺灣人	L11	2015 年 7 月 15 日	在蘭嶼生活了 4 年的臺灣人，目前服務於蘭嶼公家機關。曾擔任某媒體就核廢料相關議題的獨立記者。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airiti

附錄二：「核廢料管制與監督機制專家焦點座談」與會名單

與談者	代碼
前原能會官員，現任職於核能研究所	G1
擔任民間組織顧問之核工專家	A1
環保 NGO 律師	NGO2
環保 NGO 研究員	NGO3
法律學者	P1
政策學者	P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2014 年 7 月 29 日）。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107-139, January 2017

Whose Risk? Whose Regulatory and Test Standards? The Controversy of Nuclear Waste on Orchid Island

Fan, Mei-Fa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News media have reported that a researcher detected cobalt 60 and cesium 137 near the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on Orchid Island in November 2011. This research combine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to explore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regulatory controversies related to nuclear waste, and how citizen action challenges official scientific claims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case highlights the risk knowledge gap,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injustices, and the problem of undone scienc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indigenous antinuclear waste activists on Orchid Island have collaborated with expert activists and antinuclear organizations to form hybrid antinuclear alliances. These groups took action to express their demands and challenged official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test methods. The complex interest network of nuclear regulator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s weakened the credibil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release of risk information. Institutional design must empower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to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nuclear waste governance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o seek a solution that is responsive to the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ationales and distributive equity.

Keywords: technology controversies, risk perception, nuclear waste,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 Email: mffan@ym.edu.tw
Received: 2015.10.30
Accepted: 2016.8.13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ei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141-180．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6

另一種「新聞攝影」？——以「洪仲丘事件」中 Facebook 粉絲頁為例，初探社群平臺之影像傳播 *

區國強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陳百齡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潘金谷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社群媒體是當代大眾媒體以外的重要影像傳播場域，但社群媒體上大量現場影像是否可能改變我們對「新聞攝影」的理解？本研究以 2013 年「洪仲丘事件」的臉書粉絲頁為例，擷取「讚」數最高的十幅影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與傳統新聞攝影強調「決定性瞬間」等邏輯相比，社群影像具有主觀參與特色，更是要喚起社群連結。本文提出社群影像可提供有別於大眾媒體的現場資訊，但新聞媒體要如何運用這些不一定以「新聞」為目的的影像也是挑戰。另外，粉絲頁管理者在影像傳播活動中扮演了從上而下發揮影響的角色。在多對多的連結中，也存

* 本研究承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102 年度社群影響力及決策輔助資訊分析計畫」（編號：103 年度資創約字第 0226 號）補助經費並提供臉書原始資料。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4 臺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2014 年 11 月 15 日，新竹：交通大學）。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以及研討會主持人洪貞玲教授和與會評審，以及《傳播研究與實踐》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另，本文亦曾於國立政治大學「數位人文」內部會議中發表與進行討論，感謝吳筱玫老師、劉慧雯老師、黃厚銘老師，與鄭宇君老師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寫作建議，一併致謝。

** Email: asheou@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9 月 24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在某些適合拍照和連結的情境。網路作為另一個資訊傳播場域是否真的更民主與多元，值得更多分析。

關鍵詞：新聞攝影、大眾的自我傳播、公民影像見證、社群媒體、臉書

壹、前言：另一種「新聞見證」？另一種「新聞攝影」？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之說法雖然經常會被質疑，但攝影（錄影）影像在新聞中扮演的重要見證角色，卻又總被強調（Wang, Lee, & Wang, 2013; Zelizer, 2007）。在當今媒體技術改變著「新聞」產製方式引起大量實務與學術研究者討論時，新聞攝影所受到的影響是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這或許可從圖 1 這張照片談起：

2013 年夏天，臺灣發生了「洪仲丘事件」，引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7 月 20 日遊行當天，社群媒體 Facebook 上出現了一張名標題／圖說為「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的照片，得到了超過二十多萬的按「讚」（like）數以及兩千多則的「留言」（comment）。以傳統「新聞攝影」之角度來看，這張看似隨意拍攝，構圖不精緻，不符「專業」標準的照片，若粗略地以電視收視調查機構 AC 尼爾森的公式來換算，其「收視率」達到 1 個百分點，也就相當於臺灣有線新聞臺重點時段（例如：晚上六點）「整點報導」的收視率數字了[1]。當然，這照片之拍攝與傳播目的似乎不是為了「新聞」，其圖說也非為了「報導」，但當學術研究者探問新媒體科技如何改變著「新聞」的樣貌時，類似「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的這種網路上大量流傳並描繪了某「現場」情境的影像，卻可能有值得探討的「新聞」內涵。在當今媒介技術情境中，能「目擊」並把「目擊」轉化為攝（錄）影影像的人已不再只有攝影記者：「一般人」（先不論他／她是新聞事件之參與者或「剛好」在場的人）也能以數位相機或智慧型手機拍下照（影）片，並能上傳網路，甚至可以即時傳播。Zelizer (2007) 提出，「見證」（eyewitness）是新聞學（journalism）的關鍵字。而本文所要探討的正是當新聞現場「見證者」與製作「新聞」影像者已不再局限於媒體記者時，「新聞攝影」是否會有新的樣貌？

Zelizer (2007) 論述「見證」和新聞學關係時，把西方新聞業發展分為不同

1 當然，如何將網路點閱率與電視收視率進行比較，可能是另一個研究題目了（其中，包括「讚」與「留言」應算作同一種點閱方式，或應該給予不同的權重？）。另，關於電視收視率調查之計算方式，可參考林照真（2009）。

airiti

的「見證」階段：「見證作為報導」（eyewitness as report）、「見證作為角色」（eyewitness as role）、「見證作為科技」（eyewitness as technology），以及新聞機構將「見證」外包（outsourced）給在場目擊者之階段。在「見證作為報導」，大約在 19 世紀，記者所描述的內容主要不是親身見證，而是把他人之見證（例如，旅人、商人、軍人，或探險家）寫成報導。到 19 世紀中期「見證作為角色」階段，記者開始被視為「報章之眼」（the eye of the paper），作為媒體代表親臨現場，把所見證的重要事實「生產出來、說出來、寫下來」（Dana, 1937，轉引自 Zelizer, 2007: 410）。在 20 世紀，隨著傳播科技發展（例如，攝影、電影、電報、傳真、電視、衛星技術等），「在場報導」（on-the-scene-reporting）發展為除了以「人眼」見證，還以媒介技術來進行；「現場」除了變成可被再次看見的攝（錄）影像，還甚至能即時傳輸，同步被看見。到當代，傳播技術門檻降低，更讓新聞見證不再被「專業」新聞記者壟斷，一般民眾或「業餘者」也能透過各

圖 1：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924522594764508459033292928183_507924522594764。

airiti

種家用攝影器材，參與新聞見證之生產[2]。Zelizer 提出，這是新聞機構把見證「外包」（outsourced）給民眾的新聞見證新方式（Zeilzer, 2007: 412-424）。本文認為，近年網路上傳播的大量現場見證影像，除了是新聞機構必須影像見證「外包」出去，以解決新聞事件發生時，新聞記者「來不及」在場的難題外（例如，風災），實際上更反映了主流媒體記者不再是現場影像唯一生產者，而新聞「版面」也不再是現場影像流通的唯一空間。主流媒體之地位受到挑戰。當然，對傳播研究者而言，這不是太新鮮的事，近年諸如「公民記者」之論述就呼應類似說法。例如，Hartley 提出「代議式新聞學」（representative journalism）已經過時，現在到了一個「新聞」是一種全民權利，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時代。他認為，我們過去所熟悉的「新聞」概念只是一種發展了四百多年，但實際上仍在改變的「過渡形式」。以往的「新聞」產製只是一種「代議式新聞學」類型，是受到歷史情境和技術條件限制而讓特定的人能代替其他人行使新聞資訊傳播的樣態，而這樣態已逐漸被打破（Hartley, 2009 ／鄭百雅譯，2012：207）。

就臺灣目前情形來看，「公民記者」至今仍是熱烈討論議題，但「人人都是『記者』」是否成真卻尚待釐清。但主流媒體的確受到挑戰，要如何進行轉型也成為近年學界與實務界的重要議題。其實 Zelizer 所提出的見證「外包」就可被視為一種主流媒體之應變方式。而就新聞攝影而言，da Silva & Queiroga (2010) 也提出新聞攝影組織可與民眾合作，發揮「集體智慧」，發展「協作式新聞攝影」（collaborative photojournalism）。他們認為，在過往大眾媒體為主「一對多」的傳播環境已經轉移為當前「多對多」並且「離心化」（centrifugal）的傳播情境時，影像的拍攝與集結也並非如同過往由大眾媒體所集中生產與分配。此外，社會的視覺系統（the system of visibility）正逐漸擴大，傳統媒體記者必須發展更多新的能力，來面對與處理影像細節更豐富、流通速度更快、形式更多元，以及報導內容多軌發聲（multivoicing）的新傳播情境。他們建議媒體記者要與民眾們共同協力，製作出更全面和多元的視覺報導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06-113)。

但對本文來說，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協作式新聞攝影」真能完成？該如何達成呢？以臺灣為例，在報導中翻拍網路影像或以「業餘」素材作為報導材料就等於是「協作式新聞攝影」嗎？其實，da Silva 和 Queiroga 也提醒，表面上使用了「多

2 這些「業餘者」可能是因為剛好在新聞現場，目睹突發新聞事件之發生，以家用 DV 攝影機、數位相機、智慧型手機，或車上的行車記錄器記錄了關鍵的新聞畫面，最後被主流媒體「發現」，使用於新聞報導之中（例如，2013 年 8 月 31 日基隆八斗子滾下來的大石塊）；他們也可能是主動地拍攝具新聞價值之影像素材，參與新聞製作（例如，風災中民眾主動提供給電視臺的災情畫面，或各種消費與社會「踢爆」新聞）。有研究者提出，「一般人」的目擊影像幫助新聞機構解決了時空上的「物理距離」與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心理上的「攝影距離」，因此使得更多現場能有機會被轉化為「新聞現場」（區國強，2013：8-10）。

airiti

對多」或「協作」之報導形式，不一定就等於真正達到「多對多」之實質目標；「技術」（technological）之匯流也不一定等同於「意念」（conceptual）上的匯流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15)。例如，集體或網絡（network）的邏輯與大眾媒體的有所不同，前者強調連結、充滿人際互動，後者則是「一對多」的傳輸。因此，儘管在產製（production）階段進行「協作」，其發行（publication）與流通（circulation）未必達到「多對多」之方式。另外，大眾媒體始終具有商業利益考量，「協作式新聞攝影」作為創新的新聞影像產製模式與新的商業安排之間有著含混（ambiguities）之處；大眾媒體的商業身分與「協作式新聞攝影」理念可能會有矛盾 (da Silva & Queiroga, 2010: 113-116)。以本文的角度來看，實務中的「協作式新聞攝影」是否真能回應或解決大眾媒體在當前傳播情境之中的合法性問題（儘管先以新聞影像之角度來看）實際上仍有待釐清。新聞影像見證要如何「外包」也尚待探討。

本文認為，在探討如何達成「協作新聞攝影」之前，要先針對網路平臺上大量傳播的現場影像進行分析，瞭解內容與形式上的特色，包括「見證」的動機等，才能進一步探討如何發展結合集體力量與智慧的「協作新聞攝影」。當然，若跳脫大眾媒體之位置，更值得關心的將還包括新聞攝影是否會出現新樣貌？網路上大量傳播的新聞現場影像是否隱含了另一種新聞攝影之可能？或，這些影像會擴大我們對新聞攝影之定義與理解？作為網絡上主流媒體之外新聞現場影像活動的初探性研究，本文以「洪仲丘事件」中社群媒體平臺的影像活動為對象，透過傳統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嘗試探討媒體攝影記者之外的人所製作的新聞現場見證影像之特色與「新聞攝影」內涵。

貳、新聞攝影與「決定性瞬間」

沒有攝影術的發明，就不會有新聞攝影；新聞攝影從一開始就跟技術發展關係密切。當然，新聞攝影之技術議題除了攝影術本身外，其實也包括了攝影術外，諸如傳輸等技術議題。本文關注網路上大量傳播的現場影像，正也是要處理網路與社群媒體出現後對新聞攝影之影響。簡單來說，新聞攝影首先可分為「再現」與「複製」兩層面；前者與攝影術本身之進展關係密切，後者則更有關傳輸方面的相關技術[3]。

除了「再現」與「複製」之技術議題外，新聞攝影也是有關「新聞」的攝影活動。或者說，新聞攝影是一種以攝影工具進行新聞報導之行為。新聞攝

3 當然，「再現」與「複製」之間並不能完全切割；例如照相技術「數位化」就同時有關「再現」與「複製」技術之發展。

airiti

影不只是「攝影」而已，更有關何謂「新聞」或什麼是值得被「再現」與被報導。Caple (2013: 38) 分析新聞攝影的圖文關係，歸納了十種「新聞價值」（news value），包括：包括負面性（negativity）、時間性（timeliness）、鄰近性（proximity）、顯要性（prominence）、共鳴性（consonance）、影響性（impact）、新奇性（novelty）、激烈程度（superlativeness）、個人化（personalization）與審美性（aesthetics）。而新聞照片則可因圖文關係分為「圖像作為核心」（image as nucleus）（也就是照片優先、文字為輔）、「圖像作為附屬」（image as satellite）（文字優先，照片為輔）與「序列圖像」（sequences of images）（諸如圖片故事等序列照片）三種（同上引：122-200）。總之，在主流媒體實務中，新聞攝影有關新聞訊息之傳達；「新聞價值」決定了什麼是新聞攝影的內容。

但除了內容外，Caple 也強調新聞攝影的形式或美學價值作為新聞攝影的重要組成部分 (Caple, 2013: 91)。攝影記者除了是記錄／見證新聞事件和歷史，也以某種美學價值來完成他們的工作。當然，拍新聞不是為了拍「美麗的照片」，「真實」仍是前提，訊息傳達才是重要目的（閻凱毅，1981：5-9）；而突發新聞由於事發突然而導致搖晃激烈、影像模糊的直擊影像也被視為具有強烈臨場感和視覺衝擊力的「第一人稱」的攝影美學形式 (Andén-Papadopulos, 2013: 761; Mortensen, 2015: 35-36)。但在大部分情形中，專業攝影者極力以具有美學形式的構圖方式來掌握最能表現新聞事件的一剎那，來進行其「新聞攝影」。Caple 從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之角度探討影像構圖形式，包括黃金分割（golden mean）、攝影對象數量、視覺元素位置配置等；她認為，攝影記者除了要捕捉發生中的新聞事件之關鍵時刻（critical moment），也要透過構圖力量（compositional power）去吸引和留住（to attract and hold）觀看者的注意力，來形成一種就算文字內容已被遺忘而影像仍被留存的記憶（memory）(Caple, 2013: 118)。她說，這就是攝影家 Cartier-Bresson 所描述的「決定性瞬間」（decisive moment）：「照片中所有元素配置一起，共同形成具有心理與視覺衝擊的陳述」（one in which all the elements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compelling psychological and visual statement）（Rosenblum, 2007，轉引自 Caple, 2013: 118）[4]。

4 「決定性瞬間」作為 Cartier-Bresson 的「名言」其實已經被不同世代不同攝影者與理論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採用，經常有著不一致的說法、定義，或「合理化」理由。就 Cartier-Bresson 本身來說，「決定性瞬間」實際上還有關影像元素搭配之幾何形式，或以繪畫形式論述攝影構圖之議題。不過，Cartier-Bresson 也強調「攝影是唯一可以凝固特定瞬間的」，而攝影者必須把握「正在消失的東西」，在短時間內對「現實向我們提供的大量訊息」進行分割、簡化、掌握攝影機快門，注意構圖，完成照片之拍攝。Cartier-Bresson 說：

airiti

當然，「決定性瞬間」作為新聞攝影判準是受到質疑的（例如，郭力昕，2013：20-23）。攝影記者在實務中也不總是拍攝「決定性瞬間」的照片（參考黃義書，2004：162）。但對本文而言，新聞攝影強調掌握抓取新聞事件的關鍵時刻以及注重景框之內的視覺元素組合，可以說是傳統新聞攝影的重要特質。圖 2、3、4 是「洪仲丘事件」中《蘋果日報》的新聞照片，以「決定性瞬間」作為參考點，很容易看以看出《蘋果日報》照片與「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照片之間的差異。就形式上來看，前者構圖仔細、平衡、視覺重點明顯、視覺元素之間主從分明，紀錄內容上既有表情，也有動作，屬重要時刻的重要畫面，並非「隨意」的一刻[5]；後者則相對缺乏構圖，也非除了當下此刻外就無法捕捉到的「決定性瞬間」。

當然，本文並非要將「決定性瞬間」作為新聞攝影的唯一標準（包括，作為「好的新聞照片」之標準），而是要提出，傳統新聞攝影強調瞬間時刻與影像構圖可以說是其明顯特色，因此可作為一個參照點與起點，來觀察網路上「一般人」所拍攝的現場影像。或者說，當傳統新聞攝影要求製作出具「決定性瞬間」的照片時，網路上的現場影像的內容又是什麼，如何被拍攝？

> 在觸發快門的那一刻我們已經本能地固定下一些幾何般精確、嚴格的位置，不會產生毫無個性和沒有生氣的照片。構圖是始終應該注意的事情之一，但在拍攝的那一瞬間只能憑直覺行事，因為在我們拍攝的瞬間所有的關係都正在發生改變，機會稍縱即逝。（Cartier-Bresson, 1996／趙欣譯，2013：19-24）

Cartier-Bresson 也這樣闡述過「決定性瞬間」：

> 一張獨一無二的圖像，構圖上具有如此的力度與豐富性，如此將內涵向外散發，讓這張單一圖像本身就表現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轉引自 Bate, 2009／林潔盈譯，2012：85）

另外，延百亮（2005：43）曾分析世界攝影比賽（World Press Photo）的得獎要素，提出「現場抓拍」為絕大部分獲獎作品中所共享的元素，是「圖片新聞對事件概括性的瞬間表述」。延百亮之描述可以被看作是「決定性瞬間」在新聞攝影論述中的典型描述：

> 說到底，圖片新聞攝影就是在按下快門那「一剎那」決定一切！那麼，一個新聞事件存在形象情節，每一情節又有諸多像瞬間，那一剎那才是能夠反映事物本質，可以表徵折射整個事件（組照需要多個關聯主題的情節）的決定性瞬間呢？這一瞬間比任何形象瞬間都具有新聞價值，都有說服力。但它潛在在一個事件中，懂行的攝影師都知道，要想獲取它，必須用雙眼緊盯每一形象細節，一旦這一瞬間閃現，攝影師就毫不猶豫地將其鎖定。（延百亮，2005：98）

5 換個方式來說，若攝影記者沒有在當下一刻拍到此照片，就可能再拍不到了（「拍不到」可以指影像內容，也可以關於構圖形式）。

airiti

圖 2：2013 年 8 月 4 日《蘋果日報》「凱道 8 月雪 25 萬人送仲丘」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趙元彬，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04/35197794/。

圖 3：2013 年 7 月 21 日《蘋果日報》「仲丘犧牲喚醒正義 5 千人燭光伴淚光」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陳國楨，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721/35165191/ 仲丘犧牲喚醒正義 5 千人燭光伴淚光

airiti

圖 4：2013 年 8 月 4 日《蘋果日報》「凱道 8 月雪 25 萬人送仲丘」

資料來源：攝影：《蘋果日報》，余志偉、趙元彬、侯世駿，圖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chive/20130804。

參、「大眾的自我傳播」中的影像見證活動

若「決定性瞬間」相對屬於「再現」層面之議題，那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則是有關攝影圖片如何被「複製」之問題。雖然主流媒體以外有關新聞事件的影像傳播活動可能不只在網路上進行，但網路卻可能是有史以來大眾媒體外最龐大的訊息流通空間。我們可以想像，若「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這張照片是網路出現前拍攝，除非被主流媒體轉載，否則似乎難以在一天之內被 20 多萬人所「看見」。因此，除了「再現」之外，網路與社群媒體平臺對影像「複製」之影響也值得注意。

網路與社群平臺又有何特質呢？ Castells (2007, 2009) 提出，網路、行動傳播（mobile communication）、數位媒體，與各種社群軟體工具（tools of social software）之結合造就一種新的媒介現實（media reality），促成了一種連結了在地與全球、提供互動傳播形式的橫向網絡發展。這種橫向連結的媒體網絡中以「大眾的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為特質，也就是「在眾多（個人）

airiti

對眾多（個人）之傳播中，內容是自己生產的、散布是自己指向的，而接收也是自己選擇的」 (Castells, 2007: 248)。透過網路與行動傳播工具之使用，人們可以把影音上傳到網路、寫作部落格，或開啟網路聊天室，來發展與其他人形成橫向連結的網絡；或者說，每個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大眾傳播系統，成為大眾媒體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的傳播管道（陳韻如，2013：7）。對 Castells 來說，「大眾的自我傳播」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它是相對於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之反向力量（counter-power）[6]。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延伸「大眾的自我傳播」概念，提出當今社群網絡與可攝影手機（camera-phone）普及後，新聞影像見證到了「攝影中介大眾的自我出版」（camera-mediated mass self-publication）時代。尤其在 YouTube 等影音分享平臺以及具備攝影功能的智慧型手機之出現後，網路成為了大眾媒體之外的另一個「見證場域」（field of witnessing），大量「我親眼所見」（I-witness）影像被生產與傳播，並經常成為公民或異議人士用以對抗國家政權並召喚行他人行動的說服活動。在「大眾的自我傳播」中，見證影像的生產與散布已成為社會視覺經濟（visual economy）和視覺戰爭（image wars）的重要環節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755-756)[7]。

---

6 另外，Castells 提出，「大眾的自我傳播」不只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景觀而已，還改變著全球政治之樣貌。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者而言，網際網路、社群媒體，以及行動科技提供了他們用以同時對抗主流媒體和政權，並進行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之媒介（medium）。在即時、靈活、媒材彈性高與多樣化的「大眾的自我傳播」活動出現後，什麼是能被看見、聽見、接觸到的意見、資訊，與影像，已不再是主流媒體和國家政權（不管它是「民主」或「專制」政權）所能完全掌控的事。網路社群媒體對真實社會的體制與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促成新型態且多樣化的「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模式（翟本瑞，2011），包括近年「茉莉花革命」（Tunisia's Jasmine Revolution）與「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改革者如何透過網路社群（以 Facebook 與 Twitter 為主）反抗既有的政治體制，並成為全球媒體景觀之一部分，成為了許多傳播研究者的研究主題（例如 Khondker, 2011; Skinner, 2011）。

7 在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所討論包括緬甸、伊朗、埃及、利比亞，以及敘利亞的案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公民媒體見證經常連結或產生出「烈士」（martyrdom）的概念，或簡單來說，這些見證影像素材往往在抗爭現場中，由倖存者（survivor）所拍攝關於某些犧牲者之死亡／受難情景。Andén-Papadopoulous 把這樣的媒體見證連結到的宗教上的烈士傳統（martyrology），提出這些見證影像之所以具備強大的道德和說服力量，正是來自於那些受苦和遭遇死亡的身體景象；受難影像一方面確立了見證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另外一方面賦予了這些見證難以被反駁的正義（righteousness）。Andén-Papadopoulous 分析 2009 年伊朗德黑蘭發生的反政府抗議中少女 Neda Agha-Soltan 之死亡事件，以及記錄了其死亡情景的手機之散播，認為這些見證影像透過再現（re-present）事件的暴力與傷痛，形成了受難者、觀看者，以及影片拍攝者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關係。或者說，肉體死亡之媒體見證不只是「見」而已，更是形成包括觀看者之主體參與到見證現場的苦痛經驗中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再』現」（re-present）不只是呈現而已，還包括重新再場與體驗。Andén-Papadopoulous 也舉美國 911 事件的在場者的拍攝經驗為例，在某些難以言說的苦痛經驗過程中，攝影或錄影行動或許是一種 Marianne Hirsch (2003) 所說的「沒有理解的看見」（to look without understanding）；或者說，以攝影／錄影來進行見證不必是有目的或為了產生理解的行為，而純粹是一種身體「在場」的經驗而已。如同一位拍攝 911 攻擊事件情景的目擊者所說：「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經驗了什麼。實際上我是把自己隱藏在我的照相機背後。是我的照相機承載了見證。」（Zelizer, 2002: 706，轉引自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airiti

對本文來說，Castells 與 Andén-Papadopoulous 的說法一方面強調了傳播活動中「技術」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注意到影像見證同時有關「再現」與「複製」[8]。事實上，新聞攝影史從不只是「再現」（或拍攝）技術發展而已，更有關「複製」技術之突破。Cruz & Meyer (2012: 215-217) 以 iPhone 手機為例，提出近兩百年來攝影技術之演變除了是製造照片（making of images）方式之改變外，更同時關於「影像處理」（processing of images）和「影像展示／流通」（showing/distribution of images）。他們認為，智慧型手機開啟了攝影史的新紀元；「智慧型手機攝影學」（iPhonegraphy）之「移動性」（mobility）與「便易性」（ease-of-use）特質，將「連結性」這種新元素加注在傳統的攝影實踐之中。以本文的角度來看，影像之流通技術表面上雖不是「攝影」本身的事，但卻是哪些影像會變成大量被看見的「新聞影像」之關鍵[9]。實際上，新聞影像之所以有價值，除了因為有某個攝影記者拍下重要的新聞畫面而已，更是這些畫面能大量被複製在報紙、雜誌，或電視中，被許多人所看見。McLuhan（1964 ／鄭明萱譯，2006：36）認為「媒介即訊息」，也提出「媒介作為其他媒介的內容」。對影像傳播或新聞攝影研究者而言，當攝影總非單獨被使用時，要真正理解新聞攝影便不能只談「再現」或「生產」，更必須顧及影像之展示、流通，與「複製」之層面；或者說，當攝影術成為了網路之內容時，「複製」或「流通」方式之改變所對新聞攝影的影響。

某種程度來說，本文嘗試一種新的新聞攝影研究典範。有別於過往研究者大多從「攝影」談新聞攝影，本文則以什麼樣的新聞現場影像會被複製、接收、消費，與賦予意義，也就是從「複製」或「什麼樣的影像會成為『新聞影像』」之角度，來探討那有別於主流媒體視覺系統的另一種（可能的）「新聞攝影」。這除了因為在「大眾的自我傳播」中，「攝影」者也可能是影像的「複製」或傳播者[10]；更是因為在網際網路與社群平臺上，影像的「複製」可能與「再現」扮演同樣甚至可能更重要的角色。若「再現」主要有關影像之「內」視覺元素（包括視覺元素之間的配置）、新聞現場，與新聞意義之間的關係；那「複製」更有關影像之「外」，影像如何被連結、複製、賦予新聞現場意義與重要性的過程。

8 另外，兩人的論述也同時關注到新媒體技術之政治影響，這也提醒了我們注意大眾媒體以外影像見證活動的政治意涵。

9 其實以此角度思考，文字內容（相對於影像）也可能有類似情形。但初步來看，影像之複製特質似乎又與文字有所不同，這將牽涉到更深入有關文字與影像媒材之比較與分析。

10 這也是近年引起許多討論的「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或「創用者」（produser）之概念。

airiti

van Dijck (2010: 402-411) 在討論 Flickr 照片分享平臺時，提出網路上的社群媒體文化是一種「連結的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使用者在其中與他人分享內容、對話，參與某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連結式經驗（connective experience）[11]。本文也想像，當新聞攝影的傳播活動並非透過大眾媒體管道而在網路空間中進行時，或者說，當有關新聞或公共事件之影像傳播並不是以縱向的方式播送，而是以橫向的方式進行連結時，新的傳播方式是否會對人們透過影像理解與認識新聞事件造成什麼影響？攝影「再現」與影像「複製」之間是否會有新的方式、關係，與結果？

肆、分析對象：「洪仲丘事件」Facebook 粉絲頁

准此，本文以新聞攝影的角度，分析網路上「一般人」或非專業者所進行的現場見證影像活動之樣態。

本文作為一個初探性研究，希望找出這些影像之特性，並進一步進行新聞攝影理論層次上的對話。本文以新聞攝影作為立場與觀點也是一種觀察與分析策略，因為若新聞現場之見證影像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往往因為它和「公共」有關；那新聞攝影作為一種關於公共事件影像之產製活動，或許可作為一個有效的觀察和比較起點。另外，這也是以「新聞學」作為關懷重點的研究角度。在觀察資料過程中，本文將聚焦以下三項：

一、與新聞攝影比較，網路上有關公共或新聞事件之現場影像有何內容與形式上的特色？

二、從「複製」與「連結」之角度來看，這些影像有何特質？

三、對新聞攝影而言，這些現場見證影像有何理論上的意涵或啟發？

在開啟研究之際，本研究首先會面臨研究方法上，包括研究對象、範圍，以及資料蒐集等技術上的挑戰。首先，與具有特定時間、範圍或「版面」的大眾媒體不同，網路上的影像傳播活動範圍相對難以掌握[12]。若以特定網路或社群平臺

11 不過，van Dijck 也提醒，表面上開放的網路空間和社群媒體中，可能存在研究者注意的某種「技術無意識」（techological unconscious）；也就是說，人們並不需要，也不需自覺專業知識就能在這持續發展的數位環境進行合乎個人目的的社群互動和連結行為，但在這些社群媒體平臺背後卻可能存在某種運作機制，或如同 Beer 所說的「演算法的力量」(van Dijck, 2010: 403)。van Dijck 舉 Flickr 上的「標籤雲」（tag cloud）和熱門排行機制等為例，強調社群媒體的設計和架構可能無聲無息地影響了使用者的社群參與行為。或者說，「連結」（connectivity）不必或不一定等於是真正意義上的「集體」（collectivity）。對本文來說，當我們以集體見證之角度觀察和分析社群媒體上的連結活動時，或許也需要注意社群媒體平臺的特性對連結行為和影像見證活動之影響。

12 儘管是主流媒體在網路上的「版面」，除了「官方網站」外，也可能有建立在社群媒體平臺上的粉絲頁面。

airiti

作為資料，仍會遇到不同平臺（例如，部落格、BBS、微網誌，以及社群平臺）上可能有不同樣貌的影像傳播活動，並且也可能由於使用者組成和使用方式之差異而有不同的資料樣態。另外，對傳播研究者來說，蒐集與整理大量網路資料也是技術上的難題，涉及大量傳播學以外的技術與知識。因此，本文事實上也是一個跨領域研究之嘗試，希望透過傳播與資訊科學研究者的協力，蒐集社群平臺上的大量資料，來進行傳播現象與新聞攝影理論之間的對話。

作為起步，本文以臺灣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平臺 Facebook（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2）作為觀察對象。基於資料撈取範圍的可行性和資料本身的穩定性等考量，本文以 2013 年臺灣「洪仲丘事件」中 Facebook 上兩個最重要的粉絲頁面——「聲援永遠的好朋友——洪仲丘 請大家幫忙替他找出真相，不要讓他白白犧牲，讓他繼續發光發熱」（ID: 504590332928183）與「還仲丘公道！——公民 1985 行動聯盟」（ID: 306729736131098）（後粉絲頁改名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自 7 月 11 日（「聲援永遠的好朋友」粉絲頁成立日）至 8 月 11 日（凱道紀念活動後一週）為止的所有公開資料[13]，包括貼文、留言，與按「讚」數等。以這兩個粉絲頁的資料來觀察網路平臺的影像傳播活動，也是呼應 Castells 所說，「大眾的自我傳播」是相對於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反向力量之說法；本文好奇，若這種反向力量真的存在，那又將如何反映在見證影像之內容與形式上？

截至 2013 年底，該兩個粉絲頁分別有 17 萬和 26 萬人次按「讚」[14]。初步統計從 7 月 11 日至 8 月 11 日期間兩個粉絲頁合共 24,001 篇貼文，其中有照片的貼文共 2,428 篇，有影片的則有 894 篇，共占全部貼文 13.84%（見圖 5）。但值得注意的是，若以按「讚」數作為 24,001 筆貼文的排行標準，按「讚」數量最高的前 10 篇貼文都是具有照片的貼文。在「讚」數量排行前 100 篇貼文中，有照片或影片的共占了 54 篇（見圖 6）。如果再以所有貼文總按「讚」數與照片的按「讚」數比例來看，更會發現照片的按「讚」數（1,876,117）占有所有貼文總按「讚」數（3,067,988）的 61.16%。換句話說，在本文蒐集的資料中，照片雖只占全體貼文數量的 10%，但這些貼文的按「讚」數卻占了所有按「讚」數量的 61%（見圖 7）。當然，若要仔細追究照片與「讚」數之間的相關性，還必須

13 在 Facebook 平臺中，粉絲頁貼文與回應欄位屬「公開資料」（public data），意即當註冊使用者登錄並連結至該粉絲頁頁面後，便可瀏覽其上之所有貼文與回應資料。但由於相關資料涵蓋大範圍頁面與多樣化欄位，無法單純以人工方式逐一擷取。據此，可選擇透過 Facebook 所提供之 Graph API 功能，透過粉絲頁 ID 設定即可進行粉絲頁公開資料之查詢及蒐集動作。在 Facebook 平臺所有註冊使用者及粉絲頁均以唯一之 ID 為辨識基礎；透過 ID 指定，即可查詢相關公開性資料。本資料撈取時間為 2013 年 8 月 19 日。

14 在 Facebook 中，按「讚」是加入公開性粉絲頁並「追蹤」相關訊息的方式。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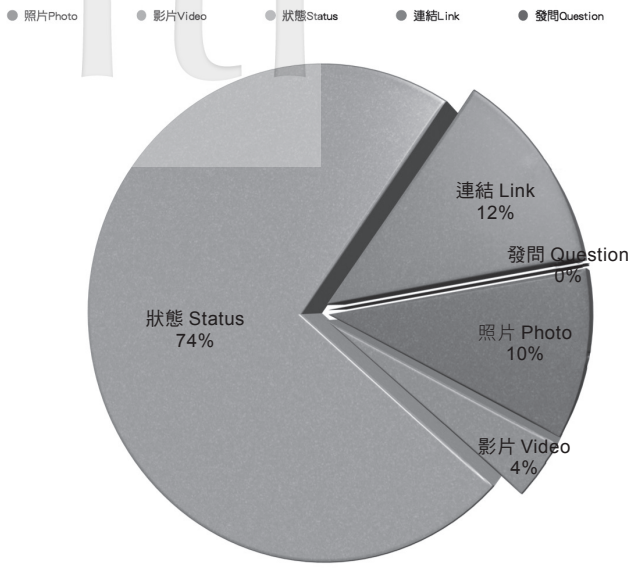


圖 5：全部貼文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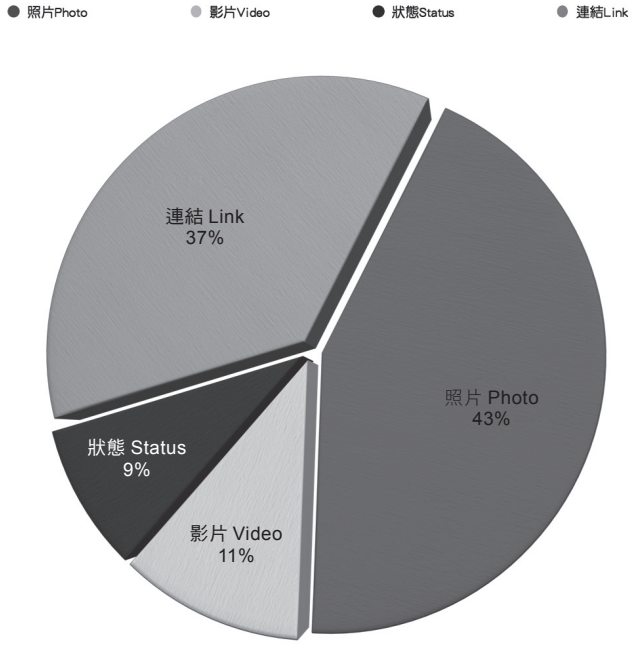


圖 6：「讚」排名前 100 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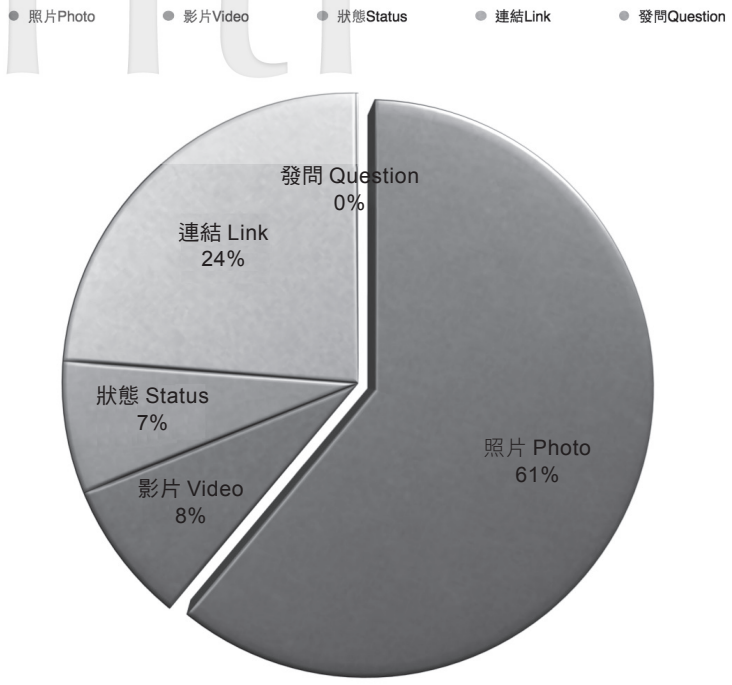


圖 7：所有按「讚」數量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要有更仔細的研究設計與分析，例如，去辨認到底是因為照片，還是照片旁的文字描述引起了按「讚」數。但無論如何，就初步來看，在這兩個社群平臺粉絲頁面中，影像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與了大量被按「讚」的貼文之傳播活動。

伍、分析一：以影像見證「報導」新聞現場 vs. 以影像見證「參與」活動

在大量的影像傳播活動中，哪些又是特別被注意和流傳的照片呢？和傳統的新聞照片比較又有何特色？本文以下將從資料裡所有貼文中「讚」和「留言」數量對多的影像來開始討論。事實上，本文開首提到的「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的照片也是兩個粉絲頁貼文中按「讚」數量最多的圖片（共有 381,387「讚」）[15]。

15 「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同時出現「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兩粉絲頁上，並同時是該兩個頁面上按「讚」數最高的貼文。也因此會兩個網路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924522594764 和 https://www.facebook.

airiti

但，以「專業」之角度來看，這是一張「新聞照片」嗎？就「新聞價值」而言，儘管支持者送水也具有新聞資訊上的意義，但這意義似乎不足以讓它成為一張重要的新聞照片（最多可能只是「花絮」而已）。另外，若就形式上來看，它沒有要捕捉新聞事件最精彩瞬間、不講究視覺元素搭配、重點也不突出[16]（可再次比較《蘋果日報》攝影記者拍攝的照片）。從「專業」來看，此照片非常「業餘」。

不過，正因為此照片不夠「專業」卻更值得討論；因為當「專業」攝影記者意圖以更精準的視覺元素配置構圖去捕捉新聞事件之重點時，「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這照片卻讓我們看見另一個被「專業者」忽視，但卻引起許多人關注的現場場景。當新聞攝影強調「決定性瞬間」能吸引觀看者目光時，「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這照片卻也引起了 38 萬人的點閱。當然，到底是這影像貼文的影像還是文字描述引起了大量連結仍是值得探討的事，但非「決定性瞬間」的「業餘」照竟能被大量觀看，卻也衝擊了我們對何謂「新聞影像」的想像。其實，在所有按「讚」數排名前 10 名的貼文中[17]，許多照片都和傳統新聞照片之內容與形式有很大不同。除了兩張以類似的高角度拍攝 8 月 3 日晚上大量群眾集結凱道形成「十字形」（圖 8、9）圖案的照片與傳統新聞照片比較接近外，其他八張大量按「讚」數的照片都大多不是專業攝影記者會捕捉的場景與時刻，以及會採用的構圖形式。其中有兩張是拍攝 7 月 20 日遊行結束後沒有垃圾的乾淨現場（圖 10、11）[18]、一張是視覺重點不明顯的集會現場人群背影（圖 12）[19]，另外兩張則比較像是參加遊行者的「紀念照」（圖 13、14）[20]。若有限版面的媒體

---

com/306729736131098/posts/308894605914611。本文在分析部分，各圖的按「讚」數目均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兩個「粉絲頁」於 2013 年 8 月 19 日資料撈取時之累積「讚」數。在這兩個粉絲頁面上，經常會出現同樣的貼文或照片，並同樣引起大量的「讚」或「留言」。但目前尚無足夠資料確認，兩個粉絲頁管理員之間是否有合作或互動關係。本文中以「總『讚』數」描述者，均為此類同樣出現於兩個粉絲頁中的照片之加總。另外，由於本研究撈取資料和網路截圖時間並非同一天進行（也就是說，在資料撈取後，仍有社群媒體使用者對這些照片按「讚」、「分享」或「評論」），因此截圖中的「讚」數會和原撈取資料的有些微差距。本文各照片圖說中的「讚」數，均指資料撈取時後設資料中的「讚」數。除此之外，為保護使用者隱私，本文引用 Facebook 網路截圖時，均對使用者名稱與頭像（包括照片中的人臉） 加上馬賽克。

16 例如，以「專業」角度來看，該照片除了留言的紙張與其後面的水外，包括建築物的欄杆與只看到背面的人，都以說是「多餘」的。

17 圖片旁引號中為原本 Facebook 上標題。

18 我們可以想像，對「專業」攝影記者來說，也可能會拍攝類似的主題；但他們可能會選取民眾「撿垃圾」的動作，或用更富有構圖感的方式去表現出「萬人上街不留垃圾」的「乾淨」。

19 同樣以「專業」角度來想像，攝影記者可能必須拍出現場氣氛，包括抓取抗議民眾的表情等。

20 再次說明，以「專業」的眼光只是用作觀察與分析照片之參照點，並無貶義。

airiti

圖 8：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晚間 20:00 空拍照，感謝 XXX 攝影，鄉民 XXX0000 於 ptt 提供連結）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347458602659。
註：「讚」數：142,240。

圖 9：沒有真相，沒有原諒！（感謝鄉民 XXX 提供）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341031936635。
註：「讚」數：60,177。

airiti

圖 10：萬人上街不留垃圾！這就是我們的公民素質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09132185890853。
註：總「讚」數：215,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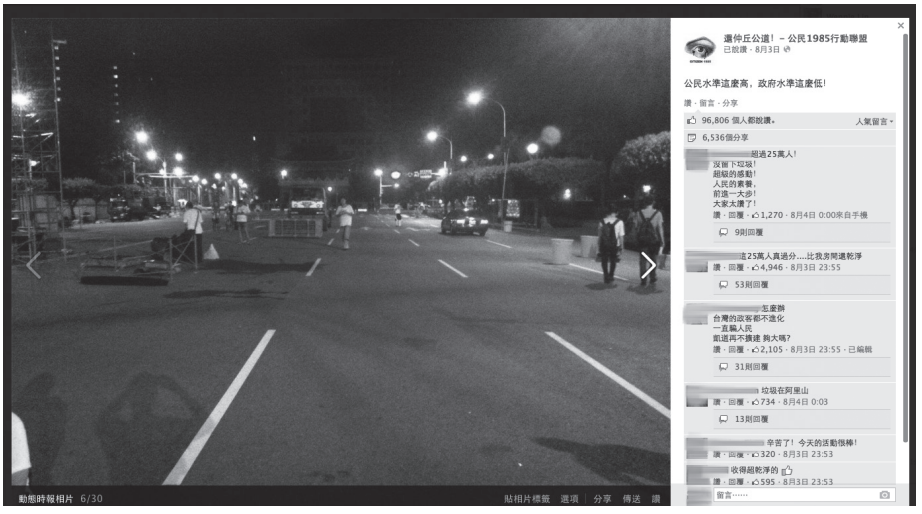


圖 11：公民水準這麼高，政府水準這麼低！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408655263206。
註：「讚」數：96,670。

airiti

圖 12：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感謝網友 XXX 上傳照片）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294965274575。
註：「讚」數：52,589。

圖 13：公平正義～緬懷仲丘燭光晚會。臺灣加油！！甲中團永懷你～仲丘！！！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8097342577482。
註：「讚」數：51,662。

airiti

圖 14：本版管理員為仲丘的大甲高中好友，我們從北中南各地親上火線，晚上六點我們立法院見！！！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8003879253495。
註：「讚」數：48,621。

根據某些新聞價值只拍攝與傳播了非常少數的現場影像；那在相對沒有版面限制的社群平臺空間中，這些「很難上版面／上不了版面」的現場影像卻得到了被看見的機會。這些看似不「專業」的「業餘」照片，實際上得到了 90 萬個按「讚」數！它們不一定關於「決定性瞬間」，但引起了 90 萬次的觀看與連結，被大量複製，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另一種新聞現場的見證活動。

進一步來看，這些照片反映出同樣是「在場」的「見證者」，但所見證的內容與形式是可以非常不同。當媒體攝影記者透過使用攝影工具掌握新聞現場重要瞬間拍出具有「新聞」內涵與視覺元素恰當配置的新聞照片時，社群平臺使用者所關注的「現場」往往很不一樣。若新聞現場大多具有「高潮點」或精彩瞬間，而這也經常是「專業者」所關注之時刻（對攝影記者來說，這也是最能表現「新聞性」的時刻）；那對非專業新聞人員而言，「高潮點」之外（包括新聞事件「發生之前」與「發生之後」）的時刻也可能具有重要性。當然，這必非指「專業」觀點一定「不對」；但卻不是「完整」的新聞現場。也當然，新聞現場發生的每樣事情不可能都會變成新聞記者的對象，但如果說主流媒體之現場影像構築了新聞事件的影像樣貌，那社群媒體上的影像的確挑戰著主流媒體影像景觀。當然，本案例兩個 Facebook 粉絲頁不只是「一般」的粉絲頁而已，其粉絲頁之成立就是要進行抗議活動，但透過隨身攝影工具與社群媒體平臺，抗議者的確有能力與

airiti

機會以自己的方式與觀點建構其抗爭活的影像樣貌。實際上，回顧臺灣政治與傳播史，例如解嚴前專門以「黨外」角度紀錄與傳播「黨外」活動的「綠色錄影小組」，就曾以 ENG 攝影機衝擊著大眾媒體對「黨外」活動所形塑的影像樣貌；不過，在當時，能拍攝影像者（包括有能力購買與操作 ENG 攝影機）仍限於非常少數的人，建構抗爭影像景觀之方式也只能透過少數場合或方式（例如，販售 VHS 錄影帶）（官鴻志，1987：46-55），可以說是一種「小眾媒體」對抗「大眾媒體」之做法。「一般人」尚難以（並且是即時地）參與到影像與其意義之建構過程中。但現在，「一般人」也有機會透過拍攝、分享影像、按「讚」，或「留言」參與到建構抗爭事件或新聞現場的影像景觀過程中；以「社群」（相對於「小眾」）或集體連結方式扮演「媒體」角色[21]。無論如何，媒介技術發展提供了新的影像見證與影像景觀之可能性，對亦認為自身是要紀錄歷史的新聞攝影記者具有挑戰的意味。

另外，延伸來看，以影像見證之過程來看，這反映了新聞記者與「一般人」各自和新聞現場之間有著不同的關係，也讓見證到的內容與形式非常不同。兩者雖都「在場」，但「專業」攝影者卻比較是扮演「在場的局外人」之「旁觀」角色，以完成新聞照片之心態，設法把看見到的現場視覺元素構築出一張新聞內容與影像形式合一的影像。至於「非專業者」（他們往往也是新聞事件的參與者），其在新聞現場中有著相對「主觀」與「個人」的位置[22]，是從自身經驗與參與者角度「在場」與「見證」新聞現場[23]。兩者之間對於什麼是重要的、值得拍下來，與該被他人[24]看見的影像，可能會有著非常大的差異。但這樣的情形也展現了新聞現場的影像見證之複雜性。Mortensen (2015: 31) 認為，尤其在衝突的新聞事件中，非新聞專業人員的「在場者」進行影像見證時，有著同時作為紀錄者與新聞事件參與者之雙重角色；新聞現場對他們來說有著和新聞人員不同的「旨趣」

21 我們可以大膽地想像，若 1986 年許信良「闖關」回國時已經有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的發明，臺灣政治發展是否也會有所不同呢？其實，有關「黨外」時期「小眾媒體」發展到當前「社群媒體」後，抗爭現場影像會有什麼改變或是否有不同的影像特色，也是一個值得延伸研究的問題。

22 在此，「主觀」與「客觀」是指攝影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和位置；無關其產生出來的知識或資訊是否「客觀」。

23 以圖 12、13 與 14 為例，參與者正視鏡頭的集體照事實上就強烈地展現了一種「我（們）在場」的參與者位置。而幾幅只拍到前方的人背面，看似沒有視覺重點之照片，則可被視為「主觀鏡頭」，突顯了親自在場並參加著抗議活動的參與者視角（因為在人群之中，除非刻意轉身過來，否則前方視線正是其他人的背面）。另外，在圖 11 下方，亦可看到拍攝者和同行者反射在地上的影子；這對「專業」攝影記者來說，除非有特定的構圖或新聞意義，否則多會避免「自己」成為畫面中的視覺元素。

24 當然，專業者與活動參與者所想像的「他人」是誰，也可能會對什麼影像會被生產有重要角色。

airiti

（interest）。因此，我們其實要從「參與新聞事件」而非「報導新聞事件」之角度來理解其新聞現場的影像見證行為。但這代表這些影像沒有「新聞」意義嗎？事實上，本文認為若我們能跳脫「專業」角度來思考，這些非專業者的影像其實提供了「旁觀」的專業者所無法提供的許多新聞現場相關資訊；例如，當專業者以某種常規方式尋求新聞事件的「高潮點」或視覺重點時（例如，重要人物登場、激烈的現場者反應、具象徵性的視覺符號），活動參與者所拍攝與分享的影像則讓我們另外一個充滿主觀並帶有主觀情感的現場（例如，「市井小民」的參與和感動、集體散發的「公民素質」，以及「一起參加」訴求公平正義的集體情感）。若專業攝影人員總必須保持「客觀」的位置從「外」觀察與見證新聞事件，那在場參與者的影像則提供另一種「主觀」、從「內」觀察、感受，與見證新聞事件之視角。當然，再延伸一步來看，這牽涉到新聞攝影或新聞的「客觀性」問題，但若我們願意先接受「客觀性」並非新聞之唯一判準，或許能從這些非新聞專業者之影像取得對新聞現場和新聞事件更多的理解。此外，若我們又超越「實體」新聞現場才是「新聞現場」之思考方式，那社群媒體平臺上的現場現象活動或許也可被視為另一個具有重要「新聞價值」的現場，一個專業者過去所忽視、無法，或沒能力去「看見」和「報導」的另一個「新聞現場」。

另外，以傳統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我們更可進一步發現新聞攝影專業人員與現場參與者之影像的「見」和「證」，有著不同的比例與特色。Peters 提出，見證本身其實包括了「被動地看」（passive one of seeing）與「主動地說」（active one of saying）兩個部分，也就是對事件的經驗（experience）與產生該事件的論述（discourse）是構成見證的兩大元素 (Peters, 2009: 709-710)。那對新聞攝影專業人員來說，其旁觀的觀察位置與主動地採用現場視覺元素來構成新聞照片的行為，其實反映出他們在「看」與「說」之間的微妙游移。一方面，他們被期待（被要求？）是被動的目擊者，另外一方面又必須主動地透過自身攝影位置、鏡頭選取，與快門和光圈等技術操作，掌握現場視覺元素，構圖取景。其實，在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旁觀」其實並非絕對的「旁觀」，因為就算能保持被動地「看」，但「說」和「證」始終具有主動的選擇。至於現場參與者作為新聞事件的一分子，其「看」與「說」之間的關係則顯得含糊，也難以保持被動，因為他們正是新聞現場景觀的構成者之一；他們所「看」見的影像正包含了其主動參與，其所「說」與「看」也都同時是經驗和論述；他們一方面主動地（以影像）「論述」其「經驗」，另一方面主動地「經驗」著其（影像）「論述」。事實上，參與者的影像見證已經是新聞事件之一部分了。

airiti

陸、分析二：再現「決定性瞬間」的影像空間 vs. 喚起情感／認同／參與的「連結」行動

如果我們把照片即時上傳網路以及其後的按「讚」與「分享」等行為也考量進去，將會進一步清楚地看見新聞事件參與者的影像見證之「行動」與「時間」特質。如果說傳統新聞影像是要以影像來「再現」新聞現場，或是要在二維影像空間中表達新聞事件的相關資訊（也就是把三度的現場空間轉為二度影像平面），那本案例中大量被流傳的社群平臺影像則除了二度影像平面之製作外，更包括由圖片的傳播而引起回應、分享，和連結的時間性活動。或者說，它們是要透過見證式影像與文字圖說的結合，產生社群之中人們之間的連結活動。其中，圖說[25]與影像之間的關係值得討論。傳統新聞影像也有圖說，或我們平常接觸到的各種影像（不管是新聞影像、廣告影像、生活影像等等）也經常是搭配文字來一起閱讀／觀看[26]，但在傳統新聞影像中，圖說或「圖一文」之間的關係主要有關新聞資訊的傳達與新聞意義的詮釋 (Caple, 2013: 122-174)，但以本案例流量最高的照片來看，「圖說」不只是「說圖」而已，更隱含了該圖片應該引起什麼樣的回應，例如激起觀看者對圖片中所描述的事件之關注與參與[27]。如果說傳統新聞照片是以「再現」為主要目的，那社群平臺影像則更有關「人際」或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從一些按「讚」數超過 10 萬的照片來看，包括「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見圖 1）[28]、「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見圖 8），和「萬人上街後不留垃圾！這就是我們展現的公民素質！」（見圖 13）幾張的標題來看[29]，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照片之所以大量被複製與連結，除了照

25 精確一點來說，在 Facebook 上的圖說應指使用者上傳照片時的「在這照片寫點相關內容……」。

26 影像與文字之間的關係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例如 Berger 提出，照片與文字存在著相互關係；文字作為一種概括（generalization）的符號，經常完成了照片等待被詮釋之任務；而反過來說，由於照片「無可駁斥的存在感」，也賦予了這些詮釋或概括一種特殊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照片與文字共同運作時力量強大，影像中原本開放的問句，彷彿已被充分地被文字所解答完成」（Berger & Mohr, 1982 ／張世倫譯，2007：97）。

27 事實上，這些照片出現大量的按「讚」數，到底是由於照片或文字內容所引起，是值得更深入探討。但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想像若這些文字缺少了照片，仍能有那麼大量的連結數量嗎？

28 該照片內文字內容為：「我是一個每天為生活擺攤的市井小民為了生活我無法參與你們的活動 這是我昨天擺攤賺得的錢 買的水 我能深深體會仲丘的苦 希望真的能讓此事件得到真樣 你們辛苦了加油！！！」

29 事實上，其他按「讚」數前十名的照片貼文，也幾乎是使用類似的圖說方式，例如，「公民水準這麼高，政府水準這麼低！」、「沒有真相，沒有原諒」、「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和「公平正義～緬懷仲丘燭光晚會。臺灣加油！！甲中團永懷你～仲丘！！！」等等。

airiti

片本身內容，更可能是來自「圖說」（或標題）。但更重要的是，社群平臺上大量進行的傳播活動雖然見證了某新聞現場，但見證與再現卻並不一定是最主要目的，而呼喚行動、認同與情感支持似乎更明顯。以「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下 2,600 多則「留言」中詞頻最高的一些字詞來看，包括「哭」（79 次）、「大家」（299 次）、「我們」（218 次）、「感動」（294 次）、「真相」（344 次），和「加油」（971 次）等，都反映了這些照片所引起的反應[30]。另外，儘管標題為「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見圖 8）的兩張空拍影像在內容與形式上非常接近主流媒體的新聞照片，但在兩張照片的留言內容中，仍出現大量情感與認同的字詞，包括「感動」（120 次）、「大家」（135 次）、「加油」（174 次）「我們」（246 次），和「真相」（317 次）。原拍攝者 XXX 也在留言中也說，「我是原攝影者。歡迎大家轉載，讓大家知道有這麼多人在意這件事」[31]。總之，就以本案例來看，社群媒體上大量傳播的現場影像與傳統新聞照片之目的或功能是很不同的，前者更應被視作為了呼喚或引起特定反映的「行動」。以日常生活溝通作為比喻來說，傳統新聞照片是要被閱讀與被「看見」，而社群媒體影像則更像是說話或呼喚，其目的更在於被「聽見」、被「觸動」。

這種「行動」特色也反映在圖片的時間連結過程上。雖然 Facebook 並沒有提供貼文被按「讚」的時間[32]，但從「留言」之時間分布來看，例如「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見圖 1）這則在 2013 年 7 月 20 日早上 7 點 48 分發布的貼文，其 2,600 多則「留言」中有 2,152 筆是在 7 月 20 日被寫下的，而在當天早上八點到中午一點之間，「留言」數就有 1,512 則，占了當天總「留言」數目 70.26%（圖 15）；我們可想像這照片在當天扮演了某種動員或引起粉絲頁追隨者關注當天抗議活動的角色。也就是說，這照片表面上再現了當天活動現場中熱心民眾捐贈物資的「資訊」，但它被上傳與加上「圖說」後，卻更要是激起連結、呼喚參與的行動，在特定時間點上扮演了串聯、動員，與凝聚情感的角色[33]。

---

30 當然，以「留言」內容來推斷按「讚」的原因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與三十多萬「讚」相比，數目只有兩千多筆的「留言」資料只能是一種很粗淺的推測。但到底能用什麼的材料來作為研究 Facebook 上的「讚」，可能仍是目前研究者們要設法解決的問題。

31 截至 2014 年 1 月 23 日為止，XXX 這則「留言」也引起了 6,184 次按「讚」數和 97 則「回覆」。

32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知道哪些人按了「讚」，但卻不知道他／她在哪個時候按「讚」。

33 若檢視該照片貼文下的留言內容會更清楚看到這篇照片貼文所引起的「反應」或「迴響」。例如，無法到場表示支持：「感動，即便今日不克前往，我白 T 出門」、「加油 無法到現場 但 會一直關注 挺大家 挺仲丘 心與大家同在」、「加油我在上班，但我心與大家同在」；表示將到場參加活動：「我們這裡有 3 個人趕往參加中」、「高鐵前進中……即將報到！」、「我住臺中市， 了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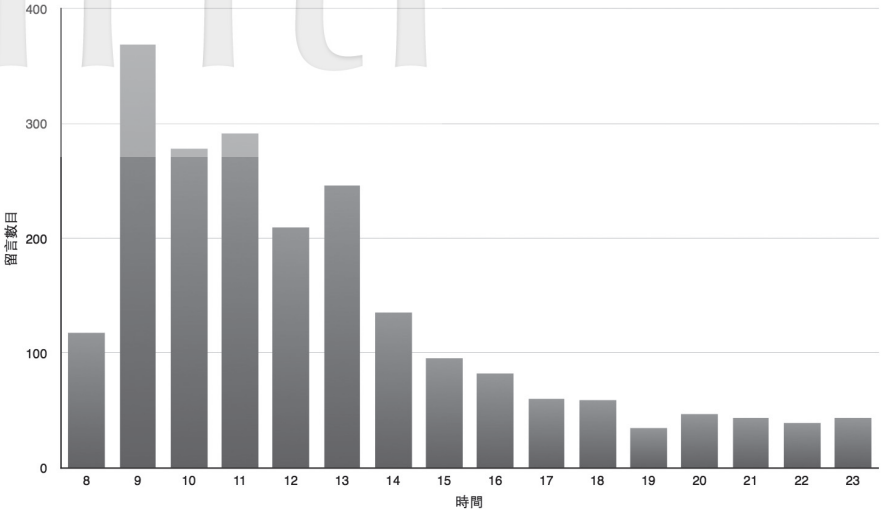


圖 15：「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7 月 20 日「留言」則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其實，以上分析只是反映了大眾媒體和網路社群媒體（以本案例來看，是社群媒體中有關社會運動的粉絲頁）本來就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場域，有著不同的成員組成和運作邏輯，因此儘管是同樣新聞現場，卻有不同見證影像，不同的內容、形式，與特質。這，似乎不是太難想像。但是，對本文而言，這對新聞攝影具有重要含義。首先，大眾媒體的確已經無法壟斷有關新聞現場的影像「再現」與「複製」；傳統專業者的新聞影像至少在數量上已經受到另一種影像產製系統的照片之「威脅」。另外，在比較兩種影像產製場域的影像特色時，雖可質疑社群媒體上尤其是新聞事件參與者的影像之「客觀性」，但若換個角度來看，主流媒體攝影記者製作新聞現場的見證影像時也是經過主動的選擇，而其影像產製邏輯在新聞訊息與意義的產生和傳達上其實也有侷限性。例如，郭力昕（2013：20-23）提出，專業新聞攝影實踐與其美學觀實際上隱含了商業考量，而其實踐方式也暗藏了倫理與精神上的「暴力」。當然，要如何審視與批判專業新聞攝影實踐並非本研究最重要問題，但我們卻也提出，「專業者」的影像見證或許只是歷史上其中一種新聞影像產製模式而已，在當前媒介情境中不只不能壟斷新聞現場影像之產製，更受到另一種模式的見證影像之挑戰。就以本研究個案來看，當許多不被

溫飽我早上也得工作，但我晚場一定到」；或表示認同並呼籲團結：「相信仲丘一定也會到場聲援／大家辛苦了／人民必須要團結一致，不要被這種無能的政府和自私的軍方打壓到底了，全臺灣人民站出來吧！」。

airiti

專業者視為「決定性瞬間」的影像也被大量複製，影響非在場者或其他人（甚至包括在場者？[34]）對新聞現場之理解時，專業者或許也能反思其「決定性瞬間」到底有多「決定性」？或是以什麼樣的標準來判斷其「決定性」？當然，這也延伸一個有關新聞攝影的核心問題：什麼才是能更「好」地紀錄、再現、產生「新聞」資訊或有關「現實」知識的影像？

此外，從社群媒體的案例中，我們會發現現場影像見證有關「再現」，但見證影像之「複製」，特別是其被大量「複製」之平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本案例中，二次元的攝影影像透過了時間上持續片刻（而且又是短時間內，例如半天之內）的不斷連結，從左到右、從下而上地構成了影像之重要性與意義。當然，傳統新聞影像產製也不只是攝影而已，也包括新聞任務分派、現場拍攝、發稿、圖片編輯、版面編輯，與定稿等步驟（黃義書，2004：128），再加上發行、被閱讀、傳散等過程；大眾媒體的新聞影像與其意義也並非攝影記者拍下照片時就被決定的；「再現」也總和「複製」過程（包括，從作為單張影像被複製在新聞版面中，以及作為報紙，複製到讀者手中）具有密切關係。因此，當我們要重新思考或定義「新聞攝影」時，「複製」將是「再現」之外另一重要關鍵字。若更進一步來看（或預測），當網際網路與社群平臺技術提供了另一種新聞現場見證影像之「再現」與「複製」模式時，那當前實務界熱烈推動的「即時新聞」報導方式是否又會產生出另外一種專業模式的新聞攝影呢？

另外，回到本案例社群平臺的影像樣貌，可發現其影像更接近是一種「行動」。或者說，若傳統新聞攝影是以攝影之行動來產生具有新聞意義的影像，那本案例的影像產製者更接近是要透過產製現場見證影像來參與到新聞事件中所進行抗爭之行動。回到「再現」與「複製」之概念來看，若傳統新聞攝影相對屬於先「再現」再「複製」（雖然更整體的「複製」脈絡，例如新聞組織立場與商業考量等「複製」因素也會在「再現」之前產生影響），那社群平臺之影像活動更像是同時進行的「再現」與「複製」行為，或甚至是為了「複製」而進行的「再現」行動。其實，以此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跳脫「傳播學」角度，而以社會學或政治學角度來看待見證影像產製活動；因為它不只是「傳播」活動，更是指向他人、指向政治的社會與政治行動；正如以上曾提到，網路或社群平臺其實是另一個「抗議現場」或「新聞現場」[35]。

---

34 其實，社群媒體使用者所拍攝的現場影像，是否即時上傳，是否又被同樣在現場者所閱讀與複製，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事情；因為這可能顯現出一個與新聞現場同時同步建構的影像景觀，甚至應被視為新聞現場的（虛擬的）一部分。不過，就目前資料撈取技術，我們尚難以針對大量資料來確認按「讚」者與留言者是否也同時在新聞現場之中。

35 這樣的角度也適用於思考傳統新聞攝影產製 — 究竟以新聞報導作為目的／理由的現場影像見證

airiti

柒、分析三：「反向力量」中高同質性的集體連結

學術研究者在論及新媒體或網路對傳統新聞學之影響時，經常關心像是網路或社群媒體這樣的場域，是否可能因為有更多人的參與而讓訊息流通變得更「民主」、「開放」或「多元」。提出「公民記者」或「協作式新聞攝影」等想法也隱含了這些結合集體智慧的新實踐方式可能能生產出更好的「新聞」或公共資訊。若以這樣的角度出發，從本案例之資料來看，集體的「連結」讓影像能以不同於傳統新聞影像產製的方式來形成其影像的重要性與意義；但兩種各有不同「再現」與「複製」邏輯的影像，真能進行「協作」、共同進行「新聞報導」嗎？為了參與抗爭而進行的影像「複製」行動，又該如何（以及是否可能）更恰當地被轉「用」到「再現」新聞現場、傳達新聞意義的新聞攝影之中呢？這些都是以「協作」作為思考觀點所會遇到的理論上和實務上的難題。

本文認為，與其從「協作」角度切入，不如更可以「競爭」或甚至「抗爭」的角度對待主流媒體與其之外的網絡社群平臺上的影像見證活動之間的關係。當然，在理論層面上這又可能延伸另外一個本文尚未有足夠分析資料與理論資源來解答的問題：我們究竟該把主流媒體與網路（包括社群平臺）的新聞現場影像活動視為「一個」系統之內的競爭？還是「兩個」不同的視覺系統呢？若以前者作為觀點，將可能會特別注意（暫時來說仍具有龐大社會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如何「收編」網路與社群平臺上的現場影像與訊息，並在視覺系統之內尋求有共識的現場影像或對現場影像有共識的理解；若以後者為觀點，則可能更注意網路與社群平臺之「反向力量」與以視覺影像作為抗爭工具之角色，並且也包括使用者如何反過來採用主流媒體的新聞影像與報導到抗爭活動之中[36]。

其實，在本研究案例中有一個「意外發現」，就是根據 Facebook 的分類，「照片」（photo）除了是照片外，實際上也包括各種靜態圖像與畫像，而在本研究所統計按「讚」數前 35 名的「照片」中（「讚」數介於 23 萬多至 1 萬之間）出現了許多非見證式或非現場拍攝的漫畫、海報，或翻拍主流媒體報導（翻拍報紙或電視）的圖像[37]。這些圖像除了符合了「感動」、「認同」，和「支持」的情感外，也加上了「惡搞」（kuso）色彩與對政府官員的怒罵與批判。例如，「連

行為，是什麼樣的行動呢？具有什麼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對傳播研究者來說，與社會學、政治學進行「跨領域」的新聞攝影研究，或將傳播學概念連結到社會學與政治學概念中，將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36 當然，這其中更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理論上如何定義「系統」？

37 若以按「讚」前 100 名的「照片」來看，有超過三成是屬於「現場」照片以外的各種圖像。

airiti

洪舅舅都不認識，你跑去慰問個什麼東西啊！！！！！」（圖 16）與「誰說要管到底啦！這不就管到底了？」（圖 17）都不是一般所謂的「現場」照片，而分別是翻拍電視螢幕新聞報導的畫面，以及網路與漫畫家「蟲蟲」對馬英九總統的諷刺性漫畫作品。在那些包括以影像來作為回應的「留言」內容中，某種集體批評政府和情緒發洩（情感互動？）成為了這些圖像集體連結出來的主要情境。這些有別於現場影像之「意外發現」除了呼應了社群媒體平臺作為一種對既有媒體與政治景觀來說的「反向力量」之說法，更讓我們看到這新的視覺系統中，還將包括合成圖像，以及被挪用、改造過的主流媒體新聞影像。對「外」反抗與對「內」凝聚是其重要的特徵，「惡搞」也有許多值得再深入探討的政治意義[38]。

另外，就以本研究個案來看，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外貌上從左到右、從下到上進行新聞現場影像見證活動的，其每一次的連結是否像是「一人一票」般讓影像之流通方式變得更民主呢[39]？「大眾的自我傳播」被視作一種相對於主流媒體所形塑的媒體和政治景觀之反向力量，其橫向的「連結」是否比傳統媒體縱向的傳播方式能產生出更豐富意義的訊息或內容？ van Dijck (2010) 曾提出網路

圖 16：連洪舅舅都不認識，你跑去慰問個什麼東西啊！！！！！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5775115226560。
註：「讚」數：39,076。

38 其實，本案例中許多圖像使用方式是非常有趣的，這除了包括各種影像、圖說，與「留言」等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影像也可能透過不同網路頁面之連結（與不斷地再連結）而成為一種持續保持動態的影像文本（例如，見圖 18）。此外，本次案例中所出現的大量非「照片」的圖像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因為這些帶有情感、口號，和動員色彩的圖像應該不只是單純地發表「意見」而已，更反映或構成了粉絲們對事件本身之態度與理解。事實上，這種海報式的影像或版面設計也出現在近年臺灣主流媒體之中，例如去年「馬王政爭」事件中蘋果日報頭版上漫畫風格的新聞視覺圖像（見圖 19），可能與本次個案中看到的各種大量被按「讚」的圖像一樣，隱含了某種當代媒體情境底下的人們理解「新聞」與「現實」的新方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39 當然，這種「一人一票」等於「更民主」之說法是值得更進一步釐清的事，但本文更關注的是：連結性是否等於更廣大的參與，或更具「集體性」的意涵？

airiti

圖 17：誰說要管到底啦！這不就管到底了？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13596842027532。

註：「讚」數：38,049。

圖 18：2013 國防部隻手遮天！公民挺進凱道大對決！！ 8/3 要真相！要人權！萬人送行洪仲丘！！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306729736131098/posts/312795802191158、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11940805526469。

註：總「讚」數：23,803。

airiti

圖 19：2013 年 9 月 16 日《蘋果日報》頭版「馬罔了，架空王金平可罰 30 萬」
資料來源：取自《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9/362361/。

上的社群媒體文化是一種「連結的文化」，但也強調「連結」不一定等於「集體」。以此角度來看本案例資料，也會發現以「連結」作為特色的網路影像傳播活動並不就完全等於是「集體」。實際上，若進一步整理本研究資料，會看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合共超過 40 萬「粉絲」的粉絲頁中，會引起大量傳播的貼文，其實幾乎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聲援永遠的好朋友」兩個管理者帳號所發布的貼文。在所有 24,001 篇貼文中，兩個管理者帳號共發布了 360 篇貼文，共占所有貼文的 1.5%，但其產生的按「讚」數卻達 2,999,169 次，占全部按「讚」數的 97.76% ！以「照片」部分來看，兩個管理者帳號共發出了 104 篇「照片」貼文，其得到 1,854,161 次「讚」，占了全部「讚」數的 98.8%。換句話說，至少在本案例中，「集體連結」雖然以「多對多」的方式發生，但引起連結的主導力量可以說是單向，或另一種方式的「從上而下」。我們可以看到管理者帳號在影像與訊息的「集體連結」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甚至是主導的角色；或者說，訊息或影像之發布仍先以「從上而下」散布，才再以「集體連結」方式「多對多」進行。這其中隱含了帳號管理者對到底哪些影像該於粉

airiti

絲頁中被大量傳播的「過濾」或「選擇」；例如，包括「銀十字勳章」（見圖 8、9）[40] 與「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見圖 12）[41] 這三篇「讚」數共 25 萬的「照片」貼文，按照其原標題可發現原為「鄉民」和「網友」所拍攝的照片，但都是被粉絲頁的管理者所挑選，再被大量連結與看見。當然，這並非說該兩張照片本身不具備被大量連結的潛能，但這潛能卻可能需要透過粉絲頁管理者的策動（策展？）而發揮出來。總之，在本案例中，橫向「連結」活動上，「從上往下」的縱向力量仍扮演重要角色。van Dijck (2010) 提出，社群平臺後可能存某種運作機制而形成了「技術無意識」（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的連結行為，那對本文來說，Facebook 之平臺設計以及粉絲頁管理員在其中所被賦予的角色，則是某種表面上看不見，但實際上卻影響著其中各種訊息傳播行為之機制與邏輯。當然，這些「技術無意識」也將有關 Facebook 本身的演算法與程式設計，對使用者每次打開 Facebook 之際，其頁面所能看到的內容之影響與限制（另外，這也包括使用者比較容易可能看見哪些「好友」的狀態，從而也影響了社群網路之形成）。就有關新聞或公共事件之影像而言，「技術無意識」是否形成了某種「物以類聚」之狀態，或總是以特定方式、內容，與形式被生產，以及也總是被以特定方式來詮釋與複製，值得關注 [42]。

此外，除了粉絲頁面的管理員帳號之角色外，在本案例大量被傳播的影像貼文中，可以看到高度同質或相類似的「再現」內容與「複製」情境。或者說，當「大眾的自我傳播」走進抗爭事件的脈絡時，會出現一種「適合被拍照的」和「適合被連結／複製」的情境；在本案例中，「感動」、「認同」、「支持」、「惡搞」與「批評政府」等成為了「再現」與「複製」活動之主軸。當然，換個角度來看，此主軸為何能在社群媒體或此事件中引起那麼大的迴響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事，並牽涉到整體政治情勢之分析。但對本文來說，更重要的是：網路社群平臺上所進行的影像傳播活動雖然有著「集體見證」的意涵，但更大的目的與效果卻是形成「集體連結」。與其說人們透過影像的傳播與複製再度見證了新聞現場，不如說

40 原標題為：「立即修法，終結黑幕！！冤案重審、還原真相！！（晚間 20:00 空拍照，感謝 XXX 攝影，鄉民 XXX0000 於 ptt 提供連結）」和「沒有真相，沒有原諒！！（感謝鄉民 XXX 提供）」。

41 原標題為：「不到 5:00 主席就已經宣布，現場人數已經超過 2 萬人！！（感謝網友 XXX 上傳照片）」。

42 另外，網路世界具有冪律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之特色，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長尾理論」或「80-20%」法則，即小部分使用者貢獻大部分的內容或使用量（鄭宇君，2014：73），也是值得關注媒介特質。

airiti

在社群平臺之內，人們透過持續不斷的上傳照片、留言、分享、彼此連結，而讓這平臺本身成為了另一個「現場」空間。在其中，就以影像傳播活動來說，見證可能並非最重要的，「感動」、「認同」、「支持」，和「批評政府」才是主軸；圖像（不管是照片、漫畫，或其他）在是一種展開連結與複製的「觸媒」，點燃了時間軸上人際之間的連結活動。在此活動中，某種情境被建構起來，影響了人們拍攝影像，以及詮釋和分享影像之行為。在這種貌似「大眾的自我傳播」中，「自我」其實受到許多「大眾」的影響。「複製」除了是技術議題，其實也是「適合被連結／複製」的情境問題。網路與社群媒體雖然一方面以集體力量之連結衝擊了主流媒體的視覺景觀，但另外一方面也建構了高度同質性的連結情境；在其中，影像傳播活動既是向「外」發動抗爭的政治／社會行動，也是對「內」凝聚認同的活動[43]，就像是一種宣告「我們是一起／在一起（戰鬥）」的儀式。

事實上，若我們跳脫出攝影者作為影像之唯一產製者的角度來觀察各種類型的攝影實踐，會發現某種結構或情境總影響著不同領域的人以攝影來對眼前事物作出（或不做出）特定或類似的反應。對主流媒體攝影記者來說，其背後存在著組織力量、媒體特性（例如，報紙和電視就有所不同）、媒材種類（例如，攝影、錄影）、與「專業」的工作模式對「拍什麼」和「如何拍」的認知之影響。對非專業者來說，其背後存在著社群認同、人際關係、複製技術、談論新聞事件之脈絡，以及網路平臺的演算法等影響。而對本文來說，若人們對於網路或新媒體之「集體」或「民主」期待是建立於某種「更多人的參與」會代表了「更多人主動／能動地分享意見或智慧」的想法上（相對傳統媒體或政治組織中只有特定的人以從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決定、分配，或媒體影像景觀之構築），那本研究案例中仍出現了「從上而下」的重要影響力量。集體連結是否真達到真正意義上「民主」、「開放」，或「多元」，還要受到質疑[44]。

---

43 例如，在這些大量被複製的照片連結活動中，雖然以目前資料蒐集技術條件來看，我們難以知道為何「粉絲」會按下「讚」，但那些被大量按「讚」的貼文都存在著類似的主題或訴求；連結後的結果似乎是頗一致的意義與意見，從影像上傳到連結、留言，和分享，「感動」、「認同」，或「支持」的情境似乎是很穩定的，並彷彿更像是一場透過集體「連結」而在網路場域上見證某種認同的儀式。

44 另外，雖然仔細觀察「留言」內容，會發現這些照片的「留言」除了大量的情感認同外，也會有一些其他的「聲音」或內容，例如在「一早看到這堆水，哭了！」中「留言」內容中，除了表示支持或認同外，也有批評政府或國防部官員，或討論洪案新聞事件的內容（例如，禁閉室監視器錄像為何沒有畫面）。但是連結的主軸仍大多於支持和認同為主。與文獻中例如 Andén-Papadopoulous (2013) 對中東抗爭事件之社群媒體情形比較，犧牲者、肉體痛苦，或死亡的影像相對地並未出現在本次研究的觀察範圍內。當然，這並非說洪案中不存在犧牲者或死亡元素的影像，例如洪仲丘本身的 Facebook 首頁，就被用作貼文中的「照片」之用途，並得到了 40,000 多個「讚」數（在所有照片貼文中「讚」數第 12 名）。不過，我們或許能推論這張發布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晚上 10 點 45 分，也就是 7 月 20 日前一晚的貼文，標題為「感謝。正義。明天見。」

airiti

捌、結論

本文以兩個 Facebook 粉絲頁為觀察對象，初步考察網路上社群媒體平臺的影像傳播活動以及與新聞攝影之間可能產生的關係，但事實上我們引起的疑問比解答更多。首先，在本文比較少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技術上，本研究透過資訊科學方法雖蒐集到大量網路資料，但此「大量」其實只是網路上「鉅量資料」（big data）之極小部分而已，不管在樣本數量的代表性以及樣本本身都不能代表「所有」網路上（儘管就以 Facebook 來說）的影像傳播活動。憑著兩萬多筆資料所做的結論雖然已比過往許多傳播研究的資料數量來得大，但實際上也只能算是網路上的特定資料群而已。當然，換個角度來看，這反映出進入網路或新媒體時代後，尤其對傳播學研究而言，研究者在資料蒐集時遭遇的挑戰：在幾乎沒有「邊境」的網路空間中，到底如何設定研究問題與資料範圍，以及克服大量／鉅量資料撈取與整理時所出現的困難，都似乎不是單一領域之研究者所能解決的問題。對本研究來說，若真要更全面地討論網路上有關公共或新聞事件之影像傳播活動，那就算只是以「洪仲丘事件」作為對象，並先鎖定於 Facebook 社群平臺來說，除了本案例兩個粉絲頁外，實際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影像傳播行為（這可能發生在以「網路名人」的個人頁面[45]，或廣大使用者與朋友之間的非公開貼文活動中），但要如何蒐集到這些資料以及如何驗證這些資料的完整性，卻需要更多資訊科學或其他方面的研究者協助才可能完成[46]。

另外，就以本研究所蒐集與整理的資料來看，若要更鞏固本文所提出的推論和分析，我們還需要包括使用者按「讚」時間、照片貼文的流通與分享路徑，以及兩個粉絲頁外仍有哪些「洪仲丘事件」的影像被大量傳播在 Facebook 等網路空間的資料。

此外，對傳播研究者來說，除了關注影像之生產外，也同時關注連結過程

的照片（圖 20），其內容雖然是關於「犧牲」或「死亡」的洪仲丘，但其被運用的方式更在於動員隔日的遊行。此外，換個角度來看，臺灣「洪仲丘事件」與中東抗爭事件相比，支持民眾在「現場」與軍警抗爭的衝突情形是相對較少的（當然這也跟該新聞事件中並沒有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有關），所以「犧牲」、「死亡」、「身體痛苦」等元素的影像也可能因此並未扮演最重要角色。不過，本次蒐集的資料中，「洪仲丘事件」中經常與媒體互動的洪仲丘姐姐洪慈庸，其媒體所拍攝的照片也被大量流傳，可能是我們探討「犧牲者」影像時可以再進一步探討的情形。

45 例如，九把刀、朱學恆，與五月天等對「洪仲丘事件」一直保持關注，並會在其個人頁面上作出相關意見的名人頁面。

46 事實上，對資訊科學研究者來說，如何進行更準確與完整的鉅量資料蒐集也是當前有待解決的重要議題另外，在技術問題上，我們仍缺乏足夠工具驗證撈取到的資料是否具備十足的完整性問題。例如，Facebook 的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與使用者隱私設定等都可能影響了資料撈取結果。

airiti

圖 20：感謝。正義。明天見。

資料來源：截圖自 https://www.facebook.com/504590332928183/posts/507773149276568。
註：「讚」數：42,830。

中影像到底是在何種情境脈絡下被觀看、閱讀與賦予意義；或者說，每一個別的 Facebook 使用者觀看和閱讀（儘管是同一篇）照片貼文時，其觀看情境脈絡是否會造成影響？就算先不處理使用者使用的裝置（例如，手機、平板電腦、家用電腦）或在閱讀貼文之場所（例如，在家裡、與朋友一塊，或在新聞現場），使用者在看見某篇貼文時，其觀看的時間點、當時的按「讚」數、被顯示在網頁上的「留言」內容[47]、「粉絲」 間的社會網絡關係等等，都可能是形成影像「複製」情境的重要元素，並對影像之「再現」具有影響。本文相信若能蒐集到這方面的資料，那現象與理論之間的對話將會能更仔細與深入，推論也能更確實[48]。除此之外，本文也主要針對案例中的「照片」進行分析，尚未對同樣能扮演影像見證功能的「影片」進行研究[49]。

47 在 Facebook 中， 顯示在網頁上的「留言」內容，有「最新留言」和「人氣留言」。

48 這也包括社群媒體使用者是否以手機進行影像拍攝與傳播的資料（本案例所蒐集的欄位料並無此資料，亦無影像本身的後設資料）；若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們就能更一步地把 Curz & Meyer (2012) 所說的「智慧型手機攝影」加入到研究分析之中，觀察智慧型手機之出現如何形成了另一種隨時隨地，也即時即地的影像見證活動。

49 但初步以按「讚」數來看，「影片」在本次兩個粉絲頁中造成的連結效果相對比「照片」低。「讚」最高者（17,590 次讚）是標題為「7/20，站出來！！上午九點國防部大門公民教召！！晚上六點立法院前方紀念晚會！！活動說明……」的影片，聲音軌以張雨生「沒有菸抽的日子」作背景音樂，視覺軌則以 Prezi 工具做的文字簡報，主要介紹「洪案」案情和疑點，最後呼籲「720，穿白衣，上街頭，要真相」、「如果你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到場 請身穿白衣，照張像 上傳到『公民 1985』FB 專頁」、「讓我們攜手一起奪回消失的公平正義」。在「影片」按「讚」數超過 10,000 次的

airiti

無論如何，本研究以新聞攝影作為參照點與起點，分析了三種社群平臺影像活動之特色與對新聞攝影之意義：

一、與攝影記者旁觀且被動地進行觀察，卻又要主動地把新聞現場視覺元素轉化為內容與形式合一的新聞影像相比，社群平臺上的影像相對不那麼「講究」。這透露了見證影像的「看」與「說」之間是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和組合形式，並可產生出不同目的與功能的見證影像。但無論如何，過往由大眾媒體壟斷的新聞現場影像景觀已被打破。

二、主流媒體攝影記者的攝影實踐主要是為了「再現」新聞現場；與此相比，社群平臺上的新聞現場影像更接近是一種引發影像「複製」來進行連結的社會與政治行動。而對新聞攝影理論來說，在當前新媒體技術情境下，「複製」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社群平臺作為一種「大眾的自我傳播」，其外貌上「從下而上」或「從左到右」的資訊連結方式，經常被賦予「民主」、「開放」、「多元」等想像。但本案例則出現了高同質性的內容與主軸。另外，粉絲頁管理者也扮演了某種隱藏的「從上而下」之關鍵力量，透過篩選和發布貼文，以及賦予影像特定標題或圖說等方式影響了貼文的連結和走向（對本文來說，這不只是粉絲頁管理者之「人」的問題，還包括社群平臺設計與演算法等技術議題）[50]。當然，意見一致或高度相似並不就等於「不／非民主」，但就本案例來看，社群媒體上的影像活動有高程度的同質傾向。影像見證與其說再現現場或傳達資訊，不如說更是抗爭與動員行動，以及透過情感互動來凝聚認同之儀式。

最後，回到新聞攝影之層面來看，就本研究案例來說，我們看見了一個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另一個見證影像的視覺系統，並明顯地具有「反向」與「對抗」的意涵。對希望發展「協作式新聞攝影」論述或實務的人來說，如何與該「反向力量」進行協力，以及如何從其影像中擷取出「新聞」資訊，仍是有待探討的問題。例如，要發展見證影像的「群眾外包」前，似乎要先去瞭解這些群眾／社群是否

共有 8 部，其中包括大量使用主流媒體影像素材的「懶人包」式影片，值得進一步觀察主流媒體影像與社群媒體影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互動或相互影響。

50 當然，若如同媒體報導所說，兩個粉絲頁中，其中「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是由 39 名原本素不相識的志願者合力發起的，那這少數人所引起的龐大網路與社會連結力量，可以說是非常驚人。另外，或許有人也會提出另一個重要問題：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洪仲丘事件」是否屬於「特例」呢？而以這個可能是「特例」來探討社群平臺上的影像傳播行為，又會否只能得到片面的理解呢？再進一步地，只針對社會運動或爭議性事件來探討大眾媒體以外的影像傳播行為，又是否不夠完整？哪些有關「日常生活」的影像傳播行為也可能同樣具有「公共」或「新聞」的意義呢？本文認為以上的問題都是必要並且有待探討的重要角度，回答這些問題才能更清楚地理解我們的社會視覺系統中到底存在著哪些競爭或反向力量。

airiti

有參與「外包」的意願，以及其見證影像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就本研究案例來看，這些充滿抗爭色彩、情感強烈、主觀的見證影像的確反映出許多主流媒體影像中看不見的細節，提供了另外一種對新聞現場之意義的理解。不過，基於資料蒐集技術的限制，本文僅以特定社群平臺粉絲團作為觀察對象，討論案例也侷限在政治抗爭事件，未有延伸到其他新聞事件類型（例如，在相對沒有抗爭意味的災難新聞中，「協作」是否比較可能發生？）。我們可以想像，就算只是抗爭類型的新聞，除了「報導者」與新聞事件「參與者」外，也會有「路過」、「剛好在現場」，或儘管參與但涉入程度沒有那麼深的另一些「一般人」[51]，他們也在網路與社群平臺中進行著影像見證活動；這將又是另一種見證影像，或另一個視覺系統。至於要如何「發現」他們，討論他們，又將是理論與資料蒐集上的新任務。此外，本文提出新聞攝影研究要更注重「複製」之角色，也是從過往新聞攝影研究相對著重討論「再現」之研究轉向，並認為該把新聞攝影研究深入擴展到整體媒介技術之探討。例如，新攝影技術（例如，智慧型手機）提供了「製造影像」加「處理影像」再加上「影像展示／流通」之機緣，或者說，讓「再現」與「複製」得發展為「一件事情」，打破我們過往對「攝影就是拍照」之想像。又例如，就以本個案來看，時間性值得被視為社群平臺之「空間」元素，包括文字標題、按「讚」數量、留言內容、超連結，與分享次數等網路平臺元素，都和過往主流媒體「版面」非常不同[52]。延伸 McLuhan 的角度來看，當攝影成為了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內容」時，新聞攝影也將會有不同的新樣貌、新理論、新定義，和新的想像。

參考書目

官鴻志（1987）。〈當人民要掌握他們的媒體〉，《人間雜誌》，15：46-55。

延百亮（2005）。《解讀「荷賽」：世界新聞攝影比賽探究》。長春，中國：吉

51 這可能還包括：「專業」新聞記者本身在工作之外是否也會以另外一種方式拍照、上傳、分享到社群網絡，以另外一種角色「見證」新聞現場？

52 例如，傳統媒體的有限版面與理論上網路中無限或沒有清楚邊界的數位空間便是一種明顯的差異。社群平臺設計本身也是重要技術議題。例如，「按『讚』」作為一種觀看、分享，與連結相結合的「閱聽人」行為將如何改變我們對「閱聽人」的想像？初步來看，就影像傳播活動而言，「按『讚』」讓影像之「觀看」、「複製」、「連結」得以同時進行；閱聽人一方面觀看影像、閱讀貼文，另一方面也在複製影像與貼文（「讚」至少產生了「量」的增加）並且也同時和他人產生連結。若再加上其他平臺使用方式，包括「留言」與「分享」等，將又可形成另一種可與「觀看」同時進行的「複製」與「再製／再現」影像方式（這除了「量」之外，更有關「質」的「再製／再現」）。McLuhan 提出人們需注意媒介形式對內容之影響，那對新聞攝影而言，就以社群媒體來看，新的媒介使用機制改變著「再現」與「複製」之間的關係，包括加上了「連結」與「再製」之新意涵。另外，這實際上也可能是構成了我們一般使用社群媒體時所沒有察覺到的「技術無意識」，值得進一步釐清。至於社群媒體是如何透過大量使用者之間的連結「形式」來構成其大量「內容」而發展成新的視覺或媒體系統，那就更牽涉到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分析了。

airiti

林攝影出版社。

林照真（2009）。《收視率新聞學：臺灣電視新聞商品化》。臺北，臺灣：聯經。

林潔盈譯（2012）。《攝影的關鍵思維》。臺北，臺灣：城邦。（原書 Bate, D. [2009]. *Photography: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UK: Berg.）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2）。《社群！原來如此》。臺灣，臺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區國強（2013 年 7 月）。〈新聞攝影之「見證」技術：從演化之角度探討當代電視新聞影像〉，「2013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新北。

張世倫譯（2007）。《另一種影像敘事》。臺北，臺灣：三言社。（原書 Berger, J., & Mohr, J. [1982]. *Another way of telling*. London, UK: Writers and Readers.）

郭力昕（2013）。《再寫攝影》。臺北，臺灣：田園城市。

陳韻如（2013 年 7 月）。〈尋找網路公眾：以 ANT 觀點探討網路環境運動〉，「2013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臺灣，新北。

黃義書（2004）。《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認知、角色、專業權力及生存心態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翟本瑞（2011）。〈從社區、虛擬社區到社會網絡網站：社會理論的變遷〉，《資訊社會研究》，21：1-31。

趙欣譯（2013）。《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論攝影》。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原書 Cartier-Bresson, H., Macé, G., & Franck, M. [1996]. *L'imaginaire d'après nature*. Saint-Clément-la-Rivière, France: Fata Morgana.）

鄭宇君（2014）。〈向運算轉：新媒體研究與資訊技術結合的契機與挑戰〉，《傳播研究與實踐》，4（1）： 67-83。

鄭百雅譯（2012）。《全民書寫運動：改寫媒體、教育、企業的運作規則，你不可不知的數位文化素養》。臺灣，臺北：漫遊者文化。（原書：Hartley, J. [2009]. *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 St. Lucia, Australia: UQP.）

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臺灣，臺北：貓頭鷹。（原書：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閻凱毅（1981）。《鏡頭的抉擇》。臺灣，臺北：時報。

Andén-Papadopoulos, K. (2013). Citizen camera-witnessing: Embodie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age of "mediated mass self-communication." *New Media Society*, *16*, 753-769.

airiti

Caple, H. (2013). *Photojournalism: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38-266.

Cruz, E. G., & Meyer, E. T. (2012). Cre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photographic process: iPhones and the emerging fifth moment of photography. *Photographies*, *5*, 203-221.

da Silva, J. A., Jr., & Queiroga, E. (2010). Collaborative photojournalism in a time of convergence.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6*, 103-119.

Dana, C. A. (1937). News and reporting. In F. L. Mott & F. L. Casey (Eds.), *Interpretations of journalism: A book of readings* (pp. 159-164). New York, NY: F. S. Crofts.

Hirsch, M. (2003). I took pictures: September 2001 and beyond. In J. Greenberg (Ed.), *Trauma at home: After 9/11* (pp. 69-86).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Khondker, H. H. (2011). Role of the new media in the Arab spring. *Globalizations*, *8*, 675-679.

Manovich, L. (2012). Trending: The promis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big social data. In M. K. Gold (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p. 460-475).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ortensen, M. (2015). *Journalism and eyewitness image*. London, UK: Routledge.

-- (2011a). The eyewitness in the a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K. Andén-Papadopoulos & M. Pantti (Eds.), *Amateur images and global news* (pp. 63-75).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 (2011b). When citizen photojournalism sets the news agenda: Neda Agha Soltan as a Web 2.0 icon of post-election unrest in Iran.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 4-16.

Peters, J. D. (2009). Witnessing. In P. Frosh & A. Pinchevski (Eds.), *Media witnessing: Testimony in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 (pp. 23-41).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Skinner, J. (2011). *Social media and revolution: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as seen through three information studies paradigms*. Retrieved from

airiti

http://aisel.aisnet.or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82&context=sprouts_all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Flickr and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Sharing views, experiences, memories. *Memory Studies*, *4*, 401-415.

Wang, B. Y., Lee, F. L. F., & Wang, H. (2013).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journalistic witnessing: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he 2011 Japan earthquake. *Journalism Studies*, *14*, 497-506.

Zelizer, B. (2007). On “having been there”: “Eyewitnessing” as a journalistic key word.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4*, 408-428.

-- (2002).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 697-714.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141-180, January 2017

Another Ways of "Photojournalism"? The Making of "News" Image in Social Networking Spaces

Au, Kwok-Keung*

Doctoral Candidat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en, Pai-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n, Jin-G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Besides mainstream media, social media is a place where images are being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But do abundant witnessing images on social media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photojournalism?" The article takes the top 10 most "liked" images of two important Facebook fan pages in Taiwan's "Hung Chung-chiu incident" as example,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journalistic values of those images. It states that comparing with traditional photojournalistic logic such as the capturing of "decisive moment," the images on social media are characterized by subjectivity and participation, and can be described as kind of ac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social connec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mages on social media have important journalistic values, but it will be a challenging task for those who want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photojournalism." In addition, a context of what are "apt to be photographed" and "apt to be linked" occur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mages and information, and there is an uneq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itors and users on the fan group of social media.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determine if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can promote democracy and plurality of information.

Keywords: photojournalism, mass self-communication, citizen camera-witnessing, social media, Facebook

---

* Email: asheou@gmail.com
Received: 2015.6.15
Accepted: 2015.9.24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ei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181-205．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7

紀錄作為創傷的療癒：從《赤陽》、《漫漫哀傷》到《怒祭戰友魂》*

蔡慶同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是將東亞地區（臺灣、南韓與日本）三部紀錄片，包括了《赤陽》、《漫漫哀傷》與《怒祭戰友魂》，進行一個參照與比較，尤其是它們不僅都涉及到個體如何因帝國的戰爭而受到身心的創傷，同時，也透過不同的美學實踐，再現了被壓抑的記憶乃至於尋求療癒的方式，進一步反映出對於殖民主義的不同追問。

在此，紀錄片的文化生產，猶如一場精神分析的對話過程，一方面是透過音像記錄的自身，再現了創傷及其療癒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音像記錄的過程，召喚了過去的記憶，詮釋著對於當下與未來的認識，並衍生出政治爭議的差異化，而透過此一參照與比較，本文亦企圖釐清它們可能衍生的啟示與彼此之間的連帶關係。

關鍵詞：東亞、紀錄片、殖民主義、創傷與療癒、精神分析

---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東亞視線：臺灣、韓國與日本紀實音像之比較研究」（100-2410-H-369-001-MY3）部分成果；初稿曾發表於「2014 藝術社會學研討會：作品社會學如何可能」（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在此並特別感謝三位匿名評審委員的寶貴意見。

** Email: tonytsai@mail.tnnua.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然而，不管如何，政治性的暗殺從來都不是個由一個人單幹的事；即令刺客是有精神病的獨行漢，他的精神病也替現了——將他和被刺者加以連結的——歷史的和心理的種種更廣泛的勢力。

——Ashis Nandy（1983／丘延亮譯，2012：40）

壹、前言

電影作為一種觀看方式，以及精神分析作為一種認識方法，不僅同時地誕生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現代社會，也都同樣地穿越在寫實與虛構、記憶與夢境、現實與欲望之間，從而使得兩者的發展平行同步卻又交織纏繞（Bergstrom, 1999; Heath, 1999）。

從精神分析的認識方法來說，人的心理乃是受到欲望與幻覺的驅動，而「夢是一個（受壓抑的或被潛抑的）欲求的（偽裝的）滿足」（Freud, 1965／孫名之譯，2002：112），「夢有兩個主要特點——欲求的滿足和幻覺的經歷」（Freud, 1991／彭舜譯，2001：105），因此，「夢的解析是通向理解心靈潛意識活動的康莊大道」（Freud, 1965／孫名之譯，2002：371）。

同時，原本屬於個人最私密的想法，可能也是最為所有人共享，也就是說，內在生活中難以捉模的個人主義，也可能屬於整個文化所共有，「每個人所夢見的夢境都大致相同，而我們常認為這種夢對每個人而言必定有著相同的意義。這些典型的夢之所以特別有趣，是因為不論誰作這種夢，大概都出於同一來源」（Freud, 1965／孫名之譯，2002：170）。

此外，「夢主要是以視覺意象進行思維——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夢也利用聽覺意象，在更小的程度上還利用其他感覺的印象」（Freud, 1965／孫名之譯，2002：33），「視覺意象也不是思想轉化的唯一形式，然而，它卻構成了夢的形成的主要特性」（Freud, 1991／彭舜譯，2001：144）。

從電影的觀看方式來說，透過記錄的再現與真實的模擬，電影乃是人類想像的表現技法，電影的銀幕也被類比作為文化與社會的夢境，夢和電影作為想像的手段，兩者之間存在著共謀與一致性，它們皆是個人試圖轉換痛苦的經驗，以及某種（受壓抑的或被潛抑的）欲求的（偽裝的）滿足。

因此，精神分析（慾望）的認識方法，也往往被用以來詮釋電影（再現）的觀看方式（Metz, 1982／吳瓊編譯，2005），例如像是討論電影作為意識型態

airiti

的工具與支持者，而觀眾作為主體在面對銀幕時，把它當作是 Jacques Lacan 的另一面鏡子，由於認同影像時（認同了觀看一切的攝影機，並把所拍攝的世界加以挪用及建構）所產生的快感與危險，衍生類似偷窺癖（voyeurism）、戀物癖（fetishism）的概念（Lebeau, 2001 ／陳儒修、鄭玉菁譯，2004）。

然而，它也易於侷限於文本分析，並較為關注的是電影說了什麼、怎麼說、為誰說，同時，除了虛構電影（劇情片）的類型之外，紀實音像（紀錄片）的文化生產，是否能為我們開啟不同的思考與觀點？

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往往不只是文本的面向而已，它在紀錄的面向（誰是記錄者、記錄者與被攝者的關係），乃至於觀看的面向（被映演與討論的情境與形式），具備有更加多元乃至分歧的內涵。

舉例而言，對於具有創傷經歷的被攝者而言，可能表現某種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症狀或反應，症狀或反應又往往具有每種意義並與其創傷的經歷有關，甚至他們都固著於自己過去的某個特殊階段，彷彿無法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似的，但是，透過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可能因此克服並解除被潛抑的阻抗，甚至在消除潛抑，將潛意識的過程變為意識的過程之中，使其症狀或反應消失（Freud, 1991 ／彭舜譯，2001）。

換句話說，紀錄片的文化生產，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實踐歷程，有如精神分析的談話療法，它就像是建立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斷地要求被攝者進行感受的體驗、記憶的回想、言說的描述、表達的治療等等迴圈，從而共同完成某種創傷的敘事，乃至療癒。

有鑑於此，本文將藉由分析東亞地區（臺灣、南韓與日本）三部與殖民經驗有關的紀錄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是進入 1940 年代的太平洋戰爭，無論是日本內地或者作為殖民地的臺灣、韓國，帝國主義透過一個戰時的總體戰體制，配合各地的精神總動員乃至皇民化運動，不斷汲取資源並動員或徵募人力，或軍或民，或被迫或自願，幾乎都被捲入到這場漩渦之中。

在《赤陽》（2007）中，陳志和紀錄了遠赴南洋的臺籍戰俘監視員如何淪為戰犯以及持續追求被承認的境遇；在《漫漫哀傷》（낮은목소리）（1997 年）中，卞英珠（변영주）紀錄了南韓慰安婦的公開見證、要求道歉賠償與共同生活的過程；在《怒祭戰友魂》（ゆきゆきて、神軍）（1987）中，原一男紀錄了主角奧崎謙三不斷追討戰爭真相並要求天皇負責的行動。

參照與比較的目的，在於進一步釐清紀錄片的文化生產，是如何轉化心理的防衛機制？包括記憶是如何被開啟的，尤其是被攝者原本不能被人所接受的念

airiti

頭、情感和行動，且在不知不覺中潛抑到無意識去以保持心境安定的創傷？包括感受是如何被言說的，尤其是被攝者能夠將一連串被破壞而斷裂的連結，逐步重建為一段早已消失的故事？包括創傷是如何被療癒的，尤其是被攝者能夠跳脫過去的各種羈絆，勇敢地將身體與意識的困擾描述出來？

貳、《赤陽》

> （李琳彩遺書）說起此次的事件，令人驚嘆，處在戰爭的嚴苛的情況下，受上官命令所為之事，竟然戰後全部變成個人的罪過，被宣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對家人感到很抱歉，當時臺灣青年的立場，諒大家都知道，請原諒，可是到當地，被訴以冤罪，被再度付諸國際裁判。（陳志和，2007，54’30”）

一、臺籍戰俘監視員

從 1937 年的中日戰爭，到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並發動太平洋戰爭，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無法置身事外地被捲入其中，根據初步的調查統計，當時約有 20 萬 7 千多人，以軍夫、翻譯人員、俘虜看守員、勞工、技術人員、軍屬、海軍巡查補、看護婦、海軍特遣隊、海軍工員、勤勞特設團等等諸多名目，被動員投入各地的戰場。

而 1945 年戰爭結束之後，除了總計約有 3 萬多人喪生之外，至少還有 173 人在戰後的軍法審判過程中成為戰犯[1]，有 26 人被盟軍判處死刑（或絞首刑），其餘 147 人各被判處 2 ~ 20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BC 級），有一群當時參加戰俘監視員徵募的臺籍日本軍伕，就在其中（李展平，2005，2007）。

這批臺籍戰俘監視員，都是參加皇民奉公會所招考的戰俘監視員，他們完成在臺南白河演習所兩週的軍事訓練之後，一部分就被派遣到菲律賓，一部分則於 1942 年搭乘三池丸號從高雄出發，被派遣到北婆羅洲砂拉越的古晉、山打根等地，幾十名的戰俘監視員管理著幾千名的集中營俘虜。

1944 年，盟軍開始所謂的跳島作戰，在盟軍登陸之後，日軍帶著戰俘監視

1 朝鮮則是有 148 人（李展平，2005）。

airiti

員與俘虜撤退並往山區行軍，直到終戰投降，但是，臺籍戰俘監視員，由於他們曾向盟軍俘虜開槍或毆打，導致在戰後的審判過程中，就有 11 人被判死刑、27 人被判 3 ~ 20 年不等的徒刑，並被關押在古晉、納閩、馬努斯、拉包爾等地（李展平，2005，2007）。

隨著審判的陸續結束，原在各地的戰犯也都送達東京的巢鴨監獄統一監禁，1958 年，才被釋放恢復自由之身，然而，由於 1952 年舊金山合約生效之日，日本即宣布「包含居住日本內地的南韓人、臺灣人喪失日本國籍」，而日本後來通過的恩給法，又把上述的戰犯排除在外，導致他們並未能適用此等特別立法之補償。

除了無法獲得與日本戰犯同等的待遇之外，由於日本又依照國籍法，讓他們歸屬於中華民國，但當時方才歷經抗日的國民政府，對於這批臺籍戰俘監視員亦非友善，他們在返臺之後，又往往被視為特定人士來加以監管，《赤陽》所再現的正是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以及似乎已被遺忘的創傷。

二、口述歷史的方法

《赤陽》的導演陳志和，是一位高中美術老師，並非有著專業背景的紀錄片工作者，2004 年，他先因九二一地震而參加了全景基金會的紀錄片培訓班，2005 年，閱讀了李展平關於太平洋戰爭的著作後，才發現到自己的叔公（陳只生）正是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其中一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林木材，2009；林琮昱，2009）。

基於記錄的急迫感以及影像化的念頭，尤其是這群人已經都非常年邁了，如果不馬上記錄下來，這段歷史很可能就會因此消失掉，於是，他開始從自己的叔公記錄起，並找到作為臺灣聯絡人的柯景星，以及連繫上日本的林水木乃至其他的戰友們，並走訪日本、婆羅洲等地，尋覓相關的史料與主角。

拍攝《赤陽》時，上述所提及的 173 位戰犯之中，只剩十幾人在世，並且已經都八十幾歲了，包括了導演的叔公陳只生（1917 年生，刑期 8 年，於 2005 年去世）；已歸化日本的林水木（1925 年生，刑期 15 年），不僅出版戰爭回憶錄，也找律師寫訴訟狀；定居在日本的簡茂松（1925 年生，刑期 5 年），常上節目並接受專訪，籌組臺籍戰犯同志會與發起遊行請願；彰化的柯景星（1920 年生，刑期 10 年），在臺灣幫忙聯繫與傳遞消息；其餘尚有蔡春心（1924 年生，刑期 3 年）、蔡新宗（1923 年生，刑期 10 年）、許清泉（1921 年生，刑期 10 年）、連阿木（1923 年生，無刑期）、周慶豐（1925 年生，刑期 15 年）等等。

airiti

這個紀實音像的拍攝過程，大抵是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讓被拍攝對象依著時序娓娓道來他們從參加戰爭到回臺生活的生命歷程，包括了每個人參加徵募的動機、在臺灣受訓的過程、前往戰場的過程、監視俘虜的生活與築路運輸的工作、盟軍空襲並登陸後日軍撤退往山區的行軍、戰後軍事法庭的審判與被判刑期的原因、從監視員淪為服刑的戰犯（1946 年在拉包爾、納閩服刑、1950 年在馬努斯服刑）、1953 年遣返回到東京巢鴨監獄如何受到與日本人不同的待遇、釋放後每個人的生涯經歷（或者留在日本放棄臺灣國籍取得永久居留權，或者回到臺灣卻已人事已非）。

也就是說，透過紀實音像的再現真實，尤其是口述歷史的方法，這些經歷戰爭的臺籍戰俘監視員，因此得以現身並被看見，他們也得以進一步言說其私密壓抑的身心創傷，包括了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大多都是為了改善家境與生計因素而參與徵募（軍人薪水較高），其動機即具備了無知、受騙或被迫的性質，以及在戰後卻因受命凌辱或槍殺俘虜而導致被軍法審判的無奈（陳志和，2007，12’30”，19’30”，41’00”）。

除此之外，還包括了權利的受損，當時參加日本軍隊的臺籍戰俘監視員，被歸化為日本籍，也就是所謂的皇民，他們被帶往婆羅洲等地負責俘虜的管理，又因服從上級命令虐待囚犯等罪行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而無法歸鄉，從戰俘監視員反淪為被處罰勞役的戰犯，不僅需要等到服完刑期（日本人戰犯回到東京之後幾乎都是釋放回家），之後亦未獲得該有的月俸與人權，在日本社會淪為次一等的殖民地人民，在臺灣與中國社會則是被貼上污名的烙印。

面對戰爭的身心創傷，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亦採取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行動，尋求公開、被理解與療癒的可能性，例如已歸化日本的林水木，他積極地出版戰爭回憶錄、找律師寫訴訟狀、要求日本政府賠償，在 1980 ~ 2006 年期間就上訴了 58 次，希望能藉由法律途徑討回尊嚴和權利，甚至寫信向李登輝總統陳情，卻獲致「你已經是日本人，我無法幫你忙」的回信：

> 我是臺灣出生，做戰爭犯罪者臺灣人，我要爭抗這些事情，不是我個人的事情，我是 173 名，而且這個殖民地，這個朝鮮的 158 名，總共 321 位軍屬的戰犯，日本給我們差別待遇，我自己林水木一個人沒有辦法，拜託你們在後面幫忙一下，歷史是胡扯的，對他們有好處才有在寫，如果對他們沒好處，他就不理睬你，我的告訴是：同樣是戰犯，為何日本人有賠償，臺灣人沒有賠償，這是有差別的。（陳志和，2007，06’25” ~ 07’20”）

airiti

又如未歸化但定居在日本的簡茂松，不僅常上節目接受專訪，並籌組臺籍戰犯同志會，多次發起遊行請願，透過串連的組織工作，他們要向日本討回公道以及連帶賠償，尤其是一樣都是殖民地，南韓的戰犯是有賠償的，而臺灣的戰犯卻是沒有的，他們要求的是公平的對待（濱崎紘一、邱振瑞，2001）。

透過《赤陽》，原本被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視為個人生命史不堪的回憶，經由口述歷史的影音紀錄，不僅得以公開並現身，尤其是他們十七八歲離家，到三十幾歲方才返回家門的歷程，也從庶民的觀點重新檢視了歷史的真實，同時也進一步引出了家國、身分與認同之間的錯綜複雜。

三、解離人格

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乃至影音紀錄的公開，對於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而言，也是某種療癒的方式，尤其是這段戰爭的創傷，讓他們在日本社會猶如棄兒，在臺灣社會又揹負污名，這段禁忌的記憶，只能埋藏在心底而無法紓解，這類的美學實踐，無疑地有助於改變他們噤聲與失憶的困境，例如他們看完影片之後的感受即是「影片把他們內心的話都吐露出來了」（林木材，2009；林琮昱，2009）。

在這創傷公開與尋求療癒的影像旅程之中，更因此揭露了殖民主義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那就是某種身分認同的分歧與錯亂：

他們曾經是皇民，卻在戰時即面臨到差別的待遇，在審判時又因日本長官推諉卸責而被判刑，在戰後更面臨到與日本人不一樣的待遇（陳志和，2007，37’10”），過去承受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時代下，或者在牢獄裡渡過十餘年載，或者被判絞首刑因此喪命回不了家園。

即便是有幸從日本服刑完後，選擇回到臺灣的他們，正當二二八事件過後與白色恐怖時期，受到國民政府的監控與騷擾而苦不堪言，導致他們往往被扣上流氓、思想有問題等等的帽子，一生皆只能以底層勞動維生，並將這段禁忌的記憶藏在內心的深處，甚至有人因此得了妄想症與強迫症（陳志和，2007，97’00”）。

在《赤陽》中，有幾段影像是最能洩漏出分歧與錯亂的無意識表現，一段是談到受絞首刑的李霖彩及其血書，他的血書是用中文書寫，年分、日期與時辰也是用民國與傳統的天干地支觀念，但是，自稱與歲數又夾雜有日文與中文（陳志和，2007，56’00”），而他作為一個被處死的臺灣人，又被承認而奉祀在靖國神社之中（同上引，59’00”）：

airiti

鈴木三郎
遺衣言
母親大人尊前兒大不孝平常膝下
民國卅五年丙戌歲
九月廿二日子時歸終
二十七才李琳彩血書衣服（同上引，56’20”）

又例如這類身分認同的分歧與錯亂，也出現在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的不同抉擇，像有人選擇歸化日本籍，也有人選擇沒有歸化日本籍，有人選擇回到臺灣，也有人選擇回到中國，有人憤慨於日本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也有人在言談舉止之間懷念日本將官與對日本的憧憬，換句話說，他們無論是和日本、臺灣或中國之間都是充滿矛盾與距離的。

特別是在《赤陽》的最後，記錄著一場終戰60年紀念、祭祀戰時亡魂的典禮，不僅將兩國的國旗並置（陳志和，2007，94’00”），而當他們穿上海軍的服裝之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那個年代，並精神奕奕地唱起日文歌〈海行兮〉，換句話說，那是對日本及其時代的一種想要貼近、但又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排拒在外的症狀與反應。

這群臺籍戰俘監視員，透過口述歷史的紀實音像，再現了一段臺灣人身分認同轉換的過程，他們曾經是作為日本人而戰，卻又在戰場上感受到作為受歧視的被殖民者，而戰後他們想公開被認可為（至少曾經）是日本人，才能以日本國民的身分獲得戰爭賠償，然而，在當下的教育與史觀面前，卻也可能因此遭到非議與污名化（朱惠足，2011）。

紀實音像，透過口述歷史的美學實踐，從庶民的身心創傷出發，公開了原本不為人知、被排除的、自我隱匿的體驗與記憶，進一步挑戰著歷史的客觀與國族的敘事，從而映射出某種集體性的徵狀[2]，至少在身分認同上，就好像一個人的身體裡，同時住著好幾個靈魂，它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分別被召喚出來，有如解離人格的精神狀態[3]。

2 1990 年代之後，由於工具、技術與成本的輕便，加上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開放，紀實音像作為再現真實，也逐漸被用以再現日本殖民時期的真實，例如從《跳舞時代》（耿德華，2008）、《尋找 1946 消失的日本飛機》到《綠的海平線》（張家佳，2008）等等，而在這類口述歷史的影像書寫當中，某種身分認同的解離人格，都在紀錄片中留下了蛛絲馬跡，而《赤陽》又是其中最能表現出解離人格的症狀、樣態與表徵。

3 解離（dissociation），「特指一組協調的行動、思想、態度或情緒，據以與這個人人格的其餘方

airiti

參、《漫漫哀傷》

> 我們這些人都很老了，但我們住在一起像一家人，日本，我警告你，別以為砸些錢我們就會讓步，儘管痛苦我們還是會活下去，我們有決心，每週三的抗議已持續 200 多次，我們會戰到最後一人，我們會跟日本人戰到底，讓世界知道我們的戰爭，我們不會輕易死亡，是日本，使我們如鋼鐵般堅強，我們會更加堅強。（변영주，1997，54’30”）

一、韓籍慰安婦

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之下，原殖民地與東南亞各國也都被席捲其中，日軍更以欺騙、利誘與強迫的各種手段，將殖民地與占領地區的年輕女性，送至各地戰場擔任慰安婦工作，在此期間被迫成為慰安婦的各國女性，包括日、韓、臺、中、東南亞，估計也有數十萬人（賴采兒、吳慧玲、游茹蓁、馬聖美，2005）。

當時的日軍為了安定軍心、防止強姦、防治性病等等原因，在亞洲各地遍設慰安所（軍事慰安所、軍人俱樂部、軍人娛樂所），遍布於中國、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爪哇、緬甸、新加坡等地，而所謂慰安婦，即是在此被迫為日軍從事性服務之婦女，甚至被視為一種軍需品與戰略物資（賴采兒等，2005）。

1972 年，南韓女性裴鳳基成為第一位被發現的倖存慰安婦，1990 年，尹貞玉發表慰安婦文章，1991 年，金學順成為第一位公開控訴的倖存慰安婦，有 158 人出面作證曾為慰安婦，民間團體開始提出訴訟，1992 年，設立共同之家，作為倖存慰安婦的住所，並發起週三抗議運動，1993 年，日本政府公開承認此一史實，1995 年，日本政府主導成立亞洲女性基金，試圖以此私下了結，1996 年，在退村設立新的共同之家，1998 年，建立慰安婦主題歷史館，2000 年，發起女性國際戰爭法庭（東京大審）。

根據初步的統計，二次大戰期間，八萬名慰安婦中就有六萬五千名是南韓婦女，而《漫漫哀傷》即是以南韓慰安婦為題材的紀錄片，導演卞英珠，生於 1966 年，1989 年畢業於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法學院之後，就進入京畿道神學院繼

面分離開來並單獨發揮作用的過程（或其結果），……因為每一個的分裂了的方面都保持了它的整合性」（Reber, 1995 ／李伯黍等譯，2003：260）。

airiti

續研習電影，並曾加入女性電影團體「Bariteo」，是 1990 年代南韓重要的紀錄片導演之一（游惠貞，1996）。

1992 年，卞英珠拍了日本觀光客南韓買春之旅的紀錄片，也因此間接地接觸到共同之家及其慰安婦婆婆們[4]，但婆婆們的反應卻多是冷淡、沈默與疏離的，婆婆們的反應，其來有自，原來婆婆們自從公開了慰安婦身分後，全球無數媒體蜂擁而至，採訪的媒體、紀錄片導演不計其數，婆婆們白天接受赤裸裸的訪問，晚上便會回憶起過去慘痛的遭遇，甚至惡夢連連，加上這些媒體採訪並沒有改善婆婆們的生活，反而打擾了她們的平靜（游惠貞，1996）。

從一開始婆婆們覺得卞英珠不過是另一個要來問她們問題、為了拍片接近她們的人，她花了一年半的時間與她們相處，並未拍攝，只是訪問她們，1995 年，她才開始拍攝以南韓慰安婦為題材的系列紀錄片，花了七個年頭，陪伴並守護著垂垂老矣卻依舊等待日本政府道歉的婆婆們，完成了慰安婦三部曲，包括了《慰安婦悲歌》、《漫漫哀傷》及《我的氣息》（游惠貞，1996）。

二、生活、陪伴與合作

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方法，使得婆婆們能夠敞開心胸，同時也逐漸理解到卞英珠她拍片的目的並不是想知道 50 年前慰安婦婆婆們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是想知道這件事為何被湮沒了 50 年？也想知道自從公開之後，婆婆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事情？

本來慰安婦婆婆們常常覺得羞恥而隱藏自己，但拍完一部曲之後，把自己暴露出來或講出來的過程中，似乎發現一種新的快樂，甚至有可能在拍片的過程之中，尤其是卞英珠所採取的一種傾聽的拍攝方式，就成為她們治療自己的過程，因此，婆婆們甚至主動勸說卞英珠繼續拍片。

例如一位跟她最親的婆婆說：「我有肺癌只剩 3 個月可活，只拍 3 個月應該不用花太多錢吧」，於是，在婆婆頻繁進出醫院的最後一年半，卞英珠用鏡頭陪伴她，花了一年半完成了二部曲，之後又進行了三部曲，並採取由其他的婆婆們自己做訪問的方式，企圖在自然的聊天互動之中，聽到當事人的聲音。

相對於其他慰安婦紀錄片，總是企圖透過當事人口述訪談而作為歷史見證並

4 1992 年，卞英珠拍了日本觀光客南韓買春之旅的紀錄片，跟濟州島一個賣春女熟識，女孩說自己是為了幫媽媽籌手術費才下海，她的媽媽，就是當年被徵召的慰安婦，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了卞英珠，她透過在慰安婦共同之家工作的朋友，到中心參觀，剛開始，婆婆們對她很好奇，但一聽她是紀錄片導演，婆婆們反應立刻冷了下來，不肯跟她說話、甚至趕她走（游惠貞，1996）。

airiti

進行控訴，《漫漫哀傷》作為二部曲，卻反倒是採取與婆婆們共同生活、陪伴與拍攝的再現方法，記錄著慰安婦婆婆們向世人現身並公開發聲之後，長達兩年的生活紀事，紀錄的對象包括了金信實（南韓受害婦女後援會）、姜德景（69 歲）、尹今禮（77 歲）、金宣卓（77 歲）、金福童（72 歲）、尹圖禮（70 歲）等等。

當然，在共同生活、陪伴與拍攝的過程之中，婆婆們仍然會提到當初是如何被迫成為慰安婦的，有的是日本老師的命令：

> 我去的時候 14 歲，我的日本老師送我去的，那是命令，我們經過大阪到富山，被安置在一個工廠裡，我跟一個朋友一起逃跑，第一次我們失敗了，第二次當我們跑出來時，被一個卡車司機綁架，我的朋友不見了，我一個人在卡車裡，那時候我月經都還沒來呢，我什麼也不懂，那可惡的卡車司機強暴了我，被強暴後一直在流血，然後又被帶到另一個地方，聽說那裡叫作慰安站，在松代我曾經畫過，每周末身體都要忍受痛楚，被日本人強暴。（변영주，1997，07’30”）

有的則是被警察強行帶走：

> 一個日本人拿著槍要我過去，我不知道他是指我，我轉過頭，他正在對我說話，……所以我用日本話問他，有什麼事嗎，他只是不斷命令我過去，我怎麼樣也不肯，最後他把我拖過去，我反抗並且大吼大叫，……我們到了警察局外面，我被拖到裡面去，……一進去就發現，還有四個年紀跟我相當的女人，我突然瞭解到是怎麼回事，……我自己被抓了。（同上引，39’00”）

除了言說當時是如何被迫成為慰安婦，以及被安置在慰安站的痛苦經驗，包括了試圖逃跑、被強暴等等記憶之外，還有就是回家之後所承受的身體病痛與心理恐懼，無法如其他女性一般正常結婚組成家庭的不幸境遇，乃至於受到社會不公平的歧視與對待，選擇噤聲或壓抑而缺乏宣洩情緒之管道。

不過，在二部曲裡更強調的是婆婆們在公開見證之後的共同生活，尤其圍繞著得了肺癌、為了不被遺忘要求繼續拍攝的姜德景，婆婆們與紀錄者陪伴她經歷生病住院（변영주，1997，11’00”）、出院回到位於退村的新的共同之家（同上引，15’30”）、在共同之家飲酒作樂、夏日野餐（同上引，20’00”）、從事農作

airiti

（同上引，23’00”）、養雞（同上引，33’30”）、互相照顧、定期回診（同上引，36’00”）、病情惡化到婆婆離世（同上引，48’00”）的點點滴滴。

對於慰安婦婆婆們而言，她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其創傷包括了經歷身心的痛苦：

> 那種日子真可怕，持續大約有一年的時間，我開始酗起酒來，變得又消沉又墮落，拒絕好幾次的提親，我有很多朋友，但是都是女的。（변영주，1997，07’30”）

也是某種心理的恐懼：

> 結婚沒多久，我先生便被徵召，在我從慰安站回來之後，我是逃跑的，但先生又被拉走，他一年後生病被送回來，是一種傳染病，所以日本人送他回來，又活了九或十年，他回來時病的很重，警察把我妹妹也帶走，我們兩個都被帶走，我們全家都被整慘了，我先生也被抓去當兵，我三十出頭就變成了寡婦，……現在所有的日本人都讓我不安，有些人是好意，但我覺得心酸。（同上引，14’00”）

更重要的是，慰安婦婆婆們在戰後回歸社會生活之後，仍然必須面對各種歧視與不平的境遇：

> 媽媽和妹妹都不相信我，一天裡和幾十個男人睡，她們說我說謊，我說我沒辦法結婚，媽媽傷心而死，因為她不能保護我，我自己一個人過了一段時間，但受不了寂寞，所以嫁了個離過婚的男人，我騙他說以前結過婚，我們沒有小孩，我發現自己不能生育，我姐妹都有很多小孩，但女人會變得不能生，如果在慰安站待過久。（변영주，1997，26’30”）

三、性暴力

針對殖民主義及其戰爭創傷，慰安婦問題乃是作為南韓社會主要的關注，它涉及了性別、社會階級、族群與國家權力的不同面向，然而，慰安婦作為殖民主

airiti

義及其戰爭創傷的主體，從她們是被如何命名的，就足以進一步透露出其所象徵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Soh, 2000, 2008）。

首先是「慰安婦」，乃是站在法西斯主義觀點的命名，也就是將其視為類似新娘或妻子的禮物，用以安慰皇軍讓他們奉獻並贏得戰爭，它意味著女性是順服的，然而，如此的意涵也非常容易被置放在國仇家恨的單一視框之下，也就是說，被殖民主義所強暴的慰安婦婆婆們，往往被隱喻為自身的母國、土地乃至母親（motherland）的被糟蹋，因此，在戰爭中男性對於女性的強暴並將其視為非人化的軍需品，就意味著是對於整個民族的強暴，從而簡化成為單一的國族仇恨及其對抗（Yang, 1997）。

其次是「挺身隊」，則是站在父權沙文主義觀點的命名，也就是將其視為某種自願參戰的身分，它意味著這原本就是被許可的賣淫，只是現在被當作是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方式乃至軍事的物資，由於它隱藏著女性乃是男性的所有物，是傳宗接代的容器，因此，我們也可以發現到，殖民地的父權傳統與重視貞操，往往也可能作為幫兇（為了改善家境或被賣掉），而回歸社會的慰安婦婆婆們，更因此不被接納，或者選擇噤聲（Yang, 1997）。

最後是「性奴隸」，因此，站在女權運動的觀點，即主張女權就是人權，也就是認為強暴是侵犯女性身體的暴力犯罪，施加於女性的性暴力，就是違背人權，而在戰時由軍隊所犯下的強暴，就是某種戰爭犯罪（Soh, 2000, 2008）。

回到紀實音像而言，當然，它作為紀錄片的題材並不少見，而透過私密創傷的進入公共領域，見證的敘事也可以作為療癒的場景，包括透過創傷敘事的公共化衍生社會支持的效應乃至心理創傷的療癒（彭仁郁，2012）。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對於慰安婦婆婆們而言，這類私密創傷的公開化，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或局部性的療癒與復返，尤其是由於媒體往往關注並再現的的是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並用以比對文件紀錄之類的客觀事實真相，慰安婦婆婆們作為女性主體的生活經驗與生命存在，往往就被邊緣化了（Yang, 2008）。

透過女性導演卞英珠，以生活、陪伴與合作的美學實踐方法，進一步完成的慰安婦三部曲，在《漫漫哀傷》的二部曲裡，我們還看到的是某種紀錄者與被攝者透過紀錄片文化生產的對話過程與互動關係，甚至是化被動為主動的角色互換（변영주，1997，17’00”，29’00”）。

也就是說，在《漫漫哀傷》這部慰安婦紀錄片中，著重的卻早已不是婆婆們的口述如何作為公開見證的歷史文獻，也並非是創傷經驗的激烈控訴，更重要的是，透過一種生活、陪伴與合作的美學實踐，它再現了另一種慰安婦婆婆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不斷地召喚記憶、言說創傷與表達感受的療癒過程。

airiti

例如，在紀錄片中，主要是以罹癌的姜德景作為被攝對象，包括她如何透過自己的繪畫，還原過去的經驗，並抒發身心的創傷，同時，婆婆們也透過共同之家的互相照顧，她們共同生活在一起，或者喝醉酒、或者互開黃腔與男人的玩笑，甚至是一起面對自己與同伴的死亡。

又如，在《漫漫哀傷》這部慰安婦紀錄片中，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拍攝方法（변영주，1997，18’00”，30’00”，50’00”），也逐漸使得拍攝紀錄片及其過程，成為某種療癒的方法，藉此，慰安婦婆婆們希望不被遺忘，主動要求拍攝，直到生命盡頭，甚至可以一起聊著來世的夢想，有的希望能好好讀書當教授，有的戲稱想投胎當男人，有的想好好結婚懷孕生子（同上引，56’30”）：

> 我一直想著這部影片，或許會有很多人看，我祈禱大家都來看，我希望很多人注意到它，可能會有人受到感動來幫助我們，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同上引，50’00”）

綜而言之，透過生活、陪伴與合作的方法，紀錄者不再是外來的、優越的或高高在上的，被攝者也不再是弱勢的、無力的或需要照顧的，《漫漫哀傷》再現了慰安婦婆婆們在公開證言之後於共同之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她們互相照顧、扶持、面對疾病、死亡、分享記憶、創傷的最後旅程。

進一步言之，它不僅因此翻轉了慰安婦婆婆們只是國仇家恨的象徵，更加凸顯的是，她們是殖民主義、父權體制與性暴力的多重壓迫之受害者（Soh, 2000, 2008），也落實了慰安婦婆婆們作為殖民主義及其戰爭創傷的主體及其主體性，在此，翻轉了女性作為影像的客體，不只是為國仇家恨而存在，也不只是被父權體制所觀看與想像。

肆、《怒祭戰友魂》

> 對各位而言，所謂國家或許是很重要的吧，但是，就我的人生經驗來說，日本和世界上所有所謂的國家，都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疏離、阻礙人類融合的最大障礙，國家，甚至家庭，都是讓所有人疏離斷絕的一道牆，這是違反了神的法則，今後我會更加激烈地去攻擊。（原一男，1987，03’00”）

airiti

一、日籍參戰老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前述的臺籍戰俘監視員、韓籍慰安婦涉入其中之外，作為帝國內地的日本人，當然也脫不了干係，紀錄片《怒祭戰友魂》的主角奧崎謙三，當時就是跟著所屬的獨立工兵第 36 連隊，出征到印尼的西新幾內亞作戰，這個部隊原本有同僚 1,300 多人，但是，最後生還回到日本的卻僅剩 100 餘人。

然而，更為駭人的是，這個部隊的成員他們大多都不是因為戰鬥而死亡，卻是因為食物缺乏而飢餓致死，奧崎謙三本人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年就先被俘虜，因此躲過了飢餓致死的境遇，但也就是在約莫昭和 19 年（大戰結束前一年），在印尼西新幾內亞的叢林中，他的大部分同僚卻逐漸被逼入於沒有食物只好吃人肉的慘況，甚至在日本已宣布投降的 23 天之後，還發生長官以逃兵罪名槍殺同僚的事件。

戰後奧崎謙三回到日本之後，即因上述的戰爭經驗而從事反體制運動，甚至因曾在天皇誕辰拿彈弓向天皇攻擊的暴力行為，而被稱之為「用小鋼珠（彈弓）射擊天皇的男人」，透過這部紀錄片及這麼一趟追尋戰時真相之旅，他似乎也因此找到了具體的對象，甚至將言語化為行動，後來更因攻擊這位中隊長的長子而入獄 12 年（Spinks-Hvas, Kazuyuki, & Yoshio, 1997）。

《怒祭戰友魂》的導演原一男，1954 年，出生於山口縣，1965 年，進入東京攝影技術學院，一年後即輟學離校，1972 年，成立疾走工作室，儘管，從他的創作年表來看，紀錄片的作品看似少量並不多產，但是，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發社會的爭議，甚至是不斷挑戰著美學的界線（Spinks-Hvas et al., 1997）。

尤其是處在日本社會已經高度資本化的年代，他拍攝紀錄片的創作態度，和前一代的小川紳介、土本典昭有所不同，他往往是藉由一個特定個體的紀錄，尤其是較為禁忌的話題，來探討社會的問題與事件，而與被拍攝對象之間的強烈碰撞，更是企圖突顯任何人在攝影機前面呈現的行為都是虛構的觀念（湯禎兆，1996）[5]。

---

5 例如《再見 CP》（1972 年），疾走工作室與智障者協會組織青芝的橫田弘、橫塚晃一合作，探討腦性麻痺者的生活、家族、婚姻與性，他細細拍攝扭曲的肉體，逼視身障者身體的禁地，甚至衍生了與緊密跟隨的攝影機之間的衝突，以及對象的妻子對導演及對象的不信任。例如《戀情一九七四》（1974 年），則是他私生活的剖析，並被視為是日本私紀錄片的濫觴，本片由他的現任妻子小林佐智子協助錄音製作，紀錄導演與前妻武田由紀美之間，既親密又激烈的關係，從私密的、個人的紀錄，逐步帶出了沖繩獨立運動、政治行動主義與女權主義等等社會關注的議題。例如《全身小説家》（1994 年），則是描繪一位戰後文學作家知名小説家井上光晴，尤其是其充滿虛構謊言的人生，導演不僅大膽插入虛構的戲劇情節，並再現傾慕者與作家之間精神戀愛的關

airiti

至於《怒祭戰友魂》，則是從 1982 年開拍，迄 1987 年才完成，導演先找到上述部隊約 30 位的倖存者並進行初步訪談，之後導演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跟拍奧崎謙三如何採取神風特攻隊式的突擊行動，一一尋訪二次大戰期間的部隊同僚，以試圖找出真相，甚至回到仍處於內戰的新幾內亞（影片被沒收半年後才取回），最後是由鍋島惇後期剪接完成。

二、參與觀察的行動

回到《怒祭戰友魂》，一開始的片頭即是對於奧崎謙三這個影片中的主人翁作一介紹，包括他今年 62 歲，從事中古車修理的工作，和妻子、一條狗居住在神戶市兵庫區荒田町，以及他為同是反體制運動者的朋友作媒、主持婚禮並發表感言，以及他如要離開前往東京必須向轄區警備課長報備。

而從字卡的奧崎謙三大事記中，也可以粗略瞭解到他並不屬於任何組織卻從事和天皇制度對抗的運動，包括 1956 年因殺害某不動產業者而被判拘役 10 年、1969 年因在新年皇宮慶典用彈弓射天皇而被判拘役 1 年 6 個月、1976 年因散布天皇的色情傳單而被判 1 年 2 個月、1981 年因策劃殺害田中角榮而被逮捕但不予起訴（原一男，1987，04’00”）。

促使他從事反體制運動的原因，即是二次大戰期間的軍旅生活，尤其是跟著所屬部隊出征到新幾內亞作戰的經驗與記憶，影響最為深遠，於是，導演跟拍奧崎謙三，開始了一段尋訪部隊倖存同僚之旅，而透過這樣的旅程，戰後選擇從事反體制的他，與已經回歸平凡的戰友們，也就發生了一段一段身體的與心理的衝撞過程。

首先，是他前往醫院，探訪原士官的山田吉太郎，並將其多次入院開刀，歸因為預料中的天譴，認為是戰後的生活態度所導致的結果，尤其是有過戰爭體驗的人，不應該過著一般人的正常生活，應該出面提出見證甚至進行抗爭（原一男，1987，07’00”）。

又前往廣島縣江島田町，悼祭在西新幾內亞阿爾所死亡的同年兵島本政行，告知其母親當時如何埋葬他的遺體，而其他的人都無法入土，並與其母親一同悼祭，吟唱母親的歌謠，以及前往兵庫縣浜坂町與南淡町，悼祭餓死的山崎豐與被毒箭射死的田中三郎（原一男，1987，18’00”）。

係，透過作家如何説謊及虛構自己的經歷，進一步探討文學創作與真實之間的關係（Spinks-Hvas et al., 1997）。

airiti

其次，為了還原日本宣布投降後 23 天，中隊長古清水正雄槍殺上等兵吉澤徹之助的事實，他前往岡山縣矢掛町，拜訪原士官高見實（原一男，1987，26’00”），以及島根縣伯太町，拜訪原士官妹尾幸男，卻因不滿對方的態度而發生了肢體的衝突（同上引，30’30”）。

又前往拜訪吉澤徹之助之妹崎本倫子，她也認為兄長可能是因為礙了大家的事而被處刑（原一男，1987，37’00”），於是他、吉澤徹之助之妹與野村壽也（另一位被處決的士兵野村甚平之弟）開始同行，一起拜訪舊戰友追討戰爭真相。

他們陸續前往東京都世田谷區，拜訪原行刑下士的會川利（原一男，1987，38’30”），得知妹尾幸男也是行刑的士官之一，以及山梨縣石和市，拜訪原士官長原利夫，因他欲言又止的態度，更增加了可疑性（同上引，42’00”），以及神戶市長田區，拜訪原衛生兵濱口政一，才終於瞭解到兩人是因逃兵而被處刑，以及戰爭期間被迫吃人肉的慘況（同上引，54’00”），以及兵庫縣州本市，拜訪原軍醫丸山太郎（同上引，66’00”）。

第三，後來因兩位遺族決定不再與他同行，他就請桑田博及自己的太太假扮成兩位遺族繼續調查真相，前往廣島縣大竹市，拜訪原中隊長古清水正雄，質疑他未經軍法審判所做的處分，但他辯稱是：兩位吃了土人，且是軍司令部的命令，執行槍決也不在場（原一男，1987，70’00”）。

一行人又再回到島根縣伯太町，拜訪妹尾幸男，與岡山縣矢掛町，拜訪高見實，他們的證言才終於逐漸托出當時的行刑情況，包括古清水確實在場並使用手槍補上一槍（原一男，1987，80’00”）。

最後，他前往埼玉縣深谷市，拜訪已出院的山田吉太郎，這次找了同樣也是反體制運動者的大島英三郎假扮遺族，進一步追問當時抽籤定生死的事件，彼此都認為是被當時的領導人影響而捲入這場洪流，但對於如何處理這類創傷卻有著不同意見（「我有我的供奉、你有你的方法」），也險些發生肢體衝突，更進一步道出戰時人吃人的真相（原一男，1987，90’30”）。

片尾陳述他前往新幾內亞，但在當地活動的實況紀錄影片，被印尼情報局所沒收，後來還開槍造成中隊長古清水的長子重傷，逃亡、通緝後被捕，並以殺人未遂被判刑，他的太太則繼續宣傳他的理念直到她過世。

三、伊底帕斯

對於奧崎謙三及其倖存的戰友們而言，二次大戰期間，遠赴印尼西新幾內亞的戰爭經驗，乃是猶如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境況，這包括了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仍有

airiti

不合理的槍決行刑、食物缺乏導致人吃人才能活下去乃至時時面臨死亡的威脅，都成為戰後回歸到日常生活裡，不願意再被提起的創傷記憶。

然而，如果大多數人選擇沉默、默默供奉並過著戰後的日常生活，奧崎謙三卻並不這麼認為：

> 老天爺讓你活著回到日本，不是讓你過這種生活，……總之，從那戰爭中很特殊的活著回來，回來的10年，卻和一般人生活沒有兩樣，活著只想自己的事，作了不能太誇耀的事，我認為這種生活態度遭天譴，……那是因為你活著回來，而別人都死了。（原一男，1987，119’00”）

因此，他採取了不同的生活態度，並非是潛抑也不是阻抗，或者說是選擇了不同的療癒方式，他認為正是天皇制度引發了戰爭，並指責天皇乃是發動戰爭、應受處分的元兇，必須重新思考其爭議和地位，甚至認為他的敵人就是這龐大的國家體系，他從戰爭中回來，不應該過著戰後的平常生活，而是應該積極地抗爭，例如他時常於天皇誕生日開著寫滿要求天皇負責文字的車子前去抗議等等：

> 現在，我奧崎謙三，要在這裡，安慰那些為裕仁天皇而犧牲的人，為無數犧牲亡靈舉辦慰靈的弔祭，……奧崎謙三在此，在裕仁天皇生日的今天，要安慰那些因為天皇裕仁，因為在位到81歲的裕仁本人，及他的同夥所害而犧牲掉的無數靈魂，在戰爭時，我屬於獨立工兵第36連，在新幾內亞，自連長以下，幾乎全餓死了，……對我來說，偉大的人物是遵從神的法則，不畏人所訂定的法律。（原一男，1987，26’30”）

而透過紀錄片的再現真實，他找到了更為具體的對象，尤其是他一一尋訪二次大戰期間的部隊同僚，無論是動之以情，亦或逼迫威脅，在在都是表達他認為將戰時經驗與創傷記憶公諸於世，甚至是認罪道歉，才是應該採取的生活態度與抗爭方法，如此方能進一步凸顯戰爭的責任歸屬：「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慰靈的儀式，我將對兩個不負責任的人，就是帝國軍隊最高統帥，裕仁天皇和古清水」（原一男，1987，101’00”）。

換句話說，《怒祭戰友魂》讓我們看到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問題，不是只有跟

airiti

海外的殖民地有關，在殖民母國內部也會發生殖民地化的問題，尤其是自殖民地化裡產生的各種文化與心理病理，它所帶出的各種破壞力，也會在它們自己的內爆並作用著，使得自身也會受制於殖民意識型態的宰制與影響[6]。

而從《怒祭戰友魂》來看，則是充滿了某種伊底帕斯的情結，Freud 以此希臘寓言來陳述某種子女與父母之間難以割捨、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奧崎謙三的療癒（或者說是爆發）方式來看，戰爭經驗已然成為其自身的創傷記憶，而從他特地前往悼祭同年兵並撫慰其母親，到對於戰時長官的不斷逼問，並企圖槍殺古清水隊長的行為，乃至強烈批判日本天皇威權的言語行動，都在隱喻著竭力擺脫來自家父長的壓力甚至是對於家父長的刺殺（李墨，1988）[7]。

伍、結語

過去，由於工具、成本與技術的門檻，且因其往往被視為是真實且客觀的並具有誘導的功能，紀錄片從實況影片（actualities）、科學或教育影片（science & education）、風景或旅遊影片（travelogue），逐漸發展為新聞（newsreel）與宣傳影片（propaganda），紀錄片的再現真實，切合著殖民主義的治理需求。

但在後殖民的時期，伴隨著工具的輕便與技術的普及，紀錄片作為文化生產，往往也成為再現殖民經驗的方法，尤其是透過它的紀錄、揭露或保存，讓我們得以見證到殖民主義的真實，乃至進一步產生說服或宣揚、分析或質問、美感或表達的效果（Renov, 1993），以傳達反（去）殖民的反思。

然而，針對與殖民經驗有關的紀錄片，除了個別社會的關切之外，卻也往往較為缺乏區域比較的視野，同時，除了被攝對象的殖民記憶是如何作為作者導演的歷史觀點之外，卻也較為缺乏紀錄片的美學方法，如何作為紀錄者與被攝對象的對話過程，乃至於可能的療癒行動，並進一步反映並建構著不同社會對於殖民主義的追問。

首先，上述三部紀錄片雖各來自不同的地域及其社會，但其被攝對象皆是

6 反映在紀錄片的美學實踐上，還包括了大島渚於 1963 年製作的《被遺忘的皇軍》，透過在日朝鮮人老兵的四處陳情與艱困生活，震撼了日本社會並控訴著國家暴力，以及土屋豐於 1998 年製作的《天皇有責》，導演直接把麥克風遞給靖國神社附近的路人，一一詢問他們是否認為日本天皇應負戰爭責任。

7 伊底帕斯情結（Edipus complex），「指兒童所感到對雙親的愛戀與敵意慾望的組織整體。在所謂正面形式中，該情結以一如伊底帕斯王故事中所述的方式中出現：希望其對手——同性人物——死的慾望，以及對異性人物的性慾望。在負面形式中，它出現的方式相反：對雙親中同性者的愛，以及對異性者的妒恨」（Laplanche & Pontalis, 1981 ／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86-89）。

airiti

因殖民主義，尤其是因外力的戰爭經驗而在青春時期受到身體乃至心靈創傷的主角，包括了臺籍戰俘監視員、南韓慰安婦與日本參戰軍人，他們都是作為底層階級，都因被捲入到殖民主義的戰爭，而承受身心的創傷。

同時，紀錄者也各自採取差異的再現方法與美學實踐，在《赤陽》中，是透過口述歷史的形式，讓他者作為歷史真實的親身見證，在《漫漫哀傷》中，是透過陪伴合作的形式，讓他者再現共同生活的身心狀態，而在《怒祭戰友魂》中，更是透過參與觀察的形式，記錄他者的政治行動。

這類創傷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以正常方式排解，甚至形成永恆的困擾或阻塞的狀態，而透過紀實音像的文化生產，開啟了對話的過程，包括個人私密創傷經驗的公開化，我們得以認識到殖民經驗中外在創傷事件的暴力性質與殘酷程度，以及這個創傷如何因其敏感與禁忌，而成為他們長期地所衍生出像是有意識的噤聲、無意識的失憶乃至偽裝性的滿足等等作為某種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症狀或反應。

其次，上述三部紀錄片，紀錄者都選擇了在當代社會中被視為「他者」的被攝者或對象，作為被攝者的他者，在這三部紀錄片中，都涉及到因殖民主義的戰爭，所造成的流離經驗，以及他（她）們作為倖存者，如何隨著帝國主義的瓦解，回歸社會生活的困境，症狀具有每種意義並與其創傷的經歷有關，甚至他們都固著於自己過去的某個特殊的階段，彷彿無法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似的，他（她）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透過創傷的追問，不斷地在描繪自己的經驗，以建構如何面對過去，並指出現在所處的位置，以獲得心理的療癒。

在《赤陽》中，是臺籍戰俘監視員從作為日本人而參戰、戰後不被日本所承認到國民政府懷疑監控的歷程，在《漫漫哀傷》中，是南韓慰安婦從勇於公開見證、相互扶持共同生活到面對死亡的歷程，而在《怒祭戰友魂》中，是日本參戰軍人從被徵調從軍、餓死或處死到追求真相的過程。

也就是說，透過紀錄片再現真實的美學實踐，它讓戰爭的創傷經驗得以被看見，而被看見往往就是形成記憶乃至對抗遺忘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作為被攝者的他者，他（她）們所選擇去記取的過往並非零散無序，乃是人格的形塑和撿選的產物，甚至是一個世代、階層乃至文明的共同經歷、集體記憶乃至身分認同之反射。

第三，如果以精神分析的診斷方法，來閱讀這三部與殖民經驗有關的紀錄片，藉著影像的再現真實，更加反映出不同的「喻象」及其敘事框架，尤其是透

airiti

過紀錄片的美學形式，除了創傷記憶的公開化之外，它們的被攝對象也都採取了不同的療癒方法，進一步凸顯著受創傷的主體如何理解記憶並詮釋經驗？乃至於如何透過言說與行動去尋求某種療癒的可能及其實踐？

在《赤陽》中，透過臺籍戰俘監視員的口述歷史，我們所觀看到的是某種解離人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在《漫漫哀傷》中，透過南韓慰安婦的共同生活，我們所觀看到的是因性暴力受害的女性，而在《怒祭戰友魂》中，透過日本參戰軍人的追尋真相，我們所觀看到的是伊底帕斯的弒父情節。

換句話說，透過紀錄片的再現真實，受創傷主體的公開記憶、詮釋經驗乃至尋求療癒，意味著他們是如何想像自己的存在及與他者之關係（朱惠足，2011），它們反映並象徵著不同地域的社會群體，對於殖民經驗是什麼、為何存在殖民創傷、如何擺脫殖民主義等等的感知異同。

綜而言之，透過上述分析，本文試圖強調紀錄片再現真實的美學實踐，如何作為再現一個早期創傷—防衛—潛伏—爆發—受壓抑的復返等等心理歷程，使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壓抑或遲發之憂傷，能夠透過聆聽（或者說是記錄）創傷，轉變了這個循環（Chen, 2005 ／周靈芝、項幼榕譯，2014）。

當然，我們也在討論中會發現到，紀錄作為創傷的療癒，未必就是所有創傷主角的療癒選擇（例如《怒祭戰友魂》的其他參戰老兵），同時，如果立基於不對等的拍攝關係或者不適當的製作方法（例如《漫漫哀傷》慰安婦婆婆們過去曾有的媒體經驗），也有可能只是局部的復返，甚至造成更大的傷害。

但是，它也進一步提示著紀錄片具備去殖民的可能性，尤其是相對於語言或文字的隔閡（例如口述歷史的文本），影像更能再現共通與共鳴的心理與情感，透過類似這樣的並置與比較，我們得以跨越國界與國族的敘述，進而真正以社會的他者之視角，重新建構在所謂歷史客觀與真實之外的邊緣人或被壓迫者，得以連結起來的動能與潛力。

參考書目

丘延亮譯（2012）。《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臺北，臺灣：臺灣社會研究雜誌。（原書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朱惠足（2011）。〈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文化研究》，12：13-44。

airiti

吳瓊編譯（2005）。《凝視的快感：電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Metz, C. [1982].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李伯黍等譯（2003）。《心理學辭典》。臺北，臺灣：五南。（原書 Reber, S. A. [1995].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李展平（2007）。《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臺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5）。《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南投，臺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李墨（1988）。〈一部反天皇紀錄片的誕生〉，《人間》，7：178-180。

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精神分析辭彙》。臺北，臺灣：行人。（原書 Laplanche, J., & Pontalis, J.-B. [1981].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周靈芝、項幼榕譯（2014）。《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臺北，臺灣：典藏藝術家庭。（原書 Chen, H.-C. [2005]. *Beyond commemoration: The 2-28 incident, the aesthetics of trauma and sexual difference*. Leeds, UK: University of Leeds）

林木材（2009）。〈追探生命裡的歷史——《赤陽》與陳志和〉，《國藝會》。取自 http://woodlindoc.blogspot.tw/2009/12/blog-post.html

林琮昱（2009）。〈專訪陳志和導演談《赤陽》〉，《紀工報》。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10.html

原一男（導演）（1987）。《ゆきゆきて、神軍》【紀錄片】。東京，日本：社会思想社。

孫名之譯（2002）。《夢的解析》。臺北，臺灣：貓頭鷹。（原書 Freud, S. [1965].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New York, NY: Avon Books.）

耿德華（2008）。〈為兩代而舞的《跳舞時代》〉，《電影欣賞》，134：57-60。

張家佳（2008）。〈紀錄片中的歷史思維：以《尋找 1946 消失的日本飛機》與《綠的海平線》為例〉，《電影欣賞學刊》，134：167-179。

陳志和（導演）（2007）。《赤陽》【紀錄片】。臺北，臺灣：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陳儒修、鄭玉菁譯（2004）。《佛洛伊德看電影：心理分析電影理論》。臺北，

airiti

臺灣：書林。（原書 Lebeau, V. [2001]. *Psychoanalysis and cinema: The play of shadows*. London, UK: Wallflower.）

彭仁郁（2012）。〈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臺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文化研究》，14：139-196。

彭舜譯（2001）。《精神分析引論》。臺北，臺灣：貓頭鷹。（原書 Freud, S. [1991].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 analysi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游惠貞（1996）。〈捕捉慰安婦生態的「私語心聲」：邊永主訪談錄〉，《電影欣賞》，80：25-28。

湯禎兆（1996）。〈追求「演出」的紀錄片作家：原一男對現實的重構〉，《電影欣賞》，79：26-28。

賴采兒、吳慧玲、游茹棻、馬聖美（2005）。《沉默的傷痕：日軍慰安婦歷史影像書》。臺北，臺灣：商周。

濱崎紘一、邱振瑞（2001）。《我啊！一個臺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臺北，臺灣：圓神。

변영주（감독）（1997）。《낮은목소리》【다큐멘터리】。서울，대한민국：영화진흥위원회。

Bergstrom, J. (Ed.). (1999). *Endless night: Cinema and psychoanalysis, parallel histor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ath, S. (1999). Cinema and psychoanalysis: Parallel histories. In J. Bergstrom (Ed.), *Endless night: Cinema and psychoanalysis, parallel histories* (pp. 25-56).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nov, M. (1993). Toward a poetics of documentary. In M. Renov (Ed.), *Theorizing documentary* (pp. 12-36). New York, NY: Routledge.

Soh, C. S. (2008).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0). From imperial gifts to sex slaves: Theorizing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omfort wome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3*, 59-76.

Spinks-Hvas, Kazuyuki, N., Y., & Yoshio, Y. (Ed.). (1997). *The pursuit of japanese documentary: The 1980s and Beyond*. Tokyo: YAMAGAD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Yang, H. (2008). Finding the "Map of memory": Testimon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survivors. *Positions*, *16*, 79-107.

airiti

-- (1997). Revisiting the issue of Kore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The question of truth and positionality. *Positions*, *5*, 51-72.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181-205, January 2017

Documentary as Healing of Trauma: *Heat Sun, Habitual Sadness* and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

Tsai, Chin-To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Documentary & Film Archiv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uma of World War II in three documentaries, namely *Heat Sun* (2007) from Taiwan, *Habitual Sadness* (1997) from South Korea and *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 (1987) from Japan, and specifically explores how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ies becomes a healing conversation and a form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se documentaries, three directors used different methods (just like oral history, companion or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represent traumatic memories, experiences or narratives of subjects (whether Taiwanese-Japanese-soldiers, South Korean "Military Comfort Women" or Japanese soldiers) under imperialism. The whole 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shooting, editing to screening) of documentaries thus became some kind of healing conversation in the psychoanalysis therapy.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a dialogue contained in these documentaries is needed and opens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connections among vulnerable or minority groups in East Asia to shar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trauma memories with one another, and to cooperate to rethink the influence or meaning of colonialism until now.

Keywords: East Asia, documentary, colonialism, healing of trauma, psychoanalysis

* Email: tonytsai@mail.tnnua.edu.tw
Received: 2015.6.27
Accepted: 2015.10.8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207-239．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8

中國新聞傳媒的組織場域、領導風格與文化：以《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為例

王毓莉 *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深度訪談 13 位曾任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南方人發現，《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所處場域，雖具有相對自由發揮空間，但仍需與當權者持續博弈，爭取新聞空間。集團領導者多扮演管制者與抗爭者雙重角色，具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領導者風格為：「舉才不分背景，文才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造就黃金十年獨有的「289 南方大院」組織文化氛圍。

關鍵詞：《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組織場域、領導風格

* Email: ylwang1022@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1 月 1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大陸對於新聞媒體的管控嚴格，至今仍未鬆綁，不過強大的新聞控制下，仍然存在一批不同於傳統黨報「喉舌」的媒體。尤以隸屬於廣東省委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為代表，集團中最受推崇的兩報一刊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與《南都周刊》，被知識分子推崇，視其為中國最坦率和敢說話的媒體。

雖然中共對於新聞的管制仍然嚴苛，但由於新聞媒介第三產業屬性，媒體被要求「自負盈虧」，因此，新聞媒體必須在官方宣傳任務與閱聽眾的需求之間，尋求平衡點，同時注意新聞媒介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效益。而中國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下，中央權力下放地方後，地方諸侯經濟坐大，貪腐事件層出不窮，反貪腐成為政治改革的核心重點。因此，在政治改革支持新聞媒體監督貪腐事件與傳媒商業化的雙重邏輯下，「新聞輿論監督」（news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在中國大陸的出現，可以被理解為，在對的時機與對的需求點上（王毓莉，2010：5-6）。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在國家控制與市場競爭的背景下，也開始尋找新的經濟來源，子報《南方周末》趁勢從報導娛樂新聞、社會新聞的定位，轉型以新聞輿論監督為主，主打深度調查式報導（李小勤，2007）。記者們紛紛使用探底線的報導方式，大打擦邊球，希望在政治箝制與收視市場之間達到最能為組織帶來利益的平衡。此背景下，以「為民申冤」、「揭黑式」報導形象，快速取得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王毓莉，2010：167）。

然而，由於中國大陸新聞傳媒的特殊角色，除了需遵守商業生存邏輯，因其產權仍屬於國家，所以，新聞輿論監督的出現，便對政治、經濟、社會三者產生莫大衝擊，經常需要與商業利益、國家新聞管制，做不同的碰撞與妥協。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轄下的《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時常衝撞體制，遭到當局政府或權力單位整肅。根據張小麗（2004 年 6 月 2 日）研究，2003 年以後《南方周末》的批評性報導下降，特別是跨地區輿論監督的數量從 1997 年的 91.5% 降至 2003 年的 28.7%，至 2005 年後，這樣的跨地區報導幾乎已無法執行。2008 年又面臨汶川大地震發生，《南方周末》探討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引來當地政府極大的不滿，直指媒體的行為是在為救災「添亂」。之後在 2008 年這一年，《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都遭到官方緊密的盯梢，報社內部風聲鶴唳，輿論監督報導難以進行（王毓莉，2010：170）。一直到 2013 年《南方周末》發生新年獻詞被竄改一事，乃至 2014 年「21 世紀報系沈灝事件」，都顯示官方對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強烈打壓。

airiti

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研究方面，張小麗（2004 年 6 月 2 日）以《南方周末》為主體，討論該報的新聞專業主義與自由主義。張志安（2008）嘗試以新聞專業主義為理論視角，對中國大陸深度報導實踐的軌跡進行回顧與反思。王毓莉（2012）亦曾以「權力」與「反抗」的角度，探討南方報業集團記者從事新聞產製時的馴服與抗拒策略。上述研究著重於新聞專業層次的傳播者研究，較缺乏組織層面的關照。

因此，本研究選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作為研究對象，並且注重前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與政治控制的爭鬥過程，希望探討該集團面臨的組織場域、組織領導與文化。據此，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面臨的組織場域為何？

二、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類型為何？

三、《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與文化為何？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期望探討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面臨的組織場域、組織領導與文化，以下針對場域理論、領導類型等相關理論，加以檢視。

一、場域理論

場域是個人與結構之間關係的工具 (Bourdieu, 1993: 13)。舒嘉興（2001）指出，對於「場域」一詞無需過分複雜的想像，只需要代以領域或界域的概念，便可以很容易理解。

Bourdieu 指出，分析一個場域，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位置，其次必須勾勒出行動者或機構所占據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結構，包括各種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的利用與獲取。Bourdieu 認為每一個具有生產性關係的環節中，皆可能隱藏著權力關係。也認為社會空間是由人的行為場域所組成，行動者在各個場域中的實踐活動，都與社會結構關係緊密。而場域的一般社會空間，一方面是力量的場域，這些力量是參與的行動者所需具備的；另一方式，又是一種鬥爭的場域（高宣揚，2002：228-232）。

在 Bourdieu 看來社會空間就像市場體系一樣，人們依據不同的特殊利益，進行特殊的交換活動；而社會空間是由許多場域的存在而結構化的，這些場域如同市場一樣，進行多重的特殊資本競爭（邱天助，1998：121）。

airiti

從媒體的組織管理角度觀之，Bourdieu 曾指出新聞場域，如同被象徵性暴力的現象所籠罩（張意，2005：142）。進入一個場域就像參加一場遊戲，參加者必須遵守場域中所制訂的遊戲規則。而參與者陷入遊戲當中，他們之間激烈的對立，是因為他們都有一致由衷的信仰（doxa），他們競爭和衝突的根源，就在這個一致相信的默契上（Bonnewitz, 1997 ／孫智綺譯，2002：82）。此種信仰與默契在於，Bourdieu 認為象徵暴力的特點，在其施行的同時，會獲得承受者默許的共謀，而且連施行的人，也常常承受這種暴力，因為施暴者與承受者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Bourdieu, 1996 ／林志明譯，2002：21）。所以遊戲參與者與制定者，不但受到不同資本的優先順序考量，同時也會因場域變化後的不同而改變。

舒嘉興（2001：18）指出，新聞場域中絕不能忽略其他場域權威者所施加的力量，這種力量並非只有經濟影響力，包括機關、警政單位、各研究機構對新聞訊息的壟斷而對新聞業者形成的壓力，猶如這些單位的鬥爭武器用來對付新聞業者一般。像「官方消息」就是一種支配型態，可以合法的掩護、裝飾新聞的真實性，以做為操控的手段。

黃順星（2010）指出，報業不只受外部力量的壓迫與刺激而產生特定的面貌，也受內部競爭而產生不同的行動策略。他將新聞產業視為文化產物，發現新聞必不可免的會受制經濟與政治力量的牽引，如 1960 年代臺灣《自由時報》加入與當時《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的競爭局勢，無不受到恃從報業的影響。

曹麗紅（2014）研究中國調查記者的行動實踐，發現伴隨著新聞場域（政治空間）的緊縮，調查記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不過這群記者仍具有新聞人的職業理想與專業，會運用自我審查與即興創作，展開應對的行動。

二、領導類型、風格與文化

領導乃是為了達成組織目標，讓領導人員發揮其影響力，領導風格是由個人的行為方式所組成，足以影響別人，行為包括「指導（任務）行為」和「支持（關係）」，不同的領導類型下的領導風格，可能會使組織產生變革。

過去探討領導理論，主要根據 Bryman (1992) 的分類，從特質理論、行為理論到情境權變理論。特質理論是從領導者的特徵及人格特質來判斷，強調領導者的特質是與生俱來，無法藉由後天培養，又稱為「偉人論」。如 Stogdill (1974) 曾將與領導相關的特質，劃分為「能力、責任、成就、參與及地位」，而後，轉向行為理論，注重討論領導者所表現出來的行為風格，認為領導者是創造出來而非天生。Lewin, Lippitt, & White (1939) 提出的領導效能差異，主要討論三種領導

airiti

類型：「獨裁式領導」、「放任式領導」和「民主式領導」。不過，這類研究往往傾向領導者個人特質的單一分析，忽略領導與部屬間雙向互動之本質。

1980 年以後研究開始注重情境，轉向強調領導與部屬的雙向交流，主張領導者必須具有願景，領導的功能在於能對成員產生轉化的影響（梁榮輝、陳建壕，2005：107）。新型領導理論包括「魅力型領導」、「參與式領導」、「交易型領導」、與「轉換型領導」。

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是以個人魅力，融入組織的目標、任務、制度，使追隨者認同領導者就代表組織。House (1976) 指出魅力型領導者特徵如下：具備支配性、有強烈的欲望來影響別人、具有自信及強烈的個人道德價值。他們擅於運用言語、象徵性行動來激起其他的員工對他的崇拜。有學者認為魅力型領導其實也是轉換型領導的特徵之一 (Bass, 1985) ；「參與式領導」（participative leadership）具有多種形式，Yukl (2013) 整理過去的相關領導類型研究，僅將其進行決策分類，指出還未有最佳的決策過程。且其認為在決策時，常為了廣納他人的意見，就可能需要多種決策方式，包括獨裁式決策、協商、聯合決策、委任等（Yukl, 2013 ／宋秋儀譯，2014：120）。

Burns (1978) 提出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指領導模式的主體，其發生乃聚焦在領導和他的部屬間的交易，兩者之間的維繫。相較於交易型領導的不同，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是藉由人與人之間的吸引而創造連結的過程，領導會留意部屬的需求與動機，也因此領導往往會充分運用權力和情境等因素，提高成員創新的意願和能力。

除了西方的領導型態理論外，從東方文化特色來看，中國古典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也帶有不同的領導型態，康自立、蘇國楨、張淑萱與許世卿（2001）將情、理、法所建構的中國式領導架構，分成「親情式」、「教導式」與「威權式」三種領導表現向度。一為「動之以情」，以和諧友善、關懷尊重、怒道同理的方式，視部屬如己出；二為「作之師」，運用教導、角色扮演及分享參與等方式來帶領部屬，在工作上給予指導，刺激其成長；三為「訴之以法」，強調賞罰分明、一切依法行事，屬於一種君權式的領導型態，此也符合傳統儒、道、法三家的學說與思想。

除了領導者外，在這領導者帶領下所造成的文化，也是一種變項。文化視為平常的、明確的與隱含的符號系統，以有意與無意之方式來進行成員的學習與分享，並藉以相互聯結為一個有機體 (Ott, 1989: 29-30)。

Sliver (1983) 表示，每一個組織具有各自獨特的風格，而一個組織本身與周

airiti

圍環境的因素均可能滲入整個組織，並賦予組織內部事務不同的特色。Schein (1992) 也認為並非組織中每個人都感受到組織文化，除非它是群體共同擁有的，但是所有人輕易能感受到組織氣候（Schein, 1992 ／陳千玉譯，1996），組織氣候與組織文化常被人們混淆，組織氣候是由一個單位或部門所存在的群體氣氛，包括人際關係、領導方式、作風和心理相融程度等，強調的是整體的氛圍，是成員對所處組織環境所感受到的一種知覺，這種知覺會影響成員的動機與行為（蔣景青，2002）。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隸屬於廣東省委，以黨報《南方日報》為首，旗下有平面媒體：《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21 世紀經濟報導》、《南方農村報》、《雲南信息報》、《理財週報》、《西江日報》、《南方法治報》、《梅州日報》、《南都周刊》、《南方人物週刊》、《南方雜誌》、《21 世紀商業評論》、《風尚週報》、《城市畫報》、《名牌》、《中國財富》等。網路媒體：《南方網》、《南方報業網》、《奧一網》、《南都網》、《大奧網》、《今日廣東》。以及其他相關事業：《南方日報出版社》、《南都網報刊訂閱》、《鞋包世界》、《第一消費》、《凱迪網路》、《南方文化產權交易所》、《小夥伴》等。

平面媒體下又成立：《21 世紀經濟導報》、《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三大報系，集團中最受推崇的兩報一刊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與《南都周刊》，比起其他子報，他們的報導內容更偏向時政議題，以調查式、批判式的報導為品牌特色，以敢於對權力者進行監督報導而聞名於海內外。

《南方周末》創辦於 1984 年 2 月 11 日，面向大陸地區發行，核心讀者群為知識型讀者，擁有全國甚至世界的影響力，被知識分子與網友譽為中國「最有良心的報紙」。而《南方都市報》則於 1995 年 3 月試刊，1997 年 1 月 1 日正式創刊，覆蓋廣東省，被稱為珠三角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南都周刊》在 2006 年 3 月 1 日創刊，後因「重慶唱紅打黑」、「起底王立軍」系列調查報導打響知名度。

《南方周末》早期以娛樂、社會新聞定位為主，發行量一般，在 1993 年改版，實踐『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的理念，以深度報導為主打產品，產生巨大的效益，發行量突破百萬，成為大陸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類報紙（張駿德，2006：49）。主編左方曾以《南方日報》總編輯黃文俞說過的話，「有可以不說

airiti

的真話，但是絕不說假話」作為報訓，豎立《南方周末》的特色（左方、沈洪，2014：293；左方，2009 年 6 月 12 日）。讀者們也認為快速、客觀、關注社會底層是《南方周末》輿論監督內容的獨特風格，成功將《南方周末》的閱讀率、販賣率提高，《南方都市報》趁勢進行改革，而後成功抓住現代都市新興的讀者群，發行量穩定在 110 萬份左右（張駿德，2006：29）。

1998 年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三家集團化的報紙。本研究以 1984 年至 2014 年為研究範圍，以 1984 年成立的《南方周末》、1997 年的《南方都市報》為主要研究對象。《南都周刊》創立於 2006 年，雖於短時間內就成功打響知名度，有許多精彩報導，但本文著重於探討南方「報業」場域與領導之內涵，因此暫不將《南都周刊》列入研究範圍。但在受訪者中，來自《南都周刊》的兩位前南方人（S3、S6），都有超過 5 年以上的南方經歷，後來也成為重要的媒體觀察者，因此，透過他們有助於觀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組織場域與領導階層等領域，所以列入訪談對象。

本文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以「滾雪球抽樣」，受訪對象主要設定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出走菁英，期望透過曾任職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南方人，探討組織所面臨場域、組織領導風格與文化。研究成功訪談 13 位受訪者，他們曾經任職於《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單位，年紀分布在 32 歲到 62 歲（30 歲以上，3 位；40 歲以上，8 位；50 歲以上，1 位；60 歲以上，1 位），南方年資由 3 年 ~ 15 年不等，在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內的職務經歷，從一線記者、部門主任與副主任、主編與副主編等，能夠較全面性觀察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風格與文化。他們目前任職的領域橫跨平面媒體、廣電媒體、網路新興媒體、網路科技業與自由業等，持續發揮南方的影響力（詳見表 1）。訪談進行時間：2014 年 11 月 6 日 ~ 2014 年 11 月 15 日。

肆、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面臨的組織場域分析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過程中，新聞傳播事業被列入「第三產業」，媒體須自負盈虧，新聞改革隨即展開，以謀求自我生存之道。首先，1979 年初至 1982 年，此階段主要為改變原先「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的媒介定位，認為新聞媒介有其自身的規律，應照媒介的規律行事。1983 年至 1986 年，自國外引進「信息」概念後，1987 年至 1989 年上半年，提出新聞的輿論監督，將中共的新聞改革推向最高峰。然而經過「八九民運」後，新聞重申黨性，直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談

airiti

受訪者編號（按姓名筆畫序）	南方報業集團年資	現職領域
S1	3 年	電視製作、從商
S2	6 年	網路新媒體
S3	6 年	雜誌
S4	7 年	藝文界
S5	7 年	自由業
S6	15 年	創業
S7	9 年	網路新媒體
S8	14 年	自由業
S9	8 年	網路科技創業
S10	4 年	學術界
S11	8 年	網路新媒體
S12	8 年	專欄作家
S13	4 年	報業

表 1：本研究受訪對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話後，決定深化改革政策後，傳播媒體的經營越發重視「市場化」策略，傳播媒介的經濟面向，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只不過，中國的新聞傳媒經營制度轉向事業單位企業型管理，政左經右的改革結果，平面媒體的業務部門有更多的發展可能，可是針對新聞編採仍是嚴格管控（王毓莉，2010：4-5）。

而中國大陸的報業經營制度變革，從恢復廣告、自辦發行、擴張增版、兼辦市民報、與招聘工資改革，一直到 1999 年第一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直到 2004 年底成立了 39 家報業集團，說明了中國的報業已經從供給制辦報，轉變成多元化經營實體的傳媒企業集團（張裕亮，2006：275）。

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獨有的揮灑空間

1978 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直言批判中央的權力過度集中，使得「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習仲勳主政廣東編委會，2007：242），1979 年 7 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由於廣東是一個通商口，商業貿易發達，且鄰近香港、深圳，遠離北京，比其他的地方更能夠接受新思想與新思維，言論立場較為開明（S1、S3、S5、

airiti

S6）[1]。其次，由於早期廣東省委書記，在黨內多屬於自由派，比較能接受不同的黨內批評聲音（S5、S7、S8、S10），加上廣東省的政治獨立性較其他省分強，有些事情中央選擇緘默以對，在此大環境下，媒體不需要對中央俯首稱臣（S1、S6），就連《南方日報》的表現被認為較其他黨報，有相對開明的言論表現（S7、S10）。

在廣東特有的經濟條件與政治空間下，《南方日報》社決定加入 80 ~ 90 年代週末報的戰場。於 1984 年 2 月 11 日創辦《南方周末》，定位為文化娛樂類的周末報，但 90 年代後期以來，以調查和批評報導、自由思想取向、文學化的寫作風格等風靡全國。雖其屬於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集團下的子報，但在 2001 年左右號稱發行量 130 多萬，其中 70% 在廣東省以外（潘忠黨、陳韜文，2004：9）。核心讀者群轉為知識型讀者，表現亮眼。

而後，面對傳媒市場化改革，1980 年代都市報浪潮興起，在《南方周末》的資本基礎之下，也趁勢於 1997 年籌辦《南方都市報》，成為一份以廣州、深圳兩個中心城市為主，覆蓋全省包括珠三角 12 個中等城市在內的綜合類日報。然而，身為一介地方報，《南方都市報》拜網路電子報之賜，卻享有全國性的影響力，還曾讓中宣部發布禁令，其他媒體不准轉載該報的報導（王毓莉，2012 年 12 月）。

2000 ~ 2010 年是為南方報業的黃金時期，也是中國的關鍵十年。1998 ~ 2002 年江澤民執政時期，由於中國大陸積極爭取加入 WTO 與申辦 2008 年的北京奧運，特別注重國際形象，順應市場條件，新聞媒體有相對自由的發揮空間，此一時期《南方周末》新聞輿論監督表現突出，報紙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S2、S4）。受訪者（S6）表示：

> 每天看報紙都覺得特別好看，有很多東西可以看，而且那個時候，整個中國互聯網還沒有起來，就是說像新浪、網易、搜狐它們這種，互聯網的新聞，它還沒有到可以對這種紙媒產生威脅，就是大家的這種日常的閱讀渠道，還是通過報紙。（S6）

《南方都市報》創立後，推出新聞輿論監督一系列的報導，在年輕主管程益中的帶領下，大家都富有熱情，更是懷抱新聞理想，為民發聲，為弱勢說話，強

1 基於研究倫理與對受訪者的保密協定，以下受訪者意見之引用，僅以 S1 ~ 13 代號顯示。

airiti

調正義道德（S6），陸續推出許多精彩報導，如 2003 年的孫志剛案，經過《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峰、王雷調查後，同年 6 月 20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導致孫志剛被毒打致死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S9）。這是一次成功的新聞輿論監督，最終造成法令的更改。

集團領導人范以錦（2005）指出南方傳媒報業集團，強調以「龍生龍，鳳生鳳」帶動優質子報的戰略。在經營管理與新聞專業上，受訪者（S6）認為兩報在輿論報導上有一定的互補性，也是兩者的定位與興起時間有所接軌，《南方周末》在 2000 年時，已成為全國性的週報，主打全國市場，此階段的《南方都市報》則是剛在草創期，主打廣州市場，屬於時政、民生、經濟的綜合性日報，不過它更面向大眾市場，注重異地監督、深度式的新聞調查（S2、S6、S10）。

集團獨有的揮灑空間的最高點展現在，2003 年 11 月 11 日，在北京《新京報》的創刊，成為第一家得到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具有合法地位和受法律保護的媒體集團跨地區經營管理的報紙，該報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日報報業集團聯合創辦。該報以《南方日報》人員為主，主要的編採人員均來自《南方都市報》，首任總編輯為程益中，社長是戴自更。該報創刊號就在頭版報導了 SARS 非典的後續新聞，大打擦邊球，引起新聞界的高度討論。

受訪者認為與《光明日報》合辦《新京報》，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合的產物，當時原先在《南方都市報》的一批員工，隨著程益中前往北京創刊（S6），《新京報》或《南方都市報》為什麼能夠成功，仰賴的不只是南方的新聞獨特空間，更重要的是南方這群人具有的新聞專業與自由主義理念[2]（S9）。

而《南方都市報》沒有發行全國，但透過傳播媒體與網路的力量，該報的「網眼版」挖掘報導許多事件，影響力卻往往能擴及全國。2007 年「史上最牛釘子戶」的監督報導，使得當時房子面臨拆毀的拆遷戶，居住權力等問題開始在中國社會受到各方正視。其次，該新聞「網眼版」轉型後的第一則監督報導，也正式開啟了中國媒體，上網找尋新聞來源的新潮流。之後「陝西華南虎照片造假事件」的輿論監督系列報導中，致使照片提供者不得不坦承，照片為做假合成下的產物（王毓莉，2012 年 12 月）。2009 年「躲貓貓事件」，揭發了監獄獄卒對待受刑犯的黑暗面，不再受到獄卒的凌虐，讓受刑人在監獄中的人權到重視，使得原本想透過掩蓋、壓制消息的公安部門，在《南方都市報》的揭發下，讓更多閱聽人

2 深究數位受訪者於受訪時，引用的「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精神」，較為偏向「古典自由主義」的內涵，主張要限制政治權力的界限，保護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自由市場等概念。

airiti

瞭解並引發社會輿論，讓本想息事寧人的公安部受到廣大的輿論撻伐，而必須重新審理，並對外說明事件的經過。幾次成功的新聞輿論監督表現，使得《南方都市報》享有高度的專業評價。

二、南方報系與政治控制的博弈分析

然而，上述因為地處廣東的特殊優勢，《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擁有相對寬鬆新聞表現空間。不過，政治控制的力量，始終未對新聞媒體鬆手。受訪者（S8）指出，中共除了對集團下命令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管制媒體的方式，如行業准入和審判制、人事任免和持證從業制、記者編輯自我審查制、新聞禁令制等。

此外，還有更為細緻的內容審查方法，如（一）審讀員刊播前審查制，由中宣部指派審讀員進入媒體，直接對內容進行審查；（二）新聞閱評制，請黨的退休人員看稿，若有問題甚至可直接送交給省委書記、中共政治局委員看，進行事後處分；3. 行政或司法處罰，直接吊銷刊號或執照，也是最高和最後的手段，2003 年的「南都案」、2014 年的《21 世紀環球報導》案，即屬此例（S8）。

不過，即便管控嚴格，南方報系仍然努力在每個事件，與政治控制進行博弈。然而，在擦邊球的過程中，數度出現幾次的重大打壓事件。

2001 年 4 月，法院開庭審理張君犯罪集團殺人搶劫案，《南方周末》報導不僅沒有像通常的做法，高調讚揚公安機關偵破張君案的功勞，而將主題指向了社會不公正以及公權力者對規則的肆意破壞，並暗示或許正是這些不公正，導致人心向背，進而產生仇視和報復社會的心理。此一事件處分不僅常務副主編、代理主編錢鋼被調離，副主編陳明洋被撤職，多名涉及上述報導的記者、編輯更被除名或要求自動離職，至於剩下的採編人員，則要全部重新考核半年，及格的才准留下，並從《南方日報》社調來「政治上可靠」、年僅 29 歲的向熹新任總編輯職務（大紀元，2001 年 6 月 3 日；郭國松，2012 年 8 月 20 日）。

張君案後《南方周末》被中宣部緊盯時，新聞發展空間縮小，《南方都市報》則能透過全國性的跨地區監督報導，推開其知名度。2003 年的 SARS 事件發生後，宣傳部門下達各種禁令，聲稱疫情已受到控制，要求所有媒體對外口徑一致（何清漣，2006：49-50），但即便上頭已發布多達 10 多張的禁令，《南方都市報》仍是不畏懼政府的施壓，成為中國唯一發布非典相關新聞的媒體，贏得大眾的信任（S7、S8、S9、S11）。

但 2003 年 3 月，《南方都市報》率先曝光 SARS 疫情，事後總編輯程益中被降職處理。同年 4 月，《南方都市報》報導孫志剛案，造成收容遣送制度廢除，

airiti

但隔年 1 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被廣州執法部門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即為著名的「南都案」，一般認為此乃經濟入罪的整肅手段。

2003 年因集團內《南方都市報》被指違規報導孫志剛案、非典事件「闖了大禍」，執掌《南方都市報》的南方報業第一副總編王春芙遭到免職，而官方宣傳官員全面進入南方報業、直接控制不聽話的南方子報如《南方周末》、《21 世紀經濟報導》（徐文中，2004 年 4 月 24 日）。在該事件中，《南方周末》也受到牽連，導致言論受控，之後其他廣東本地媒體，也從此噤若寒蟬。

2005 年中旬，出現了資深編輯集體請辭事件。據中國博客披露，《南方周末》在珠海開了全體會議後，因對新任主編、南方集團派來的向熹獨裁作風不滿，十名左右資深記者向報社遞交辭職報告。而這批資深記者被指為，《南方周末》輝煌時代僅存的一批人馬（大紀元，2005 年 8 月 2 日）。

2008 年 4 月，《南都周刊》主筆長平因發表評論《西藏：真相與民族情緒》被免職，調任研究員（陳珣，2013 年 1 月 20 日）。儘管集團竭盡力量，將上面交辦需要處理的人，以集團內部調職方式冷處理，但是 2011 年 1 月，長平終究被南方報業解聘。

由於多重打擊，陸續的擠壓報導空間，特別是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南方報系無論在人力或話語權明顯下降，許多採訪回來的調查報導無法刊登（S2、S7），2008 年北京奧運後，產生所謂的「兩南」一說，意旨兩個南方，在採訪上兩難，新聞發揮空間明顯縮小，2009 年後《南方都市報》的社論選題，多需經過審讀員的檢查後，才得以發稿（S1、S5、S6、S7、S12）。2010 年《南方都市報》再次發生領導階層被撤換。2011 年 9 月，《新京報》被北京市委宣傳部接管，終結了南方經驗的北上。2012 年 5 月，庹震出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加強審查和監管南方報系。

三、報業資本市場蕭條與新時期的政治控制

受訪者（S7）指出，南方傳媒報業集團被定位為，黨內一個較為開明的報系，中央宣傳部門雖非完全滿意他們的批評報導，但仍會認為這些報導是他們為黨的利益著想，所進行的批評報導。就在這樣的氛圍下，《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發展，主張回歸新聞專業主義，並尊重市場的規律，吸引讀者，淡化宣傳，趨向專業的權威化（S4、S9）。在 2000 年初均已成為發行量百萬份的報紙，在知識分子與普羅大眾當中，奠定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廣東的報業中，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並非一家獨大，廣州日報報業集團與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在廣東的報業市場中，競爭激烈。其次，新聞輿論監

airiti

督是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黃金時期的品牌優勢，後來也出現例如《北京青年報》等競爭對手（S3）。

其次，在報業市場經濟環境方面，根據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局、國家工商總局、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的統計，中國大陸的報紙種類，從 2008 年 1,943 種，逐年下降，到了 2012 年急遽下降為 1,918 種（崔保國、何丹嵋，2014：4）。而 2015 年最新公布的報告中指出，2014 年中國報紙印刷用紙量約為 270 萬噸，比 2013 年減少了近 1/4，報紙發行量也下降了 25% 左右，而報業賴以生存的廣告市場連續 4 年下降，2014 年的下降幅度更達到 15%（人民網，2015 年 5 月 11 日）。特別是 2013 年末《新聞晚報》的停刊，引起了「紙媒將死」的話題，而面對報業廣告市場的持續衰退，中國報業集團紛紛尋求透過資本運作，探索轉型與革新。

加上，新聞輿論監督的報導，需要相當雄厚的經費支出，媒體對於調查性報導的支持，攸關於投入經費充裕與否。2005 年剛加入《南方都市報》的記者龍志，曾按以前地方報的規格坐火車去採訪，深度報導版的主管陸暉打來電話：「怎麼不坐飛機去！」其次，新聞工作者的收入方面，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聞部工作的記者回憶，2004 年他以應屆生身分入職，一個月能拿到 8,000 到 10,000 多元人民幣，當時廣州市的人均工資為 2,585 元人民幣（吳婧，2015 年 8 月 14 日）。顯示在大約 10 年前，報業的財務狀況，屬於相對寬裕的情況，對於調查性報導的經費投放，更加大手筆。

不過，一項 2010 年 9 月～2011 年 3 月針對調查記者的職業滿意度調查顯示，就工作非物質回報而言，滿意度最高的是黨報機關報（如《中国青年报》）、新聞雜誌（如《中國新聞週刊》、《瞭望東方週刊》、《南都週刊》），而市場化都市報（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和精英報（如《南方週末》、《21 世紀經濟報導》）的調查記者，都對非物質回報抱以較低的評價。其次，就工作物質回報而言，黨報機關報的調查記者依然表達了較高的滿意度，市場化精英報次之，而市場化都市報，新聞雜誌的記者對於物質回報子項的打分都很低（張志安、沈菲，2012：68-70）。

市場化都市報的調查記者，各項滿意度比較低，由於深度新聞部工作，經常要奔赴全國各地報導重大事件，且需要在一周左右拿出調查報導，因此發稿壓力大。此外，都市報的薪酬考核體系，比較重視發稿數量，起薪比較低，若未完成發稿任務則收入很低，因此人員流動率高（張志安、沈菲，2012：71）。

報業資本市場蕭條，顯現在記者的待遇上，以同集團的《21 世紀經濟報導》特稿部記者為例，每月要求完成 3 篇調查報導，基礎工資 3,000 元／月，每篇報

airiti

導稿費 2,000 ~ 3,000 元，理論上若完成 3 篇的任務，月收入可超過 10,000 元，但因新聞禁令等因素，通常只能發 2 篇，月薪便在 7,000 ~ 10,000 元之間（張志安、沈菲，2012：71）。

由上述情形得知，報業市場蕭條下，組織能夠投入調查性報導的資源，相對被剝奪，也影響著新聞監督功能的表現。其次，受訪者 S11 指出，當報社時常收到許多禁令，甚至有些記者被指名不能報導某類型的新聞，即使主管們盡可能嘗試激勵記者，但稿件未見報，等同於沒成就，他們心中充滿著挫折與失望。

新時期的政治控制，尤以 2012 年後最為明顯，在政治與市場雙重夾殺下，幾個事件導致南方報業的記者、編輯，開始產生自我審查，很多選題都被刻意避掉，認為是禁區（S2、S13）。

2012 年 3 月 17 日，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閉幕，新一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談話，提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社會主義力量等要點。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這篇在 1 月 2 日刊登的獻詞，卻臨時被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刪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把憲政夢，改為強國夢。引發《南方周末》編採人員不滿，在報社外、微博社群進行抗議，要求庹震下臺，後也有許多到場聲援的群眾與前南方的員工（BBC 中文網，2013 年 1 月 7 日），稱為《南方周末》新聞獻詞事件。

2014 年 9 月初，上海警方宣布偵破一起「以輿論監督為幌子、通過有償新聞非法獲取巨額利益的特大新聞敲詐犯罪案」，逮捕了涉案的 21 世紀網主編和相關管理、編採、經營人員以及兩家「公關公司」的負責人。警方在 25 日中午到達 21 世紀辦公室，帶走了 21 世紀報系總編輯沈灝、總經理陳東陽，他們均為南方報業集團的核心領導人。

由於中國沒有成文的「新聞法」，加上中宣部發布的禁令，沒有截止時間，各家報社領導人或中層主管，只能透過自身對政治的敏感度、議題的掌握度，嘗試在政治控制之下找活路（S7）。基於過去的外部媒體環境，南方傳媒集團與政治勢力仍呈現一收一放的狀態，如當《南方周末》無法發揮影響力時，《南方都市報》趁勢興起（S6）。

直到 2013 年「新年獻詞事件」，受訪者（S3）認為，此時的南方傳統已經不在，無論是制度、人力或者報導水準皆下滑，乃至 2014 年沈灝事件，受訪者（S4）指出，這是對市場化媒體的全面整肅。多數受訪者皆認為未來 10 ~ 15 年間，中國新聞媒體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尤其是批判性的報導，會越來越艱困（S2、

airiti

S3、S4、S5、S6、S7、S9、S11、S13），這也被認為是對南方報系媒體的重創，也代表著新一代領導人，已再進一步緊縮中國新聞媒體自由空間。

2015 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做好黨外知識分子工作」，他要求中共官員學會同黨外知識分子打交道，特別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領。此一發言被認為與其上任以來 2013 年的「七不講文件」、「8.19 講話」，與 2014 年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一致性，顯現其對知識分子思想工作的高度興趣。分析指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儘管打壓異議人士亦不手軟，但對改良派思想的態度，較為曖昧含混。而習近平對此頗不耐煩，旗幟鮮明地反對憲政，堅決打擊皮裡陽秋的網路大 V 和 NGO 組織，其次一些對推動中共自我改造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如許志永、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郭玉閃等，都被判刑或拘押審訊（長平，2015 年 5 月 21 日）。上述情形說明著，中國大陸的言論、新聞、思想自由，正走向更加嚴峻的限縮態勢。

伍、中國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類型分析

中國大陸傳媒的所有權，並未開放民營，探討中國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無法單以「報老闆」為研究對象，因為中國新聞傳媒的老闆，都是「共產黨」。儘管老闆都是同一主體，中國報業集團組建，主要以黨報為中心主體，由於大陸的黨報體制，存在著由上而下的階級性，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以黨報《南方日報》為首組建，除此之外，同一集團下為何又存在《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南都周刊》等具有市場性與改革特質的媒體？更凸顯此議題的重要性，有必要深入探討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方式。

2005 年 7 月 18 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率先從報業集團邁向傳媒集團，成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由廣東省委委託省委宣傳部主管，在報業部門組織結構上，保留省委機關報原有的南方日報社社委會，並新組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會、管委會、編輯委員會。新組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設董事會及經理班子。集團黨委會和管委會作為集團的最高領導機構，總體把握集團報刊的輿論導向和集團資產的保值增值。南方日報社社委會和新組建的編輯委員會負責新聞採編業務，具體把握集團報刊的輿論導向（曾原，2006 年 3 月 21 日）。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董事長，也同時兼任黨委書記、《南方日報》社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管委會主任，權力一把抓，其次在報業集團下設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21 世紀經濟報導》三大報系，各報系下分管報刊，

airiti

而各報刊的總編輯（或主編），則由南方日報社社委會或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編輯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分管各報系下的子報、子刊（詳見圖 1）。

其次，各子報、子刊內則設立「編輯委員會」，負責的新聞編採內容、管理業務，通常依照各個子報或子刊的特性設立「新聞中心」，各報內不同編輯委員，分管一個中心，以《南方都市報》為例，設立時政新聞中心、娛樂體育文化中心、財經新聞中心、城市雜誌中心。「時政新聞中心」再細分為各部門，負責不同的新聞版面，如要聞部、編輯部、深度報導部、評論部、國際新聞部、廣州地方新聞部、深圳地方新聞部、珠三角地方新聞部……等（S4、S7）。

本研究乃針對兩個層次領導人：不同時期報業的集團領導人、與中層主管（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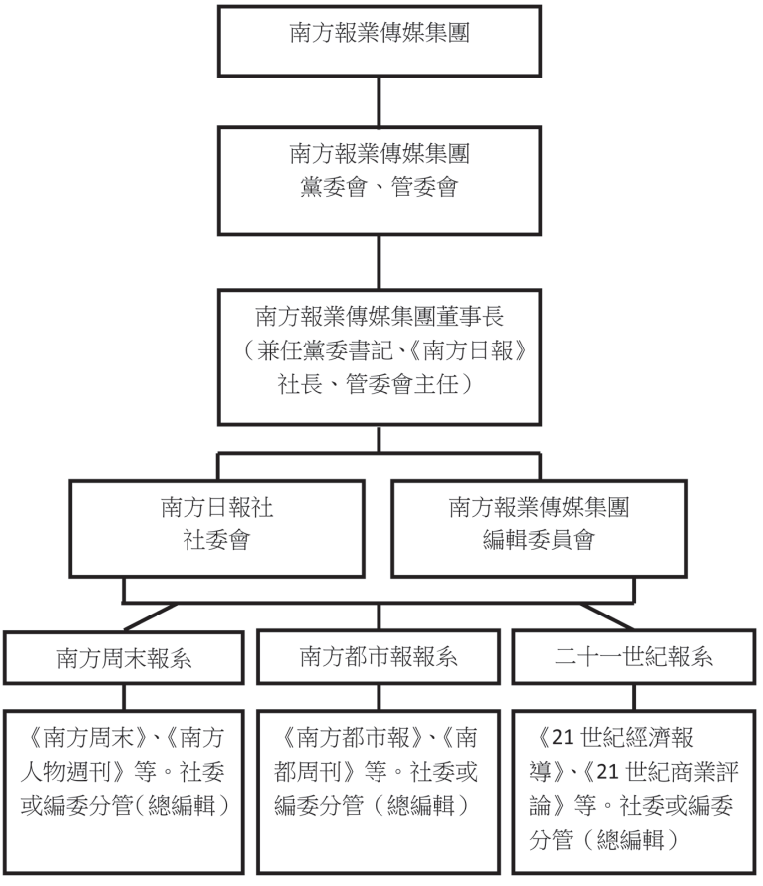


圖 1：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報業部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airiti

括子報社長、主編、或總編輯[3]、部門主任）為研究對象，經過深度訪談後，進行不同時期的集團領導人與主編角色分析；其次，針對最多受訪者推崇具指標性人物的《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與《南方都市報》主編程益中，敘述其個人的領導特質；最後，則整體歸納受訪者指出，其任職期間認為較具新聞專業精神的大部分中層領導，所具備的領導風格。

一、集團領導人與主編扮演角色

南方的集團領導人為一把手，對上是最接近權力核心的角色，能與廣東省委書記直接交流、互動，同時也為下頭爭取出南方的新聞空間。受訪者（S3）表示，好的高層領導需要能與過去的省級黨員構築保護傘，為報社尋找資源與接收資源。在人格特質上，范以錦曾說：「知道我的性格的同事有兩個評價，一是為人寬厚；二為原則性強」（范以錦，2005：317），此兩項帶有衝突性的特質，正好符合集團領導人，對上成為「管制執行者」、對下「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角色扮演。

南方的集團領導人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張琮（1987～1995）、劉陶（1995～1996）、李孟昱（1996～2001）、范以錦（2001～2006）、楊興鋒（2006～2013）、楊健（2013～2014）與莫高義（2014～迄今）等 7 人，詳見表 2。

本研究受訪者，任職期間橫跨 1990 ~ 2014 年，訪談中最常被提起與推崇的集團領導人，為李孟昱與范以錦，其次為楊興鋒。受訪者表示，2006 年以前集團領導人的價值觀較為開明、寬容，政治立場傾右[4]，有新聞理想之外，他們更有擔當，促使兩報的記者、編輯有更多施展空間，進行深度採寫（S8、S13）。即使議題觸碰到上頭紅線或有些限制，多半也僅是口頭提醒，需注意新聞處理的尺度而已（S9）。

不少受訪者特別指出，2006 年以前的集團領導人：李孟昱和范以錦，待人處事和善，具有報人涵養、新聞專業、與海納百川的領袖特質，因此，也較不會

3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組織編制稱呼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用法，根據受訪者指出，大部分稱「社長」為「主編」，直到後期也設立了「總編輯」職位，其職能等同於「社長」或「主編」。

4 左派與右派的提法，起源於法國議會，當時坐在議會左邊的人，更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藉由透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稱為「左派」。而坐在議會右邊的人，更支持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形成「右派」。中國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右派是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反對共產黨領導的人。1978 年改革開放後，「左派」通常指的是支持私有化，但強調市場經濟的計畫性，被認為「保守派」；「右派」則是推崇私有化，主張改革的市場經濟，被認為黨內的「改革派」。受訪者此處「偏右」的提法，指的是政治上屬於較偏向追求自由主義精神的改革想法。

airiti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張琮	1987 ~ 1991	1984 年參與創辦《南方周末》，歷經《南方日報》批評報導的黃金年代，曾一手策劃反對以權謀房的系列批評報導（賴競超，2012a 年 4 月 24 日）
劉陶	1991 ~ 1996	1993 年主導《南方日報》改版，擴至 12 個版，並提出「一手抓報紙，一手抓銀紙」的經營理念。1994 年籌畫、創辦《南方都市報》（賴競超，2012b 年 4 月 24 日）
李孟昱	1996 ~ 2001	與范以錦兩人，被前南方人稱為是最開明的集團領導者，兩人團結合作，共同推動南方報業經營管理模式，並發展報業集團化。兩人合作長達三十年，素有「李范時代」之稱（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
范以錦	2001 ~ 2006	1994 年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而後為南方報業集團建立企業化管理、多品牌營銷模式。負責、建立報紙的內容管理，注重深度報導與批評報導，主張創辦經濟新聞版、綜合新聞版與地方新聞版，親自抓批評報導主題（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
興鋒	2006 ~ 2013	2006 年被上層指派為南方領導，進行集團整頓，提倡全媒體，主導傳統媒體轉型，注重網路、新媒體的發展與轉型（S3、S7）
楊健	2013 ~ 2014	2013 年官派、也是首次直接從外部空降的集團領導人，未經過南方報業的基層訓練、提拔（新華網，2013 年 4 月 8 日）
莫高義	2014 ~ 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受訪者認為其作風相對集權，並主動審查報社內部人員的網路社群發言內容。2015 年 8 月提出 41 條整改措施，被認為是南方內部的自我審查機制（曹國星，2015 年 8 月 28 日、S6）

表 2：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賴競超（2012a 年 4 月 24 日，2012b 年 4 月 24 日）、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新華網（2013 年 4 月 8 日）、曹國星（2015 年 8 月 28 日）與 S3、S4、S6、S7 訪談資料。

主動干涉記者、編輯的行事（S2、S5、S11）。舉例來說，他們較不重視組織內部的階層區別，辦公室大門隨時敞開，隨時都可以與下層員工見面，願意熱心的解答任何問題（S2、S5、S7），即便面對中宣部的政治壓力或為了某些情勢需做新聞處理的妥協時，他們從不會以命令式的要求，更多的是彼此討論與協議，換言之，下層的人有機會直接影響上層想法（S9）。

集團領導開明的特色，也顯現在為新聞記者扛責方面，集團領導常需碰觸新聞紅線的新聞報導寫檢討書，一線記者往往在事後才被告知（S6、S10）。受訪者指出，范以錦是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代表，他雖然行事魯莽，不過因其曾任省委書記的文字紀錄員，比其他人更懂得拿捏政治尺度（S4）。受訪者（S6）提及，以前范以錦為他們培訓時，就曾教導他們如何聰明的與上面作對，舉例而言，他曾以手機沒電、搪塞處理來應對上層，為報社爭取新聞發布的時間，隔日見報後，可能事情過去，也就成功將報導傳遞出去。

受訪者（S3）認為 2006 年以前幾位集團領導人，皆由一線記者、編輯慢慢

airiti

地往上晉升，對記者的困難與問題感同身受，注重公共利益，較不會考量自身利益。受訪者認為，這些都是屬於傳統的南方文化之一：

> 南方所謂的傳統，要保護編輯、記者，寧願自己受點傷害，要把記者、編輯保護起來，處分分管領導，不積極處分編輯、記者，罰款編輯、記者時，分管領導交，實際上分管領導也不交，是報社交，這就是傳統。（S4）

至於 2006 年之後的集團領導人，屬於空降部隊，甚至有些人沒有新聞實務經驗，更重視的是自身利益，對新聞嚴格管控，無論尺度、題材、內容都朝向官方標準，迎合黨的原則（S3、S6）。

2006 年上任的楊興鋒，來自同集團的《南方日報》，雖然《南方日報》在全國黨報中，已被視為相對開明與自由的報紙，但在同一集團下，該報的從業人員特質，仍屬於相對保守，一些該報的從業人員，多企圖走制度化管道升遷的路線（S3、S10）。受訪者（S5）表示，當時與楊興鋒共事的人，普遍會認為他較強勢、個性果斷，難以直接與他溝通，在領導特質上，偏向強制性領導，不過，由於也出身自新聞界，他被認為在面臨黨的要求與新聞理想間，仍具備有一定的新聞專業堅持。

然而 2013 年之後，莫高義與楊健直接從中宣部調任成為南方傳媒報業集團的領導者，他們的新聞專業能力，被認為較不能服眾（S3、S5、S6）[5]。加上從小處的新聞干預，到新年獻詞事件等，大環境對該報業集團的整肅不斷，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集團領導人甚至直接開抗議證明與名單給中央單位，要求公安局對抗議公民執行逮捕行動，引起內部不少新聞記者的不滿（S6）。此時期新聞記者們的個人微博言論，甚至在社群平臺的網路管理員都還未通知的情況下，時常被報社直接要求刪文。換言之，他們相對於過去的領導較不具有兼容並蓄的包容力，部分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出線，也代表著過去屬於南方傳統文化的消逝（S3、S4、S6）。

除了集團領導人層次的轉變外，《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主編角色，也有著相對應的變化。《南方周末》的主編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關振東（1982-1983）、左方（1983～1995）、江藝平（1996～2000）、向熹（2001～

5 對於此二人的評價，乃綜合數位受訪者意見歸納而成，至於此二人本身是否具備新聞專業能力、是否在接受了官方派任，不得已而為之，則無受訪者做此衍生推論，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airiti

2003）張東明（2003～2005）、向熹（2005～2009）、黃燦（2009～2013）與王更輝（2013～迄今）7 人，詳見表 3。

而《南方都市報》的主編從 1980 至 2014 年期間，共歷經關鍵（1995～2000）、程益中（1995～2004）、王春芙（2004～2006）、江藝平（2006～2008）、曹軻（2008～2012）、黃常開（2013～2014）、任天陽（2014～迄今）7 人，詳見表 4。

主編層級的轉捩點，出現在 2001 年的《南方周末》和 2004 年的《南方都市報》，其中左方、江藝平、程益中等三人，被認為是最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的主編，在他們的任內也將兩報提升到全國性知名度與影響力（S1、S3、S5、S10）。受訪者認為《南方周末》張君案後，新聞部主任長平被調離與主編江藝平、副主編錢鋼相繼被整肅後，報社的組織文化或員工士氣皆有所轉變[6]（S3、S10）。

其次，從《南方日報》採編中心主任調任《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編的向熹，於 2001～2003 年接任主編，一開始他被認為是空降來整頓編輯部，不過，自 2005 年再次接手《南方周末》主編時，2009 年他以總編輯身分獨家專訪美國總統歐巴馬，並刊登於頭版頭條，但期間因報導遭官方干預，被刪文處理後，決定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關振東	1982～1983	籌辦、創立《南方周末》，首任主編
左方	1983～1995	籌辦、創立《南方周末》，曾三度邀請錢鋼擔任主編，為《南方周末》的報業風格轉型，被認為帶動了一場中國新聞改革
江藝平	1996～2000	與錢鋼共同建立《南方周末》報業風格，2001 年因張君案事件，被調職
向熹	2001～2003；2005～2009	被指派接手《南方周末》，起初被認為官派色彩嚴重，部分員工反彈離職（林妙容，2003 年 9 月 28 日）；2009 年因歐巴馬專訪「開天窗」事件，被調職
張東明	2003～2005	曾擔任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長，2003 年被指派至南方，因貫徹官方封鎖 SARS 新聞影響，民間為了罷免他，甚至曾發起推動拒買《南方周末》報紙直到他下臺（中國一公民，2003 年 5 月 2 日）
黃燦	2009～2013	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認為既得罪上層，又被屬下們認為專業與勇氣不足，被調職（關軍，2014 年 4 月 14 日、S5）
王更輝	2013～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被認為是較聽從省委宣傳部命令的主編之一，目前致力持續推動全媒體、新媒體的數位營銷戰略（S3、S13）

表 3：《南方周末》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中國一公民（2003 年 5 月 2 日）、林妙容（2003 年 9 月 28 日）、關軍（2014 年 4 月 14 日）與 S3、S5、S13 訪談資料。

6 江藝平與程益中的領導風格，將於下文深入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airiti

姓名	年分	重要事蹟
關鍵	1995 ~ 2000	關振東之子，與程益中等人，共同籌辦、創立《南方都市報》
程益中	1995 ~ 2004	籌辦、創立《南方都市報》，建立《南方都市報》人事管理制度、基本法則。2003 年 SARS 報導、孫志剛事件，發生南都案被入罪逮捕（S8、S9）
王春芙	2004 ~ 2006	南都案之後，2004 年由上層指派來的南方領導，第一位直接空降擔任總編輯，意在整頓南都（S3、S4）
江藝平	2006 ~ 2008	2006 年社長范以錦退休，江藝平被提升為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輯，分管因南都案受重創的《南方都市報》。2008 年疑似因長平西藏評論事件、2008 年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報導事件後，被調職
曹軻	2008 ~ 2012	2008 年起推動組建全媒體，被視為仍具有新聞專業精神的領導者（S7、S8）
黃常開	2013 ~ 2014	2013 年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持續推動全媒體
任天陽	2014 ~ 迄今	官派的領導代表之一，歷經南方報業的傳統文化洗禮，由基層到總編輯，被認為其個人風格，較不接受任何協商，也被認為較服從宣傳部門指令的主編之一（S13）

表 4：《南方都市報》歷年領導人物與重要事蹟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S3、S4、S7、S8、S9、S13 訪談資料。

以開天窗方式表示不滿，因而被調降職。他和《南方都市報》的王春芙，在受訪者評價中毀譽參半，主要是因他們都屬於來自《南方日報》的領導者，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有著一定的情感與專業基礎，除了具備新聞實務經驗外，也能夠迅速瞭解當時的南方組織文化，只是在個人行事風格上較為強勢、自我。加上當時報社內部，仍有一派屬於「本土派」的力量，被認為相對較具有新聞專業與理想，如兩報的執行主編陳明洋、莊慎之與其抗衡，同時期下形成報社內部的兩種不同的派系的特殊編輯部生態（S5、S8、S11）。

而《南方周末》後期的主編，張東明、黃燦、王更輝，被認為較傾向官派與聽話。受訪者指出，張東明除了擔任該報總編輯外，還自行設立一個新職位「南方報業集團副總編輯」，使其權力擴及到整個報業集團，不僅從經營管理切入，同時介入管控編採內容；而王更輝則被認為是，較無實權力的傀儡，當記者的報導出格時，無任何溝通的餘地，內容通常會直接被刪除、或直接撤稿。至於黃燦是在 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中，被認為既得罪上層，又被屬下們認為專業與勇氣不足，才使得此次的抗爭失敗告終[7]（S3、S5、S8、S9）。

至於《南方都市報》主編曹軻、黃常開、任天陽，多半具有宣傳部經歷，被視為空降部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行事作風傾向強勢（S6、S7），相較於先前

7 黃燦在新年獻詞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認為兩面得罪，但受訪者的發言乃植基於期待他更站在編輯部立場，對抗省委宣傳部門，因而對黃燦有此評價。

airiti

的幾任主編，部分主編更偏重的是維繫與上層的關係，與自我未來的發展（S3、S13）。特別是在 2008 年《南方都市報》再次發生組織內部人事調動，原本負責分管《南方都市報》的江藝平「被調離」[8]（S11、S13），調查記者們感受到自身能發揮的新聞空間尺度越來越小，選題不斷地被打壓，毫無成就感（S2、S11、S13）。受訪者（S5）表示，2009 年以後許多評論的選題也多半在審讀員之後[9]，就被限制處理掉。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至 2011、2012 年，許多南方人都逐漸覺得失落與失望，相繼選擇離職（S2、S11）。

綜合上述，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經常扮演著「向下執行禁令管制」與「向上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角色。在主編的層次上，兼具有力爭新聞自主的「新聞專業型」主編；部分來自《南方日報》，具有新聞專業背景，但又臨危受命空降兩報，不斷擺盪於馴服與被馴服角色扮演的主編；以及最後期空降《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多具備宣傳部門背景，更重視與官方的關係和未來離開南方報系後仕途的主編。

二、《南方周末》主編江藝平與《南方都市報》主編程益中的領導特質

由於集團領導人的差異，中層主管所能施展的空間，也有所差異，為進一步瞭解《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的實際運作環境，本文特別針對最多受訪者推崇具指標性人物的江藝平與程益中，敘述其個人的領導特質。

江藝平曾在南方傳媒集團三起三落，歷經分管《南方周末》、《21 世紀環球報導》與《南方都市報》，都為南方產生一股新力量，1996 年至 2001 年甚至被稱為「江藝平時代」（S7），2001 年更因為江藝平與錢鋼被撤職後，引發南方第一波出走人潮。直到 2012 年正式退休後，過去的南方人對她評價好，甚至寫文章來鼓勵她，《南方周末》的創始人左方表示，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從馬上打天下，轉為下馬治天下時期」（左方、沈洪，2014：298）。

她被認為是南方傳統文化的創立者與代表人之一，受訪者（S4）表示，《南方周末》興盛時期，其實出了許多問題，那時江藝平為了送檢討書，一個禮拜就需飛一次北京。與她相處過的受訪者，對她印象深刻，她從不擺架子，像是大家的親人（S1）。S2 表示：

---

8 「被離職」在中國大陸的語彙上，指的是非自願離職或被迫離職。

9 審讀員的主要職責，為對付印前的報紙內容進行審查，刪改稿件或撤掉被黨的宣傳機構禁止發表的稿件。

airiti

我們都稱她江老師，很和藹，進哪個電梯碰到她，然後就會聊，最近是做什麼阿？或怎麼樣阿？挺好的我覺得。經常都能碰到。（S2）

另一位典型人物為程益中，他籌辦《南方都市報》，並成功將報業編採制度化，受訪者（S9）表示，程益中崇尚自由主義思想，不但具有寬容度，也尊重個人。由於當時的集團領導人不太管，所以能夠充分授權於他，受訪者（S7）指出，當時在經營方面，程益中只要跟《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鋒兩人商量一下，南都的事情就能處理，不需透過集團或宣傳部。由此可見，其專業程度受到集團領導人的重視與信任。

許多受訪者認為，程益中的個人魅力色彩強烈（S6），因此即便他在編採方面，只重視記者效率與能力，風格偏向強制，但這只突顯在編採新聞上（S9），也因此仍有一群人，受到他個人的英雄魅力，願意為他賣命（S3、S6）。

受訪者（S8）表示，程益中的思想與成長經歷相關，1980 年代政治的改革派崛起，讓他在新聞理念上，堅守新聞專業。所以在新聞管理上，他認為制度大於人，所以建立《南方都市報》的評分制度。受訪者（S7）表示，2004 年南都案程益中離開後，更形成一批所謂的「南方本土派」，最為明顯的是莊慎之、陳明洋、陸暉等人，他們注重新聞專業、新聞道德與社會責任，這些特色也是繼承程益中的個人風格。

曾任中層主管的受訪者（S9）比喻，《南方都市報》的中層主管就如同團長，所以他有必要在前線，帶著團員衝鋒陷陣，自然能建立起革命情感與信任。他表示有許多大型報導都是他親自帶兵領隊到現場的，而不只是在辦公室指揮、發布施令。

雖然不同中層主管，在管理方式上有所差異，但主要都是會遵循南方傳統文化，主動保護記者，讓記者免於受到上層的威脅（S2、S13）。例如，受訪者（S13）曾經因為多篇帶有批判性的調查報導，被中宣部列入禁令名單之一，許多報社都不敢聘請這名優秀記者，唯有當時《南方都市報》主編不畏懼，直接聘請他入深度調查版當記者，甚至主動為其化名處理新聞內容，也為該報增添許多精彩作品。

在南方傳統文化培養下，這些中層主管屬於「新聞專業型」，他們多具備編採能力與新聞專業，是富有新聞理想的一群人（S3）。其中受訪者認為這群人，往往傾向自由主義，有他們的一套新聞價值判斷標準（S1、S3、S4、S6）。

受訪者（S2、S7）表示，江藝平與人說話是非常溫和儒雅，與人說話總帶著笑容，並會尊重記者、編輯的意見，她不管具體業務，而是以一種精神、人格魅力來激勵員工。而程益中則不同，受訪者（S4、S9）表示，他具有支配力，但

airiti

這種強勢性只在於編採業務上。讓人佩服的是其判斷局勢準確，也因此他更勇於創新。《南方都市報》創立階段，發行量不佳，程益中請完全不具發行經驗的詩人記者浪子，負責發行，以「不看不知道、一看都說好」的直白廣告詞，企圖分食《廣州日報》的發行，之後確實成功讓《南方都市報》從 8,000 多份突破十萬份（S4）。正因其有這樣的趨勢觀察能力，所以在銜命北上創立《新京報》，有近百人願意追隨他（S6）。

歸納受訪者的分析，研究者認為江藝平與程益中，皆屬於偏向西方領導學「魅力式領導」，而在東方特色中，江藝平常「動之以情」，與部屬相處更多的是關懷尊重，屬於親情式的領導；程益中在處事風格上強調「制度」與「創新」，偏向教導式和參與式的領導，相似於東方文化特色中的「作之師」，對待部屬，強調彼此信任感、更多的分享參與，扮演教導者角色。

陸、《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分析

除了上述兩位主編，此部分研究發現，主要歸納受訪者指出，其任職期間認為具「新聞專業精神」的集團領導與中層主管們，普遍具備的領導風格特色。研究發現《南方周末》與《南方都市報》的領導風格具有四種特質：「舉才不分背景，文人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

一、舉才不分背景，文才為重

兩報中層主管在舉才時，不論背景、學歷，皆以文采為重，他們更要求的是採寫能力，尤其在報紙草創期最為明顯。當時出現一批「流浪記者」，他們沒有正式的記者證，來自四面八方，包括詩人、寫球評、樂評、商人……等，他們多半不具備高學歷、新聞經驗，但肯吃苦、勇於突破、創新。不同於後期多是來自名校新聞系的背景（S4、S8、S9）。相對來說，當時的新聞內容豐富多元，受訪者（S9）甚至戲稱這批人是「三教九流」，突顯出這群人的奇異性，這些人根本難以進入其他主流報社。

當時的《南方都市報》內部競爭激烈，可能一下子來了上百人，加上基本工資不高，所以只有通過三個月試用期，具備寫稿的能力，才能夠被留用（S1、S4）。不過，後期也有一群人是因個人興趣，對新聞富有理想而選擇加入。對此，較晚期進入的受訪者則認為，具備法律、商業經濟……等知識，所謂非新聞科系

airiti

出身的人，往往在處理新聞議題上更為豐富，對議題拿捏的掌握，或思考的邏輯會更為清晰與詳盡，因而會被優先錄取（S2）。

綜述可知，這群南方人雖不是出自名校，也沒有新聞背景。但他們具有更多的社會經驗，本身是文筆好，加上對新聞富有理想，也造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當時許多精彩的報導與明星記者的光環。

二、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

受訪者認為，不少集團領導人、中層主管、一線記者、編輯，包容力廣大、價值觀開放，相對更傾向民主，反專制的理念，也期望中國大陸朝向更為開放、自由的發展方向（S6、S7）。

受訪者（S12）指出，2006 年漫畫家鄺飈的作品在《新快報》一直登不上去，但《南方都市報》願意給他寬廣的尺度空間發揮，透過網路熱點找題材，大膽將新聞漫畫的內容創新，將帶有諷刺性的灰色幽默漫畫，取代過去的單純幽默漫畫，從漫畫上與文字上的批判性，做了大幅提升。

由於組織上到下的價值觀是一貫的，所以一線記者、編輯不太需要跟上層爭辯任何的新聞尺度問題（S4、S11、S1）。《南方周末》由江藝平與錢鋼雙向管理的特殊時期，江藝平完全授權錢鋼，而錢鋼也只是偶爾針對記者、編輯的文稿進行指正，從不會主動干預或者修改新聞內容（S10）。

另外，記者、編輯在發言的權益上是最大的，多數時候集團領導人、中層主管、一線人員三層打通的，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越級報告，而大多時間他們也都是歡迎記者、編輯去提問、討論的（S3）。

三、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

保護記者、編輯是南方報業的傳統，所以當《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發生問題，中宣部要求報社處理時，最常運用的方式是：在報社內部，對外看似是處理記者，如離職，但實為只是將他先調至其他部門，避風頭。即便遭到罰款，也多半是由社長出面，這些事也可能隨著時間而有變化，甚至不進行處分（S4、S10）。甚至有中層主管會跟宣傳部的審讀員發生爭議，幫一線人員爭取新聞空間（S8）。

受訪者（S1）任職於《南方都市報》時，曾聽說一名同事不小心犯錯將高行健的照片登在報紙上，但前一晚已經收到禁令通知，強調不能夠做他獲得 2000

airiti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因此碰到政治底線，對外是勒令離職。原來領導的做法只是幫那個同事換個名字，仍留任報社。這樣的事情，對南方人而言是常態。上述的處理方式，明的是能給上層一個交代，私底下則是為了保護記者，免於他們受到更大的傷害（S2、S11、S13）。

受訪者（S6）表示，他擔任集團中層主管期間，對上更為嚴厲，對下則是相對寬鬆，多為下頭爭取更多的利益與空間。這是具有新聞專業素養的南方主管的基本精神，他們不會為了自身的晉升，反而會為一線人員爭取最大的利益。

四、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

2003 年《南方都市報》在程益中的帶領下，首先推行組織內部的文章評分機制，而後更成為制度化的運作方式之一（S8）。當時報社基本工資低，記者們要賺錢多半只能靠稿費，至後期都還是如此（S2、S4）。稿費多為按件計酬，由特獎、A ＋、A －……一直到 E ＋、E －，共十一個等級，最高是特等 800 元人民幣，最低 E －僅有 50 元人民幣。只要記者、編輯肯努力，持續發稿、編版等，其月薪都有可能超過主編。

此外，主管階層會針對文章的優劣來寫評語，並將優秀或劣等的文章，貼在報社內部公布欄上，受訪者（S1）表示，他看過最有趣的是，某次看到中層主管對一個版面的不滿意評語竟是：「喪盡天良」。直白的用語，看得出來，主管與一線工作者的親密互動關係。

除了文稿的評分機制，中層主管也負責部分財務管理，也因此他們能彈性運用這些獎金，以此來激勵優秀的員工（S6、S8）。即使記者的稿子，基於禁令未能被刊登，主管也會根據內容質量給予稿費（S9），如果邀稿未能刊登，仍然會給予稿費，受訪者（S12）表示，一幅好品質的新聞漫畫，最高能給到 500 人民幣，未能刊登也會給到一半稿費。以文稿而言，最高的稿費大多出自深度報導部，受訪者（S2）表示，有的人可能一篇優秀的深度報導，就可拿到 5 萬人民幣。但該名記者所耗費的時間，也有可能長達一、二年。

另外，報社內部每年會在廣東星海音樂廳，舉辦「南都新聞報導獎」，其中南都全媒體特別大獎年度大獎」為最大獎，也是內部南方人最想得到的獎項，這些獎項雖然是由內部頒發，對於記者確是最重要的榮譽感，也是屬於南方人一年一度的聚會（S11）。除此之外，這些優秀的作品，日後編輯出版，以此鼓勵後輩的記者，成為他們的榜樣與學習對象。由這些內部的良性競爭，更能讓記者、編輯不斷地創新、進步。

airiti

柒、代結語：289 南方大院文化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在組織人員、讀者取向組成上，也有所不同。他們的背景並非來自大城市，更多的是小鎮青年、農村青年，他們普遍具有草根精神（S7），兩報關懷更多的是在社會上較為弱勢的人們，也是大眾市場取向（S1）。對此，受訪者（S7）比喻，《南方都市報》是給進城打工的農民看，《南方周末》是給進大學的農民看。這群新聞工作者，普遍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些微的關係，有的是參與者，有的則是受到六四精神的感召，因而投身新聞事業（S10）。

來南方報系的人，往往富有新聞熱情，他們當初也是受到這股氛圍感召，這些人來自全國各地，由北到南，不一定是大城市，不少來自偏鄉地區的少數族群，往往拎個包、帶點行囊，就從其他省分過來廣東，感覺就像行走江湖一樣（S6、S7）。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往往是由年輕中層主管帶領年輕記者，而這群領導者是由編採出身，由記者、編輯到主管階層，一關一關升上去的，他們相互影響（S7）。比較起雜誌媒體，他們傾向個人英雄主義，團體作戰相對薄弱，但在新聞價值上，都更加重視新聞專業與市場化的發展（S3、S9、S11）。

這群南方人，截稿後會一起喝酒談新聞（S2、S4）。在南都新聞報導獎時，不同部門的人，彼此也會聊聊工作近況（S11），離職後只要有聽到對方任何消息，如婚宴喜慶、喪葬禮儀等，有空的人都會參與（S2）。曾任主任級主管的（S7）也說：「我們都直來直去、掏心自腹，我跟下屬的關係很好，如同軍隊的同袍一樣。」事實上也證明，離職的南方人也會一個拉一個，往下一個工作崗位發展（S2、S11）。

整體而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經常扮演著「向下執行禁令管制」與「向上爭取新聞空間」的雙重角色。在主編的層次上，兼具有力爭新聞自主的「新聞專業型」主編、偏向官派的「新聞專業拉鋸型」主編、以及重視官方關係與自我未來發展的「仕途優先型」主編。但「新聞專業型」被認為是具有南方報業精神的代表，也較為受到推崇。其次，新聞專業型的中層領導者江藝平與程益中，呈現以「魅力型領導」為主，「參與式領導」為輔的特質。最後，集團中具備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領導者們，普遍具備的領導風格有：「舉才不分背景，文才為重」、「保有自由開放思想，爭取新聞言論空間」、「分層領導，保護記者優先」、「內部競爭機制，彈性獎勵制度」特色。

airiti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廣州大道中 289 號，在前述的特殊場域中，一群懷有新聞專業、新聞改革、新聞理想的集團領導人與中層主管，帶領優秀的一線記者、編輯共同打仗，彼此因為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而共事，逐漸形成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黃金十年（2000 年 ~ 2010 年）上下，獨有「289 南方大院」的組織文化。

過去關於南方報系的研究或闡述，多集中於新聞事件處理、或單一主編的個案，然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近三十年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報業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必要從組織場域、領導人特質，做較長時間的觀察。然而，本研究基於研究的時間、人力與經費限制，亦無法全面性針對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領導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的領導人與主編，做逐一深入探討，但透過本文對於領導人時間系譜的整理，再經由離職南方人的推舉與分析，嘗試為此段南方報業發展，留下歷史紀錄。

《南方都市報》與《南方周末》的特色，不同於一般黨報風格，兩報對新聞採訪的專業要求高、敢於和體制抗爭、運用擦邊球的技巧，包括抓時機、判斷政治情勢，進行一系列的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這樣的表現也曾引起一股中國調查式報導熱潮，也獲得更多讀者信任與支持。然而上述的新聞表現，需有相對應的時空環境，政治上反貪腐與追求公平正義之聲的政策推力，加上媒體市場的拉力，配合廣東省委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領導人的進退拉鋸之間，成就了一段南方報業的黃金時期。

而在此期間，幾位被推舉為具有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領導者，有機會躬逢其盛，在擔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主管角色時，針對爭議性新聞處理，做出不同於當時其他新聞傳媒的決策表現，也因而面臨被降職、被離職的命運，其領導特質與風格亦值得關注。

隨著資訊網路時期與社群媒體的出現，目前中國新聞傳媒環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國家的新聞資訊管制策略出現漏洞，而傳統媒體需要與新媒體競爭閱聽眾。雖然時空不能複製、儘管現階段中國的新聞與言論控制趨強，南方報系被徹底打壓，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專業與典範的研究領域中，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生存之戰、領導風格與文化，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參考書目

BBC 中文網（2013 年 1 月 7 日）。〈《南方周末》事件曝光回顧〉，《BBC 中文網》。

airiti

取 自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3/01/130107_southern_weekends_review.shtml

人民網（2015 年 5 月 11 日）。〈報業步入衰退期　專家稱遭遇「斷崖式」滑落〉，《人民網》。取自 http://media.sohu.com/20150511/n412798563.shtml

大紀元（2005 年 8 月 2 日）。〈傳南方周末報資深記者集體辭職〉，《大紀元》。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2/n1005358.htm

———（2001 年 6 月 3 日）。〈南方周末因報導口徑異於官方遭中共大舉整肅〉，《大紀元》。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3/n94911.htm

中國一公民（2003 年 5 月 2 日）。〈拒買《南方周末》直至罷免張東明聲明〉，《看中國》。取自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03/05/02/41357.html?%E6%8B%92%E8%B2%B7%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7%9B%B4%E8%87%B3%E7%BD%B7%E5%85%8D%E5%BC%B5%E6%9D%B1%E6%98%8E%E8%81%B2%E6%98%8E

王毓莉（2012）。〈馴服 v.s. 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新聞學研究》，110：43-83。

———（2012 年 12 月）。〈《南方都市報》「網眼版」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之研究〉，「第十二屆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論文。中國，廣州。

———（2010）。《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一個新聞輿論監督的考察》。臺北，臺灣：揚智。

左方（2009 年 6 月 12 日）。〈創辦《南方周末》的左方：黃文俞影響了我〉，《南方日報》。取自 http://60th.nfdaily.cn/journalist/content/2009-06/12/content_5247316.htm

左方、沈洪（2014）。《鋼鐵是怎樣煉不成的——《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口述歷史》。香港，中國：天地。

何清漣（2006）。《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臺北，臺灣：黎明。

吳婧（2015 年 8 月 14 日）。〈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上）〉，《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13-china-investigative-reporting-one/

宋秋儀譯（2014）。《組織領導學》。臺北，臺灣：華泰。（原書 Yukl, G. A. [2013].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李小勤（2007）。〈傳媒越軌的替代性分析框架：以《南方周末》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2：133-160。

airiti

林妙容（2003 年 9 月 28 日）。〈緊縮言論　粵報記者出走〉，《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30928/385204/

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臺灣：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96]. *Sur la télévision*. Paris, France: Liber Raison d'agir.）

邱天助（1998）。《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臺灣：桂冠。

長平（2015 年 5 月 21 日）。〈長平觀察：習近平的思想嚴打運動〉，《德國之聲中文網》。取自 http://www.dw.de/%E9%95%BF%E5%B9%B3%E8%A7%82%E5%AF%9F%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6%80%9D%E6%83%B3%E4%B8%A5%E6%89%93%E8%BF%90%E5%8A%A8/a-18465611

范以錦（2005）。《南方報業戰略：解密中國一流報業傳媒集團》。廣州，中國：南方日報。

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臺灣：麥田。（原書 Bonnewitz, P. [1997]. *Premieres lec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Pari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徐文中（2004 年 4 月 24 日）。〈《亞洲週刊》：《南方都市報》被整肅過程揭秘〉，《博訊新聞網》。取自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4/04/200404242320.shtml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臺北，臺灣：生智。

崔保國、何丹嵋（2014）。〈2013 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崔保國（編），《2014 傳媒藍皮書：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頁 1-1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

康自立、蘇國楨、張淑萱、許世卿（2001）。〈中國式領導模式的發展及其在技職院校之應用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7：133-154。

張小麗（2004 年 6 月 2 日）。〈從《南方周末》的批評性報導看輿論監督〉。取自 http://www.xici.net/b35667/d20036679.htm

張志安（2008）。〈深度報導的軌跡回望與問題反思——以新聞專業主義為視角〉。取自 http://www.cssn.cn/xwcbx/xwcbx_xws/201310/t20131026_608992.shtml

張志安、沈菲（2012）。〈調查記者的職業滿意度及影響因素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4：64-75。

張意（2005）。《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

airiti

中國社會科學。

張裕亮（2006）。《變遷中的中國大陸報業制度圖像》。新北，臺灣：晶典。

張駿德（2006）。《中國新聞改革論》。臺北，臺灣：秀威。

曹國星（2015 年 8 月 28 日）。〈南方報業集團的自我閹割之路〉，《RFI 法廣》。取自 http://trad.cn.rfi.fr/%E4%B8%AD%E5%9C%8B/20150828-%E5%8D%97%E6%96%B9%E5%A0%B1%E6%A5%AD%E9%9B%86%E5%9C%98%E7%9A%84%E8%87%AA%E6%88%91%E9%96%B9%E5%89%B2%E4%B9%8B%E8%B7%AF

曹麗紅（2014）。〈中國調查記者行動實踐的社會學分析——一種媒介場域的視角〉，《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7：48-52。

梁榮輝、陳建壕（2005）。〈領導型態、組織文化與激勵制度對工作滿足之實證研究〉，《績效與策略研究》，2（1）：103-155。

習仲勳主政廣東編委會（2007）。《習仲勛主政廣東》。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

郭心華（2014 年 4 月 24 日）。〈南方報業的「李范時代」〉，《人民網》。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424/c382352-24939024.html

郭國松（2012 年 8 月 20 日）。〈兩代「賊王」：從張君到周克華〉，《紐約時報中文網》。取自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0820/cc20guoguosong/

陳千玉譯（1996）。《組織文化與領導》。臺北，臺灣：五南。（原書 Schein, E. H. [1992]. *Qrganization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陳珣（2013 年 1 月 20 日）。〈南方報系十三年來被整肅大事記〉，《亞洲週刊》。取自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63348811560&docissue=2013-03

曾原（2006 年 3 月 21 日）。〈南方報業 2005 破年年表：從報業集團到傳媒集團〉。取自 http://www.libnet.sh.cn:82/gate/big5/www.istis.sh.cn/list/list.aspx?id=2701

舒嘉興（2001）。《新聞卸妝：布爾迪厄新聞場域理論》。臺北，臺灣：桂冠。

黃順星（2010）。〈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臺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113-160。

新華網（2013 年 4 月 8 日）。〈楊健任南方報業集團董事長和管委會主任〉，《新浪網》。取自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3-04-08/085626760688.shtml

潘忠黨、陳韜文（2004）。〈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

airiti

變〉，《新聞學研究》，78：1-43。

蔣景青（2002）。《組織氣候、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以 C 工廠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競超（2012a 年 4 月 24 日）。〈張琮：黨性、報格、人格　記者不可丟！〉，《南方日報》。取自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04/24/content_7078266.htm

———（2012b 年 4 月 24 日）。〈劉陶：我的一生都在爬方格〉，《南方日報》。取自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2-04/24/content_7078269.htm

關軍（2014 年 4 月 14 日）。〈解密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番羅旺斯」的年輕人〉，《右邊》，3：21-43。

Bass, B. M. (1985).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UK: Sage.

Bryman, A. (1992). *Charisma and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UK: Sage.

Burns, J. M. (1978). *Leadership*.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House, R. J. (1976). A 1976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L. L. Larson & J. G. Hunt (Eds.), *Leadership: The cutting edge* (pp. 189-207).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Lewin, K., Lippitt, R., & White, R. K. (1939). Pattern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ly created “social climat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269-299.

Ott, J. S. (1989).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pective*. Chicago, IL: Dorsey Press.

Silver, P. F. (1983).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Stogdill, R. M. (1974). *Handbook of leadership: A survey of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207-239, January 2017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Leadership Style and Culture of the News Media in China: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Cases

Wang, Yu-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 leadership style and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Media Group in China through the eyes of 13 former journalists and leaders from the groups.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are both found to have relatively free environments, though engagement in political games with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remains necessary. The group leaders often play a dual role as both regulators and protesters, and advocate news professionalism. The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ho pursue professionalism in news are as follows: "Hiring journalists regardless of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ile emphasizing their literary talent," "portrayal of liberal ideas, to pursue more space for news freedom," designing a hierarchical leadership mainly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nd"employing internal competition mechanisms and flexible reward systems to enhance the journalists' performance." Finally, both groups are observed to have created a unique "289 South Courtyar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golden era.

Keywords: *Southern Weekly*,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Southern Newspaper Media Group, organizational field, leadership style

* Email: ylwang1022@gmail.com
Received: 2015.7.7
Accepted: 2015.11.1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241-263．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09

有線電視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研究

莊春發 *
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臺灣有線電視產業系統與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就衡量變數而言，頻道代理商的總營運金額，應當最能顯示頻道商在市場所擁有的市場主導力量，惟該數據屬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秘密，在實務上不易取得，在權衡之下，可以以頻道商的報價為代理變數，或者以頻道商頻道在市場上的收視率做為代理變數，以反映個別頻道在市場上的重要性。在衡量方法上，由於集中度（CR_4 或 CR_8）的計算方式，只蒐集市場前四家或前八家個別頻道代理商的數據，將會有遺失重要資訊的缺失，也有不能反映頻道商實際市場分配的狀況，因此政府部門如欲瞭解臺灣頻道市場集中與否的問題時，建議可採行以頻道商報價或其在市場的收視率為指標，並採以 HHI 計算的衡量方法。

關鍵詞：HHI 指標、集中度、頻道市場、鬆散的寡占、嚴峻的寡占

* Email: cfchuang@just.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26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1 月 28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緒論

一般產業的經營成敗與否，產品或服務通路的設計與建立，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以臺灣一般食品、飲料等產品為例，統一超商通路的建立與使用，對該產業經營成功的貢獻，即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相似的情況，在臺灣油品的銷售，加油站通路的建立與擁有，亦攸關特定油品公司是否能夠在該產業站穩腳步。2003 油品市場開放之初，外商埃索公司積極參與國內油品市場的供應行列，但因僅僅掌控區區 49 家之加油站，以致於無法有效供油而影響其臺灣的油品供應市場的立足，最後不得黯然的退出臺灣油品的供應行列（莊春發、許志義、陳汝吟、謝秀宜，2012）。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於臺灣電信產業的發展過程。2G 行動電話設立之初，因執照給予的不同，有全區執照與分區執照之別。經過兩三年的試驗，分區執照的公司因為客戶數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水準，最後紛紛為全區執照廠商所併購，其原因亦為行動通信服務通路不足所造成。到了 3G 的時代，新進廠商亞太與威寶兩家公司，一直無法與舊有廠商抗衡的理由無它，行動服務的最終據點即客戶數，無法與前三大的既有行動電信公司對抗所造成（莊春發，2009）。

是故，在一般廠商的發展過程裡，產品的品質優良、價格公道合理、服務周到等因素，固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然則，產品自有銷售通路的有無，與設計的優異與否，亦居極其關鍵的地位。

然而，審視臺灣有線電視過去的發展情形，則發現它比一般產業存在著另外的特別屬性。早期系統商電視頻道的內容，在有線電視經營的競爭過程裡，決定著廠商優勝劣敗的最後結果。所以市場上經常流傳一句話：「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其所顯示的意涵，代表有線電視市場的系統商，誰有優良或較佳的節目，誰即能在有線電視的市場裡成為優勝者。過往各分區的有線電視市場內的廠商競爭，已經實踐上述的原則。節目較佳的業者，最終將取得較多消費者的青睞，而成為市場的優勝者。因此許多系統商的經營策略，乃向上發展（back forward）成立頻道供應商的組織，以控制頻道的供給，一方面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二方面則藉此與競爭對手周旋。

過去主管機關對有線電視業者的規範，對於頻道商的管制較鬆，相對於系統商的嚴密控制完全不同，之所以產生儼如天南地北的差異，可能原因是頻道商的統計資料欠缺，二是系統商直接面對民眾，而頻道商的節目則為系統商的中間投入，只是系統商吸引消費者的重要工具，在經營上並不像系統商需要直接面對消費者，所以被主管機關認為不需像系統商一樣的嚴格管制。

airiti

依據我國目前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衛星電視市場的經營者區分為直播衛星電視事業，與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兩類業者。前者的經營模式與有線電視雷同，係以節目吸引家計單位，透過衛星視訊的傳遞到一般家庭內，並以小耳朵做為家庭收看之工具，管制節目不會外溢，便利直播衛星業者向消費者收費。

至於後者，基本上係以出售電視節目內容予有線電視系統商的經營者。經營衛星廣播電視節目的供應者，有時又稱其為頻道節目代理商，因為他們所出售的節目絕大多數係來自外國製片商、代理商，或者國內影片的製片商。他們的出身各有不同，有些經營者是錄影帶時代的片商、有些經營者則是大型集團影視節目購買人員出身，由國外引進外片，授權給系統業者，以及發展自己集團的節目臺。第三種經營業者本身既沒有系統臺，也未代理國外頻道，純粹只是因為與系統業的關係良好，能夠透過社會網路和系統臺建立買賣關係，從而崛起，典型的這類業者如八大代理公司。

頻道市場集中度高低與否的瞭解，一般除由供給面頻道銷售的營業額為衡量指標之外，應當也可以由反面的需求面，觀察頻道市場集中的情形，甚至是藉由市場交易後的結果，衡量頻道市場集中的情形。在實務上應當還有其他變數可以做為衡量集中度的指標。採用其他指標所衡量出來的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結果，與採用頻道商營業額所衡量一樣的結果是否相同或相似？

主管機關對頻道管制政策的擬定，是否應堅持以供給面營業額為指標衡量集中度，還是可以同時採用以需求面的指標為基礎，進行頻道市場集中度的衡量呢？文獻上市場集中度的衡量公式有市場集中度（CR_n）以及雙赫指標（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簡稱 HHI）為指標[1]，兩種衡量方法那一個較能反應頻道市場的集中情形？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及所顯示的意義，應可提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制定有線電視頻道管理決策的參考，它是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貳、文獻回顧

有線電視朝向「一區一家的市場獨占問題趨勢」，不僅造成經營區內民眾無選擇權，而且可能形成有線電視系統通路遭致壟斷，使衛星電視頻道上架困難。因此，為保障民眾權益，促進公平競爭，學者建議分階段改變有線電視集團版圖與市場結構（施俊吉、陳炳宏、劉孔中，2003）。競爭政策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

1 HHI 的指標是由兩位經濟學家 Albert Hirschman 與 Orris Herfindahl 所提出，見 Hirschman (1964: 761)。

airiti

委員會，亦擔憂有線電視市場高度集中的發展，可能出現「市場競爭機能斲喪」，導致「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濫用市場力量」等行為，因此提出〈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作為執法依據，防止市場壟斷及業者出現不公平競爭的經營行為。因此，臺灣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的研究大都集中於系統商市場

新聞局兩度（2003 年與 2005 年）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執行的《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發現臺灣有線電視之市場集中度，2003 年 HHI 值為 1,452、2004 年 HHI 值則下降為 1,354；因此施俊吉等人之研究認為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僅是「中度集中市場」（施俊吉、劉孔中、葉疏、周韻采，2003：23）。

陳炳宏（2002）使用 1999 年臺灣有線電視的訂戶數為資料，並以市場集中度（CR_n）為測量方法，算出臺灣前四大 MSO（multiple system operator，多系統經營者）的市場集中度為 74.3%，因此推論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屬於「高度集中」，而且是「被少數業者壟斷」的市場。

柯舜智、莊春發（2008）發現前述之集中度研究與一般社會的感覺有相當的落差，認為研究方法可能有問題，於是改採先進行各區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的計算，然後再將各有線電視市場 HHI 指數，乘上其占全國有線電視市場收視戶的比例，最後則將該數值加總，獲得的 HHI 值高達 8,084，顯示臺灣有線電視的系統商市場屬於高集中度市場。之後，施俊吉（2012）在〈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與經營區調整政策〉一文中採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亦獲得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 HHI 集中度指標高達 8,372，支持有線電視系統商市場為高集中的市場。

由於有線電視的系統商直接與消費者接觸，所以其市場結構集中度的問題受到社會較多的關注，相對的，頻道市場對有線電視產業結構的集中發展雖然存在著重要的影響，但一方面它屬於系統商經營時的中間投入，與最終消費市場沒有直接之關係，因此受到社會與學者的關注，就比不上系統市場。另一方面則是系統商頻道交易情形較為複雜[2]，研究者即使有心亦常因無法取得各頻道的真實收入，而無法進行市場集中度的估計。因此大部分有線電視國內文獻，皆以系統市場集中度的研究為重點。

2 例如臺灣有線電視市場的客戶數已達 500 萬戶以上，但頻道商的收視戶計價，仍以過去的慣例 290 萬戶為計價基礎。

airiti

如前所述之原因，國內學術的領域裡能完整分析頻道市場集中度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比較有系統的分析應當只有陳炳宏[3]（2000）的〈臺灣有線電視產業之系統與頻道市場集中度研究〉，他們以 1999 年 10 月底國內的頻道市場 52 家有線電視頻道公司經營 87 個線電視頻道為分析對象。首先以個別頻道公司觀察[4]，營業額最高的頻道公司共擁有 5 個有線電視頻道，年營業總額高達 433,440 萬元，占該年度頻道市場的 25.26%；第二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3 個頻道，營業額為 211,000 萬元，市場占有率為 12.3%；第三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5 個頻道[5]，營業額為 210,000 萬元，市場占有率為 12.24%；第四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7 個頻道，但營業額只有 152,000 萬元，市占率為 8.86%；第五高的頻道公司擁有 5 個頻道，營業額為 120,000 萬元，市占率為 6.99%；第六高的頻道公司則擁有 2 個頻道，營業額達 66,400 萬元，市占率為 3.87%；第七高的頻道公司擁有 4 個頻道，營業額達 62,307 萬元，市占率為 3.63%；第八高的頻道公司則僅擁有 1 個頻道，營業額達 56,000 萬元，市占率為 3.26%。

依據前面的數據為基礎，陳文進行分析，有線電視頻道公司的營業總額共為新臺幣 1,715,816 萬元，前四大公司擁有 20 個頻道，年營業額為 1,006,440 萬元，市場占有率 CR_4 為 58.65%，前八大公司則擁有 36 個頻道，年營業額為 1,311,147 萬元，市場占有率 CR_8 為 76.41%。按一般產業經濟學的分析指標，市場集中度指標 CR_4 超過 50%，或 CR_8 超過 75%，即代表該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陳文由此數據觀察，認為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

若按有線電視集團所掌控的頻道加以分析，結果為前四大有線電視頻道集團共擁有 21 個頻道，年總營業額為 1,059,240 萬元，而前八大有線電視頻道集團則共擁有 34 個頻道，年總營業額為 1,382,547 萬元。四大集團的頻道集中度（CR_4）為 61.8%，前八大集團的頻道集中度（CR_8）為 80.6%，依前面四大集中度與前八大集中度市場的標準觀察，臺灣有線電視頻道集團的市場集中情形，不管由前四大或前八大集中度來分析，都是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

---

3 陳炳宏進入學術界服務前，曾在頻道業的重要廠商服務，因此藉由原有人脈才有機會取得個別頻道代理商的正確的營運金額。最後能夠進行頻道市場的集中度分析。

4 其實這裡的頻道公司，是指代理多頻道銷售的頻道代理商。

5 從以上各家頻道公司代理的頻道數與營業金額，可以發現頻道代理商代理頻道數多寡，與其獲得的營業額並沒一定之關係。換言之，頻道在市場上，每個頻道的在市場的重要性與價值並不相同，將每個頻道視為等值的做法並不適當。

airiti

參、有線電視頻道市場的狀況

一、歷年頻道供應商與頻道數供應數的變化情形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5 年第 1 季 NCC 網站的公告資料，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目前有 8 家，4 家為本國業者，4 家為境外業者。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共有 110 家業者，經營的頻道數共有 279 個。中間本國業者有 87 家，經營 170 個頻道，境外業者 30 家，經營 109 個頻道，中間境內與境外兼營的業者則有 7 家，如表 1 第七欄。與 2007 年比較，可以發覺九年間國內共增加 27 家的頻道供應商業者，供應的頻道則增加了 99 個。進一步分析本國頻道業者家數近六年增加 24 家，頻道數則增加 38 個。相同時間，境外業者家數則增加 10 家，頻道數則增加 61 個。

二、頻道所屬集團情況分析

表 2 是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上主要的五家代理頻道商，以及其所代理的頻道內容。五大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分別為：

（一）全球多媒體公司（原台訊多媒體）。它代理 GTV 第一臺、GTV 綜合臺、GTV 戲劇臺、GTV 娛樂 K 臺、中天新聞、中天綜合、中天娛樂、TVBS、TVBS-N、TVBS-G、Discovery 等 10 個頻道，它對系統商的名目報價為新臺幣 88.5 元。基本上它屬於中嘉集團投資的頻道代理商。

年度	本國業者家數	本國業者頻道數	境外業者家數	境外業者頻道數	合計業者數	合計頻道數
2007	63	132	20	48	83	180
2008	66	136	23	57	89	193
2009	79	152	29	80	99[a]	232
2010	80	156	29	88	101[b]	244
2011	84	159	28	106	104[c]	263
2012	80	157	29	112	109[d]	269
2013	84	165	30	115	114[e]	280
2014	86	169	29	111	115[f]	280
2015[*]	87	170	30	109	110[g]	279

表 1：衛星廣播電視業家數與頻道數 2007 ~ 2015 年統計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註：[a]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9 家，[b]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8 家，[c]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8 家，[d]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 家，[e]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 家，[f]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6 家，[g] 境內境外兼營業者共有 7 家，[*]2015 年資料只計算到第 1 季資料。

airiti

頻道商名稱	代理頻道／自營頻道	頻道數（%）	價格總數（%）
1. 全球多媒體公司（原台訊多媒體）	GTV 第一臺、GTV 綜合臺、GTV 戲劇臺、GTV 娛樂 K 臺、中天新聞、中天綜合、中天娛樂、TVBS、TVBS-N、TVBS-G、Discovery	11（16.41）	88.50（20.57）
2. 佳訊錄影視聽企業有限公司	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三立新聞臺、國興日本臺、JET 綜合臺、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電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東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非凡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電視臺、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訊綜合臺、壹電視電影臺	20（29.85）	113.5（26.38）
3.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	13（19.40）	114（26.65）
4. 永鑫多媒體公司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S、CARTON NETWORK（CN 卡通頻道）、CNN、ANIMAX	7（10.44）	43（9.99）
5. 允誠多媒體有限公司	超視、LS TIME 電影臺、AXN、霹靂台灣臺、好消息、好消息（二臺）	6（8.95）	19.5（4.53）
6. 優視	衛視電影臺、衛視中文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MOMO 親子臺、衛視合家歡	7（10.44）	43（9.99）
7. 雄聚	MTV	1（1.49）	0.6（0.13）
8. 浩緯	動物星球、Z 頻道	2（2.98）	8.0（1.86）
合計		67（100）	430.1（100）

表 2：臺灣有線電視頻道代理商與代理頻道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調查。

註：第三欄與第四欄括弧數字為百分比。

（二）佳訊錄影視聽企業有限公司，它代理的頻道有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三立新聞臺、國興日本臺、JET 綜合臺、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電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東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非凡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電視臺、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訊綜合臺、壹電視電影臺等 20 個頻道。對外報價為 113.5 元，佳訊公司為有線電視名人練台生所投資的頻道代理商，其與台灣寬頻（TBC）集團關係良好。

（三）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為凱擘集團所投資的頻道代理商，該公司所代理的頻道有 13 個，共有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13 個頻道對外的報價為最高的 114 元。

airiti

（四）永鑫多媒體公司，代理的頻道有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S、CARTON NETWORK（CN 卡通頻道）、CNN、ANIMAX 等 7 個頻道。其代理的頻道大都為頻道市場上熱門的頻道，如電影類的 HBO、CINEMAX，體育類的 ESPN、STAR SPORTS， 7 個頻道對外報價僅為 43 元。

（五）允誠多媒體有限公司，根據市場消息它為台固公司前身富洋的轉投資公司，因此屬於臺哥大公司所控制的頻道商。它代理的頻道有超視、LS TIME 電影臺、AXN、霹靂台灣臺、好消息、好消息（二臺）等 6 個頻道。6 個頻道的對外報價共 19.5 元。

（六）優視公司為凱擘系統的頻道代理商，他所代理的頻道有衛視電影臺、衛視中文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 MOMO 親子臺、衛視合家歡等 7 個頻道，對外報價為 43 元。

（七）翊聚公司僅代理一個頻道 MTV，對外報價為 0.6 元。

（八）浩緯代理動物星球、Z 頻道兩個頻道，其對外報價為 8 元。

以上八家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 67 個有線電視頻道，大概已涵蓋目前類比基本有線電視市場上大部分的重要頻道，剩下的其他頻道不是宗教頻道（有些要付上架費，有些是不付上架費），就是系統商可收取上架費的財經股市解盤頻道與其他唱歌後銷售產品類似電視購物的頻道，或命理解盤的頻道。因此在頻道市場上任何業者只要控制上述的 67 個頻道，即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甚至可藉由此顯著之市場力量進行有線電視市場獨占力之濫用。

根據上述的資料觀察，台哥大公司所屬的優勢公司所控制的有 7 個頻道，加上凱擘公司所能控制的 13 個頻道，共有 20 個頻道占全部 67 個重要頻道的 29.85%[6]，結合後的台哥大公司在頻道市場確實擁有相當顯著的市場力量。如衡量業者市場力量的基礎改以頻道銷售價格總額加以表示，以彰顯各種頻道重要性的差異，則依據表二的資料觀察，頻道市場 67 個頻道數的報價共計為 430.1 元，而台哥大公司與凱擘集團所控制頻道的總報價數共為 157 元[7]，占全部頻道總報價金額的 36.50%，超過所有總報價金額的三分之一，可見凱擘集團對頻道市場的控制力道。

6 其實浩緯代理商實際上也是屬於凱擘集團，如此凱擘所代理的頻道共有 22 個頻道，占所有需授權付費的頻道的 32.83%。

7 若加上浩緯的兩個頻道 8 元，凱擘的報價有 165 元，占全部 67 個頻道總報價 430.1 元的 38.36%。

airiti

依據公平會結合案座談會提供的資料，台哥大公司透過台信電訊、台信聯合等公司間接持有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98.5% 的股份，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所代理的頻道數為 7 個，包括衛視中文臺、衛視電影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衛視合家歡等 6 個頻道，另自製「MOMO 親子臺」1 臺，合計代理及製作之頻道數共有 7 個。盛庭公司間接持有之凱擘公司，則取得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共 13 個頻道代理權，結合後申報人總計透過從屬公司代理及製作，共可控制 20 個電視頻道節目的銷售。

按照前述的計算方式，結合後在頻道市場裡，結合申請人所能控制的頻道數占有付費的頻道數，仍占市場的 29.85%，仍具有相當的市場力量。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為謀取更多的利益，當然會藉由此市場優勢銷售其產品。顯然的，經此結合案的發生，勢必讓有線電視市場的頻道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絕非結合案申請人在結合案所主張的：此結合案僅為盛庭公司股權結構的改變，對有線電視市場的上下游不產生任何的衝擊。

以目前類比有線電視所能播出的頻道數觀察，一般大約可播放 100 個頻道的節目，扣除必載的五家無線頻道、原住民頻道、客家頻道，可使用的頻道大約只剩下 93 個頻道。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2 條第 3 項的限制：「節目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供應者，不得超過可利用頻道之四分之一」，據此未來結合後的有線電視公司直接間接提供的頻道數 20 個，未超過《有線廣播電視法》42 條的限制規定 23 個（92 個除以四分之一等於 23 個）。

肆、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法

在產業經濟學的領域裡，長期以來受到結構學派的影響，認為市場上的結構將影響廠商的行為，而廠商的行為又將顯著的影響市場最後的績效，因此市場結構的控制遂成為政府政策上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一市場結構的衡量，就變成不可或缺的過程。集中度高代表該市場控制在較少事業手中，此少數人很可能利用此市場力去壓迫與它交易的相對人，形成一般正常社會所不樂見的獨占力濫用行為。例如最近 NCC 開放新有線電視進入市場或允許舊有有線電視跨區經營，但是擁有頻道代理權的 MSO 系統商就藉由對頻道的控制，去為難前述兩種系統商，採用方法可能是不賣頻道給這兩種系統商，使他們無法經營有線電視的服務；或

airiti

者將頻道的銷售過程利用許多的附加條款，例如要求以行政戶數 15% 為最低的購買量，使得新廠商要以 3 ~ 5 倍的價格買入頻道，最終無法與原有的系統商競爭。

早期市場結構係以市場集中度（簡稱 CR_4 或 CR_8）做為衡量指標，在美國習慣的做法是以市場前 4 家廠商或前 8 家廠商的營業額，占整個市場營業額的比例為指標。依據市場集中度得高低，美國學者 Shepherd，將市場結構區分為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嚴密的寡占（tight oligopoly）、鬆散的寡占（lose oligopoly）、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完全競爭（pure competition）等五種市場結構。見表 3。在優勢廠商市場與嚴峻的寡占的市場結構下均會受到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的嚴密注意。

後來學者之研究發現市場集中度（簡稱 CR_4 或 CR_8）指標有其先天上的缺失，例如指標計算未包括所有廠商的市場訊息，在若干情況不能確實反映市場的結構情形，因此發展出另外的 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指標（簡稱 HHI）替代市場集中度（CR_4 或 CR_8）。

HHI 指標係以市場全部廠商資料做為衡量，其公式如下：

$$\mathrm{HHI} = \sum{}^{n}{}_{1}(S_{\mathrm{i}} \div S)^2 \times 10{,}000,\ 1/N \times 10{,}000 \leq \mathrm{HHI} \leq 10{,}000$$

公式中的 S_i 代表個別廠商的營業額，S 則代表整個市場的營業額，括弧上的平方，代表每家廠商的市場力係以本身的占有率為權數。N 代表市場上存在的廠商數。

當市場為獨占結構只有一家廠商經營時，HHI 最高為 10,000。當市場有 N 家廠商而且每家廠商的營業額均相同時，HHI 為 $1/N \times 10{,}000$。所以當廠商數越多時，HHI 的值越小。例如當 N 為 100 時，HHI 則為 100。換言之，HHI 的定義域為介於 $1/N \times 10{,}000$ 與 10,000 之間。

市場結構	市場集中度
優勢廠商（dominant firm）	一家廠商占 50% 以上
嚴峻的寡占（tight oligopoly）	CR_4 占 50% 以上
鬆散的寡占（lose oligopoly）	CR_4 在 15% ~ 40% 之間
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每家占有率在 2% ~ 8%
完全競爭（pure competition）	每家占有率極小

表 3：Shepherd 市場集中度與市場結構的描述

資料來源：Shepherd (1990: 14)。

airiti

HHI 值的大小明顯的會受到廠商數的影響，廠商數越多 HHI 值越小；相反的，廠商數越少，HHI 值將越大。其次，HHI 值亦受廠商間營業額分配的不同，而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例如兩市場同樣存在 4 家廠商，第一個市場廠商營業額的分配較為集中，其市場比例分別：50%、40%、5%、5%；第二個市場廠商營業額的分配較為平均，其市場比例分別為：25%、25%、25%、25%。計算出來的第一個市場 HHI 值較高為 4,150，第二個市場的 HHI 值則為較低的 2,500。若採用 CR_4 的集中度指標衡量市場集中度時，兩個市場的集中度相同為 100%。但採用 HHI 集中度指標時，則在此例子裡市場廠商數相同，但廠商營業額分配不平均，HHI 值將會完全反映分配的差異，出現第一市場的 HHI 值較高；相反的，廠商營業額分配越平均如第二市場，則顯現的 HHI 值將越低。換言之，HHI 集中度指標能夠將市場廠商分配不均的情況，完全反應在指標上。

美國反托拉斯署過去在審核美國廠商結合案時，將 HHI 值小於 1,000 的市場稱之為低集中市場；HHI 值介於 1,000 與 1,8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中度集中市場；若 HHI 值高於 1,8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高集中市場。市場集中度 HHI 值的高低，將影響其結合案的許可與否。但是最近 2010 年重新公布的結合管理規則，則將低集中市場的 HHI 上限提高為 1,500，高集中市場的下限則提高為 2,500，HHI 值介於 1,500 與 2,500 的市場，則將其界定為中度集中市場。

伍、頻道市場集中度指標的衡量

產業經濟學研究市場集中度時，大都以市場廠商的營業額作為計算集中度的指標。但是如果廠商的營業額資料無法取得時，也會以營業額具有密切關係的廠商資本額、或廠商就業水準作為代理變數，若採用代理變數進行估計時，背後必須假定每家廠商營業額與資本額、就業水準具有相同的固定關係。所以一般研究會經常採行以廠商的營業額作為計算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指標。

一、擁有頻道數占所有播出頻道數的比例

有線電視頻道市場廠商的市場力應當如何衡量呢？第一個想到的是，頻道數經常多於系統商所能提供播出的空間，頻道商間可能必須就有限的播出空間，爭取自己頻道播出的機會。加之臺灣頻道的交易習慣，頻道商與系統商大都採行統買與統賣的形式，因此在決定頻道商在市場上的力量時，經常會以該頻道代理商所出售的頻道數，占所有在市場販售頻道數的比例，作為頻道代理商在頻道市場

airiti

所擁有的市場力量。例如某頻道代理商擁有 30 個頻道的代理權，而市場上經常可播出的頻道數只有 100 個，則該頻道商在頻道市場的占有率為 30%。

很顯然的，以頻道商擁有頻道數，占所有播出頻道數的比例，做為其在頻道市場的市場力的指標是有缺失的，第一，該指標沒有考慮每個頻道到在市場的受歡迎程度。第二，該指標未能考量特定頻道在市場的價值或是重要性。因此僅從擁有頻道的數量比例多寡，似乎無法充分的顯示其對市場的影響程度。

二、頻道在市場的銷售價值占所有頻道銷售的總價值比例

在系統所播出的頻道，若節目受到閱聽人歡迎的頻道，頻道商則可待價而沽的向系統商收取費用，但有些頻道並不受閱聽人歡迎時，可能在市場交易播出時，即無法像系統商收取一定的價格。換言之，有些頻道在有線電視上下游交易的價格為零。甚至有些頻道的播出是需向系統商支付一定之價格，此種交易已經轉化為頻道商向系統商租用頻道播出特定目的節目，電視購物頻道、宗教節目、命理解盤或股票解盤節目，即屬於此種交易模式。這些頻道等同於向系統商付費租用頻道，因此認為它在傳統頻道市場沒有影響力，而將其剔除頻道市場市場力的分析。

因此，如欲衡量頻道商在有線電視市場的市場力量，可以將各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向系統商的報價加總，占所有頻道向系統商報價總和的比例，以表示該頻道代理商在頻道市場的市場力量。向系統商報價為零或需向系統商交付一定金額，才能上架播出的頻道，全數將其價格視為零，表示其在有線電視頻道市場沒有影響力量。

三、以每個頻道的收視率做為市場力的指標

除頻道數所占比例，以及頻道節目在市場的報價總和占所有頻道報價總和兩項指標，可作為頻道商在頻道市場的影響力之外，利用每個頻道的收視率為指標，亦可作為衡量頻道商在該市場的影響力，此指標可能比前兩項指標更適當。頻道數所占比例指標，可能僅就頻道數多寡衡量頻道商在市場的市場力，可能忽略每個頻道在市場受歡迎或不收歡迎的程度，由於僅就數量多寡加以估計，將忽略每個頻道在市場的評價。

特定頻道商頻道報價價格總和占總頻道價格總和的比例，雖然以價格高低修正頻道數量比例的缺失，但由於不能完全反映需求面的影響力，所以仍然存在不

airiti

足之處。相對的，採用每個頻道收視率占所有頻道收視率和的比例，則能兼顧需求面的影響力。

陸、頻道市場集中度的實證

基本上臺灣頻道市場主要的頻道代理商有凱擘、允誠、優視、全球、佳訊、永鑫六大代理商，以及浩緯、翊聚等小的代理商。如表 4 至表 11。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東森電影臺	2.9
2	東森綜合臺	2.8
3	東森新聞臺	17.8
4	東森財經新聞臺	5.9
5	東森幼幼臺	1.2
6	東森洋片臺	6.6
7	東森戲劇臺	3.3
8	緯來體育臺	5.6
9	緯來日本臺	4.1
10	緯來電影臺	2.6
11	緯來綜合臺	1.7
12	緯來戲劇臺	5.5
13	緯來育樂臺	2.4
合計		62.4

表 4：凱擘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14 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超視	1.5
2	LS TIME 電影臺	0.9
3	霹靂台灣臺	0.1
4	AXN	4.6
5	好消息	0.3
6	好消息（二臺）	N/A
合計		7.4

表 5：允誠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0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9.5 元為作者調查。

airiti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GTV 第一臺	0.9
2	GTV 綜合臺	3.2
3	GTV 戲劇臺	4.3
4	GTV 娛樂 K 臺	0.2
5	TVBS-G	2.6
6	TVBS-N	21.7
7	TVBS	7.2
8	中天新聞臺	18.1
9	中天綜合臺	3.3
10	中天娛樂臺	2.7
11	Discovery	8.9
合計		73.1

表 6：全球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 88.5 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三立台灣臺	9.9
2	三立都會臺	10.9
3	三立新聞臺	18.9
4	國興日本臺	1.2
5	JET 日本臺	1.7
6	好萊塢電影臺	4.8
7	Dicovery 旅遊生活	3.8
8	年代電視臺	13.8
9	MUCH TV	0.3
10	東風衛視	0.8
11	彩虹頻道	N/A
12	民視新聞臺	14.2
13	迪士尼	0.9
14	非凡商業臺	0.9
15	非凡新聞臺	5.9
16	NHK	0.6
17	高點電視	1.1
18	壹電視新聞臺	N/A
19	壹電視資訊綜合臺	N/A
20	壹電視電影臺	N/A
合計		89.7

表 7：佳訊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113.5 元，為作者調查。

airiti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HBO	15.3
2	CINEMAX	1.4
3	ESPN（現改為福斯體育）	4.1
4	STAR SPORT	N/A
5	Cartoon Network	1
6	CNN 新聞臺	0.7
合計		23.2

表 8：永鑫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43 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衛視中文臺	3.6
2	衛視電影臺	3.3
3	衛視西片臺	5.0
4	FOX 娛樂臺	1.2
5	國家地理頻道	5.8
6	Momo 親子臺	1.3
7	衛視合家歡臺	0.3
合計		20.5

表 9：優視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43 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動物星球	3.3
2	Z 頻道	0.2
合計		3.5

表 10：浩緯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8 元，為作者調查。

序號	頻道名稱	收視率
1	MTV	0.7
合計		0.7

表 11：浩緯頻道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及其收視率

資料來源：2012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調查。
註：頻道簽約價為 0.6 元，為作者調查。

airiti

一、以頻道商代理頻道數比例作為指標

凱擘代理商共代理東森電影、東森綜合、東森幼幼、東森新聞、東森財經新聞臺、東森洋片、東森戲劇、緯來體育、緯來日本、緯來綜合、緯來電影、緯來戲劇、緯來育樂、等 13 個頻道，如表 4，加上同一集團的優視頻道代理商如表 9，所代理的衛視中文臺、衛視電影臺、衛視西片臺、FOX 娛樂臺、國家地理頻道、衛視合家歡等 6 個頻道，以及自製「MOMO 親子臺」共 20 個頻道。其次是佳訊代理商，其共代理三立台灣臺、三立都會臺、三立新聞臺、國興日本臺、JET 綜合臺、好萊塢電影臺、旅遊生活、年代電視、迪士尼頻道、MUTH TV、東風衛視、彩虹頻道、民視新聞臺、非凡商業、NHK、非凡新聞 、高點電視臺、壹電視新聞臺、壹電視資訊綜合臺、壹電視電影臺等 20 個頻道，如表 7。第三名的頻道商為全球頻道商，如表 6，其共代理 GTV 第一臺、GTV 綜合臺、GTV 戲劇臺、GTV 娛樂 K 臺、中天新聞、中天綜合、中天娛樂、TVBS、TVBS-N、TVBS-G、Discovery 等 11 個頻道。

四家頻道商共代理 51 個頻道，占調查年度 2012 年在系統商出現的 108 頻道的 47.22%。換言之，以產業經濟學集中度的衡量指標而言，它屬於鬆散寡占與嚴格寡占之間 (Shepherd, 1990)，若近一步考量第五名到第八名代理商所代理的頻道數，如永鑫的 HBO、CINEMAX、ESPN、STAR SPORT、CARTON NETWORK、CNN 新聞臺、Animax 等 7 個頻道，以及浩緯的 2 個頻道與翊聚的 1 個頻道，則前八大頻道代理商共代理 67 個頻道，占所有頻道數的 62.03%。初步看起來集中度似乎相當高。

如果改以 HHI 集中度指標 HHI 加以表示：$HHI = (20/108)^2 + (13/108)^2 + (11/108)^2 + (7/108)^2 + (7/108)^2 + (6/108)^2 + (2/108)^2 + (1/108)^2 = 709.44$，獲得的數據並不高。按美國反托拉斯結合的管理新規則或舊規則或新規則[8]，HHI = 799.44 小於 1,000 或 1,500，表示該市場屬於低度集中市場。

二、以價格所計算的集中度指標

如表 4 到表 11 資料顯示，凱擘頻道代理商 13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14 元，允誠頻道代理商 6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9.5 元，全球頻道代理商 11 個頻道的

8 2010 年以前美國司法部以 HHI 值 1,000 為界線，HHI 值低於 1,000 時產業屬於低集中產業，HHI 值介於 1,000 與 1,800 時產業屬於中度集中產業，一旦估計的 HHI 值高於 1,800 以上時，產業屬於高集中產業。2010 年美國司法部重新界定此準則，HHI 值低於 1,500 為低集中產業，HHI 值由 1500 到 2,500，產業屬於中度集中產業，HHI 值高於 2,500 以上時，產業屬於高度集中產業。

airiti

報價為新臺幣 88.5 元，佳訊頻道代理商 20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113.5 元，永鑫頻道代理商 7 個頻道的報價為新臺幣 43 元，優勢頻道商代理 7 個頻道，報價為 43 元。此外浩緯兩個頻道報價為 8 元，翊聚頻道商代理 MVT 的報價為新臺幣為 0.6 元。

如以集中率的指標加以表示，由表 12 第三欄的計算資料結果，可以發覺臺灣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指標為 $CR_4 = 83.44\%$，$CR_8 = 100\%$，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裡，它屬於高集中度的市場。如改以 HHI 指標加以衡量，如表 12 的第四欄，HHI = 2,045.27[9]。按照美國結合的舊管理規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度市場。若改以 2010 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公布的界定準則，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三、以收視率所計算的集中度指標

如前所述，以掌控的頻道數多寡，或是以頻道商所提供的簽約價都是以頻道市場供給面的觀點所計算的集中度，如果要較正確衡量頻道在市場的評價，需求面的影響因素也應當必須納入考量。

表 13 係以每個頻道在頻道市場收視率為指標所計算出來的結果。以集中率指標而言，表 13 的第三欄資料可以計算出 $CR_4 = 74.93\%$，$CR_8 = 84.64\%$，它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嚴格寡占的市場，亦屬於陳文所歸類的高度集中市場。表 13 的

頻道代理商	簽約價	占全部簽約價比例（%）	百分比平方
1. 凱擘	114	26.50	702.25
2. 允誠	19.5	4.53	20.52
3. 全球	88.5	20.57	423.12
4. 佳訊	113.5	26.38	695.90
5. 永鑫	43	10.00	100
6. 優勢	43	10.00	100
7. 浩緯	8	1.86	3.46
8. 翊聚	0.6	0.14	0.02
合計	430.1	100	2,045.27

表 12：以價格表示的頻道市場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9 如果將優視報價併入凱擘的報價則其報價為 157 元，占頻道總報價 430.1 元的比例為 0.3650，重新計算後，HHI 的數值將提升至 2,573.26，則在 2010 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公布的界定準則，臺灣頻道市場為高度集中之市場。

airiti

頻道代理商	收視率合計	占全頻道收視率總合比例（%）	百分比平方
1. 凱擘	62.4	18.82	354.19
2. 允誠	7.4	2.23	4.97
3. 全球	73.1	22.05	486.20
4. 佳訊	89.7	27.06	732.24
5. 永鑫	23.2	7.0	49
6. 優視	20.5	6.18	38.19
7. 浩緯	3.5	1.05	1.10
8. 翊聚	0.7	0.21	0.04
合計	280.5	84.64	1,665.93

表 13：以收視率表示的頻道市場集中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第四欄則顯示臺灣頻道市場的 HHI = 1,665.93[10]，在美國舊規則下屬於高度集中市場，在 2010 年新公布的結合管理規則，則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柒、研究發現

一、以頻道數為衡量指標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低集中市場

若以頻道數做為臺灣頻道市場集中度衡量的指標，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為：前四大頻道商共代理 51 個頻道，占調查年度 2012 年在系統商出現的 108 頻道的 47.22%。換言之，以產業經濟學集中度的衡量指標而言，它介於嚴格寡占與鬆散寡占的中間。前八大頻道代理商共代理 67 個頻道，占所有頻道數的 62.03%。初步看起來集中度似乎並非太高。

衡量方法若改為 HHI 指標加以衡量，則所獲得的數據為 HHI = 709.44，小於美國結合指導原則市場中度集中度的門檻 1,000 或 1,500，表示該市場屬於低度集中市場。此研究結果與一般研究者或有線電視實務經營者的感覺似乎有所差距。

二、以集中度指標衡量結果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集中市場

從前面的分析結果，發現本文的研究結果與陳炳宏的研究結果比較，是有若干的差距，陳文的結果顯示不管是個別公司或頻道商集團的分析，以 CR_4 或 CR_8

10 如果將優視收視率併入凱擘的收視率，其總收視率為 82.9，占頻道總收視率 331.4 的比例為 0.2501，重新計算後，HHI 的數值將提升至 1,899.05，則頻道市場在美國新規則下，仍為中度集中之市場。

airiti

表示的集中度都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高度集中的市場。本文採用全部出現於系統商的頻道為樣本為研究對象，若以頻道價格為衡量指標，則所獲得的結果為 CR_4 = 83.44%，CR_8 = 100%，在產業經濟學的文獻裡，它屬於高集中度的市場。若衡量指標改為收視率為指標時，獲得臺灣頻道市場的集中度指標，則為 CR_4 = 74.93%，CR_8 = 100%，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嚴格寡占的高集中市場，與陳文的研究結果相同。

三、以 HHI 指標衡量結果顯示臺灣頻道市場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然而，若將集中度的測量方法改為 HHI 時，則按美國結合最新發布的指標 HHI 須達 2,500，市場才屬於高集中市場，本文的統計研究結果則顯示，若採用頻道報價為衡量指標，臺灣頻道商市場 HHI 指標僅達 2,041.27，顯示臺灣頻道市場為中度集中市場。若衡量改以收視率為指標，則臺灣頻道商市場 HHI 指標亦僅達 1,665.93，屬於中度集中市場。

四、各種分析結果得比較

（一）就以上的分析結果而言，顯示以頻道數量為衡量指標者，對臺灣頻道市場的集中度衡量可能產生失真的結果。理由是頻道數不能顯示每個頻道在市場的價值，不能反映其在頻道市場的重要性。因此在政策上如欲瞭解頻道市場的集中程度，並不適合以頻道數的多寡與占所有上架頻道的比例，做為衡量頻道市場市場力的指標。此結果的政策含意是，目前《有線廣播電視法》42 條的限制規定，有線電視集團可利用頻道數中，最多只能採用自己代理的頻道數的四分之一，似乎陷入未能考量每個頻道在頻道市場重要性的謬誤。

（二）在衡量變數指標上，以每家代理商出售頻道所獲得的營業額為最佳，因為它一方面反映頻道在頻道市場的價值，另一方面則能夠反映它在市場銷售數量的多寡。採用此指標的缺點是，總營業額的高低與頻道實際交易的價格，往往是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祕密，一般不會對外揭露，研究者欲取得該數據相當不易，或取得的數據已經經過修飾後的結果。

（三）退而求其次的是採用頻道商對外宣告的頻道牌價或其經過市場檢驗的收視率為衡量指標，兩者均能納入頻道在市場的重要性於指標當中，可以避免直接以頻道數量多寡為衡量得缺失，它的優點則是數據較容易由坊間取

airiti

得，不像總營業額或實際交易價格那麼難取得。此外依據此數據所算出來的市場集中度與實務上所感覺的情況亦相當接近。

（四）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法上，CR_4 與 CR_8 的衡量指標未能採用市場上所有廠商的資訊，可能會產生偏差的結果，因為漏列前四家或前八家以後廠商的資料，而將集中度不高的產業視為高集中度。因此衡量上應以考量所有頻道資訊的 HHI 指標較佳。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若以頻道數做為頻道市場頻道集中的衡量，因為未能考量每個頻道重要性與市場價值的影響，計算出來的集中度指標將會有低估的結果。若採用頻道出售價格為衡量指標，以及 CR_4 與 CR_8 集中度的衡量方法，計算出來的結果顯示 CR_4 均超過 50%，CR_8 均超過 75%，因此臺灣頻道市場均屬於高度集中市場。

同樣的，若將頻道集中度衡量指標改為頻道在市場的收視率，所獲得的結果仍然與頻道價格所衡量的結果一樣，顯示 CR_4 均超過 50%，CR_8 均超過 75%，表示臺灣頻道市場均屬於高度集中市場。

然而若將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方式改以 HHI 衡量，則以價格為衡量變數的 HHI = 2,041.27。若以頻道收視率為衡量變數，則衡量的結果為 HHI = 1,665.93。以美國過去結合管理規則所訂定的標準 HHI 大於 1,800 市場為高集中市場，根據上述價格指標顯示，臺灣頻道市場仍應歸類為高度集中市場；相對的，以收視率指標所衡量出來的 HHI 值，表示臺灣頻道市場應歸類為中度集中市場。若採用 2010 年美國所公布的結合門檻 HHI 大於 2,500 時產業才為高集中市場，則目前臺灣頻道市場兩項集中度指標數據均低於 2,500，因此可能被歸類為中度集中的市場。

從本文的研究可以發現臺灣有線電視頻道市場是相當集中的，而且是控制於下游系統商的 MSO 手中；換言之，臺灣有線電視的頻道市場與頻道市場被少數企業集團所把持，當市場集中度愈高代表這些廠商的控制力愈高，與之交易的消費者將面臨受剝削的情況。臺灣有線電視的兩個市場不但系統市場集中度高，而且頻道商市場也高，更不幸的兩個市場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係數同一集團，更加深其對消費者的不利。

airiti

二、建議

（一）就衡量變數而言，頻道代理商的總營運金額，應當最能顯示頻道商在市場所擁有的市場主導力量，惟該數據屬頻道代理商的營業秘密，在實務上不易取得，在權衡之下可以頻道市場的公告價格為代理變數，或者以頻道在市場上的收視率做為代理變數，以反映個別頻道在市場上的重要性。

（二）為衡量方法上，由於集中度（CR_4 或 CR_8）的計算方式指蒐集前四家或前八家個別頻道代理商的數據，將會有遺失重要資訊的缺失，也有不能反映廠商實際分配的狀況，因此政府部門如欲瞭解臺灣頻道市場集中與否的問題時，建議應採行 HHI 的衡量方法。

（三）《有線廣播電視法》42 條的限制規定，有線電視集團可利用頻道數中，最多只能採用自己代理的頻道數的四分之一，未能考量每個頻道在頻道市場的重要性，可能產生管制上的偏誤，未來如需繼續管制，應改採其他能夠考量頻道重要性因素的指標。

參考書目

公平交易委員會（1995），《美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臺北，臺灣：公平交易委會。

施俊吉（2012）。〈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與經營區調整政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165-191。

施俊吉、陳炳宏、劉孔中（2003）。〈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重新調整之可行性分析〉。（行政院新聞局委託專題研究報告）。臺北，臺灣：行政院新聞局。

施俊吉、劉孔中、許志義、鍾俊文（2005）。〈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專題研究報告）。臺北，臺灣：行政院新聞局。

施俊吉、劉孔中、葉疏、周韻采（2003）。〈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結構調查及競爭政策分析研究〉。（行政院新聞局委託專題研究報告）。臺北，臺灣：行政院新聞局。

柯舜智、莊春發（2008）。〈再探臺灣有線電視市場集中度〉，《新聞學研究》，94：149-192。

莊春發（2009）。〈臺灣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政策競爭效果之研究〉，《臺銀季刊》，60（2）：187-211。

airiti

莊春發、許志義、陳汝吟、謝秀宜（2012）。〈各國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調和之研究——以能源產業為中心〉。（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臺北，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

陳炳宏（2000 年 6 月）。〈臺灣有線電視產業之系統與頻道市場集中度研究〉，「中華傳播學會 2000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Hirschman, A. O. (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61-762.

Shepherd, W. G. (1990).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ill.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7(1), pp. 241-263, January 2017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of Cable Television (CATV) Channels in Taiwan

Chuang, Chuen-F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g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is to measure concentration ratio for the cable television channel market. With regard to measurement variables, the total revenue of channel agencies would be the best means of representing the relative rankings of agencies within the market, and is the best way to identify the market leader. However, total revenue is a business secret of the channel agents and is unavailable in practice. Therefore, both published advertising prices and TV channel ratings can serve as proxies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channels. Relatively, as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traditional CR_4 and CR_8 measures, which use the datum of only the top four or top eight channel agents, might not only ignore vital information, but also might not reflect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market distribution.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ublic sector adopt HHI as a measure to help understand the topic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HHI index,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channel market, loose oligopoly, tight oligopoly

* Email: cfchuang@just.edu.tw
Received: 2015.8.26
Accepted: 2015.11.28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u-Wu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265-290．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10

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煮吃師傅」口述史與社會記憶

Food Cultur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ral History of Chefs and Social Memory

陳玉箴 *

Chen, Yu-je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主要源起於人類學、歷史學的飲食文化研究近年來在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多個學門逐漸得到重視，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在傳播研究領域，近十年來也產生了約三十幾篇相關研究，雖以碩士論文為主，但儼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主題，值得關注其發展。

檢視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在 2007 年之前僅有一篇，為報紙美食記者蔣豔蓉（2001）。從《中國時報》、《民生報》餐飲版面的變化探討臺灣飲食文化的變遷，主要指出「美食」在週休二日後逐漸成為平面媒體的重要報導題材，媒體報導亦能影響消費者的餐飲內容。2007 年後，相關研究快速增加，多圍繞在新興的美食部落格現象，飲食書寫則是另一個受重視的範疇。整體而言，當前傳播領域的飲食文化研究可大致分為如下主題[1]：

* Email: yjchen@ntnu.edu.tw
投稿日期：2015.4.25

1 本文所蒐集的研究論文為 2015 年 4 月前已刊登的期刊論文與已通過口試的碩博士論文，所檢閱論文請參見附錄一「傳播領域飲食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一、傳統媒體飲食再現的內容分析

以報紙、電視、電影等傳統媒體對飲食的報導、再現為分析對象。除了前述蔣豔蓉一文外，尚有吳佳玲（2008）以《飲食男女》等電影討論華語飲食電影中的記憶與認同、宋良音（2009）以四大報的美食新聞報導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標題、導言、內文、結語等、林靜旻（2011）探究美食雜誌在日式飲食文化引介上扮演的中介性角色，及高上宜（2013）分析電視的美食專題，張翠文（2014）則以對四大報客家美食論述的分析為基礎，進行客家美食的閱聽人研究。

二、美食部落格、討論區／ Facebook ／網路美食資訊搜尋現象分析

在網路、部落格興起之後，美食部落格開始成為傳播系所關注的對象，以此為研究題目的就有十餘篇碩論，在所有傳播領域的飲食研究論文中，此題材文章數目最多，特別受到資訊傳播、傳播管理研究者青睞，主題涵蓋部落格美食書寫、部落格行銷、網路口碑、美食資訊搜尋、美食品牌網站分析，乃至新近的 Facebook 美食粉絲團等，也有將美食部落格與電視新聞報導進行傳播效果比較的論文。

三、飲食書寫的語藝或敘事分析

此主題多以飲食作家、食評家的書寫文字為焦點，對其主題、結構、語言進行語藝或敘事分析。隨著飲食相關出版品的蓬勃，討論的例子涵蓋多種傳播文本，如飲食文學、養生書、美食評論、網站廣告等。其中較特別者為黃芮琪（2013）並非針對任何書面文本，而是從家庭敘事的角度，分析個人家庭共食情境下的對話、敘事，檢視家庭中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之關聯。另一較特殊的主題是林玉珍（2010）從語言面向，分析客語飲食烹調動詞的語藝與文化意涵。

四、農推與觀光

除前三大主題外，有少數論文是採取農業推廣、觀光等不同研究視角，如賴守誠（2013）將農會家政推廣員視為「文化中介者」，分析地方烹飪技藝的傳承，類似者如周宜潔（2009）討論農會家政班的文化中介者角色及其對飲食品味塑造的影響。其他主題尚有：消費者對農產品新食用方式的接受度、主題餐廳體驗等。

airiti

由前述學術產出可以看出，目前傳播領域對飲食文化的研究大多以報紙、雜誌、電影及各種新興網路媒介的飲食文本為研究主題，且多關注飲食消費現象。換言之，是以傳播內容（飲食文本）及受眾（消費者／飲食文本的閱聽人）二者為主要焦點，相對而言，「食物烹飪者」的角色則較被忽略。

「食物烹飪者」包括家庭內的掌廚者與各種外食的烹飪者，即餐廳或食攤的「煮吃師傅」。[2] 儘管當前對於飲食文學或家庭敘事的研究中已有部分顧及家庭廚房中飲食的生產、「媽媽的味道」、家庭口味的傳承等，但在外食興盛的臺灣社會，多數飲食文本的書寫對象為街頭美食、小吃、地方特色菜餚等，而這些「古早味」、「地方味」及各種「網路美食」，實仰賴煮吃師傅的雙手才能產生、傳承，因此，對於食物色香味的各種評述，乃至對飲食傳統、地方特色風味、宴席規範的討論與思考，也不應脫離煮吃師傅的生產脈絡。

基於上述，筆者提出另一種從傳播領域探究飲食文化的可能，即是以餐飲業烹飪者的生命故事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採集「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進行具有歷史縱深的傳播與文化研究。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不僅是個人的生命故事，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記憶，從爐臺前的視角再現了外食業的發展與臺灣社會的變遷。以下先說明口述歷史、社會記憶與傳播研究的連結，再聚焦於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並以這些具體的口述歷史資料進行討論。

貳、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

口述歷史的採集，是由研究者針對特定人士進行生命史或特定事件的深度訪談，蒐集受訪者的記憶並予以紀錄、整理、考證。口述歷史不僅已被視為一種歷史學的次領域，也在其他學科領域逐漸得到重視。以傳播領域來說，翁秀琪（2000）即曾提出，口述歷史對傳播學界而言，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更重視傳播思想史、新聞事業史等傳播學門的歷史性面向；重新思考傳播過程中日常生活知識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並提醒研究者關注分析傳播對話中的「意義」如何產生。口述歷史既是獲取常民知識的方法，其作為一對話與意義建構的過程，亦讓研究者能進一步檢視這些常民知識與日常生活事件意義的形塑。

2 臺灣社會中對「廚師」的稱呼常見者為臺語發音的「刀指」（亦有寫為多旨、都旨、刀煮等），能獨當一面的廚師會被稱為「師仔」、「師傅」，現今仍以阿 X 師作為對廚師的敬稱，「總舖」則是對辦桌主廚的敬稱，不過在北部較普及，南部用「刀指」、「刀指師」較多。本文統一使用較通用的「師傅」一詞來指資深廚師，但因其他行業中也常使用「師傅」作為對資深工作者的敬稱，故本文以「煮吃師傅」來明確指涉「資深廚師」為本文的討論對象。

airiti

具體而言，對臺灣「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不僅能讓我們更理解此一行業的實際工作內容及政經社會條件對餐飲業的影響，亦能由師傅專業技能的傳習，及師傅對他們所烹調出「臺灣美食」、「臺灣味」意義的理解，進一步探究人們對臺灣飲食文化的認知、記憶的形塑取徑與方式。換言之，師傅所親身從事的烹飪活動，正是臺灣飲食文化形塑與傳承的重要一環，在此基礎上，創造了消費者對臺灣料理、臺灣美食的具體感知經驗與記憶，所有從食物出發的抒懷、評論等各式飲食書寫，也都是在這些食物、菜餚的物質基礎上才能產生，由此觀點論之，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與人們對食物的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有著至為緊密的關連。

誠然，口述歷史所呈現的內容具有個人的獨特性，可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因為儘管經歷相同的事件和過程，每個人的認知和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口述訪談的目的就是蒐集這些獨特的生命經驗與觀點。然而口述歷史所獲得的資訊往往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記憶的一部分。Halbwachs (1992)、Connerton (1989) 等人的研究均已指出記憶的社會性，Halbwachs 強調每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都需依賴特定的社會群體得以維繫、存續，並同時影響個體的社會生活。Connerton 則認為，社會記憶有三種重要的形塑方式：身體實踐、在神話與紀念物等文化文本上的銘刻（inscriptions），以及人們共同參與的紀念性儀式，其中「身體實踐」即包括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慣習實踐，無論是飲食的烹飪者或消費者，對於食物的製作、選擇、食用等對個人來說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卻正是社會慣常文化模式的具體實踐。也因此，透過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研究者能嘗試找出日常生活飲食慣習的社會模式與變遷，亦是社會記憶的一環。

口述歷史不僅是社會記憶的一環，若口述歷史對象為庶民階層的社會小人物，更具有補充主流歷史的重要性。許多歷史研究者提出，人是活在人們所創作的「歷史」當中，人們所學習、理解的主流歷史，與主要權力結構緊緊相繫，可說是維繫政權的重要意識型態力量。對於一般庶民而言，其姓名既不被刊於史籍，也少有機會留下著述，但卻是所有歷史中真實的經歷者與承受者，藉由口述歷史，方有機會將地方耆老的生活經驗、觀感真實地紀錄下來進而出版以為人所知。藉由口述歷史的出版，也讓受訪者擁有表述的話語權，實踐了「創造歷史書寫」的權力。口述歷史在歷史學中的一大重要意義，就是能夠獲得小人物、甚至不識字者的生活經驗，藉以彌補官方史料中較乏民間、普羅大眾聲音的缺失（許雪姬，2014）。

以煮吃師傅來說，對他們的聲音很少有相關紀錄。無論近代或當代，與飲食相關的文字資料多是由文人、記者、美食作家等留下，這點從前述碩士論文關

airiti

注主題仍多環繞著美食家、飲食作家的著作可以看出。尤其在有餐飲學校之前，從事餐飲業的師傅多是少年時即棄學而跟隨師傅學習烹飪，少有能撰文從事著述者。面對文字資料的缺乏，若欲瞭解過去一般平民百姓的飲食情狀，相當程度需仰賴耆老的口述歷史，以稍補對近代飲食歷史理解之不足。

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從傳播的觀點視之，也是一種歷史敘事的「再現」。「再現」是藉由語言、符號等表意系統產生共享的意義，是種生產意義與主體位置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Woodward, 1997)，在口述歷史中揭露的「記憶」，亦是對過去經歷的選擇性再現。從師傅們對餐飲業浮沈、見聞、社會實踐與生命敘事的述說中，一方面再現了社會、國家等巨觀力量在個人生命中的履痕，另方面也經由師傅個人的詮釋，展現出這些履痕、事件的「意義」如何產生。本文接下來就以煮食師傅的口述歷史為例，呈現多位臺灣老師傅的生命故事，並思考這些故事再現或創造了什麼樣的社會記憶[3]。

參、師傅的養成：隨政策波動的工作經歷

「師傅」在臺灣是指對廚師的敬稱，在餐飲科系設立之前，傳統的廚師養成多是直接到餐廳上工，在工作中跟著師傅學習各種烹飪事務。十餘歲的孩子通常從洗碗、洗菜、殺魚殺雞、打掃等雜事開始，必須當學徒多年或在不同餐廳歷練後，慢慢升至二手、頭手，到可以獨當一面甚至收徒之後，才會被稱為「師傅」。不過，實際的工作內容會因餐廳規模有所不同：在小食攤或家庭式經營、人手少的小餐廳中，廚師無論資歷深淺，什麼都得做；在規模較大的餐廳中則會有較明確的區分，如在大型臺菜餐廳中，工作職務可分為爐臺、冷廚、砧板、蒸籠、炸臺、打伙、水臺等，學徒從水臺、打伙開始，逐步學習取得晉升的機會。

對現在已是「師傅」的資深廚師來說，會走入這一行，與其說是自己的職業選擇，不如說是幼年艱困環境下無法讀書、須求得一技之長下不得不然的求生之法。許多師傅都說，早年會去當學徒，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混口飯吃」。不過，工作經歷的不同，影響了廚師烹飪技藝的習得，目前臺灣超過七、八十歲的資深師傅中有不少是先在臺灣傳統酒樓中擔任學徒，再隨著流行的新業種流動到新的餐廳，圓環與北投就是重要的師傅養成地。

圓環鄰近的大稻埕與北投在日治時期均是熱門的酒樓、旅館集中地。大稻埕

3 本文訪談師傅名單請見附錄二。

airiti

因商賈聚集，有多家知名酒樓在此設立，北投則因擁有溫泉資源，在日治時即以溫泉旅館聞名，吸引許多人來此休閒、應酬。日治時期的酒樓、餐館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戰事影響難以經營，停業者多，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兩年間雖有短暫復興，但旋即受到國共內戰、限制消費政策及眾多新移民移入等因素影響，大稻埕的酒樓紛紛停業或改變經營方式（陳玉箴，2013），北投則在戰後轉變為酒家（亦稱菜店）的集中地，全盛時期有七十幾家旅社，顧客以生意人、日本人為主，今日許多師傅都有在北投工作的經驗。

例如，黃德興師傅（1936～）自日治末年就在大稻埕的蓬萊閣擔任學徒，戰後大稻埕的臺灣料理酒樓紛紛關閉，黃德興與許多師傅一樣轉到北投工作，1950年代北投的溫泉旅社、賓館在經營型態上也有了轉變，雖然不是餐廳，但在房間裡還是需要一桌好菜：

> 北投原本是……在房間內辦桌，客人以付房間錢為主。後來臺北的酒家進到北投之後，加以改變，房間不用錢，辦一桌菜，有那卡西，有小菜，與以前不一樣，小菜是要一直變化的。當時很競爭、很變化，也要變出很多種菜，看是要半桌菜或一桌菜，服務生抽成。例如一桌八千半桌四五千，看幾樣菜。酒家菜是從這裡來的。（黃德興，2007年1月14日，北投）

在宜蘭開業的阿甲師（1957～），也是在1974年17歲時離開嘉義竹崎到北投的飯店、賓館當學徒，他也提及當時「北投酒家」的經營方式與今日的餐廳有所不同：

> 那不是餐廳，大部分都是套房的，那是一間一間的套房，然後裡面擺酒席。一間有分半桌或一桌，半桌的一千塊到一千五，全桌的話，大部分是兩千五、三千這樣。半桌就是差不多全桌一半的菜，我們都是做大菜的，你們人比較少的話就先做半桌，不是點零菜。例如全桌是六道菜一個湯，半桌是三道菜一個湯。大菜是很大一盤，冷盤就會排圖案，其他就是龍蝦之類的東西都是一盤一盤，主要就是大盤。（阿甲師，2006年11月22日，宜蘭）

在菜色方面，因為多數去酒家的客人以喝酒為主，許多客人會點火鍋再搭配其他

airiti

菜餚，包括紅蟳、鮑魚、鱉、鴿子等上等食材，魷魚螺肉蒜、瓜仔雞、脆皮鴿等都是常見的菜，阿甲師強調當時菜餚不講究量多，重視的是精緻：「以前做的都是比較手工的，以前都要自己來，還要包裝，就是俗稱的手路菜。像做一條蝦子，絕對不會直接煮一煮，要看要包什麼，還是要連接什麼，所以做一道菜要很久」。

除了喝酒吃菜之外，「那卡西」也是北投酒家的重要表演節目，十分受到歡迎，不過在政府加強對北投的查緝後，北投酒家逐漸沒落。1980 年初報紙即報導：「北投侍應生住宿戶廢止至今已兩個月，過去每個月要做數億元生意的北投旅社和飯店，現在都門可羅雀」（胡英牧，1980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而政府對餐飲業的管理政策及治安政策更直接影響到廚師的生計，如同胡英牧的報導所稱：

> 據幾家旅館業者表示，現在他們每個月光看廚房的瓦斯就知道生意如何了，如今幾家旅館一個月還用不到一千元的瓦斯，所以這兒的廚子大都被解僱了，以往北投是最大的食品消費地區之一，現在好些菜販子的生意也受影響。（胡英牧，1980 年 1 月 7 日，第 3 版）

在北投旅館、餐飲業蕭條的情況下，阿甲師也離開北投，到鄰近紗帽山的土雞城工作。「土雞城」是 1970 年代後期至 1980 年代初期在陽明山一帶新興的餐廳類型，藉著溫泉資源，主打土雞、活魚三吃等菜餚，營業到凌晨時段，此時的菜色較接近現在的餐廳菜，北投酒家的「大菜」已較少見。

不過，紗帽山一帶的土雞城多是大型違建，也有部分兼營色情業，時間維持不長，在 1983 年左右陸續有拆除之議，阿甲師離開土雞城後又轉戰「紅娘花園」餐廳。當時田文仲主持的「我愛紅娘」電視節目十分出名，由他掛名董事長的紅娘餐廳也跟著受歡迎，以辦結婚喜酒為主。阿甲師在紅娘餐廳多年後，又換了一些餐廳，才在 1993 年回到太太的家鄉宜蘭經營餐廳，此時的阿甲師已經累積許多在其他餐館工作的經驗與各地學來的烹飪技藝，能夠獨當一面。而從阿甲師的工作經歷亦可看出，對廚師來說，哪裡的餐廳能賺錢便往哪裡去，但餐廳的起伏也與政府的管理措施密切相關。

在臺北，早期除了北投之外，圓環與中山北路一帶也是許多餐廳的聚集地與煮吃師傅的養成地。圓環靠近大稻埕，自清末開始就有飲食攤聚集，日治時期更為繁華，大稻埕的永樂市場周邊食攤聚集，附近又有信仰中心城隍廟，現今的迪化街一帶則是富商大賈的聚集地，種種因素促使圓環在日治中期從小公園發展為大夜市，並與鄰近市場連成重要的商業區。

圓環不僅是過去許多知名飲食攤的集中地，許多師傅亦是從圓環一帶的食攤

airiti

開始，慢慢累積經驗與資本，之後再到鄰近地區開餐廳。例如，來自板橋的阿明師（1936～）在 1960 年尚是少年時便先在圓環賣原汁牛肉湯，之後再改做牛肉沙茶火鍋，冬天賣火鍋，夏天賣日本料理。

牛肉沙茶火鍋在 1960 年代的臺灣十分受歡迎，最早在重慶北路有許多露天攤位，露天攤位遭取締後則以圓環與西門町紅樓戲院旁為沙茶火鍋的集中地，光此二地就有十幾家專賣沙茶火鍋的小館子（劉憲，1969 年 1 月 17 日，第 6 版）。阿明師亦投入此業累積資本，約 1975 年改開臺菜餐廳，並逐漸轉為專做高檔海鮮，尤以 1990 年左右推出的清湯佛跳牆最受歡迎。他強調，做餐廳就是要不斷順應潮流改變，做師傅的並非僅是跟著流行走，用創意、有新點子才能賺錢：

> 菜色要換來換去，你必須要開發新的菜色出來。像我來這裡（開臺菜餐廳）也是一樣，沙茶火鍋大家已經比較有做了，你就要改良，改成什麼菜什麼菜…料一直再換，你要一直改良。像現在鮑魚糯米雞臺灣也沒有人做，我就做，你要知道要改變菜，用創意，賺人家錢才賺得到。（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臺北自營餐廳）

從牛肉湯、沙茶火鍋到高檔海鮮，阿明師的經歷與對「改良、改變」的強調突顯了廚師的「行動者」角色，對於餐廳特定業種或飲食方式的流行，廚師本身的創造力其實十分關鍵，並非僅是順應消費者或美食家的喜好。許多師傅強調，儘管是在年少入行後跟著師傅學習，廚師的自學與創意非常重要，這也是讓他們在工作中得以繼續進步的原因。例如阿明師說，他在開店後還是會請師傅一起做，但與此同時仍不斷學習每位師傅的技巧：

> 他在做的時候，你就跟著他學習。現在這個師傅沒做了，換另一個人來，你也是要跟他一起做。你下去做，你的功夫才會一直提升，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有技巧，古早人有一句話「醜醜馬嘛有一步踢」，意思就是說你請一個師傅來，雖然功夫不是很好，但他還是有他一把功夫。（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臺北自營餐廳）

由於「古早菜」往往缺乏食譜，無論是家庭烹飪或是餐廳裡的師徒制，烹飪技藝多是口授親傳、親身操作，在沒有書面資料可參考的情形下，「做料理」是一種技藝的學習，透過雙手的勞動與操作，將烹飪技藝化為自身的一部分。廚

airiti

師們在轉戰不同餐廳的同時，即使未必正式拜師，所有共事過的廚師都會彼此學習，從他人的手藝學得一招半式。而由於許多廚師都在多個不同菜系的餐廳工作過，也經由不斷地觀摩、學習、創新，造就各種菜系的融合與創新，這也是今日臺灣許多本地菜館菜餚呈現多元融合特色的原因。對廚師而言，過去的工作經歷往往成為進一步發展新菜的養分。

例如，臺南也有許多資深廚師曾在酒家工作，而 1950 年代的酒家多是從日治時期的酒樓、咖啡館轉型而來，其中的菜色則是繼承日治時期酒樓的精緻菜餚，其中包含許多福州菜，如金錢肉、洋燒肉等，只不過將食材因地制宜地調整為臺灣常見的材料，對老師傅來說，源自 1950 年代在酒家的工作經驗與熟悉的老菜，便是日後創業的基礎與特色所在。如臺南阿美飯店的老闆蔡崇廉即是先在臺南多個酒家工作，再自行創業，開餐廳兼辦桌。據第二代老闆蔡坤益說，由於老闆過去有豐富的酒家菜工作經驗，店中因此供應多種過去酒家的大菜，再從八寶麵因緣際會發展出現在的招牌菜砂鍋鴨：

> 我們剛開始做最主要是賣八寶麵，八寶麵就是把很多海產放進去，鴨肉、花枝、蝦仁等放下去的麵，很清、很香。主要是有放鴨肉，但鴨肉賣不完怎麼辦？我們要自己吃，我們就用砂鍋魚，也是類似火鍋下去熬，發現這個味道好像蠻不錯的，這個好像可以做，就慢慢發展出砂鍋鴨。做給客人吃，客人覺得好香，才發展出這一道主菜。（蔡坤益，2008 年 2 月 22 日，臺南）

砂鍋鴨這道菜的開發再度突顯出師傅不僅傳承傳統的菜餚，更在飲食文化風格的建立上具有主動性，同時消費者的回饋亦扮演積極角色，老菜館是在師傅與消費者的共構中延續生命，留下彼此交織的飲食回憶。

上述幾位資深師傅的例子顯示出類似的發展路徑：從學徒、開小食攤開始到自己開餐廳當老闆，這也可說是臺灣早期煮吃師傅的主要社會流動管道。不過，也有人是完全從生手入行開小餐廳，此類生手成為資深師傅或老闆的途徑至少有以下兩種類型：

一、類型一：因轉業開家庭經營式小餐廳

如杜信夫（1945 ~ ）原本是一般公司的職員，因為不想一再調動工作地點，選擇離職並在 1977 年開餐廳，太太也從家庭主婦努力學習成為餐廳廚師：

airiti

> 那時候剛出來我們什麼都不懂，只是路邊攤，完全外行，遇到很多困難的地方，做到店都倒了，師傅都走光，我太太跟媽媽在廚房，我就跑堂。很多朋友說開餐廳應該比較好做，但是我什麼都不懂，連廚房設備都不知道，連冰箱、餐廳爐還要有馬達打風，一般叫砲臺，打風火可以噴到兩公尺高，一分鐘鍋子就會燒紅，火力很旺，我太太本來是用家庭小瓦斯爐，也要學這個，她都是看食譜，自己研究。（杜信夫，2006 年 10 月 25 日，臺北）

不過生手入行欠缺經驗也遭遇不少問題，杜信夫就說：「那時候廚師也不是很認真很有道德在幫我做，我這個店倒了五、六次以上，週轉不靈，被人家倒錢，自己也跟著倒，資本不夠會遇到錢的問題。」

餐廳的生意好不好，與政府政策頗有關係，如前文提及政府對酒樓、北投溫泉旅館、土雞城不法營業的查緝均造成許多廚師的流動，杜信夫的餐廳則是受到掃黑政策影響。

1970 年代下半至 1980 年代初期，餐廳裡的表演節目以逗趣主持人搭配名歌星駐唱的「餐廳秀」為主，杜的餐廳周邊就有許多西餐廳、秀場，都有餐廳秀節目，許多大小明星、表演樂隊等在散場後會來杜的餐廳吃宵夜，曾讓生意頗為興隆：

> （這些秀場節目）每個禮拜星期一上檔，星期天下檔，七天裡面主秀例如蔣光超、包國良，西餐廳老闆會請他們吃宵夜，一星期之內大明星馬世莉也會被請一次，主秀也會請樂隊來吃一次，樂隊又會請小牌歌星來吃，所以一家西餐廳一禮拜有三ㄊㄨㄚ。除了附近那些（歌廳），還有欣欣百貨的太陽城，後車站金龍酒店彩虹廳、西門町皇家翡翠廳、獅子林歌廳、南勢角歌廳。所以要看影歌星就來我這就好了。（杜信夫，2006 年 10 月 25 日，臺北）

不過 1984 年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實施「一清專案」大掃黑，許多黑道被捕入獄，杜的親身感受是「好像這些西餐廳一夕之間就倒了，我的生意剩下一半」，為了維持餐廳存在，他不僅賣房子，還跟地下錢莊借錢，「借十萬，利息一萬二」，連續幾年為錢發愁，直到後來生意穩定後才慢慢還清債務。

airiti

二、類型二：為實踐理念開餐廳

另一種自學開餐廳的類型，主要並非為了謀生，而是在相當的經濟基礎上，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而開業，可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追求。如來自臺北九份的簡老闆原本是室內設計師，因為愛喝酒，先是開了一個單純的小酌空間：

> 喝酒通常沒地方可以喝。Pub 那個根本不是去喝酒，另一個地方是酒店，另一個就是海產店，其他餐廳不能讓你喝酒，時間到就要走。最能喝酒的地方—路邊攤，現在也沒有了。以現在來說，路邊攤都不賣酒，因為會坐很久。（簡老闆，2006 年 11 月 14 日，臺北自營餐廳）

但與杜的餐廳一樣，簡老闆的餐廳同樣受到政策影響，在 1989 年初警方對酒醉駕車者主動取締的政策影響下，來喝酒的人變少，為了讓店能繼續經營，開始思考如何轉型為料理店。在構思新料理店風格的時候，簡老闆回到故鄉九份，觀察到各種商業活動與廣告的進入讓九份再也不是他記憶中如同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裡呈現的九份，這樣的心境讓他決定以最平實、最貼近臺灣庶民生活、但卻逐漸消失的臺灣古早風味為訴求，新餐廳在 1993 年正式開業：

> 我要呈現最原始最質樸的臺灣。開店讓你進來可以蹺腳和站在椅子上，如果是臺灣人，一進來那個內心的東西就跑出來了。我是要讓你放鬆的，一開始上班族進來，我就叫他們把領帶拔掉，下班吃個飯而已，其實我也不喜歡（客人）在這裡談生意。（簡老闆，2006 年 11 月 14 日，臺北自營餐廳）

由這段陳述就可知道，老闆有著自己對臺菜的清楚認知與定義，餐廳對他而言不僅是謀生的工具，更是一種理念的表述、再現與體現，藉由自己設計、製作的室內裝潢、桌椅等，呈現出一個庶民風味、「簡單粗獷」的物質空間，讓人在進入此物質空間後，能從裝潢、桌椅、音樂等面向感受到老闆欲傳達的臺灣意象。

理念的傳達不僅以餐廳的物質空間為載體，菜餚本身更是重要，簡老闆並非廚師出身，但因家族長輩曾從事辦桌業，他便從自己的家族飲食經驗出發學習，慢慢回憶自己「吃過的東西、味道、材料」，再反覆徵詢母親、阿姨等長輩菜餚的實際作法，藉由一再試做、反覆進行修正的過程，「花了五年時間摸摸摸，才弄出來。」

airiti

從餐廳室內空間的設計到菜餚的風味，餐廳與料理對簡老闆來說，是一種家鄉文化的再現，把個人對菜餚、風味的記憶，更具體地轉化為讓人能夠感知的媒介—菜餚、音樂、座位空間、餐廳牆上的裝飾等，試圖將消費者與過去的記憶相扣連，藉由此，進行他所認定的「臺味」或「古早味」的傳遞，在這樣的脈絡下，這些菜餚亦可說是一種經由身體所傳達的社會記憶，許多消費者到此空間中所欲尋找的，也是這種現實生活難以復見的「記憶中的真實」。

前述幾位不同師傅的創業經歷，展現出不同的社會記憶：酒樓與酒家中的觥籌交錯、土雞城、歌廳與掃黑等，共同點則是均顯示出政府政策對餐飲業的顯著影響，這也與「外食」的社會意義轉變有關。「外食」在臺灣一直到 1970 年代為止仍是以都市為主的商業活動，高級餐廳中的外食者多是以應酬、宴客為目的，簡易食攤、小館子的消費者則是以在外工作的勞動者為主，其他人多是三餐在家吃 (Chen, 2013)。在此脈絡下，1950 至 1970 年代之前的餐館可說是個應酬之地，對許多人來說不屬於「日常生活」的範疇，對外食場所的管理，因此經常與社會治安、色情業等連結，跟當代的外食業有極大差別，從老師傅對過去年代的口述，正顯現出治安維護政策對外食業的顯著影響。而對多數不需應酬的人來說，與煮吃師傅最密切相關的時機是在節日或婚喪喜慶的「辦桌」場合，辦桌可說是另一「煮吃師傅」的重要養成場域，辦桌的演變也顯示出與社會變遷的密切關連。

肆、「辦桌」的演變

「辦桌」是酒家、餐廳外另一支重要的煮吃師傅培育系統，辦桌師傅過去多稱「刀指」（臺語），特別是在南部地區，許多師傅都表示「總鋪」是近年才較常用的稱號。辦桌師傅的產生，源於臺灣漢人移民社會藉由請客吃飯來建構、強化血緣、地緣、宗族關係，及民間信仰的建醮等活動，為了因應種種的辦桌需求，地方上擅煮之人常被請來擔任主要廚師，要請客的主家需自己負責大部分的食材，更需由鄰里支援人力、桌椅、碗盤等，「辦桌」的社會意義，也正建立在這些共同合作的情感聯繫、交換勞力上（曾品滄，2010），長此以往，擔任辦桌師傅有口碑者經常被請去辦桌，就慢慢放棄原來工作而以辦桌為主業，也發展出專業的辦桌團隊。

一、從「包工不包料」到「統包」

以內門的薛清己師傅來說，他在當兵之前主要是打零工、賣香蕉，大約 23

airiti

歲（1970）開始開麵店，也曾到餐廳工作，因為看中市場上有「辦桌」的需求，1974 年就與另外三人一起辦桌，至今已持續超過四十年，他對於上述辦桌型態的變化有很清楚的描繪，強調 1970 年代前的辦桌師傅主要工作是指揮及負責重要菜餚的烹煮，其他事務則需要鄰居的大力協助，辦桌可以說是全村的大事：

> 以前辦桌是比較有人情味，師傅去，左鄰右舍都會幫忙做，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以前都隔壁鄰居、太太、先生、妹妹、小姐來幫忙洗菜、洗碗，全村總動員。左鄰右舍桌子、椅子都要搬來，碗筷都要自己收。若要娶媳婦，半年前你就要開始準備了。我們這邊的廟有在租人碗筷，粗碗那種。正式要煮時，若明天中午要吃，那今天中午師傅就要到你家去，那一晚就要把料備齊。以前也沒有冰箱，都需要用自己的頭腦去保護這些豬肉、雞。大家都幫忙殺豬、殺鴨，全村總動員就對了。師傅都先住在主人家，等晚上時，有些人休息，有些人顧「刀指間仔」（臺語，指為辦桌臨時搭設的烹煮空間）。「刀指間仔」的桌子都會墊高，防止貓狗偷吃，上面再凍露水（降溫），食物比較不會壞掉。夏天比較少人結婚，大部分都秋季、春季、冬季，很熱的時候就很少人結婚了。以前的「刀指間仔」不是像現在帆布的，都是用菅芒花，那可以擋風、遮蔭。師傅睡覺是睡在主人家的房子，顧刀指間仔的就要待在刀指間仔，有時候他們都喝酒喝整晚。通常都是隔壁鄰居或比較愛喝酒的，就會來顧刀指間仔，聊天喝酒度過一個晚上。一大早師傅、幫手就會過來。（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隨著經濟的改善，在薛師傅的記憶中，大約接近 1980 年開始，辦桌師傅逐漸轉變為「包工」型態：

> 包工就是說這些工都是我包，以前都是自願來幫忙，沒有在講價錢，不包料，但菜單一樣是我開，以前沒有冰跟水果，就是吃到飽為原則。以前師傅開菜單給主人家，由主人家自己派人去採買，師傅只負責將所有人的菜煮出來。前一晚將初步的料都備齊，隔天中午要上菜就由師傅來煮。……以前來幫忙的都是鄰居，婚嫁的對象也都是附近的人，因為交通不便的關係，所以鄉下的親戚大部分都是隔壁鄰居。大家輪流吃飯，會留桌給幫忙的人。以前結婚比較像結婚，大家都會

airiti

知道，要半年前就計畫，像木柴也要先砍起來曬乾。（薛清己，2008年4月24日，高雄內門）

從辦桌的燃料需提前準備、由鄰里輪流分工等今日已不復見的現象，可充分看出辦桌活動的今昔差異。特別是在1970至1980年代，工商業活動的興起與經濟發展帶動專業辦桌師傅需求大增，辦桌走向專業化，臺北木柵的陳永寶師傅亦是從做麵線轉向景美的師傅學烹飪，進而在1966、1967年左右開始辦桌，1979年開餐廳，其子陳欽賜師傅也敘述，在辦桌轉向「統包」之前，辦桌師傅只是賺工錢而已：

以前剛開始的時候，我的印象裡面，跟左右鄰居借，你們家有幾張桌子？張先生有兩張桌子，李先生有一張桌子，然後跟你借。我請客的時候，你們桌子帶過來，然後碗盤也是左右鄰居一樣湊一湊。然後我們負責外燴的部分是菜單，雞要幾隻、肉要幾斤，寫好以後給對方，然後他自己去買，買回來之後，我們賺工錢。以前外燴的辦桌就是只賺工錢，到後來就是變成統包。（陳欽賜，2007年1月3日，臺北木柵）

而在辦桌變成「統包」專業化之後，1980年代的經濟發展也讓辦桌行業更為興盛。在薛清己師傅的經驗中，1980年代上半，高雄市區就已經有許多辦桌的需求，當時一桌是六百元起跳，他還特別花七、八萬元裝了支電話接生意，辦桌業的全盛期大約是在1989到2001年間：

最高記錄我一個月曾經辦到三千桌，但是現在半年辦不到三千桌。以前經濟好時，神明作醮，全家、全庄都在請客，現在沒辦法了。因為孩子有些失業，教育費又貴，變成我們這邊演戲的也結束了。以前景氣好時，常常在辦入厝，大家有錢買房子，但現在這些房子有的還拍賣，哪還有落成！而且經濟蕭條也連動到好幾方面，我們這邊的工人、備料的、備貨的人也都不好。如果我們有去工作，就可以帶動很多周邊的工作，例如車、工人、瓦斯、雜貨等，如果我們沒去做，大家都沒有工作。（薛清己，2008年4月24日，高雄內門）

airiti

辦桌師傅接不接得到單子，不僅影響自身的家庭，更影響到好幾個家庭的生計，相較於過去辦桌多仰賴鄰里幫忙，僅是偶然才有的兼差工作，如今則因分工細密，從食材、點心或特定菜餚代工、瓦斯等，辦桌形成一長串工作鍊，這也是辦桌專業化、商業化，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一環後更為顯著的現象。

二、菜色變化

除了工作的型態改變之外，辦桌的菜色幾十年來也有很大變化，1970 年代的菜色在今日看來較接近家常菜，但在過去物資不豐的時代已屬珍饈，例如在靠山的內門，平日難得吃到的肉類是重要的主菜，海鮮十分稀少：

> 以前的主體就是豬肉，一桌都要用四、五斤肉，但是現在如果沒有做封肉，那根本就用不到幾兩肉了。另外還有再加一些雞肉、鴨肉，就是以肉做主體就對了。以前我們內門比較流行就是芹菜魷魚煮湯，主要材料是芹菜、魷魚、肉絲、蝦米。豬肉的話大封、小封都有，配筍干，其他都是蔬菜比較多。以前的冷盤大概皮蛋、香腸、豬肝、雞內臟，大概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海產或加工食品來當冷盤。以前沒有什麼海產，最好的東西是一尾黑鯧或炒個花枝而已，其他沒了。（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除了菜色以肉類為主外，以前內門的辦桌也沒有甜點，若是嫁娶宴席需要甜湯圓，需由主人自行準備。但即使不計甜點，整套下來仍有 17、18 樣菜，若是嫁娶桌，還會先上炒麵、炒米粉，讓飢餓的眾人吃一吃，之後才從冷盤開始出菜。

相較於今日吃喜酒多是在快結束前才會出現飯類讓大家吃飽，40 年前卻是先上麵、米粉先讓大家填肚子，這樣的差異說明了人們在日常勞動上的差異，薛師傅解釋：「以前的人比較會吃，一頓吃好幾碗飯，我們現在的人一天也吃不到以前一頓的多。所以一開始要先出好多麵跟米粉，讓大家吃飽。」此外，每道菜的分量也比今天少些，因為過去的盤子比較小，大多是用碗公裝：「炒高麗菜也是一樣菜，煮個鹹菜湯也是一樣菜，雞煨鹹菜或鴨煨鹹菜也都算一樣菜。以前的碗公只比飯碗大，不像現在的盤子那麼大，你沒多煮一點不夠吃。」此外為了「要有一些伴手讓客人帶走」，最後幾道菜常會出現炸物，例如炸雞翅、肉丸、芋丸等。最後重新煮過的菜尾更受人歡迎：

airiti

如果菜吃不完，晚上師傅會再熱過，讓大家繼續吃，或放在容器裡，挨家挨戶擔去分送。以前菜尾沒有再放一些化學原料，純粹鹽、糖、味素而已。且菜尾比較有油脂，以前我們煮湯一定要再放油蔥，剩下的菜就把它做成雜菜，大家再一起吃。（薛清己，2008 年 4 月 24 日，高雄內門）

儘管過去農村裡辦桌的菜色看起來較簡單，但因為包括肉丸、菜丸等全部從頭到尾手工製作，因此需要相當大量的人力，雞卷等較複雜的菜尚須前一天先做好才來得及，同時師傅還得顧及各地區不同的口味，例如鄉下辦桌的口味要鹹一點，市區辦桌要淡一點，經濟好時，太家常的菜也不能做，不然會遭人批評。

不僅內門的辦桌很少海鮮菜，臺北亦然，陳師傅與阿明師都說過去海鮮很少，豬肝已是早期十分名貴的菜，例如將豬肝絞碎後，連豆腐、調味料一起做的料理，以及將一小片豬肝包在芋棗內，都稱得上名貴的菜。陳師傅強調「以前豬肝貴，你要吃不是開玩笑的。」阿明師以過去的價格具體說明：

芋棗以前我們是包豬肝，豬肝是最好的，豬肝好貴，我們那個時代，大約五十年前，一斤豬肝五、六百塊，都要有錢人才吃得起，現在已經沒有人要吃了，因為現在豬都是吃飼料，以前是吃餿水，肝比較好。以前肉丸包豬肝很貴，雞卷也是包豬肝最貴，以前普通的（雞卷）要五角，包豬肝的（雞卷）要一塊。（阿明師，2006 年 10 月 26 日，臺北自營餐廳）

儘管芋棗包豬肝過去是受歡迎的菜色，但現在年輕人中已少人知道這道菜，標誌著料理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有其高低起伏，例如陳師傅提到過去有一種餃子「外表類似蝌蚪，頭大尾巴小，裡面包肉餡，跟現在的餃子完全不一樣」，但如今在臺北已經找不到，另外除了雞卷還算常見外，蛋酥白菜、爆魚、爆肉、鹹菜鴨等過去常見的菜色，現在可能都需到較老的餐廳才吃得到。

無論是早期的鄉里分工或後來的專業化統包，辦桌可以說是臺灣人的集體記憶，即使是在 1950 年前後才到臺灣的移民，也有機會吃或看過辦桌，辦桌中的常見菜色、「菜尾」及後來發展出的娛樂表演節目等，也成為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尤其對較年長的人來說，辦桌最重要的特性，一方面是異於日常素樸飲食的豐盛肉類、美味與節慶氣氛，另一方面則是投入參與的社群歸屬感，由於過去的辦桌

airiti

可說是人際網絡的總動員，藉由辦桌進行社會網絡的交流、鞏固，亦成為臺灣人生活中的重要社會活動。每個人藉由親身參與，無論是幫忙顧食材、提供桌椅、端盤子，或是單純當賓客，從事前的準備、期待，到活動結束的回味，因為個人的參與而創造了以嗅覺、味覺、行動等共構的身體實踐，同時也形塑出共同的社會記憶。然而，一旦辦桌從鄉里網絡的動員與分工朝「專業化、商品化」改變，逐漸成為專業廚師「統包」的商品，「個人」的角色也從辦桌所涉及的社會人情網絡中抽離，從社群活動的參與者轉變成餐飲商品的消費者，共享的社會記憶也縮減僅剩下共同用餐的片段。

辦桌師傅的從業經歷，不僅標誌著上述社會變遷，這些轉變也對師傅的工作型態造成影響，特別是當代擁擠街道、繁忙交通與相關法令的空間限制已不允許多數居民隨意在路邊搭棚辦桌，許多師傅改成開餐廳或餐廳兼外燴，須顧及的面向也早已不是食物本身，還有太多環保、成本、廣告宣傳等考量。如同陳欽賜師傅所言，目前做廚師這一行的複雜度已經大大提高了：

> 早期餐廳可能一個爐子、一個鍋子就可以賺錢，現在不是，環境與人為因素太多，像稅捐、消防、安全、環保衛生、人員推銷、消費者權益等，這些都要做。變成說，當你一千塊實際花到消費者身上可能只有三成，比較有良心的四成，其他都虛掉了。（陳欽賜，2007 年 1 月 3 日，臺北木柵）

對於當代外食業的興盛，許多人會以「經濟水準提高」來詮釋，但對許多資深師傅來說，從生產者角度的思考顯然需顧及更多面向，從政策、法令、消費者的喜好與需求，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絕非僅是單純的備料烹飪而已。

無論是開餐廳或辦桌，當個煮吃師傅絕對不是件輕鬆的事，在社會條件的劇烈改變下，許多資深師傅其實都曾有轉業或停業的念頭，讓許多師傅繼續做下去的原因是來自與顧客間的好交情，例如杜信夫最喜歡在餐廳中與客人聊天，因為餐廳對他來說是個交朋友的地方。木柵的陳師傅也說，臺菜這種接近臺灣人生活的菜餚，就是「常吃會煩，不吃就想」。由於開業多年，培養了一群忠實顧客，一旦歇業休息，就會不斷接到詢問何時開業的電話：

> 我現在很多客人就是這樣，嚷嚷一天到晚就只吃這幾個菜，但是當我收起來的時候，又一天到晚問我怎麼還不做。我（目前）歇業歇

airiti

了快七個月，幾乎每天都有接到電話，要訂位子或問什麼時候要開，像今天早上我就接兩通了。（陳欽賜，2007 年 1 月 3 日，臺北木柵）

客人的捧場與信任度，是讓許多老師傅願意繼續做下去的重要原因，也是在謀生的同時能夠得到樂趣的來源。王師傅（1968 ~ ）自 1981 年十三歲時開始學做菜，往後三十年在臺灣從基隆到屏東、從小攤到自行開業，經營過多個飲食業種，始終選擇待在這一行：

這當中有很多次很想換工作，也是有機會可以換，不過到最後還是發現，食物這個東西它可以很貼近人的生活。雖然說廚師這個行業在臺灣的社會價值很低，不過很多人的情緒、人的慾念都在這裡被激發出來。其實你給他看，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族群，他對食物的看法會反映出來這個族群、這個家族的人際關係。（王師傅，2006 年 11 月 2 日，臺北公館）

王師傅這段話，顯示出師傅在爐臺後對社會的細膩觀察，餐廳是人與人交會的重要場所，從應酬、宴客、家族聚會、好友小聚乃至擺桌陪罪、談判、失意喝悶酒等也都可能發生在餐廳中。餐廳的廚房則是另一個濃縮的社會空間，許多煮吃師傅不僅擅長烹飪，也在其中觀照人生的況味，師傅的生命故事不僅鑲嵌了臺灣政治、社會的變遷，也累積了許多在此交會場域的觀察，亦成為社會記憶牽繫與形塑的另一來源，值得日後深入研討。

伍、結語

一社會的外食（eating out）現象與食物生產的商業化、品味區辨、外食空間與相關法規的變遷等密切相關 (Warde & Marten, 2000)，本文藉由口述歷史，關注臺灣外食產業中「煮吃師傅」的生產脈絡，並將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視為社會記憶的一環，思考其如何再現了過去，並進而影響當代人們對臺灣飲食文化的認知。煮吃師傅的口述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至少具以下兩點重要意義：

首先，師傅們提供了實務面的常民知識，對於過去數十年間臺灣社會的外食場所區分、辦桌方式、菜餚名稱、菜餚煮法、消費者來源、消費方式等具體的項目提供豐富的口述史料。同時，煮吃師傅口述歷史中所揭露的「記憶」，更再現

airiti

了過去數十年間外食業的變動，以及國家政策、經濟狀況、社會網絡等外在條件的變化，師傅們因應著政策的改變，在不同飲食業種間流動，並開創出新的商品。口述歷史乃鑲嵌在社會的大歷史中，師傅的生命敘事與政府政策、社會變遷有著緊密的交疊與相互影響，這些獨特而寶貴的經驗讓研究者能獲得臺灣餐飲業發展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在師傅的口述歷史中，煮吃師傅的論述其實也夾雜著當代對過去的詮釋。例如，許多師傅認為「酒家菜」是代表性的臺菜，但他們也同意幾十年前其實並無「酒家菜」的說法，此詞是近十幾年才開始出現；又如南部許多辦桌師傅其實用「刀指」而非「總舖」來指稱師傅，但如今也因為媒體的報導、政府活動的舉辦多用「總舖」，而在訪談中為了溝通便利，亦採用民眾、媒體較熟悉的「總舖」一詞。換言之，對師傅來說，對於過去的陳述、記憶，也已受到當代的影響，共同形塑出一個當代人理解的社會記憶。這也說明了，「社會記憶」與「社會真實」間存在雙向的關係而使彼此界線更趨模糊，當社會記憶再現了部分「過去的社會真實」，但社會記憶也可能受到「當代的社會真實」所影響。

以煮吃師傅的口述史為例，本文嘗試說明，飲食文化研究在傳播研究領域具有何種重要性？口述歷史在其中又具有何種學術價值？從文化的觀點看，「傳播」是一種意義的產製與分享，且是建立社群連結的重要方式 (Carey, 1988)，傳播的核心活動同時包括「意義創造」與「意義分享」（趙雅麗，2011：19），由此角度而言，「飲食」在意義產製與分享的重要性包括：一、「飲食」本身或其影像、相關文本即經常是彼此分享的內容（object）；二、飲食活動是一種重要的社會互動媒介；三、「飲食」經常作為重要的象徵（symbol）、是特定文化意義的載體，同時也標示了社群間的差異（陳玉箴，2015：63-65）。同時，飲食相關敘事與影像亦是社群經驗與記憶的再現。由此而論，飲食文化可視為傳播的重要一環，從文本、互動與經驗中介、象徵符號許多角度進行意義產製的相關分析。

而在其中，口述歷史不僅是一種研究方法或研究資料的採集，亦可與「敘事研究」或「敘事傳播」相結合，開展出新的研究取徑（臧國仁、蔡琰，2013）。口述歷史是個人觀點生命敘事的再現，但也融入了訪問者的視角，以及隨社會變遷而呈現的不同解讀，反映了當代觀點下對過去的檢視，因此，口述歷史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可說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記憶，可從敘事的觀點，進一步探究敘事者如何認知、組織過去並透過語言、符號再現其生命敘事。

綜言之，本文認為藉由口述歷史探究煮吃師傅的生命史、生命敘事，並從社會記憶、真實與再現、敘事與詮釋等傳播研究的視角切入，都有豐富的研究素材，

airiti

對於日常生活、政治與社會變遷的連結，亦有諸多可探究處，值得傳播領域的研究者深入討論。

參考書目

吳佳玲（2008）。《品味中國菜：華語飲食電影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婧翎（2013）。《從部落格美食書寫看庶民美食的語藝》。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良音（2009）。《臺灣報紙美食新聞報導之初探——以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為例》。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偉平（2013）。《新奢華時代體驗性消費之美食品牌力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沈岱樺（2009）。《從飲食論述探討臺灣當代飲食文化意涵——由九〇年代末談起》。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周宜潔（2009）。《烹飪文化資本、文化中介者與飲食品味塑造——以農會家政班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緗妮（2008）。《從食品謠言解讀當代飲食觀點》。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林玉珍（2010）。《臺灣四縣客語飲食烹調動詞語義及其文化意涵》。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宜靜（2014）。《從定位觀點解構素食文化》。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林淑芬（2008）。《美食當道——美食部落格行銷與消費者滿意度研究》。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林靜旻（2011）。《異國飲食文化與中介——以日式飲食文化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邱元儂（2013）。《飲食革命正流行——大王菜舖子的認同實踐與文化生產》。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柯儷祺、陳郁涵、張漢慶、黃柏翔、高潔、張立達（2009）。〈影響網路搜尋行為之因素探討：以臺藝大學生美食資訊搜尋為例〉，《圖文傳播藝術學報》，2009：151-160。

胡英牧（1980 年 1 月 7 日）。〈北投旅館門可羅雀　華南飯店率先打烊　不見

airiti

鶯鶯燕燕　不聞急管繁弦　山間月白風清　居民樂得安靜〉，《聯合報》，3 版。

秦韻曲（2008）。《網路口碑對美食團購虛擬社群影響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秀琪（2000）。〈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從口述歷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新聞學研究》，63：9-33。

高上宜（2013）。《非凡新聞臺《中國大探索》之〈杭州美食專題〉製作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張家慧、蔡宜芳（2010）。〈美食多媒體行銷網站〉，《資訊傳播學報》，2010：121-130。

張翠文（2014）。《客家美食的閱聽人研究》。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雪姬編（2014）。《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陳玉箴（2015）。《飲食文化》。臺北，臺灣：華都。

———（2013）。〈政權轉移下的消費空間轉型：戰後初期的公共食堂與酒家（1945 ~ 196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9：183-229。

陳姵云（2012）。《電視新聞報導與部落格美食資訊的傳播效果之研究——以中國文化大學學生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陳思瑋（2011）。《消費者對農產品新食用方式之採用行為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星蓉（2013）。《主題式餐廳之消費體驗研究——以「心之芳庭」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陳婉姿（2012）。《食譜粉絲團行銷策略之研究——以 Facebook 之 icook 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陳聯均（2011）。《美食部落格內容形式分析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學位碩士論文。

曾品滄（2010）。〈辦桌——清代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21（4）：1-55。

黃芮琪（2013）。《家庭敘事之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以口述家傳菜餚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雅涵（2013）。《解讀身體：臺灣茶飲的敘事分析》。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airiti

碩士論文。

黃詩婷（2013）。《網路美食推薦文章對消費意願影響之研究》。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癸齡（2012）。《飲食敘事與認同建構——以「古早味」之懷舊書寫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臧國仁、蔡琰（2013）。〈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取向——另一後設理論思路之提議〉，《中華傳播學刊》，23：159-163。

趙雅麗（2011）。〈傳播有什麼意義？〉，《中華傳播學刊》，19：3-24。

劉憲（1969 年 1 月 17 日）〈報導消費情況　擴大消費對象　沙茶火鍋　經濟實惠別有風味〉，《經濟日報》，第 6 版。

蔣豔蓉（2001）。《從餐飲版面探討臺灣飲食文化之變遷——以中國時報、民生報為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宏達（2009）。《“Wearewhatweeat”：從 Goffman 的自我呈現理論探討美食部落格與社交媒體的型塑》。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賴幼雅（2009）。《想像健康，實踐身體——養生書的隱喻分析》。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賴守誠（2013）。〈地方烹飪技藝傳承與創新的媒人：農會家政推廣員作為地方文化中介者的個案研究〉，《新聞學研究》，117：1-45。

賴怡潔（2012）。《書寫、經驗與身體感——以當代飲食書寫為考察核心》。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宜秦（2012）。《飲食觀光與食物品質建構：以烏來原住民料理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裔翔（2009）。《以沉浸理論探討網路口碑效果——以手機討論區與美食討論區為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Carey, J. W. (198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 Unwin Hyman.

Chen, Y.-J. (2013, November). *“Eating out is cheaper than cooking at home!” :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ousehold to Market in Food Prepar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Consumption Work and Societal Divisions of Labour Conference, Colchester, UK.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iriti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Tra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0)

Warde, A., & Martens, L. (2000). *Eating ou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and pleas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odward, K. (1997).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K.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pp. 7-61). London, UK: Sega.

airiti

附錄一：傳播領域飲食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一、傳統媒體飲食再現的內容分析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蔣豔蓉《從餐飲版面探討臺灣飲食文化之變遷——以中國時報、民生報為例》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	吳佳玲《品味中國菜：華語飲食電影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3	宋良音《臺灣報紙美食新聞報導之初探——以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為例》	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	林靜旻《異國飲食文化與中介——以日式飲食文化為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1）
5	高上宜《非凡新聞臺《中國大探索》之〈杭州美食專題〉製作分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3）
6	張翠文《客家美食的閱聽人研究》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二、美食部落格、討論區、網站／ Facebook ／網路美食資訊搜尋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林淑芬《美食當道——美食部落格行銷與消費者滿意度研究》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7）
2	秦韻曲《網路口碑對美食團購虛擬社群影響之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3	蘇裔翔《以沉浸理論探討網路口碑效果——以手機討論區與美食討論區為例》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	鄭宏達《“Wearewhatweeat”：從 Goffman 的自我呈現理論探討美食部落格與社交媒體的型塑》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5	柯儷祺、陳郁涵、張漢慶、黃柏翔、高潔、張立達〈影響網路搜尋行為之因素探討：以臺藝大學生美食資訊搜尋為例〉	《圖文傳播藝術學報》，2009：151-160（2009）
6	張家慧、蔡宜芳〈美食多媒體行銷網站〉	《資訊傳播學報——網路中介傳播》，2010：121-130（2010）
7	陳聯均《美食部落格內容形式分析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學位碩士論文（2011）
8	陳婉姿《食譜粉絲團行銷策略之研究——以 Facebook 之 icook 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12）
9	陳姵云《電視新聞報導與部落格美食資訊的傳播效果之研究——以中國文化大學學生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2）

airiti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0	黃詩婷《網路美食推薦文章對消費意願影響之研究》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1	吳婠翎《從部落格美食書寫看庶民美食的語藝》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2	李偉平《新奢華時代體驗性消費之美食品牌力分析》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13	邱元儂《飲食革命正流行——大王菜舖子的認同實踐與文化生產》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3）

三、飲食書寫的語藝或敘事分析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周緗妮《從食品謠言解讀當代飲食觀點戲劇五因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8）
2	沈岱樺《從飲食論述探討臺灣當代飲食文化意涵——由九〇年代末談起》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3	賴幼雅《想像健康，實踐身體——養生書的隱喻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09）
4	林玉珍《臺灣四縣客語飲食烹調動詞語義及其文化意涵》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5	賴怡潔《書寫、經驗與身體感——以當代飲食書寫為考察核心》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6	楊癸齡《飲食敘事與認同建構——以「古早味」之懷舊書寫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7	黃雅涵《解讀身體：臺灣茶飲的敘事分析》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3）
8	黃芮琪《家庭敘事之飲食記憶與生命傳承——以口述家傳菜餚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9	林宜靜《從定位觀點解構素食文化》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14）

四、其他

編號	作者／論文題目	文章出處
1	周宜潔《烹飪文化資本、文化中介者與飲食品味塑造——以農會家政班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2	陳思瑋《消費者對農產品新食用方式之採用行為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3	謝宜秦《飲食觀光與食物品質建構：以烏來原住民料理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4	賴守誠〈地方烹飪技藝傳承與創新的媒人：農會家政推廣員作為地方文化中介者的個案研究〉	《新聞學研究》117 ：1-45（2013）
5	陳星蓉《主題式餐廳之消費體驗研究——以「心之芳庭」為例》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airiti

附錄二：訪談名單（依文中出現順序）

受訪者	經歷主要業種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黃德興	日治時期酒樓、北投酒家、多種餐廳、大飯店主廚	2007.1.14	臺北北投
阿甲師	北投酒家、土雞城、多種餐廳	2006.11.22	宜蘭
阿明師	圓環食攤、沙茶火鍋、臺菜餐廳	2006.10.26	臺北
蔡坤益	自營餐廳第二代	2008.2.22	臺南
杜信夫	自營餐廳	2006.10.25, 26, 27	臺北
簡老闆	自營餐廳	2006.11.14	臺北
薛清己	麵攤、餐廳、辦桌	2008.4.24	高雄內門
陳欽賜	餐廳、辦桌第二代	2007.1.3	臺北木柵
王師傅	早餐、麵包、西點、各類型餐廳	2006.11.2	臺北公館

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7 卷 第 1 期．頁 291-303．2017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7.011

從傳播的偏向到 STS：再探 Harold Adam Innis 傳播理論的關鍵元素

From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 STS: Harold Adam Inni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Revisited

王淑美 *

Wang, Sumei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長久以來，傳播理論側重媒體內容。早期以美國實證研究為首的學派著重媒體效果，多從政府與廣告主的角度探究媒體如何發揮影響力；歐陸政治經濟學派則以批判觀點看待媒體，認為近代大眾傳播科技多為政治經濟勢力所掌控，透過意識形態的產製來控制大眾。有別於這些傳統，Harold A. Innis（1894 ~ 1952）在 1950 年發表了《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隔年（1951 年）出版了《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臨終前（1952 年）又出版了《改變中的時間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首度將傳播媒體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核心位置，並且將研究焦點放在媒體特質本身 (Innis, 2004, 2008; Innis & Innis, 1972)。

Innis 原是一位著名的加拿大經濟學者，接連出版了三本傳播相關著作時，並未受到廣泛注意。反而因為 Marshall McLuhan（中譯麥克魯漢）積極地引述，並自陳受到很大的啟發與影響，才讓 Innis 的理論逐漸受到重視。Innis 影響了後續多位學者 [1]，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McLuhan，後繼還有 James Carey、Neil Postman、Joshua Meyerowitz 等 (Heyer & Crowley, 1991)。這些學者看重媒體特質，

* Email: sw@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6.5.25

1 除了 McLuhan，以下著作也都引用了 Innis 理論，並言明其重大影響如 Havelock (1963)、Goody & Watt (1968)。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io-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並將其研究視角放在媒體與其他社會體系的互動及交互影響，形成有別於北美實證研究或歐陸批判學派傳統的加拿大多倫多學派。

Innis 以歷史學的方法，經濟學強調效率與競爭的視角，從起源回溯西方帝國的演變，以及在此過程中傳播偏向的影響。他在著作中反覆地透過歷史來說明，文明能否強盛與延續取決於知識的傳遞，能掌握兼顧空間與時間偏向的傳播工具，其指標就是一段長而穩定的帝國文明，但霸權常為了壟斷知識而爭奪媒體，常使特性發展到極致而失控，招來毀滅的危機。過去對其理論的討論常著重在傳播的時間與空間偏向，本文重讀經典，將從經濟學及科技史研究的角度來理解其三部鉅著。

本文以下先回顧 Innis 的生平，理解他的研究動機與關切主題，接著介紹其主要理論。從石板開始到印刷術，Innis 仔細探查了各種媒材的特質如何影響其傳播效率，以戲劇詩歌的口語傳承也是媒體，這些媒體如何在時代中與其他物質條件相配合，並受到權力的操控，進而演變成下個階段的面貌。第三部分將從科技與社會（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後簡稱 STS）重視科技物本質的角度來理解並詮釋媒體偏向說，並說明 Innis 其實是跨越媒體研究與 STS 研究的先行者，最後則提出重讀 Innis 經典的反思。

壹、Innis 的生平

Innis 的著作跨越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其理論雖引人入勝，但所觸及的內容龐雜常令讀者感到怯步並覺得難解。本文先回到他的生平，來解讀其思考脈絡。1894 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偏遠處的農家，Innis 搭了上千趟火車且走了四千英里才完成高中學業。搬到多倫多上大學時，為了省錢而陷入飢餓憂鬱的輟學邊緣，所幸家族中長輩資助而能脫離困境。大學期間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 年五月他大學畢業後隨即入伍負責射彈觀測員，直到 1917 年七月因傷退伍。Watson(2008) 認為，早期參戰的經驗讓他懷疑殖民主義，對於科技的看法也傾向悲觀。Innis 原本想當律師，最終一路念到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後，回到多倫多大學教書。

此時的多倫多大學仍由在英國的學者主導，加拿大本土培養的人才仍是少數。Innis 博士論文以加拿大鐵路建造促成加拿大國境內的整合發展為題， 1920 ~ 30 年代間，他領導第一代加拿大學者，抗拒來自英國帝國中心的觀點，進行加拿大經濟史的研究。到了二戰爆發之際，Innis 已經成為加拿大學術圈舉足輕重

airiti

的大老，身為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系主任，還創立了地理系、社會系和社工系，掌握大筆研究經費與計畫。藉由鑽研經濟史，Innis 關切的是加拿大作為帝國邊緣的位置，其經濟與文化如何發展，未來又將如何遞變，這個核心關懷引領他走向傳播科技與文明的研究。

Innis 早年的作品包括《太平洋鐵路的建造歷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加拿大的毛皮交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等，傳播相關主題的書都是在 1948 ~ 1952 年完成的，這段期間他已病痛纏身，所以各書都是演講稿的集結 (Innis, 1923, 1930)。有人批評他早期與晚年的作品有明顯斷裂，但 Carey (2004) 認為，Innis 的主題一直是帝國、全球化、國際貿易，他關心的是貿易、路徑、運動、流動、散布，運輸和傳播科技強化了國際貿易，這跟歐洲侵入北美，第 9 世紀亞非帝國勢立擴散，以及美國靠著電視飛機與網路成為新強權的意義是相同的。二戰結束後，Innis 開始擔心新局勢的危機。經濟是否會回到大蕭條時期？冷戰與核武競賽中，加拿大會不會被拖下水？科技創新也帶來新的變數，1948 年電視已從美國為中心對加拿大展開殘酷的政治經濟殖民，這也是促使 Innis 發表其傳播理論的原因。

從 Innis 的生平可知，他是加拿大人、是經濟學家，並親身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關心處於大英帝國邊陲的加拿大如何在新世紀找到定位。Innis 認為，所有帝國都想要獨占知識、掌握交易、以及文化的路徑。二戰後美國帝國主義興起，加拿大從大英帝國殖民地到獨立國家，之後恐又淪落成美國的殖民地。美國乃獨立戰爭建立的國家，其帝國的特色是要抹除過去舊價值，由美帝主義所引領的文化工業如電影廣播出版持續侵入加拿大市場。受到廣告左右，重視改變是美國商業文化的特色，每部電影、廣播節目、報紙、雜誌都希望消費者趕快忘記，然後可繼續販賣下一部或下一期 (Carey, 2004)。

因為上述觀點，包括 Blondheim (2007) 在內、有不少學者稱 Innis 是加拿大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或許是 Innis 的出發點，不過，McLuhan (1972) 提到，當 Innis 越是深入剖析科技牽動的歷史，就更不願做出道德評價，許多人看不懂 Innis 的作品，也因為他著重呈現過程而非提出觀點。Carey (2004) 也指出，Innis 是主張任何文化都不應該壟斷。經濟學家關心資源分布與流動、市場競爭以及效率問題，兩次大戰引領 Innis 關心文明的更替，這些都促成他的經典理論—以傳播為核心來討論帝國的興衰與文明的交替。

airiti

貳、帝國傳播與時空偏向

在《帝國與傳播》一書導論中，Innis 首先提到探討文明興衰是 20 世紀初的顯學，包括 Spengler、Toynbee、Kroeber、Sorokin 等都著書討論[2]，也激起他對文明史的興趣。他贊成 J. S. Mill 批評英國政治經濟學只限定在地主、資本家和勞工三階層的看法，並將焦點轉向傳播，因為「傳播在帝國、西方文明、政府的組織與行政占有關鍵位置」。他由於早年研究加拿大與美國、英國、法國等帝國的關係時，追蹤貿易流向與傳播的方法非常管用，因此也延續此策略。

Innis 最知名的論點在於提出傳播的偏向（bias）論。傳播媒體對於知識跨空間與時間的散布有重要影響，需研究其特性才能評斷它在該文化情境下的影響。當媒體是笨重耐久難被搬運，其傳遞知識的時間性優於空間，諸如羊皮、黏土和石塊等，沈重的材質適合發展建築與雕塑，其上的文字容易被保存。耐久材質的媒體重視時間與延續性，這樣的文明經常偏向宗教而忽略行政和法律，也就是空間的管理。反之，莎草紙和紙張這類較不耐久且質輕的媒體，適合傳遞廣泛區域的行政與交易需求，其知識的傳遞空間性優於時間性。重視時間的媒體有利於去中心化及階層類型的組織，強調空間的媒體有利於中央控管與政府體系。這種相對上重視時間或空間的特性，隱含著該文化的偏向，從西方文明的歷史來看，穩定的社會需在時間與空間偏向之間維持相當的平衡。

從人類第一個帝國——埃及談起，原先用來裝飾神廟的圖像演變為象形文字系統，西元前 4000 年起關於國王、戰爭、政治事件及宗教訓義已用文字記載，且逐漸向拼音化發展。西元前 2895 年發展出君王的絕對權力論，國王即神，但絕對王權逐漸受到挑戰，到了西元前 2000 年演變為較民主的形式，國王降為神之子，平民也可獲得宗教權與相關政治權，這階段也是從以金字塔石塊作為媒體，演進為用莎草紙的年代。石塊材質極重，銘刻其上的象形文外形四方，線條非圓即直，書寫權力獨攬在少數神職人員身上。莎草紙由生長於尼羅河三角洲的植物製成，質輕、攜帶方便，可廣泛傳播。因書寫於草紙上更容易，手寫顯著增加，書寫閱讀活動頻繁，行政效率提增，辯論與世俗文學逐漸取代了宗教。Innis 認為，埃及帝國規模有限，跟王室欲獨占知識，且寫作系統太過複雜有關。石材太難書寫引來草紙的競爭，宗教主導的錄事官仍掌控了複雜象形文字系統，傳播難以普及擴散，因此疆域有所侷限。

Innis 的傳播理論從歷史的角度觀看，一種媒介的影響力發揮一段時間之後，

2 相關書目包括：Spengler (1926 ~ 1928)、Toynbee (1934 ~ 1961)、Kroeber (1944)、Sorokin (1957)。

airiti

常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接著新的媒介興起，連帶也促成新的文明。埃及帝國藉由困難的象形字維持其獨占知識，抗拒改變，也終究不敵亞述與波斯文明的挑戰。同時期的兩河文明以諸多城邦的形式存在，使用沖積黏土製成的泥版作為書寫工具，象形文因難以書寫在濕黏的泥版上逐漸失傳。西元前 1792 年出現以巴比倫為新都的漢摩拉比國王，他豎立漢摩拉比法典並刻在石頭上，建立集中化的王室權，所使用的文字是閃族語。法典促成共同法集、首都興起、以及年曆編纂，廣大區域內密集的交易則促成重量測量單位的標準化。善用騎兵鐵器的亞述帝國於西元前 8 世紀繼起，將整個美索布達亞平原以及埃及納入疆域，其使用的亞拉姆語（Aramaic）也逐漸成為主流。掌權者企圖使用複雜的楔形字與象形字獨占知識，在帝國邊陲的人民 , 包括巴勒斯坦地區與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運用豐沛的莎草紙，開始改造字，將人類發聲簡化成字母，成為後來西方語言的起源。

回顧至此，已可掌握 Innis 理論的幾個要點。第一、媒體影響傳遞知識的效率。Innis 指出，要衡量媒體對文明的意義不容易，受限於保存材料的完整性，不易保存的媒體所留下的素材很少。大型帝國必須在時間與空間偏向中取得平衡，失之偏頗就會招致滅亡。因此他是以帝國作為傳播效率的指標。亦即，有效率的傳播將促成強大的帝國。傳播效率受到媒介材質，以及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所影響。例如耐久媒材的文字訊息不易消失，有利於宗教神權督促人們追求時間上的永恆，質輕易攜的媒材有利於訊息跨空間的傳布，羅馬帝國從埃及取得莎草紙的原料與技術後，奠定了廣大行政帝國的基礎。媒材的特性也影響了文字和語言，例如難以書寫在黏土版上的象形文字終被淘汰。

從 Innis 對希臘口語文明的討論，則可察知其另一個重點：傳遞知識的媒體不限於具形的科技。希臘採取了腓尼基與閃族的字母，因處於帝國邊緣得以不和巴比倫或埃及全面接觸，而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希臘人繼承了腓尼基閃族子音字母及賽普勒斯的音節字母，到了西元 7 世紀初用於豐富的口語傳承。從吟唱詩人的敘事詩傳統，到荷馬風格史詩，之後出現大量個人色彩的短歌。歌舞曲演變為戲劇，藉著諷刺時事，劇作家變成新聞人，透過文學與戲劇促成公共領域。散文、演說、詩歌與戲劇的形式隨著社會轉變而調整，以口語傳承不靠書面傳遞知識，是依賴聽覺具有時間偏向的媒體。希臘城邦在哲學數學上有非凡成就，雖然之後被書寫制度摧毀，但其精髓融入羅馬帝國，並成為西方文明的根基。Innis 對口語文明非常推崇，希望加拿大能延續西方文明，發揚希臘時期的本質，重新掌握口述傳承的生命力。其想法也影響了 McLuhan & Ong (1982) 後續對口述文明的討論，呼籲應重視聲音與聽覺之感性取向。

第三個重點，媒體之間處於競爭關係。Innis 認為，當文明過度依賴某一偏

airiti

向，時間與空間關係失衡，新的媒體或下一波主流文明往往會在帝國的邊陲出現。某種媒體在文明中扮演要角，與該媒體在特定時空環境下能否最有效率傳遞知識密切相關，但效率高低是比較的結果，因此也受到其他媒體的挑戰。例如羅馬帝國取得埃及後掌控了莎草紙生產與銷售，莎草紙有助於帝國建立圖書館穩固知識，在龐大行政體系之間傳遞法律與命令，驛站系統串起了帝國內的通訊聯繫，也促成書籍買賣的興盛。不過莎草紙有易被壓碎的缺點，裝訂成冊時常從縫線脫落，在埃及之外的地區也有發霉腐爛的問題。當時的基督教會位於社會底層，發達於較少受到帝國衝擊的地區，教會系統改用獸皮書寫，利用獸皮製成手本體積更小的特色，供旅行者攜帶傳送。

羅馬帝國分裂後，基督教修道院使用羊皮紙建立起有力的教會組織，政教合一的東羅馬帝國得以維持一段很長時間。但知識壟斷後，又開始有另一種新的傳播媒體與之競爭——中國發明的紙傳入阿拉伯地區，原處於歐洲文化邊陲的波斯與巴格達，自此奠定學術地位。巴格達的製紙技術不斷精進並向歐洲擴傳，因紙張在保險文件與貨幣交換上的使用，有助信用成長，提高商業效率，也促成了西元 13 世紀起的商業革命。教會系統重視拉丁文，紙張則有助於貿易與都市成長，讓教育脫離修院體系的掌控，使世俗的力量增強，並促成方言的興起。修院制度透過宗教對永恆的追求控制了時間，羊皮紙被限定用來抄寫與宗教有關的內容，但此知識的壟斷最終被紙張挑戰並破壞。

印刷術在神聖羅馬帝國邊陲的德意志地區發明出來，挑戰教廷權威，出版大量路德的方言聖經。法國限制印刷卻鼓勵紙張生產，此舉讓荷蘭與英國成為歐洲出版中心。印刷帶動民族主義，確認議會制度，創新金融工具，促成宗教革新與科學革命。英國的印花稅限制新聞發展，使得英國書商著重於文學出版，美洲殖民地因而側重報紙，並激烈地抵抗印花稅，最終引發美國獨立革命。加拿大木材加入製紙原料，使得紙張能低價供應，美國傳播產業也因紙張的工業生產與其廣大英語讀者市場而鞏固，形成新的帝國。

媒體與周邊條件相互牽動，相互競爭與演化創新的過程，被稱為媒體生態學（media ecology）——「媒體生態學就是把媒體當作環境來研究」 (Postman, 1970: 161)，以生態系的關係作為比喻來理解媒體與社會中其他元素互動的過程及其影響。不過，以 Innis 經濟學家的身分，也可以說他是使用了李嘉圖 (Ricardo, 1817) 「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來審視各時代與帝國下最具力量的媒介科技。比較利益是指國家之間貿易時，各國生產貨品的優勢各異，具有比較利益的項目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比較利益與該國的天然資源、勞工與產

airiti

業結構、法令設計、稅制等都有關係。若以比較利益的概念來理解 Innis 理論中強勢媒介的更迭替換，羊皮卷在神聖羅馬帝國的修道院組織下具有傳遞知識的比較利益，而印刷紙張則在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時代具有比較利益。比較利益是動態的、而且是競爭的，他不是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受到各種條件牽引，例如木漿造紙技術成熟使得加拿大具有大量生產紙張的比較利益，低價供應的新聞紙加上英文單語市場讓美國報紙得以低價大量發行。

不管是用生態學或用經濟學的譬喻來理解 Innis，都指出影響媒體間競爭關係的不只是媒體本身條件而已。埃及王室欲獨占莎草紙供應，中古歐洲修道院體系限制羊皮紙用來鑽研基督教知識，紙張被擅長貿易的阿拉伯地區改良並引入歐洲，法國王室限制印刷品生產，英國透過課徵印花稅促成泰晤士報的獨占地位，這些例子說明了統治階層都想干預且掌控媒體，因此媒體之間的競爭脫離不了政治力，經濟上的因素也牽動了媒體的生產與消費，當然媒體本身的材質適於何種偏向，以及被人們用於哪些用途，都讓媒體在社會中的各種關係形成複雜體系。

參、從 STS 看媒體的時空偏向

Carey (2004) 評論，Innis 是最早提出經濟與傳播面向的全球化理論家，他提供複雜的交易商品科技與傳播史料來說明全球化的兩個面向：殖民主義在北美的擴張以及 19 世紀殖民帝國對於遠方領土的競逐。除了全球化貿易理論，重讀經典，我們可從科技物的雙元性（duality）與符擔性（affordance）角度來思考 Innis 對媒體偏向的重視。

在本文前言中提及，媒體研究具有重視內容的傳統，媒體科技與形式本身相對被忽略。然而，媒體必然也是社會中的重要科技物，晚近傳播學者開始以科技的角度來思考媒體，例如 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2) 以社會形塑科技的角度來討論媒體，而 Raymond Williams、Roger Silverstone 等人也是此研究角度的先驅者，他們重視使用者如何經驗詮釋媒體並創造意義。至於 STS 研究的學者，諸如 Bruno Latour、John Law、Michel Callon 等人及其追隨者，則重視科技的特質，其設計過程及物性的成形，從歷史考據科技在不同年代被如何解讀，但他們極少將研究重心放在媒體科技。Wajcman & Jones (2012) 建議，傳播領域與 STS 研究大可更積極地相互跨界，以激盪出更多火花。我認為，雖然領域研究重點互異，重視媒體也是科技物的特點，即是研究跨界的核心概念。以媒體社會學與 STS 研究跨界的角度來看，Innis 及其所啟發的媒體生態學其實是此方向的先驅。

Silverstone 自陳其理論起源於 1980 年代檢討科技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背

airiti

景，他傾向賦予使用者更多主動性，也因此批評 Innis 及受之啟發的 Marshall McLuhan、Walter Ong、Joshua Meyrowitz 過於科技決定論 (Silverstone, 1994: 92)。Silverstone（同上引）討論電視時，提出媒體具有雙重構連（double articulation）的特性：作為科技物，它被購買並納入家庭的生活之中，使得收視戶得以參與全國或跨國的通訊網絡；作為媒體，其節目內容的產製結構帶領家庭從私領域跨入公共領域，又將公領域的話題流回私空間豐富其家庭文化。此構連的過程需要電視消費者積極的參與，因此他提出「馴化」（domestication）的概念，認為人們將媒體科技物置入並運用於日常生活中，有如馴化野生動物的過程，而電視就代表一複雜社會科技體系，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鑲嵌其中，包含物物相連的相互關係、中介資訊的過程、以及法規限制。Silverstone 引用 Innis 在《帝國與傳播》中描述媒介偏向的段落，據以詮釋時間偏向的文化強調歷史、延續性以及表演，其符號建立在迷思儀式、傳統、與宗教之上，價值建立於地方上。空間偏向的文化的重視土地、征戰、發掘、移動與擴張，科學、官僚與理性提供其結構與象徵，最後創造空間的社群。他質疑，Innis 主張能妥善管理時間與空間偏向的帝國才能存活，但難以解釋廣播、電視這類訴諸聲音影像且兼具口說與文字傳播的電子媒體，到底是時間還是空間偏向？

Innis 著作常被解讀為二分法，例如前段 Silverstone 的評論，又如 Watson (2008: xix) 以表格整理出理論所提及的《帝國與傳播》偏向：耐久媒體如石塊、泥版、羊皮紙，是質重的、偏向時間、耐久、傾向口語傳統、具延續性、產生詩歌、為宗教性政府所好、善用耳朵且是去中心化，而非耐久媒體如紙莎草、紙張、電子媒體等，是質輕的、偏向空間、重視擴張、書寫傳統、非連續的、產生新聞、為世俗與軍事政府所好、武力治國、善用眼睛而且是中央集權。Innis 若真以此二分法來推衍其理論，當難逃科技決定論的攻擊，但若仔細深讀其著作，應會得到不同的理解。由於《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與《改變中的時間概念》都是演講集，而非仔細梳理後結構分明的專書，內容也常引來自相矛盾的批評。不過，Innis 所謂媒體的偏向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概念，不宜用二分法來對照。

例如，Innis 寫到埃及王國時代，描述石板是時間偏向，莎草紙是空間偏向。在論及巴比倫帝國時，又指出北方將石材用於建築、雕刻與書寫，強調君王與中央集權，軍事使用岩材，利用鐵器和戰馬，強調空間；宗教組織採用黏土，強調時間與延續性。紙張是質輕易於攜帶，容易散布而具空間偏向，強化書寫文明；但當印刷與紙張結合時，因字母富有彈性，印刷文字近於口語傳統，方言生命力加強，助長散文以及科學的興趣，因此反而是復興口語文明的時間偏向。從這些

airiti

例子可知，對 Innis 而言，雖然媒體的材質或物性（materiality）的影響力值得重視，但非特定的媒材即「決定」其偏向。相同的媒體在不同的文化與帝國體系下，與其他媒體的競爭關係也有所異，因此石材在古埃及時代是宗教神權的象徵，其時間偏向是在莎草紙的空間偏向下被凸顯出來。石材到了巴比倫帝國時代是樹立法典、強調君王與中央集權，在宗教組織善用黏土版，強化時間延續的背景下，發揮其空間偏向。羊皮卷跟莎草紙相比，易於捲曲攜帶，應是空間偏向，但被修道院組織限用於鑽研宗教義理，因此又具時間偏向。紙張無疑比羊皮紙更容易散布，承載了書寫文明，但與印刷術結合之後反而彰顯了口述文明，所以也可說它兼具時間與空間偏向。從 Innis 的書寫脈絡來理解媒體偏向，可知其媒體影響力須視如何被使用而定，而使用方式也受到當時的科技、政治、經濟等條件所影響，批評他是科技決定論者並不公允。

作為學術研究路上的後見之明，以符擔性（affordance）的概念或許更能清楚解釋 Innis 理論。符擔性是 Gibson (1979: 127) 自創的詞，指環境提供的特質，使得適性的生物能夠生存。例如岩石為爬蟲遮去烈日的陰影，提供昆蟲躲避天敵的空間；河流則讓牛群飲水，河馬浸泡其中。人與動物都受到環境影響，環境形塑了他們的行為。岩石對爬蟲與昆蟲的符擔性不同，河流對牛隻與河馬的符擔性也相異，岩石與河流的特質是固定的，動物們則各有運用的方法。換句話說，物性是穩定的，與之互動的動物們具有默會知識，知道該如何恰當地運用之。Hutchby (2001) 將符擔性的概念用於科技物，他認為科技物的符擔性「邀請」人們做出適當的實踐。正如人們對談之間，問題總是邀請回答，也引導答案的主題—科技物的特性是穩定的，椅子的特性不會因人而異，它邀請人們坐下，要躺在上面也是可能，但是不舒服。不過，這並非表示椅子只限於拿來坐，也可能有其他的用途，須視當時的情境與需求而定。Hutchby 也將對話分析的譬喻帶入科技與社會研究，認為科技不會自己發言，但每一科技物都值得被視為文本，仔細推敲其隱含的意義。

媒體時空偏向可視為符擔性的展現，因此媒體本身的物性提供了可能性，也形成了相關限制，不過媒體會如何被運用，需視使用者、當時的文化情境、以及政治經濟等條件而定。一如 15 世紀紙張與印刷術結合之初，是復興了口語文明，強化方言的認同，鼓勵歐洲民族國家重拾神話，復興傳統；但 19 世紀以後大量生產與標準化的印刷資本主義，卻是過度追求空間的擴張而忽略口說傳承。回到 Silverstone 的質問，因媒體偏向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廣播兼具時間與空間偏向並非衝突。廣播因具有電子媒體的共時性與即時性，比報紙更具強烈的空間偏

airiti

向；然而廣播因運用口語傳遞而非文字，更能動員起原本紙張媒體所難以接觸的群眾，訴諸在地知識而非經典考據，強調感性而非理性，因此也具有時間偏向。Innis 認為，跟過度擴張空間的報紙媒體相較，廣播與之抗衡，倚重時間和延續性，促成二戰之後反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增長（見《帝國與傳播》最末章，《傳播的偏向》第三與第七章）。

從 Innis 角度來看，媒體的特質影響其偏向，帝國在宗教或政權等權力考量下的不同使用方式，也左右傳播知識的效率，帝國能夠長時間延續，通常表示在該時代的時間與空間偏向維持了一段穩定的平衡。研究 Innis 理論更重要的任務，並非急著將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原著尚未及分析的媒體歸類，而是理解傳播的過程，並注意到過度機械化對文明傳承的傷害，這也是他臨終前急切擔憂的問題。

肆、重讀經典的反思

本文回顧了 Innis 生平，其媒體偏向等相關理論的重點，並以科技與社會（STS）的觀點來理解深層的意涵。重讀經典，我們得以探究 Innis 對傳播與文明的關懷其來有自，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為加拿大的處境擔憂，但更為西方文明的演變著急，這是他對社會與文化的關懷。另一方面，他用功廣讀文獻，從歷史尋找解答的方法，以及理論創新的觀點，也為後續的傳播研究者立下基石

雖然大部分只討論歐洲與北美，Innis 確實是最早提出經濟與傳播面向的全球化理論家。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舊帝國——如大清帝國、俄羅斯、匈牙利等，擺不平內部民族自決的新勢力，與殖民勢力帝國之間如英法荷西葡之間的衝突。一戰、二戰乃至到冷戰與核武競賽，都是帝國之間競爭與對峙的延續：印刷術強化了方言國族主義將羅馬帝國拋在腦後，最後造成了民族國家獨立戰爭；電報電話有助於高速海洋探險，促成了歐洲帝國間的殖民競爭，醞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少不了廣播、飛機的貢獻。Innis 終身都關注於科技衝突、意料外的結果、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的慾望交織下的影響 (Carey, 2004)。

於 20 世紀初期主張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蔚為風行，以及科學決定論氣氛普遍影響學界，生長於此階段的 Innis 卻不以線性關係來看待人類文明，而是充滿憂心。工業革命之後，西方普遍詮釋人類從石器時代進入狩獵、農牧而後工業，意味著社會越來越進步的思維。但 Innis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強調，人類文明並非直線進展，帝國會興起也會衰亡，而接連爆發世界大戰的西方文明，可能已經來到另一個瓶頸。他反覆強調回到希臘文明「凡事勿過」（nothing in

airiti

excess）的哲學思維，呼籲西方警惕機械化與資本化的傳播方式，追求大量生產與標準化，帶來空間的拓展卻忽略時間，已經出現明顯的偏頗。他呼籲西方文明勿再一味追求量化擴張，應重拾口語傳承的傳統與本質，強調原創性的思辨，回復親身接觸與重視感情的傳播方式。

Innis 在《傳播的偏向》書中的最後一章〈挑剔的批評〉（A Critical Review），表現上看來是批判大學制度，但也用了相當篇幅指責近代西方科學崇拜壟斷知識傳播的現象：追求進步、相信科學資源無窮無盡，以為自己身處於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優越的時代，最後發明了原子彈。這種對科學與人造文明的痴迷已到了迷信的地步，也帶來災難。歷史研究讓他體悟到，掌握政治權力者總是想要獨占知識，只在乎眼前與尋求自我利益的滿足，被短視的論述所驅使。這同時若學者的聲音沉默甚或與當權者同流，依賴媒體如印刷或廣播強化當下的傾向，則更有可能助長毀滅。指稱 Innis 為科技決定論者的學者，若仔細研讀此篇對科學崇拜提出的嚴厲批判，應該會收回其推斷。

重讀經典，我們可理解傳統傳播理論只聚焦在媒體內容及其效果的侷限。Innis 以帝國作為媒體傳播效率的指標，反過來說，能否善用媒體有效率地傳播資訊與知識，是帝國能否延續的關鍵。從這角度看來，每一個文明都是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非獨我們所處的當下世代，而傳播也一直位於文明的核心。媒體作為人類社會中重要的科技物，扮演傳遞知識的要角，媒體科技的特性與社會中其他體系互動而有複雜的過程及後續影響，值得以更寬廣的角度來做傳播研究。另外，Innis 畢竟是西方的學者，其著作中以西方歷史為中心，有關東方文明的素材引用的不多，闡述也很簡略。西方文明當然不是人類文明史的唯一主軸，傳播是否在東方文明中也扮演同樣關鍵的角色？ Innis 的傳播偏向理論在東方的歷史脈絡下是否一樣說得通呢？在東方的文明發展與傳承過程中，傳播媒體又與帝國的勢力如何交織並相互影響？這些問題仍期待更多學術界嚴謹的挖掘。在臺灣的傳播研究中，傳播史是長期被忽略的主題，也由於戒嚴時期對日治研究的壓抑，關於 20 世紀以來臺灣接觸近代傳播科技細節，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依然有限。閱讀 Innis 之後，期待對東方的媒體史與文明史，也能激起更多的好奇與探索。

參考書目

Blondheim, M. (2007).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Harold Adams Innis. In R. Watson & M. Blondheim (Eds.), *The Toronto school of*

airiti

communication theory: Interpretations, extensions, applications (pp. 53-81). Jerusalem, Israel: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nis, Press.

Carey, J. W. (2004). Introduction. In H. A. Innis,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pp. vii-xx).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Goody, J., & Watt, E. (1968).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In J. Goody (Ed.), *Literacy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pp. 27-6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yer, P., & Crowley, D. (1991). Introduction. In H. A.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pp. xxv-xlii).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utchby, I. (2001). Technologies, texts and affordances. *Sociology*, *35*, 441-456.

Innis, H. A. (2008).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2004). *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1930).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23).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Toronto, Canada: McClelland and Stewart.

Innis, H. A., & Innis, M. Q.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Kroeber, A. L. (1944).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vrouw, L., & Livingstone, S. (2002).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In L. A. Lievrouw & S. M. Livingstone,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pp. 1-15). London, UK: Sage.

McLuhan, M. (1972). Foreword. In H. A. Innis & M. Q.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pp. v-xii).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Ong, W.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UK: Methuen.

Postman, N. (1970).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 C. Eurich (Ed.), *High*

airiti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pp. 160-168). New York, NY: Pitman.

Ricardo, 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ricardo/tax/index.htm

Silverstone, R. (1994).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Routledge.

Sorokin, P. A. (195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A study of change in major systems of art, truth, ethics, law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Boston, MA: Porter Sargent.

Spengler, O. (1926-1928).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C. F. Atkinson, Trans.). New York, NY: A. A. Knopf.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1923)

Toynbee, A. J. (1934-1961).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12).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jcman, J., & Jones, P. K. (2012). Border communication: Media sociology and S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 673-690.

Watson, A. J. (2008). Introduction. In H. A.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pp. ix-xxiii).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